目　录

•第一讲•

导　言

突厥碑文和纪念物研究的主要成绩，特别是鄂尔浑碑文的纪念物（8世纪）。

本讲得在短短的篇幅中尽可能地介绍俄国和欧洲学术界在突厥民族史领域中所取得的一些成就。这里要指出，这些成就还不算很丰富，还有大量有关的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说明。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研究突厥史的原始资料要求有一种集体协作取得的知识。

为了能理解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生活的历史，自然人们首先要懂得它的语言。可是突厥史的文献资料大多数不是用突厥语写成的。这样，一个突厥史专家就和俄国史或任何西欧民族史专家完全处于不同的境地。因为游牧的突厥人的历史大多数需靠他们有文化的邻人的报道来认识。纵然那里的突厥人由于征服文明国家，从游牧过渡到定居，文明国家处于突厥王朝的支配下，但是这些地方受到被征服者的文化的影响仍非常强烈，以致于他们的语言成为文学语言，特别在散文领域内，而不是突厥语。在东亚、特别是在蒙古境内生活的突厥人——他们大概在公元10世纪被逐出那里——的历史，几乎只有靠汉文资料才能知道。

关于迁往中亚西部[①]和受到伊斯兰文化影响的突厥人，我们

① 这本著作和其他许多著作一样，巴托尔德是把中亚当作中央亚细亚和中亚细亚本身来称呼的。——俄译本注

是从阿拉伯文的资料，特别是波斯文的资料中得到报道的。

此外，中世纪的突厥斯坦一般是没有自己的历史文献著作的，不管怎样，我们没有得到这种资料。这样，例如中亚蒙古诸汗的历史，帖木儿及其后裔的历史，几乎完全是从伊朗境内写成的著述中认识的。在公元16世纪才在突厥斯坦出现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它是由乌孜别克人写成的。在由乌孜别克人所建的三个汗国中有一个汗国——卜花儿（布哈拉）汗国直到其灭亡止除极少数例外，波斯语始终是官方文书用语和历史文献语言。在乞瓦汗国中是以中亚的突厥语来作这些方面的用语的。在霍罕汗国中，人们有时用突厥语，但更多的是用波斯语来写作的。在所有突厥人建立的国家中，人们只有当时的奥斯曼国家的历史是主要依靠突厥语写成的历史著作来研究的。可是奥斯曼国家的历史家的用语中也是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比突厥语多得多，它对于突厥族中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不懂的，对于突厥学者来说只有很少有兴趣的东西。用稍微纯粹的突厥语来写的历史著作一般说来几乎是没有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突厥学者很少同时又是突厥史学家的缘故。伊朗语学者也有相似的情况（如所周知，直至蒙古时代，人们研究伊朗史必须不是伊朗语写成的，而是阿拉伯语和希腊语写成的史料）。因而人们为了研究突厥民族史，决不能满足于只作一个突厥学者而已：按照每个人所关心的时代，必得或是汉学家或是阿拉伯语学家或是伊朗语学家。

鄂尔浑碑文

对于突厥学家和历史学家同感兴趣的少数碑文，是来源于公元 8 世纪的历史性的鄂尔浑碑文。它是最早的突厥语碑文，在公元19世纪下半叶被发现和解读的（它是突厥人自己写自己历史的

第一块碑文)①。这些碑文是属于历史上第一次自称为突厥的民族的，他们出现于公元6世纪，在短期内席卷从中国边境直至伊朗和拜占庭的全部草原。因此有关这个突厥族，我们所使用的资料就比单靠汉文资料来取得知识的以前的游牧国家要复杂得多了。公元6世纪的征服者来源于突厥族，早在解读他们遗留下来的鄂尔浑碑文以前就完全可以肯定。纵然突厥一词之汉文转写为Türk 的解释会引起若干不同的意见，但是东罗马史料中的Turkoi 一词的解释就不会有不同意见②。公元6世纪的突厥国家同绝大部分游牧国家之区别，在它一开始就不处于个人的权力之下，而是处于个别王朝的统治之下。统治这个国西部的汗一开始便完全独立，甚至接待外国使节和他们订约而不用先送东方，如同后来的蒙古帝国时代的金帐汗国最初几位汗那样。欧洲学者甚至汉学家的兴趣主要只是西突厥帝国，它具有各方面的文化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远东文化和前亚各国文化的媒介，虽然没有后来蒙古国家那样高的程度。法国汉学家沙畹的渊博的著作就是为西突厥而写的。沙畹的著作是20世纪初在俄国科学院出版的。这本著作把记载公元6—8世纪西突厥的汉文史料同拜占庭、亚美尼亚和伊斯兰史料作了对比③。西突厥没有遗留下有关本身的资料。直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他们只留下几篇短短的墓碑④。

鄂尔浑碑文几乎只说到半世纪，公元630—680年的事件，

---

① 关于古代突厥鲁尼（《鄂尔浑》或《鄂尔浑叶尼塞》)碑文发现和研究的历史，参考伯恩斯坦《6—8世纪鄂尔浑叶尼塞突厥人的社会经济制度》，第11—29页；马洛夫《古代突厥碑文》，第11—16页。——俄译本注

② 关于民族名称的汉文转述，参考波里瓦诺夫《突厥》、伯希和《起源》；郭洛生《突厥与蒙古研究》第84—88页；普里布兰克《中国的名称》。中国转写的现代读法——突厥。关于突厥族名其他语言的转写，参考克里雅什托尔涅欣《古代突厥碑文考》，第18—19页。——俄译本注

③ 沙畹，《西突厥史料》，巴托尔德书评，见《札记》卷十五，第162页以下。

④ 关于中亚古代突厥鲁尼碑文，参考马洛夫《塔拉斯的碑文》、《蒙古的古突厥文字》；伯恩斯坦《古代突厥鲁尼碑文》、《古代突厥文献》。——俄译本注

即东突厥为中国所征服的时期，以及在新的汗的权力下恢复其独立；在短期内，他们甚至把其西部的同族也征服了[①]。虽然从丹麦语言学家汤姆生发现解读这一碑文的钥匙开始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了，但是对这碑文的解读仍未告结束，同时有几处的解释直到现在还常常在争论。对于不懂原文的语言的人，在利用现有的翻译以作出任何历史的结论时，必须予以极大的注意。在说明碑文方面做了最大贡献的，是拉德洛夫[②]和汤姆生[③]的翻译。在他的最早的翻译出版后，汤姆生宣称，他不打算再研究鄂尔浑碑文，但是幸而他没有按自己原来的意图去做，他对碑文还继续作了若干研究。他的最后的翻译尝试是在1924—1925年[④]《德国东方学会杂志》上发表的。毕竟在这一尝试中除了对早先的翻译作了明敏而适当的修改外，也发现使人走入迷途的非常大胆的假设。属于这一方面的例子就是关于描写汗的兄弟阙特勤的一次出征的翻译，即当时敌人给阙特勤射了一百多次箭，按照阙特勤碑文的文句，箭射中了(jarygynda jalmasynda)，汤姆生把这几个字译成："他的武器和月亮形金刚石装饰"[⑤]，汤姆生建议用aj almasynda的读法来代替jalmasynda，并认为阙特勤在自己的甲胄上面有月亮形象的金刚石的装饰，即半月形的金刚石扣[⑥]。这样的事实对历史学家会产生很大兴趣，但可惜的是对原文的这种解释引起了更多的争论。

---

① 这里仅指北蒙的主要的《王的》碑文：毗伽可汗碑、阙特勤碑、暾欲谷碑。——俄译本注

② 拉德洛夫：《蒙古地方的古突厥碑文》，圣彼得堡，1895年，新辑1897年。

③ 汤姆生：《鄂尔浑和叶尼塞碑文的解读》，《丹麦皇家科学院通报·备注》，1893年；《得到解读的鄂尔浑碑文》，《芬兰·乌戈尔学会会报》，赫尔辛基，1896年；《突厥志》，《芬兰·乌戈尔学会会报》，第37期，1916年。

④ 汤姆生：《蒙古地方的突厥碑文的解读和导言》（施德译自丹麦文），见《德国东方学会杂志》第七八卷（新编卷三），第127—175页。

⑤ 《德国东方学会杂志》第七八卷，第151页。

⑥ 参考马洛夫《碑文》，第40—41页。——俄译本注

因为我不是突厥学家和语言学家，所以我不敢对少数几个字有争论的解释和有争论的翻译试图再发表什么意见。我只想起一个我认为是缺点的地方，这在汤姆生最后的译文中也还是继续存在的，在原文里写法完全相同的字有时在不同的地方作不同的读法和不同的翻译，我认为那只有在非常必要的场合才被容许。但是汤姆生有时为这种方法找借口，即使在人们随时可以用相当的字来读和翻译，得出极为满意的意义时也这样做。例如碑文里的常见字ölmek(死亡)也常常用之于全民族。但是这里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全民族的消亡，即民族的全被消灭，而是意味着民族一时的失败，随后接着会再复兴的意思。汤姆生也是这样来理解ölmek这个字的：他把它译成"崩溃"。但是他在许多地方又完全不必要地以ülmek代替ölmek，把它译成被分开(geteilt werden)，虽然在这个地方当作ölmek的读法和崩溃的翻译是具有远为圆满的意义的。特别明显的是janylyp ölmek即犯罪和因而崩溃的词句，这里表现崩溃是犯罪的直接而自然的结果，而汤姆生则译作是当你失信的时候你就被分开①②，依我看来是错误的，而这句在拉德洛夫的旧翻译中已经正确地译出来了。汤姆生最后的翻译首先是用丹麦文出版的，后来经过自己的同意和若干的修改后译成德文。德文的翻译者认为汤姆生这一最后翻译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以致要宣称拉德洛夫的译文是完全过时了③。但是我认为上述例子指出，读者在某些情况下，发现拉德洛夫的翻译对原文的解释要比汤姆生的翻译更正确些。

---

① 汤姆生：《蒙古地方的突厥碑文的解读和导言》(施德译自丹麦文)，见《德国东方学会杂志》第七八卷（新辑卷三），第127—175页。

② 参考马洛夫《碑文》③，第34页。——俄译本注

③ 同注①。

鄂尔浑突厥人的社会和政治结构

纵然有些句子引起了争论，但是鄂尔浑碑文一般说来是为游牧民族和游牧国家的生活提供了清楚的画面。游牧国家形成和解体的经过和欧洲人所理解的政治生活[①]有多大的差别，可以从拉德洛夫很早以前所写的书：《西伯利亚闻见录》[②]，以及他所出版的《福乐智慧》[③]（该书书名也称《论回鹘问题》被译成俄文）一书的序言中说明。拉德洛夫的意见，也为汤姆生所承认，在鄂尔浑碑文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游牧民族在其正常生活条件下是不追求政治上的统一的。每一个人在氏族生活的条件下，通过各氏族的生活和习俗而形成的联系中为自己找到了充分的满足，不需要任何正式的契约和建立一定的统治机构。在每一民族的这一发展阶段上，社会具有实现意志的力量，而不须实现权力的支柱，这一权力规定一定的法律的无上权力和一定的外部的强制力。国家权力的代表汗在有利的条件下能把整个民族或甚至几个民族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少出现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汗的统治地位也是由自己主动夺取的，他不是由任何人任命的和由任何人选举出来的。一个民族的人民之承认既成事实，往往只有在残酷的战争后，汗的本族人民在其统治之下联合起来往往是和长期的流血战争分不开的，而这是在游牧民为了征服文明国家的出征而拥戴汗为首领之后。为了要使本族人民承认汗的统治权的确立，这种性质的出征和与此相连的获得战利品就是唯一办法。

---

① 法译本作"国家"和"社会生活"两词。——汉译者注

② 莱比锡，1884年；第二版，1893年。

③ 《福乐智慧》，圣彼得堡，1891—1910年。

鄂尔浑碑文也提供了下列的一幅画面，即汗是出身于突厥乌古斯[1][2]人或是九姓乌古斯的，同时又和许多乌古斯（即他们本部落）以及和其他的突厥部落长期作战，鄂尔浑碑文对此叙述比对中国人和对其他文明邻族的战争的叙述要详细得多了。汗和其它臣民（自然也是）认为，后面这些战争是为给无食的饥民以粮食和赤身的人民以衣服的非常自然的手段。鄂尔浑碑文对于新游牧国家形成的历史只赋予一个新的特点，那是拉德洛夫没有注意到的：即在国家形成时起作用的非常重要的条件，这就是贫富之间、平民和伯克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在游牧民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由于财产和身分的悬殊，完全可以引起这种尖锐化。从碑文中看到，在中国统治的年代里，突厥的贵族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特权（正如文明国家的所作所为），比之普通人更轻易满足于外国的束缚和轻易违反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例如波兰统治俄国西部各省的时期所达到的那种严重程度，伯克之接受中国风俗还加重了人民群众对中国风俗的憎恨，汗王朝的代表便利用这个煽动人民反对中国的统治和恢复突厥的国家。中亚细亚游牧民族历史提供了一个民族的政治统一是在内部阶级斗争之后的另一例证——成吉思汗蒙古[3][4]帝国的形成。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成立是贵族阶级胜利的结果，成吉思汗不是同公元8世纪突厥可汗在自己的碑文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出力，而是说到他为他的贵族部属作出了贡献，他使他们（贵族）在故乡获有安全的地位，出征时取得丰富的战利品。在这种情况下，

---

① 参考《伊斯兰百科全书》卷二，第178页。以下简称《伊斯兰百科》。

②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五；关于托古斯·乌古斯（九姓乌获），参考普里布兰克的《几点意见》，哈美尔屯《托古斯·乌古斯》。——俄译本注

③ 《伊斯兰百科》卷一，第894页下。

④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617页。——俄译本注

关于阶级斗争的报道也只有保存在蒙古人的英雄史诗里①②，在说到蒙古帝国形成的许多汉文、阿拉伯文、亚美尼亚文和欧洲文字的史料中，很少涉及这方面，同样，无论是汉文史料或是其它史料，也极少说到突厥人的阶级斗争的。如果我们手上有关他们本身、他们内部生活的游牧民的报道越多，那末就越有可能提供更多的有关下面事实的证据，即在一个新的游牧国家形成的历史中，阶级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鄂尔浑碑文对突厥国家的构成和内部组织及对各种官职的名称等，提供了相当有用的资料。这种种名称也许不尽都读得正确，但现在已明确，其中有许多名称是非突厥来源的。例如"设"（sad）这官号是汗国王朝成员的称呼，它是一些部落的首领，这官号很可能就是伊朗语，和波斯语的šâh是同出一源的。其他几个官号由于其末后是用蒙古语多数尾音t，值得注意。伯希和教授1925年秋在列宁格勒举行的一个讲演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以t结尾的官号是突厥人从其先人阿哇尔（Avaren，汉文作柔然zóu—žan）③④接受过来的。伯希和教授认为阿哇尔就是蒙古人。按照伯希和的意见突厥人的全部国家构成都是仿效阿哇尔的。

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同突厥人与西方国家文明民族的关系的一

---

① 这里指的是《元朝秘史》。伯希和《通报》卷十四，1913年，第131页。直到现在只有俄文是全译的。这一史料的叙事诗性质，最早是巴托尔德认识到的。〔勘误〕《元朝秘史》的蒙文书名Mongolun ulgucha tolchiyan应作Monghlun nighuča tobčiyan（H. H. 施德）。

② 伯希和《蒙古的名称》，参看《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255页。关于这本名著（即《元朝秘史》）的最新版本和翻译，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一，第90页。——俄译本注

③ 关于名称，参考马迦特《伊兰考》，柏林，1901年，第54页。〔勘误〕zou—zan应作Zou—zan（H. H. 施德）。

④ 关于柔然考证为阿哇尔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参考沙畹《史料》，第221—223页；博特伯克《旁注》，第230页；豪西希《来源》；沙莫林《若干注解》。——俄译本注

般问题相联系，另一方面是同在他们以前出现的中亚游牧民族的关系相联系。直到最近，下面的意见占上风，即认为远东的文明世界一般几乎不受到西方的影响。布洛什在其1910年问世的《拉施特蒙古史导言》还主张，鄂尔浑碑文中凡非纯突厥的一切东西都以受到中国的影响来说明①，甚至蒙古人是在他们出征伊斯兰各国后才认识伊斯兰文化的②，而对中国文化蒙古人从一开始就很熟悉的，和这意见相反的最有力的理由是公元18世纪的突厥人以及13世纪的蒙古人存在着前亚的字母，这是最有力的证据。

鄂尔浑碑文的字母

鄂尔浑碑文的字母同早在公元18世纪所认识的叶尼塞河上流的碑文是一样的，当时已经注意到叶尼塞碑文中有几个字母和欧洲的字母相同。一般说来，从文字形态上看叶尼塞碑文要比鄂尔浑碑文早些③，可能属于公元7世纪。不能更准确地规定它的日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碑文中没有一个是附有日期的。就是在鄂尔浑突厥人所习用的十二生肖中也是一样。但根据汉文和伊斯兰史料，当时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流的是黠戛斯人（吉尔吉思人）。因而人们就必须把叶尼塞碑文归属于他们，而中国人恰好说到黠戛斯人是使用十二生肖的，以致于有些学者已经承认这个生肖是

① 布洛什：《拉施特蒙古史导言》，伦敦，1910年（吉伯纪念丛刊，卷十二），第183页。这一基本文明……其中全部不是纯突厥的，而是中国的。

② 同上书，第178页。

③ 汤姆生：《鄂尔浑碑文考》（毫无疑问的），赫尔辛基，1896年，第153页；稍次的是拉特洛夫《蒙古地方的古突厥碑文》，1895年，第300页（显然是绝大部分）。

关于叶尼塞碑文著作的年代，参看萨兹拉索夫《年代新考》，《碑文年代考》。——俄译本注

由黠戛斯人发明的①。

有关叶尼塞碑文和鄂尔浑碑文来源的最深入的探索，我们应归功于芬兰学者顿纳尔②③。他发现这两种碑文和安息钱币上的文字之间是极其相似的。安息王朝统治伊朗的期间是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后3世纪间。从那时以后，在新疆和中国内地邻接地区的考察探险发现了东伊朗语的文献，人们习惯叫它为粟特语。粟特是泽拉夫善河附近地区的名称，那里有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两个城市④。这些文献是公元第1世纪的东西⑤。新近故去的伊朗语学家哥提欧，对粟特碑文研究有素⑥，他认为叶尼塞字母和鄂尔浑字母可能是来源于粟特字母更早的形态，它比保存于最古的粟特碑文中，即公元第1世纪的原文中的字母还要早。但是直到现在所发现的突厥碑文还没有早于公元7世纪以上的。因此在未有发现按时代是接近它的粟特文原型的其他的突厥碑文以前，不可能科学地确定最早的突厥字母的起源和它的逐渐变化的过程。

突厥人显然不满足于单纯地接受现成字母，他们自己还增加

① 阿伯尔·莱缪塞：《鞑靼语之研究》，巴黎，1820年，第300页。关于古代突厥碑文的纪年制度，参看葛玛丽《古代突厥纪年法》，特别关于十二纪年动物周期，参看查哈洛娃《十二纪年动物周期》，杜兰《突厥动物十二生肖纪年》。——俄译本注

② 顿纳尔：《论亚洲北突厥字母的起源》，赫尔辛基，1896年。

③ 关于古代突厥鲁尼文学的起源，参看克里雅什托尔涅依《古代突厥碑文考》，第44—50页。——俄译本注
〔勘误〕Zwoelfel-zyklus des Tierkreises应作'Zwoelftier-zyklus'（H.H.施德）。
〔勘误〕第153页应作第53页。巴托尔德所反映的汤姆生的论断是不够准确的。（无疑的）不是指叶尼塞碑文的年代的（H.H.施德）。

④ 《伊斯兰百科》卷四，第511页。

⑤ 东土耳其斯坦书上的粟特文献年考，参考肯宁《年代考》。——俄译本注

⑥ 特别参考他的《粟特语文法试论》，其中也有关于从前文献的说明，巴黎，1914—23年。
〔勘误〕土耳其文版（T10,1）缺碑文，事实上它不是研究碑文的，而是研究第二世纪（不是第一世纪）书信的用纸的。它见于1931年H.莱舍勒特出版的英国博物馆手稿残卷11中。关于鲁尼突厥文字母来源于粟特文字母一说可参考汤姆生的评论卷三，1922年，第76页注1（H.H.施德）。

了若干符号，如描绘箭（突厥文0q）的形状的符号用0q或uq表示语音①。此外突厥人用的字母是适应他们的语言的发音特征的，特别是元音和谐律。因而最早的突厥字母必须同时也是被认为是突厥人所使用过的字母中最完备者。人们可以想象，除了碑文外，还用这种字母来写其它种种的东西。在一件由汗王朝的臣为汗而写的碑文中，其正字法是工整的，比之献给三个汗的同僚和大臣突厥政治家敦欲谷的碑文要工整得多。

碑文的文体和措辞可以令人信服地假定，这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并不象人们所想的在游牧民生活的条件下的那样低。汗甚至把全民都招来，诵读他自己留下的碑文，以便纪念他的成功和失败，而失败是由于人民违犯汗的命令而造成的。人们难以设想，在人民中间，读和写的艺术竟是那么普遍。但是比之人们依据沙畹②的话所进行的推测，碑文的文句倒是更为透彻地揭示了统治者的用意。即汗在碑文上只写他的"残暴的光荣的梦"而已。其中说到突厥民族在不幸的日子里血流成河，而没有说到在胜利的日子里其他民族的流血事件。它既没有叙述被杀死的敌人的数目，也没有叙述任何兽性的残忍行为，例如在亚述统治者的碑文中所记的那样。

宗　教

为了洞悉突厥民族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的宗教信仰也许是重要的。碑文几乎没有说及此事。它说到了对天、地的崇拜，有时使用下列的词句："突厥的天"(türkische Himmel)，"突厥的地和水"(türkische Erde und Wasser)。同一的tenri③一字是指

① 参考波里瓦诺夫《表意（文字）主题》。——俄译本注

② 《亚洲报》卷九，第14页，384页。

③ 〔勘误〕tenri应作tengri（tenrsi），余同此（H. H. 施德）。

物质意义的“天”和作为神的“天”[1]。从说到”地和水”（jer sub）的文句中人们同样可以得出结论，这里的意思是指一个单独的神而言，而不是当作地灵的全体的。汤姆生的最近翻译是突厥的神圣的地和水（Yer—sub），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引起误解。关于单独的神只提到小孩的保护神——乌弥（umai），汗把它比拟为自己的母亲。乌弥的崇拜在阿尔泰一直保存到最近的突厥人的萨满教中[2]。无疑的，突厥人是萨满教徒，虽然在碑文里找不到表示萨满 qam 的突厥字[3]（人们在叶尼塞碑文中找到在 tenri 旁边还有 bel一字，它分明是萨满所崇拜的精灵。在鄂尔浑碑文里却找不到这个字[4]）。我们在汉文资料的若干报道中也没有找到文明宗教传播的遗痕。在汉文的文句中，汗甚至自己想修建一座佛寺，但是汗的顾问敦欲谷却规谏他，并说佛陀的教义会损害突厥人的战斗特性[5]。关于从西方而来的宗教宣传我们知道得更少了。伊朗字母的传播和古代的腓尼基字母的传播一样，只通过商业关系，和宗教宣传毫无联系。伊朗的国教——祆教毫不作国际的宗教宣传。自从亚历山大一世出征以后，东伊朗地区长期以来和西部省区分裂，受到了印度文化和佛教的影响。佛教的传教士有时在伊朗人和突厥人中间使用印度字母。由于欧洲的新疆考古考察队，现在我们有了突厥文的佛教经典，这些经典就是用印度字母来写的。但是佛教徒很快就将粟特字母接受过来了。这粟特字母象我们下面看到的，也是在突厥人中间使用的[6]。

两种东方宗教——摩尼教和基督教的代表也把他们自己的字

① 参考罗克思《腾格里》、《宗教》。——俄译本注

② 参考德连科娃《乌弥》。——俄译本注

③ 参考罗克思《萨满的名称》。——俄译本注

④ 叶尼塞碑文中的伯勒（bäl）一词是由于误读的结果产生的，正确的读法是 äl。参考沙莫依洛维奇《不是《偶象》，而是《部落》》。——俄译本注

⑤ 比邱林，《资料汇编》卷一，第274页。——俄译本注

⑥ 关于古代突厥和回鹘的字母和书法，参考葛玛丽《古代突厥的书写文化》。——俄译本注

母带来，它们在中亚大概是从公元3世纪后开始传播的。摩尼教是在基督教以后形成的，企图把袄教的概念和基督教的与佛教的概念合而为一。但是在中亚的摩尼教的公开宣传是比基督教的宣传显然开始得更早的。在这时间，宗教和字母之间的联系已经开始了。摩尼教徒有他们自己的字母，同样基督教徒也有他自己的字母，名为“叙利亚字母”，而东方基督教的每一支派都有共同的叙利亚字母的异体。信奉摩尼教和基督教的伊朗人和突厥人长期以来都是使用摩尼字母和叙利亚字母的，但是在这中间也有用粟特字母来写的摩尼教和基督教的经典，在同样的突厥摩尼教著作的原文中有时例外地有两种抄本，一种是用摩尼字母写的，一种是用粟特民族字母写的①②。

在突厥一乌古斯国家消灭后不久，象我们在下一讲中将看到的摩尼教开始大规模地传播于突厥人中间。但是我们还没有关于公元6世纪至8世纪汗统治时期内草原上粟特贸易的成绩有多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宗教宣传的成绩有多大的报道。粟特商人和传教士的主要活动范围是通向中国的商道，这是很自然的。在这商道上成立直达罗布淖尔的粟特殖民区。我们从伯希和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早在公元7世纪粟特的殖民区已在罗布淖尔岸边建立起来了，百年之后仍享有一定的自主权③④。但是粟特商人同时在突厥的草原上，特别是在汗的驻扎地也能营业取利，同样，在

---

① 我们手中有用回纥文（粟特文）和摩尼文写的摩尼教的“忏悔祷文”，参看拉德洛夫《摩尼教的忏悔祷文》，圣彼得堡，1909年；勒柯克《一个摩尼教徒的忏悔祷告》，柏林，1911年；拉德洛夫、《科学院公报》，1911年第867页以下。

② 关于摩尼教在中亚细亚和中央亚细亚（新疆）的传播，以及伊朗和突厥的变种《忏悔性祷告》，参看阿斯姆生《忏悔祷文》；威丁格林《摩尼》。——俄译本注

③ 《亚洲报》卷二，七（1916年），第111页以下。

④ 关于粟特殖民罗布淖尔及粟特殖民中央亚细亚，也可参看吉勒斯《中国地理文献》，第827页；克里雅什托尔涅依，《古代突厥碑文考》，第94—101页。——俄译本注

这里成立了粟特殖民区。从约在公元 630 年旅行中亚的中国朝圣者玄奘的报道中，我们知道，象这样的粟特贸易城市在当时已经在西突厥境内一直分布到楚河两岸[①]。而玄奘[②]对自己经过的热海[③]南岸诸城市却还只字未提[④]。

但是这些城市在中国唐代的历史中早就有记载了。有关中亚城市史的报道中止于公元 9 世纪初。

萨满教的信仰特别在突厥人的葬式中表现出来[⑤]。从汉文的史料中我们得知，突厥民族中有在战士的墓旁建立被他杀死的敌人的雕像的习惯。鄂尔浑碑文完全证实了这种报道，又为我们提供了称呼这种雕像的用语：balbal 碑（杀人石）。这个词应是来源于汉文的。鄂尔浑碑文没有提到杀人石的建立是否和任何风俗相联系。但是从拜占庭的史料中我们知道在突厥汗的墓旁经常杀死为突厥人所俘虏的敌人酋长[⑥]。这种风俗无疑的是以下列信仰为根据的，这在其他相信萨满教的民族中间也看见，即那些被杀者在来世要为杀他们的或者为他而舍生的人服务。在这种信仰中，原始的异教和文明宗教有极大的区别，在和萨满教相当的发展阶段的各种宗教还没有伦理观念。对于来世的生活信仰不是以死后（在来世）受审判或死后（在来世）要负什么责任为前提的。人们不但不怕因为消灭别人的生命而受到处罚，反而正因为他杀死

① 关于粟特殖民七河流域，参看伯恩斯坦《粟特的殖民》；拉斯波波娃《粟特人的陶器》，最近的论文——有关研究七河流域粟特移民历史的详细的书目。——俄译本注

② 补注，班格：《摩尼教徒忏罪书》（今天水平的论著）（H. H. 施密）。

③ 《伊斯兰百科》卷一，第593页。

④ 热海，见《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437页。——俄译本注

⑤ 也可参看巴托尔德《有关葬仪的问题》，《巴托尔德文集》卷四，第 377—396页。——俄译本注

⑥ 关于古代突厥墓上的雕像，参看伊夫图霍娃《石雕》；格拉奇《古代突厥的雕像》，第 73—74 页；克兹拉索夫《关于古代突厥雕像的用途》；舍尔《石雕》。——俄译本注

的人越多，他在来世的命运也就越好。

碑文和碑文一起发现的纪念物在若干其他方面也证实文献上的报道，和排斥对此提出相反意见的异议。公元8世纪突厥人的杀人石从容貌上来看同从南俄草原开始的广大地区所发现的雕像相仿佛，俄罗斯民族称之为石巴巴（kamennaja Baba）（单数），即石女；多数为kamennyja Baby。除了有关突厥人所建立的雕像的汉文报道外，一个公元13世纪中期的天主教传教士卢布鲁克的记载中也提到这样的一种雕像，即面向东方的，是当时南俄草原的突厥居民——库蛮（俄国历史中的波洛夫谢尔人）所建立的雕像，虽然汉文的报道同与他们完全无关的欧洲报道是一致的，但是拉德洛夫在他的《西伯利亚闻见录》①中却认为，无论是中国人或是卢布鲁克都有错误，这些雕像（例如俄国境内的）事实上是在突厥人入侵好几百年以前就在那里建立的。这种假设的可能性是由当时还未发现通读叶尼塞碑文的钥匙的缘故。正如若干鄂尔浑的杀人石一样，许多叶尼塞的杀人石也保存有碑文，这些碑文在发现钥匙以后，便都作为突厥文解读出来了。于是所谓石巴巴的突厥起源在现在是不再有丝毫可疑之余地了。

拉德洛夫对于有关突厥的若干其他的汉文报道也提出异议。拉德洛夫的意见是，关于突厥人在其崛起以前在山里从事锻冶的汉文史料的报道是不合乎实际的。在他看来，游牧生活和金属冶炼是互不相容的②，关于这一点，鄂尔浑碑文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汉文的陈述。不管怎样，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民间故事中都显然提到游牧生活和铁器制造有联系。拉德洛夫还从中国人提到突厥人的火葬习俗中看出了文字记载和文物之间的矛盾，在拉德洛夫所发现的坟墓中都未显示出这种习俗的痕迹③。从鄂尔浑碑文中人们只

---

① 拉德洛夫：《西伯利亚闻见录》卷二，第122页。

② 同上书，卷一，第128页。

③ 同上书，卷二，第121页。

能看到，依据突厥人的民间信仰，人类的灵魂在死后变成一只鸟或一条虫。所谓人死，即他“飞走”了（üčdü）①。大家知道，在西方，突厥人长期以来，甚至在接受伊斯兰教后，“他死了”的意思，还用šungar boedy（即他变成鹰了）一词来表示。显然对尸体的保存不赋予任何意义。下面的报道就是有关这一方面的，即当突厥人和阿拉伯人作战时，突厥人的酋长的尸体留在阿拉伯人的手中，其不幸比之酋长本人的死亡还要严重得多②。但是这里宗教观念可能不起作用，而是羞耻的感觉，如同作战时妇女落人敌人的手中时感到是耻辱一样。对汗的葬地的发掘，其有关鄂尔浑突厥人死者葬仪的报道可能要比碑文详尽得多。这种发掘曾由拉德洛夫和他的合作者以及在他之后，最终于1925年由符拉基米尔佐夫教授所进行③。但是直到现在发掘时没有发现坟墓。最可能的是象其他许多民族那样，人们在埋葬汗时，预先掘好几个坟墓，并竭力保守秘密，不让人知道汗的尸体或者骨灰到底安放在哪一个坟墓里，以免被敌人侮辱他的坟墓。符拉基米尔佐夫教授的发掘最有趣味的结果似乎是在地下发现了一个突厥战士的雕像，这具雕像保存得很好，并呈现出突厥种族类型的一切特征。这样的雕像过去在坟墓外部的地面上也发现过，但常常是无头的，头是蒙古人有意识地砍掉的，他们相信，不这样做，太古人类的肖像会给现在生存的人类带来损害。这一例证表明，古代雕像的头，即使在伊斯兰教的宗教狂信不盛行的地方也被消灭掉，人们习惯地就以它来说明这种事实。进一步的发掘很可能会发现新的资料。直到现在，还很难有理由来否定有关突厥的火葬习俗的报道，当人们在草原上遇见有火葬的痕迹的坟墓和拉德洛夫所见

① 〔勘误〕üčdü应作učdy（H. H. 施德）。
② 《塔巴里著作集》卷二，1691年，第13行。
③ 关于古代突厥碑文鄂尔浑总体的新发掘，参看余新勃《导言》。——俄译本注

不同时候，汉人的报道就更不能否定[1][2]；中国人有机会经常就近看见突厥人的葬式，有几个汗在大敌当前逃往中国，并在那里死去的时候，在居民面前按照民族的习俗埋葬在那里，以致于几乎看不出有错误[3]。

这一讲企图说明对碑文和其他纪念物研究的主要成果，这些遗物是历史上第一次被称为突厥的民族所遗留下来的。有待研究的是，这些成果对于说明下面的问题会有多大作用，即从前生存的诸民族中，哪些民族在族缘关系上和这些突厥人接近或是隔得较远呢？公元6—8世纪突厥国家存在的事实对于说明突厥民族的未来命运有多大帮助，这些问题就是下一讲所要说明的。

---

① 参考科特维兹和撒莫依洛维奇《突厥遗物》，《东方学年刊》第四卷，第84页。（此条据俄文本《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30页翻译。——汉译者注）

② 关于突厥人火葬的风俗，参看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第509页。——俄译本注

③ 参考刘茂才《东突厥史汉文资料》卷一，第9—10、197、164页。——俄译本注

•第二讲•

突厥人的史前史

突厥民族及其邻族的亲缘关系
和语言的相互关系。

除上述原因外，还由于不同历史时代的阐述很不一样，使研究突厥人的历史和研究中亚各民族的历史，造成了困难。当我们掌握有关某一突厥民族或某一突厥国家历史特定时代的比较深刻的知识时，相反的为了报道这特定时代前后的这一民族或这一国家的生活，我们倒必须满足于任何个别的资料中所发现的片言只字。无论如何，它是理解历史过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为它有可能在自己发展的全阶段上来观察这一过程(但在资料中完全缺乏这样报道的场合，则随意臆测或简单假设就大有用武之地，而这必然有害于科学准确性的意义的)。

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鄂尔浑碑文在蒙古占领以前的，和中国邻接的游牧国家的历史上是个完全个别的现象。关于在突厥帝国形成以前，也就是说在公元6世纪以前出现于草原的游牧国家，我们必须依赖于汉文的简短记载。这些民族本身在退出历史舞台时没有遗留下有关他们语言的单词。

用来解决这一或那一民族所操的语言问题的主要资料，直到现在还是中国史学家所引用的少数单词，特别是名字和称号，他们是用汉字来转写的。根据中国文字的发音规则，人们就可解决这一词或那一词是属于哪一种语言以及它是怎样念的问题。鄂尔浑碑文对审核学者的结论提供了必要的资料，但结果很少令人满

意。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即研究者认为无疑的是突厥语，而假设又是由这种语言最优秀的专家所提出的，但是这种假设却远与实际情形不符。拉德洛夫在将要发现解读鄂尔浑碑文的钥匙的前夕，他在若干著作中，例如在他出版的《福乐智慧》[1]绪言中，试以汉文的转写来确定Chan这一称号的意义和发音方法[2]。鄂尔浑碑文证明，拉德洛夫的许多假设都是无稽之谈，例如在汉文中，他看作是bekg一词转写的，而事实上是biegä一词的再现，表示光辉“Glanz”的“ajdyn”一词在当时的突厥文中是不见的，代替拉德洛夫所建议的aidynlyq，必须读作aj tenri，余类此。

从鄂尔浑碑文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有些情况下往往是随意用某一中国名称来称呼他们所认识的民族，而跟该民族本身的自称毫无共同之处。如中国人常把“奚”和“契丹”并称。在鄂尔浑碑文里，中国人同样地把地豆于人和契丹人并称。所有的欧洲学者都一致认为，汉文资料的奚就是鄂尔浑碑文中的地豆于，虽然这两字的发音全然不同，但都是同一民族。学者的研究也由于下列事实而陷于窘境，即汉学家看来还未完全查明，在诸游牧帝国所处时代这一或那一个汉字发什么音，这一问题之仍未获得解决，对于那些研究突厥游牧民族史的学者是一个障碍。

匈 奴 人

利用汉字转写的帮助来证明这一或那一民族的语言的尝试曾做过多次。这类探索是从最早的游牧民族即匈奴人的语言开始的，匈奴人于公元前2世纪在中国的边境上建立了强大的国家，以后又迁往欧洲，特别在公元5世纪后，著称一时，过去人们一

---

① 〔勘误〕Kudatku Bilik应作Qutadghu Bilig（H. H. 施德）。

② 《福乐智慧》导言，第64页以下；此外，特别是《札记》，第265页以下。

般认为，现在仍认为匈奴是突厥人，更有甚者，中国人把公元6世纪的突厥人看作是匈奴的后裔。利用汉文资料中的匈奴单词来确定突厥语发音的诸尝试中，特别有名的是日本东洋史教授白鸟库吉①，但是他的结论是令人很不满意的，甚至作者本人后来②也把他所提出的比拟抛弃了，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匈奴的这些单词是可以借助于通古斯语作较妥当的说明的。

鲜　卑　人

在匈奴以后出现的统治东蒙古的那个游牧民族，我们只有通过汉字才知道它的名称叫鲜卑，其来源是通古斯就更少可疑的了③。它是当作匈奴的东邻和敌人来报道的。它是公元后1世纪末代替匈奴之在蒙古的地位的，和匈奴一样在中国本部的北边建立了许多王朝。同匈奴相反，直到今天的著作为止没有一个学者是把鲜卑人看成是突厥人的（人们一致把他们看作是通古斯人）。虽然这样，但是象伯希和教授在列宁格勒作的一次报告中所指出的，在汉文文献中是保存有鲜卑的词汇，而这些词汇不容置疑是突厥语从而无疑问的鲜卑乃是突厥人④。伯希和教授所报道的事实具有重大意义，证明人们在汉文文献中可以找到比人们迄今所设想的更为准确的中国游牧邻族的语言资料，何况这些事实又不

---

① 《科学院公报》，1902年。同时参考白鸟库吉《论匈奴和东胡的语言》，东京，1900年（东方文献《帝国科学院通报》，17，第01—033页）。

② 《亚洲报》202（1923年），第71页以下。
匈奴语言最近的鉴定，参看普里布兰克《辅音系统》。——俄译本注

③ 鲜卑，他们的语言和来源，参看施来伯尔《鲜卑民族》，伦津《语言的系属》，李格奇《语言学问题》，1955年第5期，第137—138页，——俄译本注

④ 伯希和关于鲜卑人的民族系属的提法，最近采取保留的态度；我不相信鲜卑就是通古斯人，但我不正式宣布他们的祖先是突厥人或蒙古人（《亚洲报》第224期，1934年，第35页注3）（H. H. 意译）。

是零星散见的，伯希和教授老早就在一篇论文里[1]提到有一部字典是鄂尔浑碑文中所报道的民族之一，即是鲜卑语字典。这部字典证明人们一直习惯地看作是通古斯民族的契丹，实际上是操蒙古语的。

柔　　然

我不太清楚，我在第一讲所提到的伯希和教授认为不容置疑[2]的下列的主张有什么根据，他主张突厥的先人“柔然”一定是起源于蒙古人的。他们征服的地方虽然没有后来突厥的那样大，但是却在公元5世纪和6世纪上半叶统治了中亚的东部。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在汉文资料中所表现的名称是中国人想出来的也和实际上的民族名称毫无共同之处。中国人只提到柔然或蠕蠕（žuan—žuan）民族，这两个词是指任何一个游牧民族的，而且是中国人对游牧民族侮辱的表现。Avar（阿哇尔）一词不见于汉文资料，但它是否出现于鄂尔浑碑文，仍有争论。人们提出意见，必须解释Parpurum或Apar—apurum（阿拔·拂菻）的象谜[3]一样的民族名称，它在鄂尔浑碑文中只有一处出现，在那里只提到过去的事，而没有提到碑文作者所生活的时代。汤姆生在自己最近的译文中认为Apar和Apurum两词是两个分立的民族的名称，并把其中每一个词都标上问号[4]。Avar一词在拜占庭，西

---

① 《亚洲报》十一辑，第十五卷，1920年，第174页（少量单语），根据这资料，伯希和论述了契丹的语言。同上，第146页以下。

② 《亚洲报》十一辑，第十五卷，1920年，第47页；此外，柔然本身可能是操蒙古语的。

③ 拂菻〔勘误〕purum（可这样念）即罗马人（‘Romäer’）的谜，1914年已由伯希和解决（《亚洲报》1914年，1，第499页），他的解释最近得到伊朗资料的证实（H. H. 施德《伊朗志》第27页以下，第36页以下）。

④ 汤姆生：《古代突厥碑文考》，第171页；克里雅什托尔涅依《古代突厥碑文考》。——俄译本注

欧和俄罗斯(在俄国的编年史上是以obry的形式出现的)的资料中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拜占庭人区分开真正的柔然Araren（根据他们的陈述,柔然Arars[①]是在东方消灭的）和采用Avaren的名称并以这样的名称而来到欧洲的人们[②]。但是我们这里见到的分明是同一的民族或是彼此有血缘关系的民族。

还有一些情况看来是有利于伯希和教授的主张的。属于这种情况是所谓古不耳阿里语，它们被保存于斯拉夫的编年史中，并和古代多瑙河不耳阿里君主统治时代有关。大家知道，不耳阿里人原来不是斯拉夫人[③]，直到今天，在他们类型上仍保存非斯拉夫人的痕迹。因为这些谜一般的词明明和斯拉夫语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人们力图以突厥语或和突厥语相近似的语言来解释。芬兰教授米科拉的主张特别有理，我们依据十二生肖的纪年来确定这谜一般的词产生的时期。可是日历上的马年不用突厥字来表示，而似乎用蒙古语morin[④]来表示[⑤]。

象这样的事实在从前是会完全不能理解的。假如柔然是蒙古人的话，那么morin一词就会通过他们传到西方去的。我只局限于这一例子，没有讲到一些学者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较多、而成绩较少的探索，他们要在有历史记载的蒙古出现以前很久的时期去发现西方的蒙古字。就是伟大的学者也难免提出大胆的假设，为了说明它是怎样的性质，可以看看马迦特的探索，他以阿姆河上流[⑥][⑦]一省的名称支汗那一词来和蒙古语的白色相提并论，虽说支汗那一词一般说来是否即为蒙古语仍有争论，但是马迦特却根

① 土耳其版作斯拉夫编年史的若干手稿。

② 费欧费拉克特·西莫卡塔，《历史》，第159—160页；麦卡特尼《论希腊资料》第266—267页。——俄译本注

③ 普里查克：《不耳阿里王表》。——俄译本注

④ 《芬兰·乌戈尔学会杂志》，第三十卷，(1914年)第12页。

⑤ 〔勘误〕morimb即蒙语morin（H. H. 施德）。

⑥ 《伊斯兰百科》卷一，第845页以下。

⑦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三，第558—559页。——俄译本注

据这词的大有可疑的比拟当作时间上第一次的确切不移的词来表示[①]。

另一方面伯希和的意见会受到严厉的反驳。柔然或Avaren的统治势力早在公元5世纪就扩张到相当大的区域，在西边至少达到中国突厥斯坦的哈喇沙尔，因此导致了厌哒或白匈奴（他们后来为突厥所征服）向西进入阿姆河流域的新迁徙。蒙古民族[②]对于这个时代的事件的进程所起的那样的重要作用是难以理解的，因为中亚的考古学探险直到现在尚未发现成吉思汗帝国形成以前时代的任何蒙古文原文。此外，并不排除下面的可能性，即在柔然统治的时代里伊朗人和其他西方民族之与中亚游牧民族的贸易并没有达到后来在突厥统治下的那样发展的程度，虽然我们知道公元5世纪伊朗——粟特商人和迁往欧洲的匈奴维持商业关系正如他们和在中国边境内建立中等国家的匈奴人维持商业关系一样。

无论如何，伯希和教授的报告指出，科学界有理由期待汉学家在有关历史上起过作用的游牧民族来源问题方面，提供比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更确切和更有价值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于语言学研究的进步，可以期待它对历史学会起良好的影响或至少由于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可望其消除从前的错误，以前那种完全不科学的语言系属的提法才不再可能成立。

突厥方言的比较语言学

直到现在，人们仍相信匈奴或其他古代游牧民族的词汇和现代突厥方言的单词联结在一起是可能的，而不追问一下，该词是否以现有形式存在于古代[③]。例如在白鸟教授的著作中，他引用中

① 《东突厥语方言研究》，第71页，注2。
② 〔勘误〕应作一个蒙古民族，即柔然（H. H. 施德）。
③ 〔勘误〕应作现代方言的单词是否以同一形式存在于古代（H. H. 施德）。

亚的突厥字"（比）（Bi）"来说明见诸公元前记载的诸民族之一的统治者的官衔，而"（比）（Bi）"是古代突厥字匐（Bek）[①]的很晚近的变形，在公元15世纪以前根本是不存在的，同样马迦特[②]也相信为了说明有关蒙古地方的铁勒（T'ie-le）民族的汉文资料，可以把它和意谓"河川"的Etil一字联系起来考察，而这字却是假自楚瓦什人的，除鞑靼即窝勒伽河突厥人外，不见于其他任何的突厥民族。

碑文和在中亚发现的古代突厥宗教文献的碑文也许可能在科学的基础上来探讨突厥语逐渐发展的问题，以及某一个词是属于什么方言和什么地区的问题。如果人们能发现蒙古语的古代碑文，那么蒙古语和突厥语的比较研究工作也能在研究方法方面接近于印欧语和闪语语言学的语言比较研究。只要没有比公元13世纪更早的蒙古碑文，那么蒙古语的历史就要比突厥语的历史更模糊不清[③]。

除了古代的碑文的帮助外，语言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借赖活的方言的帮助来进行。在一切语言中曾有这样的例子，即在活的方言中保留了在文学语言中早已消失的古老形式。但是突厥学家和蒙古学家在这上头比那印欧或闪语言学家还处于更为不利的境遇中。在我的学识范围内，蒙古方言彼此是很相似的，尚未达到能提供做出任何历史结论的资料的程度。突厥方言比较大的多样性可以从突厥人分布于广大得多的地区来解释。然而，即使是突厥学家除了大多数关系比较密切的突厥方言外，只有两种分离的、远隔的语言，即雅库特语和楚瓦什语。这两种语言和其他突厥方言的比较可以为说明突厥语历史以及和它的语言有联

① 〔勘误〕Bek应作Beg（H. H. 施德）。

② 《古代突厥碑文年代考》，莱比锡，1898年，第95页。

③ 关于契丹碑文属于蒙古语（系）的假设，参看塔斯钦《判读研究》；同时参考巴托尔德《七河史纲》，《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上册，第48页，附注2。——俄译本注

系的突厥民族史，提供了若干资料。

雅库特语和楚瓦什语

雅库特语是属于一种这样民族的，即从古代开始就和其他突厥民族分离，迁往极北地方的，因而不再参与全突厥人的历史生活。另一方面，楚瓦什语却保存于窝勒伽河流域的一个地区，这一地区是突厥人从中亚迁去的地方。有理由假定，这种语言在中古时代，其分布地区要比今天大得多。阿拉伯地理学家着重指出，从南俄的裴奇内格至中国近邻的突厥人的各种方言是相似的，并补充说，有一种语言是特殊的，别人不懂的语言，就是居住在窝勒伽河中游的不耳阿里人和可萨人所说的，他们的语言也和芬兰民族所操的语言有区别。的确有这种情况，即今日的楚瓦什语和芬兰方言相比是较接近于突厥语的，但同时它又为突厥人和芬兰人所不理解。窝勒伽河的名称无论是不耳阿里人和可萨人中间都用相同的字：阿得（Etil），即楚瓦什语作"河川"解释的。所有这一切都使得突厥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楚瓦什语是从前不耳阿里人，或者也是可萨人所操的语言的残余。

关于楚瓦什语的性质问题长期以来都是学者争论的对象。拉德洛夫把这一种语言看作是突厥语和芬兰语混合的结果，接着其他的学者力图证明楚瓦什语中保存有突厥语发展较早阶段的残余，而在其他的方言中绝大部分都已消失了。这一问题最近的研究者波甫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这方面的著作，发表于俄国科学院公报①。根据他的意见，楚瓦什语属于和突厥方言和蒙古方言同一的组别。但是它已不和前者（突厥方言）相同，也不和后者（蒙古方言）相同，而是形成了这一组别的独立的第三分支。当

① 《科学院公报》，1925年，第33页以下，第405页以下。

在列宁格勒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①，波甫承认楚瓦什语是突厥语，但是它是蒙古语已从突厥语分开以后的早期的语言发展阶段的残余②。虽然这样，但是它还未取得突厥文学语言和突厥方言的特征③。

如果这一结论在科学上被看作是定论的话，那么它对于历史学家会具有重大的意义。不耳阿里人和可萨人不见于公元 6 世纪以前的记载，无疑的它和公元 6 世纪突厥帝国的创立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在这以前就生活于窝勒伽河流域。的确，他们来到这里是和匈奴一名有关的，是这一民族的著名的民族迁徙运动引起的。早在公元 2 世纪，即地理学家托勒密的时代④，匈奴就住在离窝勒伽河不远的地方。Etil 是楚瓦什人以及最后是普通突厥人对窝勒伽的名称，这在当时还没有记载可考，可是耶亦克（Jajyq）河名在当时却是突厥的名称，这在托勒密的著作中是以Daix的形式见之于记载的。在土著居民的语言中，以单词的首音 d 来代替单字的首音 j 的情形就是在较后的时期即在托勒密时代以后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据公元 6 世纪的拜占庭人的报道，突厥人对死者的葬仪称为多舍（dochia），而在鄂尔浑碑文中相同的字是以约克jog这一形式出现的⑤⑥。这一现象和今日楚瓦什的发音特征不

---

① 〔勘误〕土耳其版（T.24,6）："但是由于讨论在列宁格勒科学院发生的这一问题"（H. H. 施德）。

② 〔勘误〕语言研究应作"语言发展阶段"（H. H. 施德）。

③ 关于楚瓦什语同其他突厥语的关系，参考哥罗夫：《现代楚瓦什语》；色勒布连尼可夫：《楚瓦什（人）的起源》；巴斯卡可夫：《绪言》第188—200页；本精：《楚瓦什语》。——俄译本注

④ 〔勘误〕应作"在托勒密之后"（H. H. 施德）。

⑤ 〔勘误〕jog应作jogh，这一词在喀什噶尔《突厥语词典》中也有，参考布洛克曼的编译本，第92页（H. H. 施德）。

⑥ 关于Даикс和Дохия两词，参考莫拉夫西克《拜占庭突厥志》卷二，第116、119页。关于耶亦克河名的古代形式和地名的词源学，参考伯恩斯坦《关于Джскания的古代的痕迹》，第18页；阿布哈齐《土库曼系谱》，科诺诺夫出版，第81页，附注20。——俄译本注

完全一致，正如楚瓦什语一样（其他突厥方言的）单词的首音 j 是以 s 音来代替的。但是这种发音现象的历史，正如一般突厥语和楚瓦什语发音的变化史一样，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无论如何，在托勒密著作中所见到的Daix一词在年代学上可以视为最古的突厥字。在一定时期的文学遗产中当有记载可查。

历史事实使人假设，如果楚瓦什语是代表突厥语发展较早阶段的残余，那么处于这一阶段的匈奴语也就不会是突厥语，象人们对突厥一词所通常理解的那样，也就是说现在各突厥民族（雅库特和楚瓦什例外）所说的那种语言。这种语言大概是由匈奴人带到西方去的，其残余见于直接或间接与匈奴迁徙有关的所有语言中，直至也包括匈牙利语有突厥语的因素。

其次带往西方的，还有假自中国的若干单词，在匈牙利语中有表示"书写"概念的，其语根和突厥语相同的bitimek一词①。人们把这个词的来源归之于汉文②③。突厥语本身的最早的发展阶段很可能就是匈奴人的东邻——鲜卑。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希望鲜卑——中国语字典的尽快出版，伯希和教授曾报道有这一字典。

印度司乞特人

有关突厥民族在公元前的和公元后最初几世纪在中亚西部活动的论断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证明。古代古典文献中在这方面特

---

① 〔勘误〕关于匈牙利语的说明是由如下的混淆产生的，突厥语biti—在匈牙利语作 betue（字母），而表示书写的匈牙利单词ir（写），在突厥语中作ghaz，参考龚波兹《匈牙利语言中不耳阿里，突厥语的借词》第22期，第104页。

② 参考白鸟库吉在《科学院公报》（1902年，第16页）的论文，以及沙畹在《亚洲报》第十辑第五卷第65页以下的文章。

③ 参考葛玛丽《古突厥语语法》。——俄译本注

别重要的是希波克莱特斯的著作《空气、水和土》[1]，我们只能得出下面的结论，即希腊人除认识印度欧罗巴民族外，还知道另外一个集团的民族。但是在这后者中是否包括突厥人，仍有疑问。沙畹根据他的关于十二生肖起源于突厥人的理论，倾向于把公元前2世纪的征服者，看作是突厥人，他们在中亚建立过延续许多世纪和同时包括印度地方在内的帝国，希腊人把这一征服者看作印度一司乞特人。当人们向沙畹指出，列入十二生肖的走兽也有的不见于突厥人的地方，例如猴子的时候，他回答说，突厥人早在公元前1世纪征服印度的时候就熟悉猴子了[2]。今天看来，无论是十二生肖的突厥起源说，或是印度一司乞特人的突厥起源说都已不再有附和者了，虽说在沙畹以后，另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夏德[3][4]宣称赞成这一说法。著名的生肖说似来自印度，而中国人又从那里假借过来。在很早的时候它又从中国人那里传给突厥人。

吐火罗人

在印度一司乞特人中，吐火罗人占首位。这一名称在中世纪保存于阿姆河上游的吐火罗地区的命名中[5]，虽然伊斯兰教著作家对这一名称的民族来源一点也不知道[6]。吐火罗人早先居住于中国突厥斯坦，而在中亚佛教的诸文字语言中也提到吐火罗语。

① 希腊文本，由琼斯出版，《罗布古典文库》，伦敦，1923年，卷一，第65页以下。

② 《通报》二，七，第122页。

③ 《暾欲谷碑文跋》，第48页。

④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286页，附注19。——俄译本注

⑤ 《伊斯兰百科》卷四，第874页。

⑥ 巴托尔德，《吐火罗》；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三，第514页。关于吐火罗及吐火罗语，参看巴托尔德有关语言的问题，本文集卷二，下册，第461页，附注1；施文特纳，《吐火罗参考书目》。——俄译本注

直到现在，这一名称是通过在东突厥斯坦的欧洲考察队而知道的，这一名称问题在我们已经熟悉的语言中属于哪一种语言，还有争论的余地。但是这种争论只是围绕着两种印欧语言来进行的，一种是在和阗发现的文献，另一种是在库车附近发现的文献。

突　厥　人

我们今天称说一种“突厥”语的人们为突厥人，毫无疑问，其出现在年代上要早得多。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充分的理由来假定，“突厥”一字是在公元6世纪以前就存在的。关于这个字的意义和起源只能付之揣测而已。汤姆生在自己最近的著作里，发表如下的主张，“突厥”一字是指一个独立的部落或者更恰当的说来是指以汗为首的朝代①。Türk或Türük一字本身依汤姆生的意见，原来是意味着“力量、强大”②。但是这一揣测在鄂尔浑碑文中找不到相当的句子，在那里Türk一字看来不是用来当作民族名称的意义。汗称突骑施人民的可汗为türkim budunym即“我的突厥”、“我的人民”。汤姆生把这一句翻成属于我的突厥、我的人民。如果türk一字在这里具有普通名词的意义，那末人们不如采用创造、创造物、设备安排的意义。因而汗认为反抗他的是突骑施可汗，其实自己的权力就是依靠他的。承认Türk一字和在鄂尔浑碑文中出现的，意指“法律、风俗、习惯的”（türü）一字有联系，但同时也承认“由法律联合起来的群众”，那是可能的。汗说道：“他们把他们的努力和力量，他们的人民和他们支配权都献给

① 汤姆生：《古代突厥碑文考》，第122页。——俄译本注

② 〔勘误〕汤姆生认为türk实际意谓力量、强大，乃出于缪勒《回鹘志》卷二，第97页（1911年）的证明，türk与türü（更确切是törü）的结合是不可理解的（H. H. 施德）。

了我。"①

鄂尔浑碑文没有明确回答在当时哪些部落已被称为突厥人的问题。同时也不大清楚，这个称谓是怎样传布于各国民族间和怎样取得了它今日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汗叫自己的人民为Türk，同时也称做乌古斯或者是九姓乌古斯②，虽然在碑文的一些句子中把乌古斯或九姓乌古斯称作汗的仇敌。甚至在还没有找到通读鄂尔浑碑文的钥匙以前，拉德洛夫就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公元6世纪至8世纪的突厥人是属于乌古斯的民族的③，而碑文完全证明了这一看法④。乌古斯或突厥在另一方面又分为许多民族，其中如突利失（Tölös）、达头（Tarduš）以及西方的突骑施⑤。除了乌古斯以外，还记载有若干突厥部落，即是我们今天所习用的意义的突厥人。其中有后来很出名的葛逻禄、回纥和黠戛斯。但是不能证明这些民族在当时是被称为突厥人的。给突厥一字赋予语言学上⑥的意义，即它现在所具有的，也就是说作为整个突厥民族的集合名词的，可能就是伊斯兰教徒的著作。阿拉伯人提到公元7世纪和8世纪中有很多民族说着和突厥人说的同样的语言，他们开始把这一切的人都称为突厥人。突厥民族在信奉伊斯兰教后，他们自己也开始采用这一名称，虽然直到今天还有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自己不当作突厥人，自己说的语言不当作突厥语。在伊斯兰教范围以外，突厥一字是传播不广的，除很少的例外。

① 关于Турк一语和它同mōpy的关系，参看科诺诺夫《研究》；阿布哈齐《土库曼人系谱》，科诺诺夫出版，第81页，附注21。——俄译本注

② 我国韩儒林先生也作"乌鹘"，参看《史学集刊》第四期，第46—47页，《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王静如先生作"乌获"（李仲勉：《突厥集史》（上）第462页引）；日本护雅夫作九姓铁勒《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I），第449页。——译者注

③ 《福乐智慧》导言，第77页。

④ 试参看曾里布兰克《几点意见》；哈莫尔屯《托古斯·乌古斯》。——俄译本注

⑤ 关于铁勒和达头，参看库留金《新资料》。——俄译本注

⑥ 〔勘误〕"语言学上"没有什么意义，按照土耳其版，应删去（H.H.施德）。

即在佛教文献的一个纪念物中，它的语言被称为突厥一回鹘语①，在往后的时期里，无论是俄罗斯人，或西欧人都不把裴奇内格人或彼洛夫谢尔人（库蛮人）称为突厥人。"突厥"一字在欧洲只是用来称呼②塞尔柱克民族和后来的奥斯曼帝国的民族，他们完全象（鄂尔浑的）突厥人一样，是乌古斯的后裔。在俄国编年史中有托尔奇Torki一名，这大概是和突厥同一意义的，但是它是用来指拜占庭史料中称为乌兹Uz即乌古斯的民族的。

黠戛斯人

在鄂尔浑碑文中人们所找到的一切民族的名称中只有一个在汉文资料里见到了。那是在很早的时期里（碑文以前）即结骨（今作柯尔克孜人和吉利吉思人）一名③。结骨早在关于匈奴时代即公元前后不久的事件的报道中就有所记载。伯希和教授④用奇尔昆的蒙古语单数形式来说明以坚昆形式⑤表现的黠戛斯一字的最早的汉文转写，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最初取得有关黠戛斯人的报道，是通过某部蒙古族的⑥。关于柯尔克孜人和他们的国家，即叶尼塞河上游的比较精确的汉文资料，只有有关突厥统治时代的。在这个时代里出现了一个不准确的转写的黠戛斯，它只是完全准确转写的吉利吉思（Ki-li-ki-si，又作Kie-kia-sseu）

① 《金光明经》卷一、二，圣彼得堡，1913年，第5页（佛教丛书，卷十七）。
② 〔勘误〕原文stark（第34页）不可理解，应删去，代替突厥人的是鄂尔浑的突厥人，参考土耳其版T.28,4。
③ 同时参考巴托尔德《黠戛斯》，《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上册，第475—543页，以及那里所指出的有关黠戛斯最近的文献。——俄译本注
④ 《亚洲报》第十一辑第十五卷，第137页。
⑤ 现在的转写为цзянькунь。——俄译本注
⑥ 关于黠戛斯的族名及汉文的转写，也可参看祖也夫《坚昆的名称》，彼得罗夫《关于〈吉尔吉斯〉一名的词源学》，巴斯可夫《关于〈吉尔吉斯〉族名的来源》。——俄译本注

不准确的再现。当叶尼塞河上游即明奴辛克州地区的现在突厥居民在俄国革命后和俄国其他俄罗斯的异族一样，取得了民族独立的时候，他们便须要一个民族名称，而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而且在沙皇统治时代也没有必要。明奴辛克的知识界当时便从汉文的资料借来了哈卡斯（Hakas）一字，他们知道中国人这样称呼从前居住在明奴辛克州和在政治上起了某些作用的民族的，但不知道，用这一称号把吉利吉思人叫得不准确了，现在明奴辛克州不再存在这一名称了。

唐代的汉文历史引用了若干吉利吉思字，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吉利吉思人已操突厥语了。在这些词中例如哀（aj）是月亮的意思。同时从汉人对吉利吉思人的外貌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在人类学特征方面和其他突厥人是有区别的。他们的毛发是淡色和金黄色的，他们的眼睛是蓝色的。汉人这方面的见证，也在伊斯兰教徒的著作中得到了证明。公元11世纪波斯历史家格尔德齐曾采用过我们不知道的，所未掌握的史料，同样说及吉利吉思人是赤发的和有淡色的皮肤①。

从他的话语中，人们看出，由于这一特征，甚至假定吉利吉思人和斯拉夫人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马迦特②认为这是指来自欧洲的某一民族迁徙，是否事实，无法证明。有关吉利吉思人以后的报道，也没有提供解决下一问题的材料，即这些特征是怎样逐渐消失的，在最近以前还称为哈喇吉利吉思人的吉利吉思人的类型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形成的。

在汉文史料中，有关吉利吉思人的早期报道指出，他们的国家早就纳入了国际贸易交往的范围。这同一事实也从明奴辛克州所发现的古物获得了证明。从供给考古学研究资料的丰富方面来

① 巴托尔德：《中亚科学旅行记》，原文，第85页以下。
② 《东突厥方言研究》，第67页。

看，明奴辛克是超过西伯利亚其他的全部地区的[①]。但是要确定这些遗物的年代，则同所有其他地方一样，是件极为困难的事。哪些遗物是属于一般的突厥民族，哪些遗物是属于吉利吉思自己的，其中哪些遗物是属于较为远古时代的等等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热烈的争论。在伊斯兰教徒统治时期，有许多商队来访问吉利吉思人的国家。他们输出的主要物品是当时人们予以巨大意义的麝香。把伊斯兰教地理学家的早期报道和他们的后期报道加以比较，可以设想，这一时期吉利吉思人的文化是在逐渐发展的。最早的伊斯兰教徒的报道，同汉文的报道一样，只提到吉利吉思可汗的唯一的都城。除此之外，在吉利吉思的国土里没有固定的居民区，他们有部分人营游牧生活，有部分人甚至还处于狩猎生活的原始阶段。另一方面刺失德丁[②]提到在蒙古时代在吉利吉思国家，有许多城市和农村，除了贸易的关系外，在明奴辛克州的肥沃地方还有利于农业文化的发达。

突　厥　化

吉利吉思人提供了一个民族的先例，即可能原来不是突厥人，而后来被突厥化了的。象这样的例子无论在游牧民族或定居民族中间都有许多。在以前统称为乌拉尔阿尔泰人的五个部落中：芬兰[③]、萨摩耶德、突厥、蒙古和通古斯中，受突厥化影响最深的是萨摩耶德民族住地南部边界上的各部[④]。这一同化过程直

① 关于明奴辛克盆地黠戛斯时代的考古学遗迹，参看古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第559—636页。——俄译本注

② 原文见《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卷七，第168页以下。

③ 〔勘误〕Finnen土耳其版亦同，应作Finnougrier(H. H. 施德)。

④ 有关乌拉尔阿尔泰语言学的假说，即推测乌拉尔语（芬兰·乌戈尔语、萨摩耶特语）和阿尔泰语（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满洲语）在发生学上是有亲缘关系的。参看波南《导论》，第125—129页，现今不承认乌拉尔语和阿尔泰语合为一个语组的说法，虽然有些研究人员柯令德尔、历山宁、孟

到现在还未结束。在最近才受到突厥化的萨摩耶德人乃是卡拉加先人，还有未完全突厥化的是卡马辛纳。这后者即卡马辛纳人是居住在东西伯利亚的，他们操突厥语（雅库特人除外）。

卡斯特伦早在1848年在同一地方遇见操萨摩耶德语的人。拉德洛夫在1863年发现卡马辛纳人已经完全突厥化，但是这一过程并不象拉德洛夫所说的那样，因为在他们以后很久有一个研究人员即芬兰学者卡依·端纳还发现有认识萨摩耶德语的老人①，萨摩耶德人的一个突厥语名称图巴虽不见于鄂尔浑碑文，但却见于同时的汉文史料中，即拓跋。

阿 热 人

在鄂尔浑碑文中所记载的非突厥来源的民族中也许还有阿热人(Az)，他们的名称常常和吉利吉思人的名称在一起提到。在从前人们怀疑阿热一字是否应当作民族名称的意义来理解。起初我是同意这一意见的，汤姆生在他最近的翻译中也是赞同这一观点的。汤姆生称阿热为来源不明的民族。在叶尼塞河流域的下游，即图鲁罕州，发现有这一民族的最后残余，俄国人错误地称之为"叶尼塞的奥斯恰克人"。可是事实上这一民族既与居住于鄂毕河沿岸的属于芬兰部落的奥斯恰克人无关，也与乌拉尔阿尔泰系民族无关。这一叶尼塞河的奥斯恰克人自称是科特(Kott)或阿散。公元1843年卡斯特伦搜集了有关这种人最早的语言资料，以后阿努钦

格思仍是乌拉尔、阿尔泰语亲缘说的拥护者，同时参看谢尔巴克《论词汇关系的性质》。——俄译本注

① 关于南西伯利亚诸部落首先操萨摩耶德语，后来由于操突厥语邻人（卡马辛纳人、马托勒人、奎巴列人、戈托夫人、泰吉人、卡拉加先人）的影响而丧失自己语言特点的情况，关于萨摩耶德语，参看特列普科《撒摩耶德语》。——俄译本注

深入地研究了这一民族的语言和生活①。可能是这样的，“叶尼塞河的奥斯恰克人”和萨摩耶德人一样曾据有比现在广大得多的领土，鄂尔浑碑文里的阿热人就是属于这一部落的。除阿热人外，在鄂尔浑碑文里还记载有和吉利吉思人一起的绰人，但是后来似乎就没有记载他们的资料了。

吉利吉思在当时已起到若干政治作用，他们的首领是可汗，鄂尔浑碑文对他们比对那些在极短暂的时间内就取替突厥—乌古斯地位的民族，即东方的回鹘和西方的葛逻禄较为尊重。这些民族的崛起显然是短期的产物。在碑文里只提到回鹘一次。但是原文这一节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什么理由来怀疑这个字的读法，和怀疑同时存在着一个特殊的民族名称：回鹘，它跟乌古斯一名毫无共同之点。回鹘的首领具有比较吉利吉思可汗的头衔较为谦逊的头衔即俟利发（根据汤姆生的读法是 āltāi）。汤姆生承认这个字的作用类似于突厥政府官员或相当的职位一字的意思。但是人们没有发现任何地方有某一可汗任命俟利发的记载。然而奉俟利发为首的民族被看作次于奉可汗为首的民族②。葛逻禄同样也不是由可汗来统率的民族。

鞑 靼 人

在碑文里同时记载为非突厥的民族的是鞑靼人，即蒙古人后来所采用的名称（鞑靼）。人们在碑文中看到九姓鞑靼和三十姓鞑靼的名称，这可确定为鞑靼民族的两个集团：一个分为九个部

---

① 卡斯特伦：《研究》；阿努钦受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委托，于1904—1908年研究克特语所搜集的资料没有发表。所谓叶尼塞部落（克特人、科特人、阿散人、阿冷人）于19世纪时丧失了自己最早的、彼此有亲缘关系的语言。这一“叶尼塞”组语言有时列入古亚细亚语，虽然也指出它们和其他古亚细亚语没有直接关系；同时参看卡尔格尔《克特语》。——俄译本注

② 〔勘误〕eltebirlik应作eltebirlig；qaganlyq应作qaghanlygh（H. H. 施德）。

落，一个分为三十个部落①。

突厥人走向定居

最难解决的问题是突厥人同定居文化关系的问题。很明显，突厥人全部或者其中大多数人在这个时期是游牧民，同时他们虽然受到了中国人定居文化的影响，还受到西方民族，特别是粟特人的影响，在起源于粟特人的词汇中，可敦②一词是指女主人“贵妇”的意思，人们早在突厥碑文里就看到上述单词，而后来就在突厥和蒙古人中间广泛地流行起来。粟特人和他们的国家在碑文里是以Soghd 和Saghdaq的名称来记载的。我们还在后来伊斯兰的资料中遇见这两词。有一处除Soghd 外还有Berecker Boqaraqulus(读法是可疑的)③，马迦特④把它们翻译为："粟特的伊朗人和布哈拉的人。兀鲁思(ulus)一字作为“人民”(Volk)的意义虽然出现于古代突厥宗教文献中，但不见于碑文里。它的使用在某种场合少的缘故，大概在同一地方有budun一词。以下的情况就更少见了，即ulus同budun同在一处，而意义又差不多。Parsi（汉文波斯）之改变为Berčeker 在语言学上同样是不大可能的。虽然这样，但是马迦特的解释还是被汤姆生最近的翻译所接纳，虽则是带着问号⑤。

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是在经济需要的压力下进行的。这一种需要首先表现于东突厥斯坦，那里几乎没有饲养牲口的牧

---

① 关于鞑靼族名的使用情况，参看《黑鞑靼情况》，第133页。——俄译本注

② [勘误]chatun-chanym，chanym 可删，chatum 代以 qatun，土耳其版正确(H. H. 施德)。

③ 马洛夫：《古代突厥碑文》，第33、43页。——俄译本注

④ 马迦特：《古突厥碑文的年代》，第32页以下。

⑤ 《古代突厥碑文考》，第156页。参考这些词的新解释——克里雅什托尔涅依，有关这些词的意义。——俄译本注

场，那里的全部土地既无沟渠来灌溉，又无供给牧场的地方，只有沙漠，既不适于饲养牲口，也不适于农业。根据最近考古学的发现，对于下列事实已不会有丝毫的怀疑，即西突厥斯坦原来不是突厥人的地方，同时东突厥斯坦也是一样，当地的突厥化是在逐步地进行的。当地土著人口的突厥化必然是伴随着突厥人的迁徙到定居生活而出现的。这两者的过程和路线都是相同的，即从东到西。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突厥人口之大量涌进东突厥斯坦，首先是蒙古地区的九姓乌古斯国家，其次是回鹘帝国的瓦解以后，但是在鄂尔浑碑文里人们已发现表示城市（Sfadt）的balyq一词，以及表示"五城"（fünf Städte）的Beš(Biš) balyg（别失八里）的名称①，即在今天中国突厥斯坦东部也就是现在古城附近所发现的城市②。

这一时代居住在别失八里的突厥人，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记载。从11世纪的著作家马木特·喀什噶尔的叙述中③（下面还要讲到），我们知道，balyq一字在突厥语中是"黏土"（Lehm）的意思④。因而这城市的得名是依据建筑材料来确定的，正如阿拉伯人一样，他们用毛之民和"黏土之民"这两个术语表示游牧民和定居者，ahl、al-wabar 的意思是用于修帐蓬用的(骆驼、山羊)毛之民，ahl al-wabar是泥块、黏土之民。当时在别失八里居住的突厥人也就是中国史书所记载的拔悉密。根据杜坎治（Du Cange）的关于中古时代拉丁文作家的辞典⑤⑥，我们可以看出 Basmyl一

① 《伊斯兰百科》卷一，第758页（别失八里条）。
② Bishbalik，《巴托尔德文集》卷三，第374—377页。——俄译本注
别失八里不在古城附近，而在吉木萨北旧城址。——汉译者注
③ 〔勘误〕喀什噶尔著作中关于balyq的叙述是不确切的，参考布洛克曼编译本，第29页（H.H.施德）。喀什噶尔人名的译法，按我国习惯地人名一致。——汉译者注
④ 《突厥语词典》，君士坦丁堡，1333—35年，卷一，第316页。
⑥ 杜坎治，《拉丁文著作家辞典》，最先在巴黎出版，1678年。

词有这样的意义:“混合、混血来源的人”，这是很自然的，即过渡到定居生活的最早的突厥人，在血统上已经不是纯突厥的了，他们和同地区的早先定居的居民混血了。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也把拔悉密看成是非纯突厥民族的一部分。东突厥斯坦的突厥化更广泛的问题，首先是和突厥乌古斯帝国瓦解而产生的后果问题，其次是和回鹘帝国衰微的情况相联系的，关于这个问题是下一讲所要讨论的。

〔勘误〕这一引证是不可确证的。巴托尔德显然是注意到Ducange的《希腊文作家辞典》Glossarium ad scriptores mediae et infimae Graecitatis(不是Latinitatis)卷一，第181页中的basmoijloi (gasmojloi)，但关于它的突厥的来源和Basmyl一名的系属毕竟是极可疑的 (H. H. 施德)。

⑥ 杜坎治，《希腊文著作家辞典》卷一，第182页。——俄译本注

·第三讲·

突厥斯坦的突厥人

东突厥斯坦的突厥化。745年乌古斯国家和840年回鹘国家的崩溃。摩尼教、佛教，基督教和东伊朗、粟特文化的传入。

鄂尔浑碑文是为突厥乌古斯可汗撰述的，在碑文中说明了汗的统治和权力是极其巩固和不受任何方面的威胁的，但是在汗逝世十年后即 745 年，蒙古地区的统治便转到其他一个突厥民族——回鹘的手中了。在此之前几年，突厥乌古斯的西支在和大食（阿拉伯人）的战斗中也失去了自己政治上的统一和自己的可汗。

根据汉文资料，西突厥乌古斯分为十个民族，其中五个住在伊犁河北岸，五个住在南岸①。根据汤姆生的翻译，碑文里的十个部落被称为on oq（十箭）②。有一个时期，其中的突骑施部落显露头角，出现了西突厥最后的一个可汗。那时候阿拉伯人仅为防御突厥人侵入文明区域，不想进军草原内部和进迫在楚河的突厥可汗居留地。但是由于西突厥可汗在药杀水（锡尔河）岸与阿拉伯人作战失败和丧命后，他们的国家也就覆没了。内乱持续了好几年，但如今业已不为阿拉伯人的活动所左右了。到了766年，另一突厥民族——葛逻禄才取代了占据楚河岸的突厥乌古斯的位置。

① 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7—28页。——俄译本注

② 汤姆生：《突厥志》，第4—17页。——俄译本注

和伊斯兰教初次接触

在中亚阿拉伯人主要的成功是在705年至715年，即当屈底波担任呼罗珊执政的时候。从鄂尔浑碑文中，我们知道在这时期的后半期内，东突厥人短期内占领了突骑施国家，势力及于铁门关（Temür qapugh）①即布兹加拉隘口，当时是粟特和吐火罗分界的地方，换言之，即泽拉夫善河盆地和阿姆河上游喀什卡达里亚盆地的文明地区国家。汤姆生②正确地把这隘口的位置定于撒马尔罕和巴里黑之间的道上，但是同时又错误地确定为“粟格特亚那和费尔干纳之间”。大家知道，从粟格特亚那到费尔干纳之路是往东北方向走而不是象前往巴里黑的路那样是向南走的。按当时的情况来看，不独是西突厥而且是东突厥，很可能和阿拉伯人处于敌对的关系中。鄂尔浑碑文有好几处也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其他学者又怀疑这种解释，例如有关阿拉伯侵人中亚的时代有稍后的著作即年轻的英国学者吉伯③的著作中也否定这种解释④，即阿拉伯一词也不见于鄂尔浑碑文。同时也显然不见于波斯人，中国人和突厥人的著述中。首先是波斯人，其次是中国人以及或许是突厥人是用大食（tâzik）一字或依突厥语发音的tezik（täzik）或teğik(täğik)⑤⑥ 去称呼阿拉伯人的⑦。大家知道，

① [勘误]Temür qapugh应作Temir qapygh(H. H. 施德)。

② 《鄂尔浑碑文考》，第137—138页。——俄译本注

③ 关于东突厥远征中亚，参考克里雅什托尔涅依《古代突厥碑文考》，第141—161页。——俄译本注

④ 吉伯（Gibb），《阿拉伯人之征服中亚》，伦敦，1923年，第45页以下。

⑤ [勘误]tâzik应作täzik，teğik(täğik)是不存在的，巴托尔德大概认为是喀什噶尔著作中所列的tâz ik(H. H. 施德)。

⑥ Täzik今天解释为阿拉伯人，首先见于暾欲谷碑文及8世纪的其它碑文。参看萨莫洛维奇的论文，《科学院汇报》1927年，第155页以下；《东方学年刊》卷四，第101页。

⑦ 8世纪碑文《库里—楚拉碑文》，参看萨莫洛维奇《最古的记载》；科特维兹和萨莫洛维奇《突厥碑文》，马洛夫《碑文》，第429页。——俄译本注

这个词表示完全不同的意义，早在公元11世纪时它是表示伊朗民族和非阿拉伯民族的(非阿拉伯人，大概是指伊朗来源的人)。显然人们首先是这样来称呼阿拉伯人的，其次一般指有伊斯兰文化的人们，再次是指伊朗民族，他们在突厥人所信奉的伊斯兰教徒中是占多数的民族①。

其次突厥人和伊朗人区别之处是他们没有受到伊斯兰教徒的武装征服。阿拉伯人在征服阿姆河、泽拉夫善河和锡尔河的文化区域后，在公元8世纪时②还是采取防御的政策，他们和前人一样为了保护文化区域不受到游牧民的侵入起见在这些河流沿岸修建了长城和壕堑③。大家知道，为了防御野蛮人的入侵，从大不列颠直到中国本部和满洲的整个文化世界范围曾兴建了这样的工事。在中亚这样的最早的工事，是远在伊斯兰教传进以前就有了。这种设备是公元前4世纪所建立的，大抵是为了保护本处文化区域不受非突厥族来源的游牧民的入侵的④。在阿拉伯人（侵入）以前，有一道城墙是为保护粟特东北地区由粟特人建筑的，它必然是准备对付突厥人的侵入的。这道城墙的遗迹直到今天还保存着，正如阿拉伯人为了保护粟特省，布豁地区和柘支（塔什干）四周而兴建的那些城墙的遗迹一样。在阿拉伯人侵入以后，即伊朗萨曼王朝开始的时候，这样的长城已不再建筑和维修了。萨曼王朝在这里采取了出击政策。但是他们的进攻多属于突袭性质，而且伊斯兰征服的地区就是在萨曼王朝时期，也扩大的并不多。并入伊斯兰占领地的只有从奇尔奇克（Čyrčyq）河谷至呾逻

---

① 关于大食一词的来源及其意义，参看施德《突厥的名称》；里夫施兹《粟特文献》，第87—88页。——俄译本注

② 有关这方面情报的编纂，参考巴托尔德《突厥斯坦》，今有英译本（订正和补充），见《吉伯纪念丛刊》，（新编）卷五，1928年。

③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巴托尔德文集》卷一，第128页。——俄译本注

④ 〔勘误〕斯特拉波 § 516，应作斯特拉波，第516Č页。一般是卡沙波奴斯所引巴黎版的页码（H. H. 施德）。

斯河的地方。

波斯的文化活动

纵然突厥人很少受到伊斯兰武装力量的威胁，但是由于伊斯兰教之传入中亚，西方文化对于突厥人的影响还是显著的。早在萨珊王朝的时代，波斯对中亚的影响已逐渐代替印度的影响了。波斯在萨珊王朝的时代支配了海陆世界贸易的通道，而萨珊国家当时也在这一方面和其它一切方面达到了它的崩溃前的极盛时期。

萨珊王朝时代的波斯不象多数其他东方国家那样，显示逐步发展逐步崩溃的形象。正象德国历史上的最近时期一样，萨珊国家历史上突然出现了崩溃的现象。它是在对外扩张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后精力极度紧张的结果。这一成就特别是在西方和东罗马帝国战争中取得的。由于同突厥人联盟，在东方很短时期内就取得了若干成就。但是以后就和突厥人决裂了。此外，正如在阿黑门尼德王朝时代一样，萨珊王朝时代在西方的作战不能保卫住东方边界。因而突厥人就能把波斯人从注入里海的固尔根河流域驱逐出去，自从突厥人占领这个地区以后，他们深受波斯文化的影响，并接纳了袄教①。

这一例子表明萨珊王朝的波斯即使没有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也能通过自己的文化和经济影响了他们的邻人。从这里也许能说明在粟特佛教遭到了排斥，袄教恢复其作用。通过中国高僧玄奘②公元630年遍游中亚的行记，我们能作出判断，在中亚袄教胜过佛教这一事实是属于萨珊王朝的末期的。玄奘时佛教在粟特已不存在了。当玄奘离开当时佛教昌盛的东突厥斯坦，越过粟特南

① 《英雄史诗》，《歌谣集》卷九，第21页。

② 玄奘：《西域记》，日玉莲翻译，两卷，巴黎，1857—1858。

境来到吐火罗后，他才发现佛教寺院。在粟特首府——萨末鞬（今撒马尔罕）还有两间空寺院。袄教徒不让佛教徒在任何一间寺院集会，并用燃木来驱逐他们。只有玄奘才能再恢复那里的寺院，自然，只是短期而已。玄奘对萨末鞬的叙述证明佛教之被驱逐出粟特是在他旅行前不久才发生的。

佛　　教

在突厥斯坦的多次考古学考察队明确了在那里有粟特语的佛教文献，这一文献被翻译成突厥文，也一定对突厥人发生了影响。这些文献的主要研究人即已逝世的伊朗学家哥提欧认为它不是公元 7 世纪以前的东西。假如是这样，那末这些著作不是在粟特写成的。但是也不能因此而排斥哥提欧所提出的日期。在中亚由粟特人所建立的许多殖民区中佛教还可能延续了若干时期。

在突厥人受到佛教影响的时代中，不但印度的僧侣，而且连印度的商人也来到了突厥人那里。作为这个时代的反映是萨尔特（Sart）一词的出现，它开始由突厥人用为"商人"的意义，而且在公元11世纪时仍是只有这一意义。今日被证明[1]，这个字是由印度传入突厥的[2]，显然是在主要为印度商人来到突厥人那里的时期[3]。后来印度人的商业逐渐转入伊朗人的手中。但是到了伊斯兰时代，即在公元11世纪后，萨尔特这个词在突厥人和蒙古人之间才取得了民族的意义，即指中亚的伊朗人，那里突厥人公

---

① 《观世音菩萨》《佛教丛书》，卷十四，圣彼得堡，1911年，第 37 页，有关文献的详细报道，见Sart词条，《伊斯兰百科》卷四，第187页以下。

② 〔勘误〕在中世纪北伊朗语文书中发现有 Sartvâ（商队领队），起源于梵文 Sârthavâha。见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1934年，865，18。突厥语 Sart不是直接从印度语传入，而是经由伊朗语借入的（H. H. 施德）。

③ 巴托尔德，《萨尔特》，参看《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下册，第 527—529 页。——俄译本注

并视之为商业民族。

突厥斯坦的波斯化

波斯人对中亚的影响到了伊斯兰时代大大地加强了。现在波斯人对中亚的影响不再是仅在文化方面而已。在亚历山大大帝和塞琉古王朝以后中亚的伊朗人和波斯的伊朗人第一次在伊斯兰时代联合成为单一的国家。大多数的波斯人公然和阿拉伯人一起进入突厥斯坦，并在这里居住下来。中亚的伊朗人保存有关于古代波斯沙（王）的传说。中亚的伊朗方言逐渐为波斯语所排斥，形成了为伊朗和突厥斯坦的伊朗人所共同的一种波斯文学语言。中亚伊朗的早期语言（其中有粟特文学语言）为现在的塔吉克语所代替，它和波斯语很少有区别。波斯语的唯一对手是突厥语，波斯语和这一对手的竞争对波斯语来说常常是不利的。自从伊斯兰教最初几世纪以来开始了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的两种过程：

1. 活的伊朗方言逐渐为波斯文学语言所排挤；

2. 包括波斯文学语言在内的伊朗方言逐渐为突厥语言所排挤。

值得注意的是，突厥语在波斯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大。例如如果突厥人和波斯人同住在一个村子里，那末突厥语就逐渐成为当地居民的共同语言[1]。

同伊斯兰教接触

伊斯兰教在中亚一经建立统治权以后，伊斯兰教徒即开始利

---

① 伊凡诺夫关于哈玛丹近郊乡村记载，见《地理学杂志》1926年2月号，第143页。

用从前的商路。根据中国历史，伊斯兰商队早在公元 8 世纪就从葛逻禄地方通往叶尼塞河上游，黠戛斯地方了。在伊斯兰教文献中同样保存有关于这个地方路程的资料，一部分和鄂尔浑碑文的报道一致。萨彦岭具有相同的名称：碑文和伊斯兰教资料都叫它为曲漫山。同样记载着通往曳咥河(额尔齐斯河)的两条道路的报道。曳咥河也见于鄂尔浑碑文中，里面说到东突厥汗几次进军到那里。但是无论是鄂尔浑碑文也好，或者是中国的历史家也好，都没有提到生活于曳咥河沿岸的突厥民族。这个民族的命名第一次出现于伊斯兰教文献中。阿拉伯人最感兴趣的自然是通往中国之路。在伊斯兰教文献中关于这条路和沿途居住的突厥民族有大量的资料。但是关于蒙古境内的民族以及他们在成吉思汗出现前在当地所扮演的角色，则在前蒙古时代的伊斯兰教文献中却只字未提，虽然我们从中国的文献中知道公元 924 年在蒙古境内已发现有伊斯兰商人①。在伊斯兰学者的报道中，黠戛斯人的国家就算是蒙古最外面的地区。根据他们的想象，黠戛斯人的国家一直伸延到东洋。

伊斯兰教徒进行的贸易是相当可观的，伊斯兰教著作家的地理文献涉及的内容很广泛，可是他们对中亚和东亚的伊斯兰教徒的记载一般说来都没有预想的那样明瞭。要使用这些资料常常会感到出乎意外的困难，因而得出错误的结论。最困难的是确定有关伊斯兰资料各种报道的时代。同阿拉伯著作的其他部分一样，阿拉伯的地理学文献主要也是书面的知识。至少比起根据书面资料而编纂的著作，我们得到的依靠自己亲历目睹而写成的旅行记是不很多的。相同的记事往往由不同时代著作家无止境的重复着。显然，这一记事并不属于援用它的著作家的同一时代，而是属于比著述家早一百年或更长的时代。著述家往往把自己或同时

① 布莱德施奈德：《中世纪研究》卷一，第265页。

代人所搜集的资料和别的书的资料混淆一起，并没有对资料的各个方面加以任何的甄别。读者从中得到了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书中所说的一切都是属于同一时代，即作者所在的时代的。甚至著名的学者也往往轻信大胆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力图说明某一时代的著作家曾发表过这种意见，而其实这一意见是只字不易地从一部很早撰写的书籍中抄袭来的。最近在地理学家雅古特13世纪所写的著作中也发现存在着这样的错误。在那里叙述了突厥人和拜占庭人同为伊斯兰教徒的敌人，他们给伊斯兰教带来了许多害处。但是在另一部公元13世纪的著作中，当时突厥人已在伊斯兰民族中取得了重要的地位，就很少出现这样的文句。原因是他们看见文句里提到在突厥人中十叶派和其他的异教广泛流行。可是实际上雅古特的文句是只字不易地从公元10世纪末的一位作家木喀西达的一本著作中引来的，而这位著作家同样可能是从其他的书面资料中拾取来的①，因而关于突厥人加害于伊斯兰教的文句是在这样的时代撰写的，即公元10世纪的著作家一般所叙说的，当时除了黑衣大食（阿拔斯朝）哈里发和其它伊斯兰统治者的突厥籍亲兵以外，还没有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而非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和拜占庭人同样是伊斯兰世界的外部敌人。

如果要对伊斯兰教资料中的每一种资料都提出是属于哪一时代的问题，那末这一问题的解决由于在草原发生的历史事件几乎完全缺乏报道而感到困难。阿拉伯人对于各突厥民族间发生的战争和一个游牧民族国家为其他游牧民族国家所代替的事是不大关心的。如果没有中国资料和部分的希腊资料，我们对于事件的过程就会完全不了解。因此我们对于东方、蒙古地区和中国突厥斯坦所发生的事件比之中亚草原西部所发生的事件要清楚得多。

① 《伊斯兰杂志》卷十三，第74页；卷十四，第111页。

回　鹘

只有靠汉文资料，我们才知道公元745年蒙古地区的突厥乌古斯国家为回纥所代替。回纥可汗的主要所在地也是在鄂尔浑河流域，离后来由蒙古人所修建的和林城的所在地不远。象遗址所表明的，在回鹘可汗所在地的附近同样修建了一座城市，其规模比较蒙古时代的城市还要大得多①。回鹘成立约一百年，即到了公元840年，为来自西方的黠戛斯人的袭击所消灭。汉文资料又指出，在蒙古居住的游牧民的战争后果是从蒙古被排挤出来的游牧民迁往中国突厥斯坦（新疆），在那里过渡到定居和城市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东部虽然民族有交替，但看来最早的突厥移民即拔悉密所立的传统，还是得到了保存。

在鄂尔浑碑文中有拔悉密统治者亦都护的头衔，亦都护按字义说即"神圣的幸福"或"神圣的君主"的意思。在突厥语中 Idiqut 一词如果指统治者说即作为欧洲的"君主"使用。在公元13世纪上一地区的回鹘统治者具有亦都护同一形式的头衔。

蒙古地区的突厥乌古斯有一部分在迁到中国东突厥斯坦以后，中国人称为沙陀（Ša—to），即草原居民之意。这一批突厥人早在公元9世纪初期就据有别失八里城，其后由于自己西方同族人的压迫只得继续向东进入中国领土内，参加了在公元9世纪后期在中国爆发的内乱，并从暴动者中挽救了中国皇帝的宝座。公元10世纪上半期在中国西北的小王朝中也有出身沙陀突厥族的王朝②③。

---

① 关于蒙古中世纪初期的城市，参看吉谢列夫等《古代蒙古城市》。——俄译本注

② 关于沙陀三王朝，参考沙畹的《西突厥史料》，1903年，第272页。

③ 有关沙陀突厥的历史和文化，以及他们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的较为详尽的报道，参看爱伯哈德《征服者及统治者》。——俄译本注

公元9世纪下半叶被黠戛斯族驱逐出蒙古地区的回鹘人来到了以别失八里城为中心的地区，并在那里定居下来。这件事出现于860年左右，在这里成立了回鹘汗国，它一直延续到蒙古时代，即公元第14世纪，由回鹘建立的其他汗国，是在中国内地，即现在的甘州城。在这事件以前不久，中国人和吐蕃在这个地区发生过战争，这里的统治权多掌握在吐蕃的手中。公元11世纪有吐蕃的一支，即党项（唐古特）把这个地区的回鹘人驱逐出去并在这里建立了国家，后来又为蒙古人所征服。从此以后，这地区遂名为西夏。在西夏生活的回鹘人此后失去了政治的作用，但是他们仍然留在那里，部分地保存了自己的语言，这是最早的突厥方言的一种。只有这里的甘州回鹘还部分地保存了鄂尔浑碑文和其他回鹘文献中所独有的计数法，即和下一个较大数字相结合的形式。如bir jigirmi（字面上是21），不表示21，而是表示11的意思（向着20方向的1），Ceu otuz不表示“31”，而是表示“21”的意思等①②。

摩尼教

回鹘也象突厥—乌古斯一样，遗留下若干历史文献，但是其中最长和最有价值的碑文是以汉文撰述的。碑文确证了汉文资料的陈述，即回鹘人并不象突厥—乌古斯那样是萨满教信仰者，也没有受到佛教宣传的影响，而是皈依了西方的另一种宗教，即摩尼教③。正如在他们以前的佛教徒和他们同时的基督教徒

① 《札记》卷十七，第0171页以下。

② 巴托尔德：《计数法》，《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363—364页。——俄译本注

③ 回鹘时代石刻鲁尼碑文著名的有两个：1.所谓色楞格墓石也叫《什涅乌苏碑文》或《磨云楚陆碑文》，参看马洛夫《蒙古古代突厥碑文考》，第30—44页；2.哈喇巴尔加逊碑文，也是用汉文和粟特文撰写，突厥原文参看奥尔昆《古代突厥碑文释》，粟特原文参看韩生《论粟特碑文》；汉文全文，参看施来格《中国碑文》；华西里也夫《中国碑文》第18—26页，关于回鹘时代的历史碑文同时参看伯恩施坦《社会经济制度》，第50—57页。——俄译本注

一样，摩尼教徒对粟特人有影响，并且后来利用粟特人商业的成就来传播他们的宗教①。同时和鄂尔浑河附近发现的长篇汉文碑文②（其中说到回鹘人皈依摩尼教）一起也保存有篇幅较短的粟特碑文，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回鹘人是通过粟特的传教士皈依摩尼教的③④。从汉文资料中我们知道粟特传教士不是直接从粟特国来到游牧民即回鹘人那里的，而是在中国公元762年即回鹘可汗出师时候在那里碰上他们的。人们从中看出，在西方民族看来和中国贸易比之和游牧民贸易是占多么重要的地位啊。在中国本部建立商业殖民区和通向那里的道路之后，粟特人始能对突厥游牧民发生较重大的影响，而突厥人对中国以及对今日的中国突厥斯坦的攻击就在这时期更加频繁了⑤。在宗教宣传的领域中，粟特人对突厥人的影响比之对生息于中国突厥斯坦的印度-欧罗巴民族的影响要更为多方面的。在库车同和阗发现的两种印欧语言（即龟兹语和于阗语）中，只保存有佛教文献遗物，但是在所谓粟特语中——这一语言的地理分布范围的界线未有确定，可能是，人们在喀什噶尔和其近邻诸城市是说这种语言的，除了佛教的文学作品外，还保存有摩尼教和基督教的文学作品。这三种宗教同样有突厥语的翻译和创作⑥。

摩尼教和基督教的主要成就是在公元7世纪末和8世纪初，即在伊斯兰教的政治势力正在西亚稳固建立的时期。伊斯兰教原

---

① 关于中亚突厥部落的摩尼教，参看皮斯塔罗查《摩尼教》。——俄译本注

② 关于同摩尼教有关的碑文部分的译文，参考《亚洲报》第十一辑，第五卷，第190页以下，那里有详细的注释。

③ 关于摩尼教传播到粟特人的情况，参看阿斯木生《忏悔诗文》，第130—150页。——俄译本注

④ 〔勘误〕'aus der man ersicht应作'woraus man ersieht，土耳其版(43.9)是正确的(H. H. 施德)。

⑤ 从粟特殖民化的过程看中国和中亚突厥粟特的关系，参看克里雅什托尔涅依《古代突厥碑文考》，第114—122页。——俄译本注

⑥ 马洛夫：《碑文》，第95—198页；《巴托尔德文集》第二卷下册，第272页，附注53。——俄译本注

来决不是靠个人宣传活动的宗教，而主要是通过伊斯兰国家对别的国家和别的社会的关系，通过战争和和平的关系来传播的。因此其他宗教较之伊斯兰教更早利用回教国家征服后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和机会是极其自然的。

在突厥历史上，皈依摩尼教一事有重大意义，虽然佛教和基督教的宣传活动的成就很大，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即公元8世纪或以前没有任何的突厥人把佛教或基督教当做全民族宗教来接纳。突厥民族第一次从萨满教过渡到以伦理原则为基础的一种宗教。根据萨满教的教义，甚至杀人也只为有益于人类的未来生活。根据摩尼教的教义，不但禁止杀人，而且禁止杀死动物和吃它们的肉。老教教义和新教义之间的对立也为突厥人所认识，在（鄂尔浑）碑文里指出："从前以血为食物的民族，现在以米为食物；从前实行杀人的地方，现在却将成为宣传善行的地方。

回鹘字母

篇幅不长的粟特碑文是和回鹘可汗的汉文碑文以及和在几行用鄂尔浑卢尼字母写的突厥语碑文一起发现的，应该承认这块粟特碑文，第一次从年代学上可加以考定的事实的碑文是公元9世纪上半叶，它不是鄂尔浑字母而是一种新字母，即在突厥人中传布的回鹘字母。摩尼教徒从巴比伦（今阿拉伯的伊拉克）引进他们自己的字母，但同时使用粟特字母，这种字母应用于回鹘可汗石碑上的粟特碑文中。伊朗一粟特人中除伊斯兰教使用这种字母外不久即为阿拉伯字所排挤。这种粟特文字是否有个时期被用为记录伊斯兰教经典一事是不清楚的。另一方面，由粟特文传给突厥

人的字母保存于回鹘间，在科学界是以回鹘文而著称的[①]。我们知道突厥人即使接受伊斯兰教后，回鹘字母也不是一下子就被阿拉伯字母排除出去的。同时回鹘这种字母传播到蒙古，蒙古人又把它带到西方去。这同样的字母稍后又由蒙古人传给满族[②]，原来来源于闪族的这种字母就是这样地通过粟特人、回鹘人和蒙古人一直传到太平洋岸。这种字母来源于粟特人是毫无疑问的，也为伊斯兰教徒所认识。有一个公元13世纪的伊斯兰教著作家法合鲁丁[③]对此说得最明确。鄂尔浑文字被代以回鹘字母一事从突厥人本身来看不是一种进步的现象，恰恰相反，是一种很退步的现象。因为同鄂尔浑文比较，回鹘文字是更不适宜于表达突厥语的发音的

在新疆的回鹘

回鹘在被驱逐出蒙古以后，便把摩尼教带到他们在新疆和甘州所建立的汗国去[④]。摩尼教之在新疆的传播可能更早一些，即在蓝突厥或他们的后继者的时代，在回鹘来到那里生息以前。阿拉伯地理学家似乎指出了这一点。

阿拉伯地理学文献史的古典时代是公元10世纪。在留传给我们的一系列的地理学著作中，包括了对伊斯兰世界详细的记载和

---

① 关于粟特文字及突厥人借用的时期，参看肯宁《中世伊朗语》；勒柯克《简短的绪论》，第93—109页。——俄译本注

② 参看袁生《文字》，第382—395页。——俄译本注

③ 罗斯，《系谱》，第405页。——俄译本注

④ 公元840—845年被黠戛斯所粉碎的回鹘大部分迁往甘州（甘肃）和吐鲁番盆地（东突厥斯坦）。甘州回鹘于1028—1038年为西夏所灭，其他回鹘，在东突厥斯坦者于13世纪中叶蒙古诸汗的战争中丧失了政治独立。关于这些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参看柯恰诺夫《西夏·回鹘战争史论》；马雅福金《回鹘吐鲁番公国》；葛玛丽《回鹘王国》；哈美尔屯《回鹘》；季霍诺夫《经济》。——俄译本注

同时对从伊斯兰教国家经过突厥人居住地区前往中国的道路的简短报道。根据这一描述，从里海直至中国的全区域是在三个突厥民族统治之下，即：

（1）●古斯，居住于里海直到锡尔河中流的区域；

（2）葛逻禄，从拔汗那到东方得走二十天路程远的地方；

（3）托古斯古斯[①]或九姓乌护，从葛逻禄东境直到中国的地方[②]。有关突厥这一段的记载，按照汉文的资料是属于回鹘统治新疆东部时代的作家所保存下来的。甚至从中我们发现这条大道最早的阿拉伯著作家的著作中，即伊宾·霍尔达白的著作中。人们会怀疑他的书是否在860年前或其后，即回鹘侵入新疆时期以前或以后写的[③]，从此得出下面的结论，即汉文资料中的回鹘和阿拉伯资料中的托古斯古斯是同一的民族。人们甚至有时建议，以托古斯古尔即托古斯回鹘来代替托古斯古斯，但是我们必须放弃这种解决办法[④][⑤]。把托古斯古斯和回鹘视为一体的考证也和阿拉伯的历史资料相矛盾。伊宾·阿勒—阿提尔[⑥]保存了下面的资料，西部古斯是起源于托古斯古斯的。塔巴里[⑦]提供了关于公元820年后不久托古斯古斯袭击在今天齐查克Čizaq和俱战提两城之间的鄂斯洛善省，人们从这里看出，当时不但新疆东部的居民，就

---

① 〔勘误〕Tuguzghuz应作Toghuzghuz（H. H. 施德）。

② 较为详细的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下册，第280—284页。——俄译本注

③ 被保存下来的霍尔达白著作的两种本子写于公元880年；参看布尔加可夫《道里郡国记》。——俄译本注

④ 关于书目提要，见《伊斯兰百科》卷四，第871页，Toghuzghuz条。

⑤ 巴托尔德：《托古斯古斯》，参考本卷，第568页，从蒙古古代突厥鲁尼文献中可确定族名托古斯·乌古斯（乌古斯九部落）的正确读法。在这一联盟中占主导地位的部落是回鹘。在阿拉伯和波斯文史料中，托古斯、乌古斯这一名词是专指东突厥斯坦的回鹘。关于这两个族名的相互关系，参看迈那尔斯基《塔蒙》，第285—290页；哈美尔屯《托古斯·乌古斯》。——俄译本注

⑥ 托伦伯克编：《伊宾·阿勒·阿提尔》卷十一，第157页。

⑦ 塔巴里：《著作集》卷三，1044年。

是伊斯兰国家最近的邻人也是被称为托古斯古斯的，下面的事实：即伊斯兰地方的俘虏称为托古斯古斯也证明了这一点。出身于托古斯古斯的还有埃及吐伦王朝的奠基者阿合马·伊宾·吐伦的父亲吐伦[1]。

伊宾·霍尔达白是描写陆上通往中国大道的阿拉伯著作家中的最早者，他自己没有亲自到那里旅行过，而是利用一种现成的记载。正如伊宾·霍尔达白一样，上面的记载也为雅古特所援用，两人都是根据曾经旅行过这条路的塔蒙的著作[2]。遗憾的是，没有说到，塔蒙的旅行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3]。根据其中记载这次旅行的事实，人们必须假定这次旅行不是在公元760年以前进行的，即当葛逻禄在七河流域和新疆西部树立统治权的时候[4]。也不在公元9世纪开始之后进行的，即当系出于鄂尔浑碑文上的突厥人，也就是说出身于托古斯古斯的汉文资料所记沙陀突厥人从

记载也就是借助于沙陀突厥的帮助而将这一暴动镇压下去的事实的。这是比较少见的历史事件之一，即我们不但掌握有汉文资料，而且掌握有阿拉伯文资料的报道。阿拉伯人所叙述的托古斯古斯的作用，正如中国人把它归于沙陀突厥的作用一样①。

在塔蒙旅行的时候，托古斯古斯地方已有袄教徒和摩尼教徒。袄教徒一般是在乡村占优势，摩尼教徒则在首都占优势。摩尼教之扩张很可能是靠牺牲袄教的。阿拉伯人后来把托古斯古斯整个民族都算为摩尼教徒②。人们把摩尼教和佛教同样看作是对于民族习俗起了弱化作用的，即所谓对托古斯古斯的武勇特性起了损害作用的。公元869年逝世的阿拉伯著作家察希兹说道，在皈依摩尼教以前，托古斯古斯是个勇敢善战的民族，虽然人数不多，但在和葛逻禄作战中常常取得了胜利。自从皈依摩尼教以后托古斯古斯便开始遭到了失败。马迦特③认为察希兹的话是指游牧民回鹘而言，并又认为这些话证明蒙古地方的回鹘汗国为黠戛斯族所消灭的消息传到了阿拉伯人那里。同时马迦特所引用的察希兹的原文，很明显指的不是和黠戛斯族作战，而是和葛逻禄作战，由此可见说的不是指在蒙古境内发生的事件，而是指在新疆境内发生的事件，阿拉伯史料中的托古斯古斯是回鹘迁来新疆以前就住在那里的。回鹘迁往新疆最后发生的一次事件是在察希兹逝世前三年。因此从察希兹的文句中人们可以看出，根据他的看法，托古斯古斯在这地区生息很久，在这里阿拉伯人认识他们，长期以来就和他们的西边邻人——葛逻禄作战。

---

① 这一断言，由于阿拉伯史料术语学上的错误，不能当作托古斯·乌古斯一名传播到沙陀突厥的证据。参看迈那尔斯基《塔蒙》，第288—289页。——俄译本注

② 关于塔蒙对托古斯·古斯宗教的分析，参看迈那尔斯基《塔蒙》，第296页，迈那尔斯基认为旅行家错误地把袄教当作佛教或突厥人古代的宗教。参考有关中国及其邻区袄教的资料，埃什贺伦《资料》。——俄译本注

③ 马迦特，《东欧漫游记》，莱比锡，1903年，第92、95页。

在书本资料的影响下阿拉伯人继续往下叙述：新疆东部的托古斯古斯，在回鹘已在那里居住时期的情况，保存在阿拉伯资料的有关这个民族的少许历史报道中，以公元10世纪的著作家——马修迪和纳丁的记载最为重要。他们指出回鹘汗在中国皇帝和在萨曼王朝伊斯兰教异密面前对自己的同一信仰者都一律保护。根据纳丁的说法[1]，有下列的谣言传到托古斯古斯那里，萨曼王朝的统治者企图迫害寻思干（撒马尔罕）的摩尼教教会。托古斯古斯汗吩咐通知萨曼王朝的异密，在托古斯古斯地方的伊斯兰教徒要比萨曼王朝的摩尼教徒多得多，如果伊斯兰教徒迫害在他们国家居住的摩尼教教徒，那末他就要开始迫害在他们国土内的伊斯兰教教徒。由于以上的恫吓，萨曼王朝的异密才放弃了自己的计划[2]。

这一记载指出，察希兹所谓的突厥人由于接受了摩尼教而丧失了早先的武勇特性的说法是夸张的，正如后来人们过于强调佛教对改变蒙古人的民族性的影响一样。蒙古人为了独立对汉人进行的有效的战争，证明了蒙古人没有丧失自己古代的武勇特性。同时，吐蕃在公元 7 世纪刚刚接受佛教后还表现出征服者的作用。即在佛教长期支配西藏后的公元20世纪初，英国人还是遭到藏族方面顽强的抵抗。前数世纪的基督教在欧洲的例子表明，好战的民族可以把博爱和平的宗教转变为战争的宗教。同样，游牧的回鹘之接受摩尼教成为威胁中国的一个新的借口。中国人在其对于异教徒的政策上必须把回鹘可汗保护摩尼教徒这一情况考虑在内。一当黠戛斯人打败回鹘之后，在中国即开始对外来的宗教，其中包括摩尼教在内的残酷迫害[3]，新疆回鹘统治者的威胁已经不能再发生象从前在蒙古境内强大的回鹘可汗的威胁那么大的作

---

① 《书目》，第337页。

② 《书目》卷一，第337页。有关托古斯古斯的阿拉伯和波斯史料的报道，同时参看雅库鲍夫斯基《吐鲁番公国》。——俄译本注

③ 特别是沙畹和伯希和在《亚洲报》第十一辑，第一卷，第 295 页以下论文。

用了。但是马修迪[①]和纳丁的记载指出，新疆的回鹘还对留在外地的伊斯兰教徒进行保护，对此不惜使用暴力，他们也没有丧失勇武善战的特性。

回鹘的摩尼教

通过中亚考古探险队所发现的波斯语、粟特语、突厥语和汉语的摩尼教文献，初次使得欧洲学者有可能根据摩尼教自己的文献去认识摩尼教[②]。在这以前人们只有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著作家的大部分论战性质的著述中去认识摩尼教。摩尼教正如佛教一样在人民群众中间有广泛的传播。苦行教义是针对祆教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等级制度的[③]，特别是在伊朗萨珊王朝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那种形式的等级制度。因此摩尼教的文献写得下层平民都看得懂。在当时所有波斯文的手稿中只有摩尼教手稿的文字，字字是用平易的波斯文撰写的，而不使用闪语的表意文字，[④]闪语的这种表意文字在所谓中古波斯文手稿中比比皆是。连波斯的基督教也使用这种文字：许多单词用波斯语发音，但是文字上却以相当的闪单语来代替波斯单语。摩尼教徒也是用同样朴素而明确的语言——突厥语来撰写的。根据拉德洛夫的意见突厥语的摩尼教主要文献，即所谓Chuastuanift（忏悔祷文）在语言纯洁性方面是超过几乎所有保存下来的突厥文字的文献。[⑤]

---

① 《金色牧场》卷一，第300页以下。
② 普什：《摩尼教》。——俄译本注
③ 〔勘误〕应作由祆教所神圣化了的等级制度（H. H. 施德）。
④ 'Idiogramme'应作'Ideogramme'（表意文字）(H. H. 施德)。
⑤ 这一石碑突厥文的出版和翻译，参看拉德洛夫《忏悔祷文》；马洛夫《碑文》，第108—129页（附有详细的参考书目）；德米特里也娃《忏悔祷文》。——俄译本注

从这种文献中可以看出，摩尼教果然是和佛教相接近的。侵犯佛教寺院和侵犯摩尼教寺院一样要受到处罚。这两种宗教彼此间的亲密关系可以从两者的用语来证明，彼此的用语证明互有影响，以致于从这些碑文中不易分别是这两种宗教中的哪一种：是从前曾传播于突厥人中的佛教还是摩尼教？突厥人用以指称佛陀和佛像的 burchan一字是从摩尼教徒借来的，它是用来表示摩尼教的圣人的。另一方面佛教采用摩尼教的用语nom来称自己的圣书，这个字直到今天仍保存在蒙古文中。摩尼教徒和佛教徒和后来的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一样，在突厥人中间传播他们的宗教时，竭力用突厥语来创造宗教术语，但这并不是随处都能做到。人们在萨满教中找到表示“上帝”、“魔鬼”的概念的术语。但是在萨满教中没有相当于“天使”的那样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在突厥人中的摩尼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士只得满足于以波斯语 firište 来充当。在突厥人中缺少天使的概念一事，马木特·喀什噶尔也已注意到①。许多阿拉伯著作家不很清楚摩尼教和佛教的区别，因此也有一些著述家如阿勒·毕鲁尼 al—认为摩尼教是分布很广的，而另一方面，马修迪却明确说，除了托古斯古斯②之外没有其他的摩尼教徒，在这种情况下，托古斯古斯不待说是指回鹘说的。后来大概在公元10世纪后不久，在回鹘摩尼教也让位给佛教和基督教了。但是史料没有报道这是怎样发生和在什么时间发生的。甚至马木特·喀什噶尔在公元 11 世纪下半叶写的著作中，我们也找不到当时摩尼教还继续存在的记载，虽说马木特·喀什噶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回鹘汗国。值得注意的是，马木特·喀什噶尔几乎是当时唯一的阿拉伯语著作家，他对中亚不是根据书本资料，而是根据自己对这地方的亲历的知识来写书的，一般不用“托古斯古斯”这个词，而是使用“回鹘”一词。

---

① 《突厥语词典》卷三，第 9 页。

② 《金色牧场》卷一，第288页。

这就最好不过地证明，用托古斯古斯一词表示回鹘只能说明书本的传统，而在当时住在新疆的突厥人中间是不存在这样的词的。

在马木特·喀什噶尔同时代的回鹘人不是摩尼教徒，就是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但是他们西方的邻人在当时已经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了。

下一讲企图要回答下面的一问题，即从目前看来什么可说是突厥民族史上最重要的事实。

·第四讲·

突厥的伊斯兰化

伊斯兰教在突厥人中的传播——突厥史上最重要的事实。作为世界宗教的伊斯兰教处处胜过基督教和佛教。

伊斯兰教在突厥人中间的得势是在伊朗萨曼王朝统治中亚以后才开始的，萨曼王朝是在公元9世纪及10世纪（大约从820年至1000年）成为今日俄罗斯突厥斯坦文明地区的主人的。阿拉伯人给这个地区即位于阿姆河外的区域起个普通的名称为"马瓦拉痕那儿"，也就是说"河以外的地方"。在伊斯兰教征服历史中，河中的居民多次被称为突厥人。这是可能的，因为有些地方是在来源于突厥人的王朝统治之下而为人所认识的。盛行着下列的意见，即在白衣大食（Omaijaden）[①]的库萨暗拉的宫殿中有一幅画，绘有伊朗的萨珊王朝的沙、拜占庭的皇帝、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和阿比西尼亚国王的肖像，还有来自布哈拉的突厥王后的肖像[②③]。但是这个时代，突厥语还未流行到土著居民中间，看来阿拉伯人往往把伊朗土著的语言看作是突厥语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即如察希兹所断言的，在呼罗珊语和突厥语之间只

① 'Omaijaden 应作 Omaijaden，'Amrâ 应作 'Amra(H. H. 施德)。

② P. 威特克：《伊斯兰杂志》卷十四，第402页以下。

③ P. 威特克：《一个突厥女王》，第402 页以下。但赫尔兹弗尔德对威特克的假说提出了异议，在专门文献中得不到承认；参看赫尔兹弗尔德《考古学报》卷五，第149、152页，尼尔沙赫书、佛赖译，第111页。——俄译本注

存在有方言的差异，正如麦加和麦地那方言之间的所存在的差异一样①。

伊斯兰教徒在河中地的殖民

中亚伊斯兰教和哈里发的北方边界在某一时期恐怕是和波斯人与突厥人的民族界线相一致的，同时也和农业区与牧业区间的文化界线相一致。在这界线的北方无疑是有城市的，但是这些城市只是农业文化地区居民迁移到那里和定居在那里所建立的殖民区。甚至公元10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也把突厥人描写成独立于伊斯兰教之外，并把他们列入伊斯兰教徒的敌人中，虽然这种形势在当时已开始发生变化。

正如黑衣大食哈里发的宰相巴尔玛基登特一样，萨曼王朝也是出自巴里黑（Balch）的，也就是说这一地方在伊斯兰教传入以前是佛教占统治地位的②。但是佛教在面临伊斯兰教的挑战下要保持自己的影响，遇到了特别的困难，在寺院中有大量雕像一事引起伊斯兰教徒把佛教看成主要是崇拜偶像的宗教，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的婆罗门教在伊斯兰教占统治时期得以存在，反之，佛教则消亡得很快。同样，佛教在巴里黑和一般地在吐火罗消失了，而相反的祆教却在河中地继续存在一段时间。此外还有摩尼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等教会。而只有后面两种宗教一直保存到今天③。但是，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佛教并没有被消灭得毫无痕

① 参考曼德里什塔木《突厥评述》。——俄译本注

② 关于萨曼王朝的起源，参考西蒙诺夫《关于萨曼王朝的起源问题》。——俄译本注

③ 关于阿拉伯侵入前佛教、基督教、摩尼教在中亚的传播，参考伯连尼茨基《问题》，第36—52页；同拜火和地方诸神万神殿有关的礼拜在前伊斯兰教的中亚占有主要地位。巴托尔德断定这种礼拜为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但是它同在伊朗占统治地位的被认为正统的拜火教有很大的区别。在苏联的历史文献中，这一宗教信仰体系有条件的被称为马兹德教，参考例如《塔吉克民族史》卷二下册，第87—88页。——俄译本注

迹。

例如研究伊斯兰教神学的经文大学的出现，恐怕要用佛教的昆诃罗(寺)[1]的影响来解释，经文大学最初见之于伊斯兰世界东端，公元11世纪后才出现于西伊朗和哈里发的首都报达（Baghdad)。巴里黑及其附近很多的经文大学同样是受到佛教的影响的[2][3]。

公元10世纪的经文大学，据我们所知的仅在呼罗珊和河中地，它们是宣传伊斯兰教的有力工具，这些大学不受伊斯兰教政权的控制和约束。从下面事实也许可以说明这一现象，即伊斯兰教的宣传在独立于哈里发的政治界线之外的中亚所取得的成功大大超过了伊斯兰教世界的其他地区。正如我们已经看出的，萨曼王朝抛弃了呼罗珊和河中地以前的伊斯兰教政府的防御政策。他们放弃了作为文化地区防御游牧民侵入的长城的维持，他们开始了向草原进军。这些军事出征有几次是在于占领城市，例如公元893年占领了怛罗斯城即现在的奥列阿塔[4][5]地方，当时相传那里有闳大的教会改变为清真寺的事[6]，这后一事实，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里基督教的宣传活动是在伊斯兰教的宣传之先的[7]。但是征服行动只有涉及最近接壤的地区，而且这里除萨曼王朝征服性进军外，还有不受它的影响的，由河中地移民所建立的城市的和平的殖民生活。粟特人是在河中地的前伊斯兰

---

① 〔勘误〕Wichara'ｓ应作Vihâra'ｓ（H.H.施德）。

② 穆莱编，《白哈奇史》，第248页。参考《札记》第二十三卷，第9页以下和《伊斯兰百科》卷一，第615页。

③ 同上书，卷一，第538页。

④ 施赞，《布哈拉地形和历史志》，第84页。

⑤ 关于帖木儿的墓地，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下册，第431—432页。——俄译本注

⑥ 即今之江布尔。——俄译本注

⑦ 巴托尔德，《阿里雅阿塔》，见《巴托尔德文集》卷三，第340页。——俄译本注

时代来到突厥草原，并在那里从事农业的。当伊斯兰教在河中地变成了大部分居民的宗教时，伊斯兰教徒仍继续粟特人在前伊斯兰时代所从事的殖民活动。同时在锡尔河下游修建了三座伊斯兰教城市：毡的、库瓦拉和养吉干就是新殖民区的意思，阿拉伯语是al-Qarja al-hadita，波斯语是Dihnu①突厥语是Jangykent，"kent"一字是由粟特人传到突厥人那里去的②，在这些城市中只有后一城市养吉干的所在才准确地为人所确知，它的废墟今日叫做詹干特。据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说法，这些城市虽然是伊斯兰教徒居住的，但是处于非伊斯兰教徒的突厥—乌古斯人的统治下。这一事实证明，这不是在萨曼王朝所征服的地方建立起来的诸城市，而是河中地的移民得到了当地突厥人的同意建立起来的殖民区。这不但为萨曼王朝征服的答剌速（塔拉斯），而且由和平殖民者所建立的新殖民区养吉干也继续在中亚扩张商务。这里每一个城市都有路通往为中国人所不认识的奇马克民族的土地的曳咥河（额尔齐斯河）。根据突厥语的发音可能是Kimäk③，但是，他们就是后来占据广大地区的钦察（Qypčaq）④民族的祖先⑤。

花剌子模和可萨人

列入伊斯兰文化边缘地区的花剌子模三面附近都有草原，在很早以前就和游牧民族有很活跃的贸易关系，这种贸易在伊斯兰时代当有更大的发展。花剌子模在参加建立锡尔河沿岸伊斯兰殖

---

① 〔勘误〕Dih nû应作Dih—i nau（H. H. 施德）。

② 关于锡尔河下流中世纪早期城市及其建立者，参考托尔斯托夫《古斯人的城市》；同作者《沿着古代三角洲》，第273—294页。——俄译本注

③ 《伊斯兰百科》卷二，第1085页。

④ 同上书，卷二，第1099页。

⑤ 巴托尔德：《奇马克》；巴托尔德：《钦察》，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549—551页。——俄译本注

民区方面，也许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面向西方和西北方，面向窝勒伽河流域的，是当时这儿居住的不耳阿里人和可萨人。花剌子模人，早在伊斯兰教传入以前就开始在这个地区活动。公元764年侵入高加索①伊斯兰教各省的可萨军队的首领是一位花剌子模人。但是在较后时期中我们也发现为可萨人效劳的伊斯兰教徒的花剌子模人，而花剌子模人遇见可萨人反对伊斯兰教国家的战争的场合则允许有保持中立的权利②。此外，有大量伊斯兰教商人在可萨地方和它的首都：位于窝勒伽河（阿得水）河口的阿得。一般说来，单靠商业而能在一个国家中兴建一座大城市，用阿拉伯人的话来说，是不会有的。可萨帝国西南在达格斯坦，是和伊斯兰哈里发国家接壤的。这里也常常发生军事冲突。由于这种敌对的冲突，可萨可汗被迫放弃他们在达格斯坦的首都，而在阿得水河口兴建一座新的城市。虽然阿拉伯人后来（正如在突厥斯坦的情况那样）放弃了他们进攻高加索的政策，除了打耳班③及其近郊以外，达格斯坦仍在可萨人的手中。而在东方在可萨帝国和伊斯兰各边省，则常常处于瓯脱状态，他既不属于这一边，也不属于那一边。虽然这样，人们根据阿拉伯的若干资料仍能作出以下的结论，即花剌子模军队不顾这样的中立地带瓯脱的存在，有几回越过这一地带，参加窝勒伽河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最重要的是斡罗思在公元10世纪进出窝勒伽河流域④。

斡罗思之进出窝勒伽河流域是在可萨进攻东方的斯拉夫世界

---

① 《蒂巴里著作集》卷三，第328页，第9行。

② 关于花剌子模及窝勒伽（伏尔加）河沿岸可萨人和不耳阿里人国家的关系，参考托尔斯托夫《沿着遗迹》，第223—265页。——俄译本注

③ 打耳班，参考《伊斯兰百科》卷一，第979页以下。关于打耳班，参考巴托尔德《打耳班》，《巴托尔德文集》卷三，第419—430页；又参考迈那尔斯基《舒尔正和打耳班史》。——俄译本注

④ 关于伏尔加河沿岸及高加索俄罗斯、可萨人的关系，参考巴托尔德《有关罗斯的阿拉伯文资料》；雅库鲍夫斯基《论俄罗斯、可萨的关系》；查霍德尔《里海汇编》；阿尔塔摩诺夫《可萨人史》。——俄译本注

以前。从俄国的编年史中，我们知道有若干斯拉夫民族直至公元9世纪后半期还向可萨可汗进贡。可萨的影响达到北方有多远，人们可从下面的事实看出，居住远在北方的，那窝果罗附近的斡罗思大公在罗斯还是诺耳曼底人和操瑞典语的时代里，是用可汗的头衔的，当后来人们为了表示斡罗思君主，比较常用普通斯拉夫的源出日耳曼的头衔 Knjaz 时，有好几回还是使用可汗的头衔①。

公元9世纪，斡罗思人在东海即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地区建立起来的帝国是对可萨帝国的一个可怕的打击。当斡罗思人的侵略也特别伸张到窝勒伽河岸和里海的时候，两个民族之间的直接冲突变成为不可避免。大家知道，俄国编年史关于这种侵略，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资料。编年史只有关于后者和有关司维牙脱思老的出征才保存了几行记事。我们有关斡罗思人迁移的资料，几乎全部是采自阿拉伯的资料，其中最详尽的资料是马修迪关于最初侵掠的记载，这次侵掠看来是在公元910年和915年之间，大抵是在913年发生的。这一次掠夺性出征得到了可萨人的默许，斡罗思人事先约定给他们一部分战利品。但是后来可萨可汗纵容他的伊斯兰教徒的臣下公然违反自己的诺言，当斡罗思在返回的路上予以攻击，几乎完全将他们歼灭了。这个时期住阿得城的基督教商人，加入了伊斯兰教徒的行列，因为他们在反对诸如此类的入侵情况中同样关心于保护商业的安全。

有关在943年至944年斡罗思第二次掠夺性出征的伊斯兰教徒

① 关于罗斯一词的起源和瑞典在拉多加湖沿岸殖民问题研究的现况，参考硕斯戈尔斯基《诺曼底的理论》，第50—54页，第203—206页。巴托尔德注意到《伯尔第尼阿尼年代记》，在839年下提到古代俄罗斯大公（被称为可汗）的使臣——《伯克第尼阿尼年代记》第19—20页；但是没有什么证据。说这里是指来自拉多加湖沿岸的诺曼大公；参考舒舍林《古代俄罗斯国家》，第420—421页。——俄译本注

的报道中，当时伊斯兰高加索最重要的城市巴达阿[1]受到了掠夺和破坏，丝毫没有说明这次掠夺性出征是否得到可萨可汗的同意，或者违反他的意志进行。人们同样不知道这一掠夺性出征除了伊斯兰各地以外是否还有属于可萨的地方[2]。

斡罗思第三次掠夺性进军，即司维牙脱思老王965年的出征是仅仅指向可萨帝国的，这一帝国在若干年内完全役属于斡罗思，在达格斯坦和哈里发直接接壤的地区也是一样，但是斡罗思这时没有越过可萨帝国的边界和攻击伊斯兰各省。他们也没有进一步追击逃往可萨帝国的部分居民和逃往伊斯兰国家的靠近巴库的阿普歇伦半岛的部分居民。从伊宾·贺柯尔（Ibn Hauqal）的记事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他们此时正在里海东南方，他们同时代的人却把斡罗思这次出征看作是对可萨帝国的决定性征服。在那置身于斡罗思统治下过活[3]的亡命者为了返回祖国，便开始和斡罗思谈判。伊宾·贺柯尔后来也不知道斡罗思舍弃了被征服的地方，而可萨帝国又重新建立起的事实。

为了理解这一事件的进程，必须估计到司维牙脱思老也指向其他地区的出征。诺耳曼底人之侵入斡罗思正如侵入西欧一样，原来的打算只是为了掠夺的目的。斡罗思最初进军里海具有同样的性质，但后来掠夺性的出征便变成了以征服为目的的进军了。然而征服者的目的并不是把被征服的土地合并到自己以前的领土内，而是为了在那里居住和留下来使富有的土地受自己支配。当司维牙脱思老最后来到了多瑙河不耳阿里的土地时，便决定在那里留下来，因为这个地方从经济和文化方面看来是大大超过斡罗思的。它并且是贸易关系的中心。他不顾周围人们的一切劝告，

---

① 《伊斯兰百科》卷一，第683页。

② 巴托尔德：《巴达阿》，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三，第472—473页；同时参考雅库鲍夫斯基《伊宾·米斯卡维赫》。——俄译本注

③ 《阿拉伯地理学丛书》卷三，第286页。

想不再回基辅去了。很有可能，当出征可萨人时，阿得城在贸易方面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多瑙河畔不耳阿里的城市，但司维牙脱思老却喜欢后者，在他看来，和基辅比较，它是个更为重要和更为富庶的城市和更适于成为强有力的帝王的首都城市。后一因素对于斡罗思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如果司维牙脱思老留在阿得城，那么斡罗思一定会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司维牙脱思老从可萨地方退却，不是为了返回自己的家乡，而是为了和多瑙河的不耳阿里人战斗，如有必要时请求拜占庭帝国帮助。拜占庭的使节虽然不在基辅，而是在可萨地区遇见司维牙脱思老的。俄国史料和拜占庭史料都没有明确指出司维牙脱思老是否舍弃可萨地方，而舍弃的原因是由于拜占庭默许的影响和由于梦见对西方新的征服，自己情愿离去，或是由于阿得水若干次的失败和考虑到某些敌人的威胁引起的危险而被迫离去的。人们也许从传到报达的谣言中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谣言被记载于伊斯兰教史料中①，即正在公元965年，也就是说司维牙脱思老出兵反对可萨人的一年，有一个"突厥"民族偶然攻击了可萨，而可萨则转向花剌子模求援。花剌子模答应给他们以援助，条件是要可萨人皈依伊斯兰教。可萨人同意了，于是花剌子模便从敌人的侵入危险中解救了他们。

伊斯兰教资料在记载另一个时代的事件中，记载了可萨人接纳伊斯兰教是出于另一种理由。根据这个报道，可萨人被迫信奉伊斯兰教似乎是因为乌尔良赤（即现在的乌尔良赤旧城）城马门的出征讨伐他们。这里指的不是哈里发象马迦特②错误的假定那样，而是指乌尔良赤的异密马门·穆罕默德。

---

① 首先见于伊宾·米斯卡瓦希的著作，载阿梅德洛兹和马哥利奥斯所编的《阿拔斯朝哈里发的衰微》卷二，第209页（原文）；卷五，第223页（译文），牛津1920/21。

② 《东欧漫游记》，第3页。

毫无疑问，有关可萨人信奉伊斯兰教的资料的两种情况都是根据错误的谣传的。因为可萨人的国教，归根结蒂是犹太教，它大概是公元8世纪末即讨论的时代，为可萨可汗和可萨贵族所信奉。这件事是犹太教广泛宣传的最后回声，它记载于福音书和许多古代历史家的著作中。作为国际宣传对象的犹太教逐渐让步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犹太教直到今日仍然遗留下来：但是变成了犹太民族宗教。而其他民族的成员之接纳这一宗教会被看作是很不自然的。根据伊斯兰的资料，犹太教是可萨政府的宗教，而不是可萨人民的宗教。可萨政府是维护犹太教的利益的，获悉伊斯兰国家的一个犹太教堂遭破坏的消息后，在922年也破坏了阿得的一个清真寺尖塔作为报复。但是据阿拉伯人报道，人民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要比信犹太教的多①。

这就是为什么克里米亚半岛的克烈姆人的起源和来源问题仍然弄不清楚的原因。希伯莱语 Qârā'îm 一词在中古时代不是用来表示犹太教的一个派别的，他们也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克烈姆一样，由于不承认犹太教法典和大多数的犹太人有区别。克烈姆操突厥语，且有突厥语翻译的圣经，因此他们的语言的纯粹性保存得比较多。克里米亚一部分属于可萨，他们在这里生活，恐怕直到最后的可萨君主的11世纪初期，虽然这一君主显然是基督徒，因为他叫做乔治。在历史资料中，没有明确证明，可萨是加入克烈姆的犹太教派的。把克烈姆人和可萨人等同起来也和下面的语言学资料相矛盾：可萨人的语言和不耳阿里人的语言一样，都不为其他的突厥人所理解，这样一种语言的残余也许见之于今日的楚瓦什语中。克里米亚的克烈姆的语言和他们的圣经的语言同大部分

① 关于可萨部的宗教情况，参考查霍德尔《里海汇编》，第145—166页。——俄译本注

突厥方言只有微小的差别，但同楚瓦什语却毫无共同之处[1]。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犹太教和克烈姆的突厥语一样，没有充分的事实来确定他们的起源和他们同可萨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结果，伊斯兰教在可萨帝国中没有变成为支配的宗教，不管在这一民族中伊斯兰教的宣传成功与否，花剌子模有充分理由在反对自己外部敌人的战争中来援助可萨人，何况为可汗服役的有花剌子模的卫队。他们在可萨帝国崩溃的时候，必然要受到斡罗思人的迫害。因此司维牙脱思老的撤退，可能至少一部分是由于花剌子模的侵犯而引起的，也就是说他们从东边来攻击占领阿得城的斡罗思人。

花剌子模和阿得水流域的不耳阿里人

和可萨相比较，他们（即可萨人）的近邻：窝勒伽河流域的不耳阿里人同花剌子模以及伊斯兰文化的关系较为密切。伊斯兰教史料提到这方面的比较少。它只叙述有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不耳阿里使团于公元921年来到了摩克塔底哈里发那里，使团要求派遣军事技术专家到自己的国家中建立要塞和城堡以及伊斯兰的博学者来传授新宗教。作为回访的哈里发的使节是伊宾·法德兰，他写了他从报达到不耳阿里和经过可萨地方回来的旅行记。到最近为止，伊宾·法德兰的著作只能凭藉13世纪地理学家雅古特所作的摘录才有所知。不久前人们才肯定，伊宾·法德兰著作的原稿虽然是不完整的，但是唯一的抄本，它的形式和雅古特的抄本（仅结尾部分缺少几页）完全一致，原稿保存于麦什赫特图书

---

[1] 关于同其族源问题有关的克烈姆人的语言和文学，参考巴斯卡可夫《绪论》，第233—235页；普里特沙克《克烈姆人》；奔雅兹可夫斯基《克烈姆文学》。——俄译本注

馆①②。

显然，伊宾·法德兰承担了使不耳阿里人认识伊斯兰教教规的任务。他对使团的政治方面的任务不感兴趣。至于算端方面，也就是说报达政府方面，是指定另一类型的人为使节，现在就人们所知的范围内，伊宾·法德兰一点也没有说及这个人如何完成他的任务，是否为不耳阿里建筑他们所恳求的要塞而来。同时也丝毫没有说不耳阿里原来是如何认识伊斯兰教的。使团所走的路线给这一问题一些答案（多少会给这个问题带来了一些澄清）。使团从报达去不花剌，又从那里去花剌子模，然后才由花剌子模出发前往不耳阿里。选择这样的一条从报达去不耳阿里地方旅行的路程只能取决于下列事实，即不耳阿里是通过花剌子模和萨曼王朝的领土取得了和伊斯兰文化接触的。报达和阿得水流域之间的路程会比经过高加索的短得多。不耳阿里和花剌子模之间的紧密的文化关系同样地可以解释俄罗斯编年史家有关这两个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的假设。指出萨曼王朝帝国的影响的还有10世纪由信奉伊斯兰教的不耳阿里所铸造的货币：它是这样的时代，即当萨曼王朝不承认报达所宣布的哈里发阿里·穆提，用前任哈里发穆斯塔夫的名字来铸造货币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同一名字，在不耳阿里地方所铸造的货币上面。

不耳阿里和花剌子模之间除了和平的关系之外，也可能发生过武装冲突③。也有关于花剌子模反对斯拉夫的军事出征的报道。十分可能，它丝毫没有提到原来的据有阿得水以西的地方的斯拉夫人。伊宾·法德兰把阿得水流域不耳阿里的统治者称为斯

① 参考泽奇·瓦里底的论文，见《科学院公报》，1924年，第243页以下。
② 瓦里多夫，《麦什赫特手稿》，第243页以下。关于伊宾·法德兰的麦什赫特手稿的出版，翻译和研究，参考科瓦列夫斯基的《伊宾·法德兰》(1939年)，以及1956年同一作者的《伊宾·法德兰》。——俄译本注
③ 《阿拉伯地理学丛书》卷二，第281页。

拉夫人的统治者①。从前人们可能解释这句是雅古特的错误，但是现在证明，在伊宾·法德兰的原文著作中也有错误。显然，阿得水流域的不耳阿里人和多瑙河流域的不耳阿里人，都是来源于突厥—楚瓦什民族和斯拉夫人之间的混血，其中唯一的差别是，多瑙河流域的不耳阿里人是操斯拉夫语的，而阿得水流域的不耳阿里人则主要是操突厥—楚瓦什语的。

由于花剌子模的帮助，可萨国家在短期内，也许不致为斡罗思人所完全覆灭，但是它不能使之恢复元气了。在11世纪以后，人们不再发现有关可萨帝国的记载了。蒙古人在13世纪不再遇见可萨人了②。斡罗思人趁可萨帝国崩溃的机会取得的利益比阿得水流域的不耳阿里人少。根据伊宾·贺柯尔的报道，斡罗思不仅破坏了可萨帝国，而且也破坏了不耳阿里帝国。但这件事为俄国的编年史所完全忽视。继之而来的事件同样也和伊宾·贺柯尔的报道不大一致，因为从11世纪到13世纪，不耳阿里活动的广大地区有：从维利基乌斯格直至萨拉托夫以南的地区和从莫洛木直至乌法地区。从政治观点来看，不耳阿里地方和斡罗思一样，可能经过了一个解体时期。伊宾·法德兰提到不耳阿里的最高统治者根本没有象可萨的统治者那样采用“汗”的头衔。此后俄国的编年史常常言及不耳阿里君主，而没有提到不耳阿里王。此外13世纪不耳阿里民族的文化水平比较公元10世纪有显著的提高。根据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载，不耳阿里的城市：波尔加尔城③和相距50公里的苏瓦尔城（显然也是部落的名称），原来是游牧民的帐幕所在地，由小屋和毡房构成，夏天便全部离去，而实际上波尔加尔城，象它的废墟所表明的，是由石和砖筑成的，居民不下50,000人。公元10世纪人们从波尔加尔也输出狩猎品（毛皮）

---

① Şaqiab＝“奴隶”，瓦里底，《阿拉伯地理学丛书》卷二，第244页。

② 马木特·喀什噶尔的《突厥语词典》也没有提到可萨人。

③ 关于不耳阿里人、民族和城市，参考《伊斯兰百科》卷一，第819页以下。

和蜂蜜。后来不耳阿里也发展制革业，不耳阿里的长靴成为向伊斯兰各国的输出品，在那里很需要这种东西。以后鞣制皮革技术从不耳阿里传入了斡罗思，农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斡罗思歉收年月里，能从不耳阿里的国家输入小麦。反对斡罗思的战争有时成功有时失败。斡罗思沿阿得水而下的进袭只是缓慢地进行的。只有到了13世纪，即蒙古的侵入前不久，他们才来到了阿得水的奥卡河口，并在那里建立了尼赤尼—那窝果罗城。从另一角度来看，没有任何资料指出，不耳阿里人在精神文化领域中取得什么成绩和有自己语言的文学，虽然不耳阿里阿拉伯字的墓石上保存有不耳阿里语言的文学，但它已属于蒙古统治时期，即公元14世纪了①。稍后，突厥语在金帐汗国流行后便迅速地在以前不耳阿里地方取得了统治地位。昔日不耳阿里语言仅保存于楚瓦什人的语言中，他们显然是来源于和伊斯兰文化接触最少的不耳阿里民族的一部分。这部分的不耳阿里人既不熟悉伊斯兰教，也不熟悉阿拉伯字母，直到最近才采用了俄文字母，在这以前，他们既无文学，又无文字②。

伊斯兰教深入到突厥中

至今还为人所熟悉的伊宾·法德兰记载的路程清楚地表明，伊斯兰教的影响常常是距离伊斯兰国家远得多的民族比之距离伊斯兰教较近的邻人更早些。伊宾·法德兰在花剌子模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不耳阿里国家之间的地区见到这样一些突厥人，他们保留萨满教的信仰，并在自己战士的坟墓上陈列石子，其数目相当于

① 参考尤素波夫《绪言》。——俄译本注

② 关于古代不耳阿里语和楚瓦什语的关系，参考巴斯卡科夫《绪言》，第192—200页。——俄译本注

被杀死的敌人的数字①。

这个时期生活于中亚的突厥各族，其文明水平也不一致。人们指出其中有些突厥民族甚至连铁制武器和骨制的箭也没有②。不耳阿里的例子证明，受到伊斯兰文化影响的，主要是已有一定文化生活的民族。雅古特③④报道说："希沙姆（724—743）哈里发派遣一个阿拉伯使团前往突厥（可惜的是他没有明确地提到哪一个突厥民族，也没有指出使团所经过的路程），目的是建议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可汗在使节的面前检阅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以后他对使节说，在这些人中没有任何的手艺工人——即理发师、锻工、裁缝"。如果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和履行他的教规，他们就无法挣钱谋生⑤。

看来，下面的假设是没有根据的，即突厥人的勇武精神是有利于伊斯兰教在他们中间的普及和突厥人由于圣战的观念和由于许诺他们在圣战死去时得到莫大的天国幸福而感到浓厚的兴趣。无论是在伊斯兰教世界内部或外部，个人的宣教活动之出现，总是和伊斯兰的神秘教义——苏非派的出现有密切的联系，在著名的苏非的传记中常常述说，他们大多数都是由其他宗教改信伊斯兰教的。苏非也去草原突厥人那里，宣传伊斯兰教，直到最近，常常取得比正统派神学的代表更大的成功。象他们一再在草原上所宣传的那样，苏非派的布道者不提圣战和天堂快乐，而是宣传罪恶和地狱的痛苦。欧洲旅行家在中亚和中非，虽然彼此是

---

① 《科学院公报》，1924年，第245页；《东方学年刊》卷四，第89页，卷六，第3页。

② 《阿拉伯地理学丛书》卷七，第295页。

③ 雅古特的解释今天确证为借自伊宾·阿勒·法吉赫（《科学院公报》，1924年，第241页）。

④ 〔勘误〕马迦特：《东亚杂志》卷八（1919—20），第290页以下，已经正确地假定这一报道是来源于伊宾·阿勒·法吉赫（H.H.施德）。

⑤ 关于这一情节较为详尽的情况，参考马迦特《随笔》，第290—291页。——俄译本注

不相关的，但都有这样的印象，即有关地狱的故事更有助于伊斯兰教的普及。但是从这方面来看，伊斯兰教没有给突厥人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因为他们从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的教士的口中也听到同样的故事。虽然这样，但是伊斯兰教的宣传在过去已经熟悉这些宗教之一种的突厥人的地方取得了成功。

同其他一些宗教比较，伊斯兰教的主要有利条件自然是根据下列的事实的，即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领域中，伊斯兰世界在这个时代的文明民族里具有显著的优越地位。游牧民常常急需取得文明国家的产品，特别是衣服。凡在文明民族和游牧民之间建立了商业关系的各处（在中国、伊斯兰世界和后来的俄罗斯），游牧民想买进的，首先是纺织品。和游牧民作生意，对文明民族来说也是同样有利的，比较在别一情况下，他们可以用较廉的价钱取得畜产品，特别是肉类。但是对游牧民来说，这种商业是特感需要的，各地的游牧民把畜群赶往靠近文明国家的移民区，而不等待商人来到草原上他们的家里。这样，他们逐渐熟悉伊斯兰教徒的商品和一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仅在宗教生活，而且在伊斯兰文明的一切方面都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但是从游牧民方面来说，只有在改信伊斯兰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和伊斯兰教世界的文化结成密切的关系。

在突厥人中伊斯兰教宣传的成功，还表现在能力上，在这方面伊斯兰教显然比其他世界宗教还要高一等。虽然伊斯兰教在信徒的人数方面不及佛教和基督教的多，但是人们可以说它现在是唯一的名副其实的世界宗教，根据这一点，它是一个超出同来源和同文化的民族界限之外的宗教。其他宗教的成就有时比伊斯兰的大，但是他们只是短期间继续而已。摩尼教过去曾经是一种世界宗教，它的信徒分布于从法国南部直到中国，但是这不能避免这一宗教的完全衰落。佛教开始时有普遍的活力，有世界的影响，这是通过对西方广泛的宣传而实现的，但是后来仅仅残留为

东亚文明世界的宗教而已。基督教在伊斯兰教扩大以前同样在突厥人中间有它的信徒，接着东蒙、西蒙和南蒙的所有民族都改信了基督教，而当时伊斯兰教的宣传在上述地区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成功。但是这一成功只是暂时的而已，而现在的基督教大抵是欧洲人的普遍的宗教；生活于欧洲文化世界边缘以外的基督教徒，无论从人数方面和文化的发展方面来看，比之欧洲的基督教徒是完全不足道的。从其本质来看，伊斯兰教是当作前亚文明世界的宗教的，但是东亚的伊斯兰教的人数，特别是印度和巽他群岛的超过了前亚的伊斯兰教徒的人数。在中国，伊斯兰教形成为一个独立力量，他们有用自己语言写成的宗教文献，他们不需要任何外面的帮助，而基督教徒为了要在中国内地扎根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教会，进行一切尝试，都宣告失败了。在非洲基督教也没有建立类似非洲伊斯兰教的同一东西。阿比西尼亚人是有自己的民族基督教教会的唯一的非洲民族，但伊斯兰教在那里的宣传甚至在19世纪也获得了成功。一般说来，历史上有许多佛教和基督教民族是改信伊斯兰教的，但没有任何伊斯兰教民族是改信佛教和基督教的。

突厥第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哈拉汗朝

阿得水流域不耳阿里人信奉伊斯兰教后，证明伊斯兰教在突厥人中取得成功的其次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公元960年，即不耳阿里的使节到达报达后不到40年，有许多突厥族人民改信了伊斯兰教（共200,000帐）。可惜这样的报道只见于报达的史学著作①②，

---

① 首先见于伊宾·米斯卡瓦希的《阿拔斯朝哈里发的衰微》卷二，第181页（原文），卷五，第196页（译文），起源是塔比特·伊宾·希南的佚著，是写回历295—363年之间的事的。

② 这里指的是回历295—363年，公元907—908—973—974年。参考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7页以下。那里也有参考书目（《巴托尔德文集》卷一，第52页）。——俄译本注

不见于萨曼帝国的著作家的著作，也不见于阿拉伯地理学者的著作。我们所得到的也是极为模糊的报道。这些著作丝毫也不能确定这一突厥民族叫什么和在什么地方生活。只有在后来的中亚的传说中，它的最早的说法见于14世纪的一本著作①，而这著作又是参考11世纪的一本著作提到了突厥可汗，他和他的突厥人民在当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民族因为可汗的改宗，全部也就改信伊斯兰教了）。这个可汗就是沙杜克·布格拉可汗②③。约在10世纪末他征服了萨曼帝国和在中亚（河中）建立第一个突厥伊斯兰教帝国的王朝的成员之一。甚至在上述最早的说法中，有关布格拉汗和改宗伊斯兰教的故事分明带有宗教传说的性质，而在现在广泛流传于中亚的布格拉汗故事的各种说法中则宗教传说性质更为浓厚了。在历史和地理的资料中甚至连沙杜克·布格拉汗（起源的）王朝属于哪一个突厥部落的问题也没得到解答。格里哥里也夫教授以后在俄国科学界即根据布格拉的另一称号，一般叫这王朝为哈拉汗国。在欧洲科学界有些东方学者还常常称之为伊列克汗朝，这一名称不大好，因为伊列克并不是常常和汗的称号相结合的。此外，这个汗朝的汗不都命名为伊列克④⑤。

这一汗朝属于哪一时代？突厥民族在其进入历史舞台以前是怎样迁来的？这些汗的本身是属于哪个部落的？所有这些问题，从来都是完全不清楚的，甚至在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发现和

---

① 原文见巴托尔德《突厥斯坦》卷一（原文），第130页以下。

② 原文误作Abdal—malik，正确的是《突厥斯坦》英文版，第255页。

③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255页（《巴托尔德文集》卷一，第315页）。——俄译本注

④ 参考《伊斯兰百科》卷二，第496页；詹包儿《系谱要略》，第206页（只有个别的穆斯林王朝不清楚）。

⑤ 巴托尔德：《伊列克汗》，《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下册，第519—520页，同时也指出了新的文献。——俄译本注

出版以后，因为喀什噶尔写他的著作的时代是在哈拉汗朝已经长期巩固后的统治时代，接触到过去问题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阿拉伯地理文献的代表作，甚至其中有些960年以后写的也毫不知道在萨曼王朝边界上存在一个伊斯兰教突厥帝国，他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书本的资料上，而且是属于较早的时期的。除了9世纪和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的非常简单的示意图外（根据这示意图，葛逻禄是据有位于古斯领土和托古斯古斯领土之间的土地的）①，我们发现，在若干其他的阿拉伯文资料中有更为丰富多采的描述，那只有通过两种波斯文的著作而得到，一种是无名氏的地理著作，写于回历372年即公元982—983年，它是1892年在布哈拉发现的，用发现者的名字，称为杜曼斯基手稿②，另一种是在11世纪即1040年以后写成的格尔德齐的历史著作③，这些资料显然属于较10世纪地理学家生前的略图更晚的时期。但是，即使这样，也未能提供一个清晰的图景，而且这些资料分属于各个时期，彼此之间或是和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中所见到的突厥民族的分布情况之间难以求得一致。

可是从杜曼斯基的原稿和格尔德齐的著作中，我们还获悉，根据公元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的报道，葛逻禄所居住的一部分土地，在9世纪是为样磨民族所占据的，而样磨是托古斯古斯，也就是九姓乌护的后代。样磨民族占有喀什噶尔和锡尔河支流纳林河以南七河流域的一部分。如果说样磨民族定居这里是在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载所指的时间以后，如果这支托古斯古斯是从东方迁来，那末就会同察希兹所说的矛盾，即在托古斯古斯信奉摩尼教④以后，在他们和葛逻禄之间进行的战争中，优势转入到葛逻

① 《阿拉伯地理学丛书》卷二，第11、14页。

② 参考无名氏《世界境域志》。——俄译本注

③ 参考《伊斯兰百科》卷二，第137页。

④ 马迦特，《东欧漫游记》，莱比锡，1903，第91页。

禄方面。哈拉汗国和喀什噶尔有密切的关系，喀什噶尔是可汗的驻在地，他的宫廷也称为奥尔杜干汗国建牙的所在地。马木特·喀什噶尔对此也有所说明[①]。从这里会得出这样的假设，即据有喀什噶尔的民族创造了哈拉汗朝，也就是说哈拉汗国是由托古斯古斯或回鹘的一支样磨民族而产生的。但是，马木特·喀什噶尔丝毫没有明确说到这个问题，他知道的样磨这个字只是作为一个民族名称；他们当时住在较北的地方，即伊犁河流域。马木特·喀什噶尔认为还有几个民族位在同一流域；据杜曼斯基的原稿和格尔德齐的著作，突骑施和炽俟[②]民族是住在较南的地方。相反，波斯著作家认为这些民族中的前一个民族即突骑施是居住于楚河以北的地区，而后一个民族，即炽俟是居住于热海北岸。炽俟的名称（从那以后就被人忘记了），到了11世纪便用来表示许多其他突厥部落。从塞尔柱克算端灭力沙远征河中地的记事中，我们知道，哈拉汗国的军队是由炽俟组成的。根据马木特·喀什噶尔的叙述，乌古斯把居住于阿姆河和直到中国之间的所有突厥人都称为炽俟。这一事实看来是说明炽俟在中亚方面的政治重要性的，说明哈拉汗朝是出自他们中间的。但是人们在喀什噶尔的著作中没有发现有关支持这一假设的任何陈述。作者只用以下的情况来说明乌古斯对炽俟一字所赋予的意义。即炽俟城为这个民族的一支所居住，它位于答剌速即现在奥列阿塔的附近[③]，对于乌古斯来说，他们早就知道这座城市是东突厥聚居比较靠西的地方。炽俟的其他两支居住于喀什噶尔附近的两个乡村和伊犁河流域[④]库雅斯城[⑤]附近的地区。到蒙古时代，位于伊犁河南岸的

---

①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288页。
② 同上书，第330页。
③ 即今之江布尔。——俄译本注
④ 《伊斯兰百科》卷二，第499页以下。
⑤ 伊犁，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三，第433—434页。——俄译本注

这座城市，成为成吉思汗子察哈台及其后人的首都而著称①。关于葛逻禄，马木特·喀什噶尔最后是当作游牧民族来记载的，而人们完全同对乌古斯的称呼一样，也叫葛逻禄为突厥蛮（土库曼）②，但是杜曼斯基的原稿和格尔德齐的著作则是把葛逻禄（这一名称在波斯的著作家中改为察禄的形式）位于伊斯兰教国家的近邻，即答剌速东边的附近。他们在中国突厥斯坦也有几个城市，其中有一个城市叫Penčul，汉文作温宿③，在现在乌什附近。杜曼斯基的原稿说这座城市在葛逻禄境内，但是它的支配者屈服于托古斯古斯；后来黠戛斯占领了这座城市④。根据杜曼斯基的原稿，喀什噶尔也位于葛逻禄、托古斯古斯和黠戛斯等领土的边界上。杜曼斯基原稿有关黠戛斯的资料是极为有趣的。它提供了作出下面结论的根据，即黠戛斯开始迁到南方，住在他们现在所在的地区，不晚于10世纪。但是无论是格尔德齐或是马木特·喀什噶尔或是其他的资料都没有提供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资料。马木特·喀什噶尔也没有提到葛逻禄同炽俟和样磨同样地向北迁徙的情况。但是后来，即在成吉思汗时代，我们却在伊犁河北方发现了柯耳鲁（《元史》）国家。

马木特·喀什噶尔也提到了哈拉汗朝来源的三个民族：葛逻禄、样磨和炽俟，但是没有指明三个民族中哪一个和这汗朝关系更密切些。他的关于葛逻禄的报道是极有趣的，即人们如同称乌古斯为突厥蛮那样来称它，关于10世纪初次出现的⑤这一词的起

---

① 巴托尔德，《察哈台汗》，《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下册，第538—544页，关于炽俟，参考《世界境域志》，迈那尔斯基英译本，第297—300页。——俄译本注

②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393页。

③ 今读作温宿（Вэньсу）。——俄译本注

④ 《世界境域志》，第98、283页，关于葛逻禄，参考同上书，第286—297页。——俄译本注

⑤ 见木喀达西的著作，《阿拉伯地理学丛书》卷三，第274页以下。

源和由来直至今天仍然是个谜①。波斯文：Türk mānend②（类似突厥的）的语源已经在马木特·喀什噶尔③的著作中有所发现，这一词源自然是不足信的。只知道突厥蛮的类型和普通的突厥类型有所区别，不如说和伊朗类型更为近似。和乌古斯比较葛逻禄是更多地受到伊朗因素的影响的，在接受伊斯兰教以前，同其他的突厥人比较更为接近伊斯兰的文化。到了12世纪，人们把八喇沙衮城④（在七河地区）的即出身于哈拉汗朝的统治者称为“突厥蛮”⑤⑥。这一事实也许是有利于汗朝是来源于葛逻禄的证据⑦。

关于八喇沙衮城，马木特·喀什噶尔的同时代人，波斯首相尼咱木·莫尔克⑧有这样的记事。根据这一记事，这一城市已经在940年左右成为伊斯兰教城市。这座城市的落入异教徒手中可能是由于宣布圣战而引起的。葛逻禄之信仰伊斯兰教可能比较样磨还早些，而样磨民族的可汗是仿效他们的榜样的，但也是在葛逻禄国家的领土被占领之后才开始的，其中有楚河流域，八喇沙衮城的位置可能就在楚河流域。但是这一切只是一个假定，并没有足以支持论点的证据。

---

① 木喀达西，《全国各地区最好的分类》，第274页以下；同时参考阿卡扎诺夫《新文献》。——俄译本注

② 语源同 Turk—mān “我是突厥人”（ich bin ein Türke），见于 Nešri（《奈什里》）。〔勘误〕Turk—i—mān可能是波斯语，意为我的突厥人；应作Türk-mān。

③ 《突厥语词典》卷四，第307页。〔勘误〕卷四应作卷三（H.H.施德）。

④ 《伊斯兰百科》卷一，第639页。

⑤ 术外因的原文见《吉伯纪念丛刊》，卷十六，第2、88页，按意义 Turkmân 应读作 Turkân（征服者，没有理由把八喇沙衮三叫做“突厥王”）。见于《奥彼尔特长老约翰》（柏林，再版，1870年，第132页）中的密尔汗特的著作也是这样，阿布哈齐《突厥系谱》，出版者德迈桑，第49页。

⑥ 较详细的，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下册，第549—552页。——俄译本注

⑦ 关于哈拉汗朝起源于葛逻禄的说法，参考普里特沙克《哈拉汗朝》；同上作者《葛逻禄》。——俄译本注

⑧ 施费编的《政府论》，第189页，《东方现代语学校丛刊》第三编，第七、八卷。

沙杜克·布格拉汗①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第一个突厥汗，被认为是可失哈儿的统治者，他的坟墓今日还在位于喀什噶尔城北的阿图什（Artyš）镇，（古代史料作 Artuč）②。根据有关汗的记事最早的说法，他是在回历344年即公元955—956年去世的，但是他跟突厥民族960年信奉伊斯兰教的报道多少有些矛盾，后一报道可能早见于报达历史家塔比特的当时的著作中，其日期是960年，这一日期大抵比较前一记事的日期更值得信赖，因为沙杜克·布克拉汗的记事本身包含有许多时代错误和宗教传说的细节。

在10世纪的期间内，生活于锡尔河阿得水下流的部分乌古斯人也改信了伊斯兰教。信仰伊斯兰教的乌古斯首领开始了把伊斯兰教城市从一向给异教徒缴纳贡赋的状况中解放出来的活动。一般说来，两个突厥民族（哈拉汗朝和乌古斯）自发的信奉伊斯兰教显然可看作是伊斯兰教的胜利。由于这一胜利，从前伊斯兰的边区从现在起在北方和在东方都有了伊斯兰的邻人（人们也许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可以说伊斯兰教在和非伊斯兰教世界的斗争中得到了新的同盟军。但是实际上，情况却变成这样，信仰伊斯兰教的两个突厥民族几乎同时把自己的武装转移到反对把伊斯兰教传来到他们这里来的国家。

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和结果是下一讲所要研究的。

---

① 《伊斯兰百科》卷一，第803页。

② 巴托尔德：《布格拉汗》，第803页（《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下册，第508页）。——俄译本注

·第五讲·

十一世纪的中亚

马木特·喀什噶尔的《突厥语大辞典》（第11世纪）及其对于乌古斯和其他西突厥的说明。从窝勒伽河直至中国突厥各族的文化的共同性。

哈拉汗朝的领土

关于可失哈儿汗的布格拉汗信奉伊斯兰教的问题，伊斯兰历史家没有给我们留传下足以信赖的任何参考资料。但是，有关伊斯兰教学者的传说保存一个神学家的名字：卡里马奇，这个时代（960年左右）①他正在突厥汗的宫廷里，报达的编年史②把这一年确定为一个许多突厥族人民信奉伊斯兰教的一年。然而关于布格拉汗的传说中并没有提到这位神学家。从传说的各种古老的说法中，有一种根本没有提到有什么人间的启蒙者，布格拉汗之所以信奉伊斯兰教，是由于他在梦中得到一个天上的命令来解释的③；另一种传说，是这位启蒙者亡命到突厥汗那里去的萨曼王朝的一位王子，而不是神学者。这里引用的人名和日期分明是幻想

① 萨曼尼：《系谱词典》，《吉伯纪念丛刊》卷二十，第486页。

② 〔勘误〕报达的编年史应作报达的历史编纂学（H. H. 施德）。

③ 伊宾·阿勒·阿提尔书，卷十一，第54页。

的，和历史不符，虽然这故事是抄袭本，我们没有得到的十世纪可失哈儿历史家的著作，但这一故事特别详尽地说明了汗是怎样首先对伊斯兰教商品：纺织品和糖果感到兴趣，然后才注意到伊斯兰的礼拜和开始向伊斯兰教徒询问关于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①。

我们上面看到信奉伊斯兰教的汗，沙杜克·布格拉汗邸宅的所在地是可失哈儿城②，他的孙子布格拉汗·夏隆·摸沙③则住在八喇沙衮城④，他企图从这里来征服河中地。后来，可失哈儿和八喇沙衮往往被记载为属于哈拉汗朝的两个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八喇沙衮城，不管对这汗朝表现得多么重要，但在伊斯兰教文献中却很少提到，它没有指出任何路程⑤足以确定这一城市的地理位置。在10世纪的地理学家中，木喀达西⑥是唯一的引用Balâsâghûn这一名称（他写成Walâsakûn)的，但是没有明确它的位置。无论是杜曼斯基的原稿⑦或者是格尔德齐都没有说到这城市的名称。很可能八喇沙衮城起初是用另外的名称，而以这一名称记载在9世纪和10世纪的地理学者所述的路程中。阿拉伯和中国的著作家常常确定楚河流域的首府是Su-jab⑧（是汉文碎

---

① 《突厥斯坦》，第一部（原文），第131页。

② 《伊斯兰百科》卷二，第844页以下。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三，第456—457页。——俄译本注

③ 《伊斯兰百科》卷一，第803页以下。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下册，第506—507页。——俄译本注

④ 《伊斯兰百科》卷一，第639页以下。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三，第355—357页。——俄译本注

⑤ 〔勘误〕"没有……路程"应作没有旅行指南（H. H. 施德）。

⑥ 《阿拉伯地理学丛书》卷三，第275、第17页。

⑦ 《世界境域志》，参考巴托尔德《杜曼斯基手稿》附导言。列宁格勒，1930年。巴托尔德的最重要的导言，由迈那尔斯基译成英文。

⑧ 《突厥语词典》卷三，第306页。碎叶一名可能在手稿中有过（同上，第305页），但是编者认不出来。

叶的对音[①]。在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中找不到这一名称[②]。后者只提到靠近八喇沙衮的一个名叫楚（Šu）的要塞，由楚（Šu）王所建造，这位楚王据说就是亚历山大帝的同时代人，又补充说，它是在以下的时代出现的，即当伊斯费遮普或赛蓝城、塔拉斯和八喇沙衮等城还不存在的时代。人们知道现在的吉利吉思人是以š来代替č的，他们现在称Ču河为Su河。拉德洛夫所闻这条河的名称也是这样的[③]，居住在河岸的突厥人，当时的发音也是相同的，他象吉利吉思人那样也是把这个字念成Su。后来Su的名称，不但是指河而言，而且还扩展到位于这河流域的城市的废墟，而后者的废墟就是今天还见到的布兰纳塔[④]，这一名称显然是阿拉伯语Manâra（伊斯兰教堂的尖塔）的传讹。马木特·喀什噶尔还提到在前往八喇沙衮的路上有一个珊比山口[⑤]，它是位于可失哈儿巴什（Qočqar bašy，在印刷上[⑥]常常写成qĝnkār，但被译为al—kabš（即阉羊）和八喇沙衮之间。可失哈儿巴什城的名称早见于波斯文资料中[⑦][⑧]。它位于塔拉斯之东，但是更可能的是，这个城市，象它的名称所能揣测的，是位于喀什噶尔河的上游，正如楚河（Ču）是根据它的上游来命名的一样。从它的名称和突厥名称绝不相同的情况来看，在这场合是和今天的Ŝâmsî山口[⑨][⑩]相一致的，在突厥土著的传说中存在这一名字。

---

① 参考祖也夫《中国的资料》。——俄译本注

② 〔勘误〕Suyab一名见于喀什噶尔原著，只是出版者不知道而已（H. H. 施德了。

③ 《西伯利亚见闻录》卷一，第10页等处。

④ 参考伯恩斯坦《吉尔吉思的建筑纪念物》，第40—45页。——俄译本注

⑤ 《突厥语词典》卷三，第325页。

⑥ 除指出之处外，还见于卷三，第282页。

⑦ 见《维也纳东方学艺术杂志》卷三。

⑧ 托马斯克：《维也纳东方艺术杂志》卷三，第325页。——俄译本注

⑨ 巴托尔德：《报告》，第40页。

⑩ 巴托尔德：《中亚科学考察报告》（本文集卷四，第57页）。——俄译本注

八喇沙衮的来源，从来还没有说明。上面提出的这一名称和蒙古语balghasun＝“城市”（Stadt）相提并论，现在几乎没有人赞成的了。人们在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中，发见当作“医生”[1]解释的atasaghun一词，那分明是在突厥语 ata 即父亲一字上形成的。我们并不急于作出决断，八喇沙衮一词是否出自bala即孩子和它有什么意义。在突厥人的著作中，除 Balâsâghûn 外还有 Quz uluš[2]。（uluš一词表示乡村或城市的意义）或 Quz-ordu[3]的名称。ordu 的名称，除了 Balâsaghûn 外还有其他城市（在这个时代）是用此 ordu 来表示的。10 世纪末的地理学家木喀达西也引用它当作是土著“突厥蛮”统治者居住的地方。至于关于 Quz ordu一词中的 Quz的意义，马木特·喀什噶尔没有提出任何说明。

八喇沙衮是粟特人所修建的诸城市之一，那里的“突厥化”在马木特·喀什噶尔的时期还没有完全结束。它的居民和伊斯费遮普、塔拉斯和八喇沙衮的居民是操粟特语和突厥语的。象在鄂尔浑碑文所记，粟特人也是用Soghdaq一名来表示的。根据作者的报道，称为Soghdaq的民族来源于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之间的粟特地方（Soghd），同时这一 Soghdaq是采用突厥人的服饰和风俗的[4]。从伊斯费遮普[5]（另一处[6]作从塔拉斯）直到八喇沙衮所形成的整个地区称为阿尔胡（Arghu），这一名称不见于其他的资料[7]。根据马木特·喀什噶尔的意见，人们普通把arghu理解为

①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81页。
② 同上书，卷一，第60页。
③ 同上书，卷一，第112页。
④ 同上书，卷一，第391页以下。同上，第114页。有关阿尔胡国的较详细的情况，参考克里雅什扎尔涅依《古代突厥碑文考》，第112—135页。——俄译本注
⑤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31页。
⑥ 同上，卷一，第114页。
⑦ 同时参考克里雅什托尔涅依《七河流域的粟特人》。——俄译本注

“两山之间的山口”①。

因而，显然这一区域是由于它位于名为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楚河和塔拉斯河之间的山脉）和楚—伊犁 Ču—Ili 山脊之间的位置而得到这样的名称的。人们没有提到其后生活于八喇沙衮以东地方的粟特人。在马木特·喀什噶尔的时代，阿尔胡的居民自然是伊斯兰教教徒。人们不了解他们是否在屈服于突厥人之前就接受伊斯兰教，当他们在语言和服饰方面变为突厥人以前，他们原来在文化方面如何，对突厥民族有何影响。

对在中国突厥斯坦开始定居下来的非突厥居民也提出相同的问题。只有根据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我们才知道这一居民在当时还是被看作是独立的民族的，它被称为干什克②，这一名称在其他任何资料中都找不到，从那时候开始，干什克已经“突厥化”了，但是他们在有些单词和某些发音特点方面还保存了以前语言的残余。

古代的萨曼王朝省区

10世纪末，伊朗—伊斯兰世界的边境国家即萨曼帝国被突厥征服一事不是发生在可失哈儿，而是在八喇沙衮。可失哈儿当时还未成为大多数突厥民族的首府。人们最初提到的是布格拉汗·夏隆所征服的伊斯费遮普或赛蓝。夏隆是改奉伊斯兰教的沙杜克·布格拉汗的孙子③。显然，在赛蓝有一小块突厥领地或者是突厥汗朝支配下的领地。992年布格拉汗·夏隆第一次进军寻思干和不花剌。这次出征取得了成功。虽然这样，但是这种情况却使得征

①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114页。

② 同上。

③ 关于这些事件以及后来的事件，参考《突厥斯坦》（英文版），第257页以下。

服者暂时舍弃了他们的征服成果，回到布格拉汗同年死去的八喇沙衮，但由于其后几年的媾和，泽拉夫善河流域以北的萨曼王朝的全部领地落入到哈拉汗朝的手中。几年后，即999年，哈拉汗朝重新占领了寻思干和不花剌。萨曼王朝最后的统治者在11世纪初恢复自己王朝的统治的企图，丝毫也不可能真正动摇在河中地区建立的突厥的势力①。

一般说来，为了激发人民群众起来保卫伊朗人的国家，反抗外来敌人的萨曼王朝所作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功。伊斯兰若干教士甚至陈述了以下的原则，只有当伊斯兰国家受到了异教徒攻击的情况下，人民才有义务参加保卫国家的战争。根据这一原则的精神，哈拉汗朝既是相信伊斯兰教的，人们就没有理由相信伊斯兰居民在他们（哈拉汗朝）的统治下的处境会比在萨曼王朝的统治下更恶劣。伊斯兰教民，没有任何理由值得入伍和战斗到献出自己的生命。

再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些情况也不大有利于组织河中地伊朗居民一致反抗突厥的征服者。伊朗的中亚在伊斯兰时代以前，没有一个强大的君主政权；实权掌握在地主贵族的手中。一国分为很多小公国，公爵只是公国的最大地主，和地主贵族一样，他们自称为达干。有时他们的权力暂时完全消失了。伊朗的达干，这个社会阶级在突厥中也起着同样的作用：人们在河中地也发现突厥的称号中有达干一词。在伊斯兰时代里，无论在河中或在波斯，都可以看出形成贵族阶级的这一倾向，由于城市生活的发展，强大的君主政权的确立和官僚集中化等影响逐渐地消失了，在当地的伊朗方言为波斯语所排除的同时，萨珊王朝关于国家概念的传统也传进了中亚，萨曼王朝自称是萨珊王朝的后裔。萨曼王朝的专制倾向，必然要在当地的贵族政治中产生暴动叛逆的情绪，

①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一，第315—329页，同时参考加夫罗夫《萨曼王朝兴衰的原因》。——俄译本注

有一份资料提到①②，布格拉汗是被达干邀请到河中来的。我们有理由认为，达干一名在突厥所征服的地方事实上立即被采用了。从地理学家木哈达西的报道中，我们知道10世纪末，达干阶级的传统在经济生活中维持下来，特别是在塔什干南、安格兰河流域的伊拉格地区。但是伊拉格的达干已不再有政治作用了。在哈拉汗朝的统治下，发现有伊拉格达干铸造的货币，它表示政治作用的加强。

在征服河中地后，哈拉汗朝始初并没有住在这一国家首府：不花剌（萨曼王朝的首府）或寻思干。哈拉王朝在河中地区最初的统治者的邸宅是乌兹根，这一城市位于费尔干纳的东部边境，在这以前并无任何的重要性。这里是他们过去领地的紧邻，哈拉汗朝分明感觉到这比之在他们所征服国家的中心是较为安全的，事实上在他们征服后的若干年，那里民族移动的若干迹象表明是有利于萨曼王朝的。乌兹根这个城市在突厥征服以前就已存在，但都曾不恰当地从突厥的语源学角度推敲出 öz kent〔kend〕“我们自己的城市”一词来说明这一城市的名称③。河中北部的首府，也保存有突厥名称，那里的突厥因素比之南部自然更大一些，那就是 Čač 地区的首府 Binket（柘折城）。根据阿拉伯人的发音，后来传至土著的文献里，是Šaš。柘折城这一名称，从阿勒毕鲁尼④的著作中，我们知道，在11世纪为Taskent(石城）的突厥语的名称所代替，虽然这地方几乎没有石子⑤。为了解释这一罕见的事实，人们在发现的文献中有若干推测，但这些推测

① 乌特比：《马尼尼》卷一，第163页，参见《突厥斯坦》卷一，第163页。

② 同上书，第163页。关于达干在哈拉汗朝时代的命运，参考《塔吉克民族史》卷二、三册，第247—253页。——俄译本注

③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288页。

④ 毕鲁尼：《印度志》，沙豪编，第149页，英译本卷一，第298页；参见马迦特的《伊朗考》，第155页；《伊斯兰百科》卷四，第746页。

⑤ 巴托尔德：《塔什干》（本文集，卷三，第499—502页）。——俄译本注

都是些任意的假设而已。马木特·喀什噶尔也提到塔什干的突厥语言的简略形式：Terkend①。从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中也容易看出，撒马尔罕城一名就突厥民间语源学来说在当时系突厥词的semiz keent，意思是肥的，也就是说“富饶的城市”②③。

哈拉汗朝放弃在寻思干和不花剌的定居，并不意味着放弃对西方的进一步征服，因为从那里不但得到了宗教，而且也得到了物质文化和物质财富。向西方移动，比之向东方和北方反对还未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的战争可希望得到更多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不能改变突厥人进行征服的一般方向（即突厥人有意进行扩张），何况象我们已看到的，在伊斯兰教国家中，有各种集团和派别把突厥人看作是自己的同盟者，宗教就更无能为力了。从他们最近改奉伊斯兰教的事实来看，突厥同西亚地区的伊斯兰统治者相比较，他们是更热心的伊斯兰教徒。甚至在10世纪，从东方来的宗教狂热者期望着出现（从东方来的）正统派的征服者，他们要废止此刻潜取报达全部权力的十叶派白益王朝的统治权④，正象在西方柏柏尔人一样，在东方各国的宗教代表和政府作斗争中，突厥人起到宗教保护者的作用是十分平常的事。马木特·喀什噶尔叙述到圣训哈提斯时，在其中按先知的话（穆罕默德）下列的话是神自己说的：我有一支军队，是由我命名为突厥的人们所组成的，我使他们定居在东方。当某一民族引起我的愤怒时，我就给他们以使之屈服的权力⑤。

---

①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369页。
② 同上书，卷一，第288页（但应参考马迦特《匈牙利年刊》，第九卷，1929年，第94页）。
③ 同上书，第288页，但应参考马迦特《诗文集》，第94页。——俄译本注
④ 《阿拉伯地理学丛书》卷三，第472页。
⑤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294页。

伊朗和涂兰

哈拉汗朝同样取得了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君主的好评。他们不喝酒，因此就和加兹尼汗朝代表人物有所区别。加兹尼汗朝也是来源于突厥人的，但是他们是独立于突厥民族移动之外的，他们是继承阿姆河以南地区萨曼汗朝的遗产的。加兹尼的算端马木特也是被看作为最虔诚的君主。他们在印度进行圣战和在本国迫害异教徒。但是作为个人来说，在自己的私生活中他们是不拒绝宗教所禁止的享乐的。

哈拉汗朝不希望呆在阿姆河，他们攻击加兹尼马木特帝国。加兹尼马木特的编年史家在这场合叙述到哈提斯时说到了突厥人的外貌；说到了他们的小眼睛，他们扁平的鼻孔等等[①]。这种哈提斯看来可当作是反对下面的意见的主要证据，根据这意见，突厥人在起源上不属于所谓蒙古人类型的民族。可能是在伊朗地区内部所进行的反对突厥人的战争也是从伊朗人的民族传统的角度来看的。正好在这时候出版了费尔都西的《帝纪》，那是在萨曼王朝时代写的，但是它在加兹尼马木特的统治期间才得到了弘布。在这里有关伊朗和涂兰之间的战争占重要地位，它指出，自从6世纪突厥出现后，人们就用涂兰（Turan）一字来表示突厥斯坦也就是说“突厥人的国家”。在涂兰这方面，作战的英雄被提升为突厥统治者的高位，虽然他们有纯伊朗的名字。这一传说应用到哈拉汗朝被下列事实说明了，即哈拉汗朝不但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伊朗史诗的影响，涂兰传说的君主名字被称为Âl-i-Âfrâsijâb（阿夫拉西也布之家）虽然这一名字完全是非突厥的名称。从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中，我们才获悉突

① 《突厥斯坦》，第273页，据乌特比的书。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一，第335页。——俄译本注

厥歌谣的主角，阿勒布·唐加（Alp Tonga）（依手稿的读法是Toña或Tönge）被考证为即是阿夫拉西也布（Afrâsijâb）。马木特·喀什噶尔所引用的这些歌谣中的几首，往往都附有阿拉伯语译文：在译文里，阿勒布·唐加一名被阿夫拉西也布一名所取代①。有关阿夫拉西也布的波斯传说的某些情节被看作属于突厥斯坦的某些地方的。喀什噶尔②是阿夫拉西布的首府。同样巴楚Barčug城（现在的玛喇尔巴什Maral-bašy）的兴建，也是阿夫拉西也布授命的，据称英雄比先（Bizen）就是禁锢在巴楚城里的③，根据波斯的史诗，因为比先私自和阿夫拉西也布的女儿结婚，阿夫拉西也布命令把他投进井中，卢斯腾(Rustem)后来把他释放了。费尔都西，甚至他的前辈，萨曼王朝同时代的达奇奇（Daqîqî），在有关神话性质的涂兰人的故事里也混入了同时代突厥人的生活特点，那是很自然的了。例如许多城市和各突厥民族的名称是属于这一情况的，突厥文字中也引用了Chatt-i-paighewi④，根据后来实行的正字法名称，这里paighû一词，同许多其他的情况一样，也是在鄂尔浑碑文中所见到的jabghu(叶护）称号的变形，特别是葛逻禄的统治者是使用叶护的。

同加兹尼王朝作战的结果，哈拉汗朝失败了。他们的一切攻击在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后被击退了，阿姆河北岸的几个省也落入马木特的手中，马木特要求人们公认他是整个东方最高的元首，并试图达到只有通过他的斡旋，哈里发和哈拉汗朝才能发生关系。但是同时马木特自己却和哈拉汗朝的可汗对等地发生了联系。这一事实特别清楚地表现于历史学家格尔德齐的关于加兹尼的马木特和可失哈儿的统治者喀知儿汗·尤素甫（布格拉汗·夏隆之子）

①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44页，及其他。
② 同上书，第288页。
③ 同上书，第318、388页。
④ 沙来曼编：《辞书》，第52页。按：《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80页，作《辞书》。——俄译本注

1025年在寻思干以南会面①的详细的记事②。

东突厥斯坦

哈拉汗朝向东突厥斯坦的唯一的出征是和1032年去世的喀知儿汗·尤素甫的名字相联系的，据历史家的报道，即是对于阗的占领。在我们所知道的范围内，只有在这里伊斯兰的取得成功是和穆斯林武装力量的成功相联系的，因为这是一座在许久世纪以来都为佛教教义所支配，但为穆斯林突厥人所占领的城市。在格尔德齐有关于阗的显然属于哈拉汗朝征服以前时代的一节记载中也提到了基督教会和伊斯兰墓地③，从这里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徒早在佛教时代就已经深人到这里来了。

指出这样的事是有趣的，即和马木特发生关系的，不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哈拉汗朝，而且还有偶像教徒的突厥统治者。根据格尔德齐的记事④，有两个突厥汗的代表于1026年来到了马木特那里（他们的称号被引用，其读法根据唯一的剑桥版的格尔德齐手稿，不能完全确切定下来，牛津的手稿只是复本）。向他请求，同意恢复他们和加兹尼王朝之间的亲戚关系。马木特回答说，伊斯兰教徒不让自己的女孩嫁给异教徒，如果汗愿意改奉伊斯兰教的话，那末他就会实现他们的要求⑤。可惜，它既未说到汗所统治的地方在哪里，又未提到它是否属于哈拉汗朝，也就是说在哈拉汗朝中间是否还有未改信伊斯兰教的汗。除了格尔德齐的著作

---

① 《突厥斯坦》（英文版），第282页以下。原文今依格尔德齐记事，纳吉木编（1928年），第82页以下。

②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282页以下；《巴托尔德文集》卷一，第344—346页。——俄译本注

③ 巴托尔德，《报告》，原文，第94页。

④ 《突厥斯坦》，第286页。

⑤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一，第347—348页。——俄译本注

外，在唯一的一部史料即伊宾·穆罕纳在14世纪撰写的关于波斯、突厥、蒙古语的著作中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这部著作的后两部分于1900—1903年①由已故俄国的东方学家梅里奥兰斯基所出版，包括原文和附有序言的语言研究的俄文翻译。全著是回历1330—1340年(即公元1912—1922年)，由里夫雅特所发表②。突厥文版的出版者利用了俄文版出版者所没有利用过的若干新资料，他还能确定作者的名字。可惜的是我们关心的章句由于突厥文版的阙略改变了原来面目，以致我们只得用俄文版相同的章句。

伊宾·穆罕纳在有关动物生肖历法方面介绍了我们没有得到的医生马尔瓦奇的一本著作：《论动物的本性》③。

它报道了算端马木特于回历418年即公元1027年接到"中国统治者和突厥统治者"的信，日期是鼠年五月，也有引用其他年份名称的，因而把bars（豹）年也称为qaplan（虎）年或salan即arslan(狮)年的。梅里奥兰斯基不懂得后一个字Salan。因而新的资料关于两个汗的使节并没有提供新的报道，只是增加年代学上的紊乱而已。格尔德齐把使节的日期定为回历417年即公元1026年。而医生马尔瓦奇则定为回历418年即公元1027年。根据动物周期的年月即鼠年，相当于公元1024年或1036年。

提供有关哈拉汗朝时代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地区的界线的报道者只有马木特·喀什噶尔一人。大家知道东突厥斯坦的文化区是位于两条主要道路的沿边的：一条是北道，通向库车④⑤和吐鲁

① 梅里奥兰斯基：《阿拉伯语言学家关于蒙古语言的意见》；同上作者《阿拉伯语言学家关于突厥语言的意见》。——俄译本注

② 同时参考马洛夫《伊赛·穆罕纳》；巴特尔：《伊宾—马·穆罕纳·鲁加褫》。——俄译本注

③ 参考马尔瓦奇（医生）；哈拉科夫斯基《舍利甫·查曼》（医生）。——俄译本注

④ 据巴托尔德的意见，今日的发音是库车（即龟兹）。玉尔：《契丹及其通道》，伦敦，1916，卷四，第231页。俄文本原来作曲先（Gucen）、苦先（Kucen），在库车东北，位于从乌鲁木齐至巴尔库尔的大道上。

⑤ 在德译本中（第89页），应改正为Куча（库车）。——俄译本注

番，另一条是南道，从和阗到塔里木河流入的罗布淖尔。在喀什噶尔的著作中，Usmy Tarym是一条大河的名称，它从伊斯兰帝国流入回鹘，并在那里消失在沙漠中①。直到11世纪，伊斯兰教还没有传进吐鲁番和罗布淖尔，它的界限北至库车（Kuča，küčä）②和轮台（Bükür）③，南至车尔成城④。但没有指明这一地区是否包括从喀什噶尔直至喀什噶尔汗以外的其他汗所在地之间广大地区在内。

回鹘可汗的领地显然是向东伸展到更远的地方，他采用阙毗伽可汗（Kül-Bilgä Chan）⑤的称号，但是Kâna jusammä（＝他常常被称为）这词表示，这一称号涉及到过去时代的人们：在作者生存的时代，回鹘可汗采用什么称号是没有说明的。阙（Kül）这个字，它是由于阙特勤（Kül-Tekin）而著名的。他是古代鄂尔浑碑文上的主角，Kül这个词也在葛逻禄统治者的称号Kül-Irkin⑥中碰见，但是作者已不再知道Kül一字古代的意义了。他把Kül一字和Köl（湖）混同起来，因而对称号采取极表面的解释，据说应解释为可汗或君主的智慧象海那样的广大。在格尔德齐⑦的著作中，阙特勒的称号是以Kür-Tegin形式出现的。毫无疑问，Kül和Kür只能是同一个字，人们常常看作是l音和r音之间的转换而已。马木特·喀什噶尔也知道Kür这字作Kür—er⑧具有"顽强、坚韧、勇敢的人"的意义，这证明Kür的古代意义没有被遗忘，但是他不承认它是称号Kül的同一字，也没有察觉到Kül-Bilgä和Kül-Irkin中的Kül就是从这一Kür而来的。

---

①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116页。
② 同上书，第339页。
③ 同上书，第301页。
④ 同上书，第364页。
⑤ 同上书，第358页。
⑥ 同上书，第99页。
⑦ 巴托尔德，《报告》，第90页。
⑧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273页。

作者也知道有关于占领于阗的故事，但是在他的著作中仅仅保存有关的暗示而已：在字典中曾引用 Ğenkši（Čengši）一名，这在蒙古时代也是当作成吉思汗的后人来理解的，还有于阗的异密（Emire）之一是这样称呼的，成为突厥占领于阗的导火线[①]。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中所引用的相当多的诗[②]是有关伊斯兰教徒和回鹘战争的，在描写回鹘时往往是和描写 Burchane（佛陀）的礼拜佛像也就是佛教本身相联系的。描写Burchane像也和描写他们的僧侣（Tojyn）托音相联系的，直到今日蒙古地区一部分佛教职业者也叫做 Tojyn（托音道人）。人们认为这一字起初来源于汉文。13 世纪波斯的著作家术外因（Ğuwaini）的记载中，人们早已知道这个字tojyn和回鹘用以表示圣书的 nom 一字同时传进蒙古人那里。根据马木特·喀什噶尔的意见[③]，人们称一切的宗教教规，其中显然也包括伊斯兰教的宗教法规在内的为 nom。在马木特的著作中没有提供在回鹘人中存在有摩尼教或基督教的任何精确的参考资料。人们只能在他的关于 bačaq[④]意即"四旬斋"的注中，看出在突厥人中有基督教徒存在的暗示，但是不可忽视这同一的字在摩尼教的文书中，也是指摩尼教大斋的[⑤]。

人们指出在哈拉汗朝的帝国中，信伊斯兰教的伊朗人和拜偶像教的回鹘人使用同一的名称：Tat[⑥]是有趣的。关于Tat这一名称的起源仍有疑问。作为民族学上的意义，Tat 现在主要用于高加索地区，在那里人们是用来称呼说伊朗和突厥混合语的犹太人的。在中亚也发现突厥蛮中间有 Tat一字，它是用来表示包括乞

① 《突厥语词典》卷三，第279页。
② 布洛克曼：《古代突厥的民间叙事诗》卷一（夏德寿辰纪念论文集），第1页以下。
③ 《突厥语词典》卷三，第100页。
④ 同上书，卷一，第345页。
⑤ 参见《忏悔持文》，勒柯克编，第20页以下。
⑥ 《突厥语词典》卷二，第224页。

瓦人在内的定居农民的。Tat①一字在11世纪时显然也有相同的意义，否则就难于解释这同一的名称，同时适用于伊朗人和文明的突厥的回鹘人。

关于回鹘的诸城市，马木特·喀什噶尔掌握有相当明确的资料。从鄂尔浑碑文和回鹘文书中，我们知道有火州（Qočo）即在吐鲁番附近的今哈拉和卓，遗址为亦都护城赛里Idiqut sahry（šähry），即回鹘统治者陛下（Idiqut）的城市，是回鹘地区南部的首府。马木特·喀什噶尔认为火州一字是个城市的名字，也是全州②③的名字。回鹘地区北部的首府自然是别失八里。此外，还列举了三个城市的名字：唆里米、张堡城和阳噶巴力（新城）。甚至在这个时期，在信奉摩尼教后几乎300年之久，回鹘仍是一个没有丧失自己勇武特点的民族，在射箭技术方面，他们甚至胜过其他的异教徒④。

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⑤也使我们知道回鹘是怎样称呼伊斯兰教徒的。人们用Čumaq一词来称呼他们，同时，知道当时也用它来称呼南俄用车辆运货的商人。人们通过它的发音特征来确定这个字的来源和把它看作是纯突厥的，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显然，伊斯兰教徒在回鹘国家中和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也是商业的主要代表。

作者关于生活于东突厥斯坦北部的各民族的报道，就更为不详细了。我们已经看出，人们根据他提供的资料可以相当明确地规定伊斯兰教在东方传播的界线。但是有关伊斯兰教和突厥民族

① 关于此语的意义请参考迈那尔斯基《塔特人》；阿布哈齐《土库曼系谱》，科诺诺夫出版，第96—97页；克里雅什托尔涅依《古代突厥碑文考》，第122—1230页。——俄文本注

② 《突厥语词典》卷三，第165、180页。

③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三，第521—523页。——俄译本注

④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103页。

⑤ 同上书，第319页。

向北方和东北方传播的界线，他的报道就比较模糊了。10世纪的地理学家只有对于从七河至构成楚河流域北界诸山以南的地区的情况是熟悉的。杜曼斯基的原稿也提到了伊犁河。但是作者是很模糊地来描写这条河的，并硬说它是流入热海的。另一方面，马木特·喀什噶尔赋予这条河以巨大的重要性，甚至把十二生肖历法的起源也和伊犁河联系起来。有一关于皇帝打猎的传说，在这一狩猎过程中为统治者所追踪的动物依次泅水渡过伊犁河，后来便按照动物泅过对岸的先后来命名周期的年份①。

马木特·阿勒—喀什噶尔

马木特·喀什噶尔是在报达撰写他的著作的，说到了开始写书的准确日期是回历466年穆哈兰月即公元1073年9月。但是这日期由于下列的两个理由看来是可疑的：首先是因为这部著作曾提到哈里发莫库塔迪②在回历467年即公元1075年才即位。其次，因为按照十二生肖周期相对照的年份是记为蛇年（法译本作龙年）的可能相当于公元1077年（法译本作1076年）。根据该著作末后的记载，此书早在回历464年祝马达拉喝勒月即公元1074年（法译本作1072年）2月10日星期一完成，即他所献给的哈里发即位以前。这一年代学上的矛盾是不容易解决的，更何况原稿是完美的和古老的，有准确的日期（回历664年绍哇勒月27日星期日，即公元1266年8月1日）③。根据抄写者的报道它是原作者亲笔的写本。因此我

---

① 《突厥语词典》，第289页以下（史哈德：《斯拉夫语言学杂志》卷二，1925，第272页以下）。

② 日本专家羽田明认为，巴托尔德说为献给莫库塔迪是错误的（《典籍论集》，第526页），它是献给其子阿比特·卡希姆·阿卜杜拉赫（同上，第522页）。——汉译者注

③ 原文作1066年。

们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作者是在11世纪后半期写的①。

作者没有说到由于什么原因迁居到报达。根据他的报道，我们仅仅知道他游历过突厥领土和草原，他是突厥语的精通者，又学会突厥、突厥蛮、乌古斯语和炽俟语，样磨和黠戛斯语。从这报道甚至没有反映哪一种语言是他的母语：是突厥语或是阿拉伯语。他的著作证明，他是完全掌握阿拉伯语的。但是他的著作有些地方证明他是突厥人。作者在说到自己时，常以第三人称出现，有时在自己名字上加进"这本书的作者"等，有时干脆只称自己为马木特而没有其他的补充。文中各处所记的马木特就是指作者本人，对此显然没有理由加以怀疑。因而下面的报道是有关作者的，即马木特的父亲原来是热海附近的巴尔斯罕（Barsghan）城市的人②，Barsghan或Bars—chan的位置早就确定了的。

格尔德齐提到了一个地方历史传说，其中谈到亚历山大大帝在远征中国时，是怎样将波斯士兵迁移到这里来的。他答应他们在返回的路上时，把他们带回家去，但是回西方是路过印度的，因而不能实践他的诺言。按照格尔德齐的解释③，Barsghan是波斯人的异密的意思，也就是说城市的名字是以pars和chan两字来解释的。马木特·喀什噶尔提出另外两种解释：根据其中之一的解释是Bârs—Chân是阿夫拉西也布的儿子的名字；根据另一种解释是，他是回鹘可汗马夫的名称。这后一种解释是有趣的，即从中人们可以作出结论，回鹘在西方曾一度来到热海，对这一事实的回忆一直保存到11世纪。

从第一卷（第102页）的一段中人们甚至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即作者不但是突厥人，而且他也是哈拉汗朝的后人。书的作者马木特说到"我们的祖先，是异密，被称为卡米尔(Chamir)"，

① 参考贝辛《编纂的日期》。——俄译本注

② 《突厥语词典》卷三，第308页。

③ 巴托尔德：《报告》，第89页。

因为乌古斯(Oghuzen)不会发Emir一词的音。还说"我们的父亲用战争的方法从萨曼王朝的后人手中夺取突厥领土"。但是可能作者这里不再说到他自己和回到了先前他所暗示的资料，那里说："马木特·察奇尔·车加汗 (Nizâmad-Dîn Isrâfîl Toghan-Tegin ibn Mu-hammad Čaqyr Tonqa Chan) 依据自己父亲的话语告诉了我……"。它也记载名为库马克 (Qumaq) 的异密名字，有时作者也伴随着他①②。

北方边界

上面所述的，居住于伊犁河谷的诸民族即样磨、突骑施和炽俟，看来也是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的前哨在伊犁河北岸和与巴尔喀什湖③接壤的地区。巴尔喀什湖是以达林库尔(Täring-kul)(Taryng-köl)④一名被记录的，并指出täring一字是乌古斯用来表示"富"于某物的意思，即当作"许多"解释⑤。巴尔喀什湖之取得这一名称，恐怕是由于它是当地最大的湖的缘故⑥。说伊犁河流入巴尔喀什湖是不见于记载的。在湖的附近有伊奇奥哥士城即"两河"，这一名称是因其位于伊犁河和其他的河即那封奇⑦之间而得的，虽则根据马木特著作所附的地图，耶封奇是位于

---

①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321页。

② 《马木特·喀什噶尔词典》卷一，第321页。关于马木特·喀什噶尔及其著述，请参考马洛夫《碑文》，第314—315页（书目）；普里特沙克《马木特·喀什噶尔》。——俄译本注

③ 《伊斯兰百科》卷一，第649页。

④ 《突厥语词典》卷三，第99页。

⑤ 布洛克曼在《中古突厥语词典》中之区别Taryng—Köl（第249页）和täring（深）（第204页），是任意作出的。

⑥ 巴托尔德：《巴尔喀什湖》，《巴托尔德文集》卷三，第360—364页。布洛克曼之区别达林库尔〔Tephgh (Taphgh) —Кутр〕和Tepuhy一词（布洛克曼《中古突厥语词典》，第204、209页），是任意作出的。——俄译本注

⑦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58页。

伊犁河南岸，而伊奇奥哥士是在伊犁河北岸[①]。1253年欧洲的旅行家卢布鲁克是经由埃奇阿斯城来到伊犁河北岸的[②]。可能旅行家听说过伊奇奥哥士这一名称，并按“拉丁语”的方式使之变形，在伊奇奥哥士附近还有甘兰州城[③④]，人们在这一地区，恐怕也要找寻伊斯兰边境上的居米·塔拉斯城，它在地图上标明位于伊犁河对岸，虽然在马木特著作其他的一个地方指出这一城市是位于回鹘的边境上的。大抵它应位于伊犁河北岸，即在奥哥士附近。在更北的地方流过的有雅马河，大概就是叶密立河[⑤]，这地方就是现在的楚库楚城的所在地。“这里是叶护民族居住的地方”，虽然（叶护）这一名称也许和一条小河的名称偶合，这条小河流入靠近费尔干纳境[⑥]的乌兹根近处．也就是说喀拉达里雅附近[⑦]。

叶护民族参加伊斯兰教反对异教徒唯一的战争一事在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中有所记载，也就是说阿斯兰特勒所指挥的四万伊斯兰战士，战胜了布克·布德拉什[⑧]指挥下的七十万异教徒。有关这次战役的诗句中也记述了伊斯兰教军队首先横渡伊犁河，其次是雅马河，即叶密立河。在伊斯兰教徒的敌人方面，拔悉密也参加了这一战争。马木特·喀什噶尔还能亲自同参战者的

① 关于马木特·喀什噶尔的地图，参考叙雅科夫《世界上最早的突厥地图》。——俄译本注

② 密色尔和莱特编：《卢布鲁克》，第280页。——俄译本注

③ 《突厥语词典》卷三，第184页。

④ 甘兰州，见《马木特·喀什噶尔词典》卷三，第184页。——俄译本注

⑤ 《突厥语词典》，第177页。

⑥ 这一考证是可疑的，因为记载把雅马河（Jamar）当作大河，似乎是可以行船的河流，参见卷一，75，卷二，5。可能是指鄂毕（Ob）河，突厥民族今天称它为Omar或Umar。关于这条河的地理位置，作者恐怕是不清楚的。但需参考布洛克曼：《中古突厥语词典》，第244页以下。

⑦ 《突厥语词典》卷三，第27页。《马木特·喀什噶尔字典》卷三，第27页。——俄译本注

⑧ 《突厥语词典》卷三，第173页。

另一方交谈过，那应是在写书稍前的时间进行的。不待说以这事件为中心早已编成一系列的宗教传说。后者自然反映出参加战争的异教徒的人数，在游牧生活的条件下，在草原出动那么多军队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所周知，人们发现在其他关于和游牧民作战，包括成吉思汗的远征在内的故事中数字同样是虚构的。

作者不把叶护民族当作纯突厥民族，虽然他断言他们除了自己应有的语言外也会说突厥语，属于这一范畴内的民族还有拔悉密的民族，象我们已看到的，在鄂尔浑碑文中这一民族是在东突厥斯坦地区，那里有别失八里城，后来这一地区被回鹘所征服。在《突厥语词典》的印刷版中随处都有Jasmyl一词。但在马木特·喀什噶尔的手稿中显然是不存在这一错误的。在那里指出卷一第399页的字母顺序Basmyl一词是在以b开始的诸词之中，在bäsbäl之后和bašghyl之前。

蒙古人和中国人

在起源不是纯突厥的民族中还有鞑靼人。我们已注意到，在鄂尔浑碑文中已经碰见这一名字，它后来是指蒙古人说的。很可能在马木特·喀什噶尔所指的非纯突厥起源的民族中还有其他若干民族是蒙古人，叶护民族也是其中一个。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蒙古人在作者的时代已来到西方，所到达地区的周围的邻族都是突厥部落。

还有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流附近的黠戛斯人，在这个时代被看作是纯突厥的民族。无论如何，通过马木特·喀什噶尔的报道，证实突厥是被蒙古人驱逐出蒙古的事实。郁督军山脉，在鄂尔浑碑文时代是突厥可汗主要的牙帐所在地，在作者的时代，是位于

"回鹘土地附近的鞑靼草原[1]。统治蒙古最后一个突厥民族，根据汉文资料所能判断的，就是黠戛斯在 840 年战胜了回鹘。他们之被逐出蒙古，大抵和 10 世纪开始的蒙古人契丹势力的增长有关，他们在华北建立了极为强大的帝国，并用契丹来命名。的确契丹这一名称，今天仅在蒙古、俄罗斯、部分在伊斯兰教徒之间还流行，可是西欧人却不再用此名了。突厥人从西方借用表示中国的阿拉伯名称：秦(Sîn)，代替波斯语的Čin；波斯语č常常以阿拉伯语 s 来翻译，另外又从东方输入已在鄂尔浑碑文出现的桃花石 (Tabghač) 名称。在马木特·喀什噶尔[2]的时代，人们事实上把秦 (Sîn) 和马秦 (Ma Sîn) 作了区别 (波斯语作Čin和Mâčin，前者指华北，后者指华南，桃花石 (马木特作 Taghač) 只用于指后者，留在称为汉族的宋王朝统治下的人。人们称桃花石或马秦为"上秦"。称本身意义的秦或"中秦"(华中) 为契丹，那是按统治那里的民族名称的 (Qytai=Chitai)。喀什噶尔[3]称下秦。看来，桃花石一字也当作其他的意义用。甚至现在，人们也把中亚古文化的制作归功于中国人，在这意义上，马木特·喀什噶尔对比了桃花石一字和古兰经中提到的古代阿拉伯民族阿得的名称。马木特把后一意义联系到哈拉汗朝所习用的桃花石和可汗的称号看来是错误的。桃花石和汗据说应释为"伟大的和古代的统治者"。比较可能的是，这一称号是从前和中国接壤的邻族所留下的，也是突厥人对于中国人的国家观念的一种爱好。我们在哈拉汗朝的货币上发现有相同的称号，翻译成阿拉伯语是 (Malik as Sîn) 即"中国的国王"。

对唐兀(Tanguten) 也有所记载，他们在1020年征服了为甘州

---

①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123页。

② 同上书，第378页。

③ 关于中世纪中国及其各部的名称，参考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264—278页。——俄译本注

回鹘所占领的地区。在唐兀和秦（Sîn）之间有一座城市，它奇异的突厥名称是Qatun Syny（“女人像、皇后像”或“皇后墓”）①②。这一名称没有得到解释，也没有提到城市得名的任何雕像。它只记载Qatun-Syny居民和唐兀人之间进行的一次战争。这一战争——大概是以唐兀的失利而告终的。

一般说来，从马木特关于这一或那一城市许多简短的注记来看，他利用了我们没有得到的，和我们看来有很大兴趣的历史资料。例如提到布格拉汗被毒杀的西昆悉牟地方便是③。但它没有说明是指哪一位布格拉汗的。其次提到英什根小城，那是属于木佩那人④的，显然在阿拉伯军队歼灭异教徒时被破坏了。在有关8世纪下半叶木佩那的异端，有关和突厥结盟以及同哈里发交战的迄今所知道的史料中，毕竟没有发现这一地理名称。

在马木特的著作所收集的语言学资料中，包括民谣和合于诗律之诗（律诗）的突厥诗歌的例子，反映了11世纪突厥人的生活观以及他们已经信仰伊斯兰教时期的精神和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许多文化语汇，但是伊斯兰教特别是伊朗的影响还没有取得对突厥民族传统完全的胜利。这一讲中要利用其全部资料是不可能的⑤⑥。但是对马木特关于乌古斯和其他西突厥民族的报道进行了一般的展望以后，应该在下讲中对这一资料的若干方面作更为

---

① 《突厥语词典》卷三，第101页和第240页。

② 《突厥词语典》卷三，第101页和第240页。据泽奇·瓦里底的口头报道，他在毕鲁尼的天文学著作麦斯欧迪天文学和占星原理中早已找到了Qatun Syny的名字。参考毕鲁尼《原理》。——俄译本注

③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343页。

④ 同上书，卷三，第323页。

⑤ 参考布洛克曼《古代突厥斯坦人民的智慧》，载《东亚杂志》卷八（1920）第49—73页；《古代突厥斯坦人民的叙事诗》，载《亚洲》试刊，卷二，第110—124页。

⑥ 参考伊勃拉基莫夫和哈拉科夫斯基《哈萨克语言形成史资料》；阿夏勒《马木特·喀什噶尔词典》；普里特沙克《喀什噶尔词典的说明》；满苏洛什鲁《哈拉汗朝的语言》，第87—88页。——俄译本注

深入的探讨。这一展望和突厥文化状况一般的评价是必要的，因为马木特所引用的诗歌选指出各个一定的地方，几乎是包括从窝勒伽河延伸到中国边境，整个突厥殖民区域的。可是未必能明确，哪一首诗属于这一地域的东部和哪一首诗属于这一地域的西部。

从文化民族、文化生活各个方面的报道，以行政方法，可汗宫廷的设备直至民间的风俗习惯都可作如是观。

·第六讲·

乌古斯的兴起

突厥之西方、西南方迁徙和侵入伊朗的文化世界。

突厥人出现于阿姆河以南地区是在10世纪他们征服行动以前早得多的时代，在某些情况下，今天居住在这一地区的突厥人可能是他们的后裔。阿拉伯的征服者早在7世纪① 就在巴达克山发现有葛逻禄人②，在那里，今天还有名为"乌孜别克葛逻禄"的民族，这种一致性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在16世纪乌孜别克人征服巴达克山以后，在这里居住的突厥人是和乌孜别克人有联系的。阿拉伯地理学家只把喀拉什人③④看作是定居于阿姆河以南唯一的突厥人（除了成为哈里发和总督卫兵的一些人和支队以外），在今天生活于伊朗的突厥人中人们还遇见有喀拉什人。突厥人本身分明是把这一民族的名称当作 Qalač 来发音的。关于这一名称起源的故事（故事为无名氏的《关于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中所引用），及民族语源学qal ač（"留下和分开"）的根据，早见于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中⑤。马木特把喀拉什当作乌古斯以代替24个氏族，如剌失德丁著作中所列举的，马木

---

① 或在8世纪，塔巴里著作集，卷二，1612年，第12页。

② 参考车尼雅佐夫《乌孜别克葛逻禄》。——俄译本注

③ 《伊斯兰百科》卷二，第939页。

④ 喀拉什，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603页。——俄译本注

⑤ 《突厥语词典》卷三，第306页。剌失德丁的另一语源"bleibe hungrig!"（挨饿的留下！）参考《剌失德史》（俄文）卷一上册，第85页。——俄译本注

特[①]的著作只列举了22个氏族，但是他指出他们原来总共是24个；后来两个喀拉什（氏族）才从其余的氏族中分离出来[②]。人们假定，喀拉什人有一部分放弃了使用自己的语言，融合到阿富汗民族中去了，这可用阿富汗部落的名称来说明，虽然从阿富汗语言发音法则的观点来看，也会有不同意见。在印度、喀拉什人某一时期在政治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他们的名称似乎被发音为希尔什（Chilg）。居住在伊朗的这一民族的一些代表，直到现在还保存突厥语，这恐怕是由于他们和在那里占很大多数的乌古斯人发生关系才有可能[③]。乌古斯的征服行动和哈拉汗朝的征服行动有本质的区别。哈拉汗国在征服萨曼帝国以前，已建立自己的帝国，被他们征服的国家加进这一帝国内，乌古斯人的领袖，为了在被征服土地上建立国家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又从这帝国出发征服他们原来的土地。

塞尔柱克王朝

乌古斯民族象葛逻禄民族一样，没有可汗：其后在伊朗建立统治王朝的首领，根据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和若干其他的资料，仅有苏巴什Sü bašy（"军队的首领"）以Selğuq形式发音，其发音和突厥的发音法则，特别是和在欧洲历史学界所采用的元音和谐的法则相违背的。最近精通突厥语发音要求的科学家，努力订正这一错误和写成Salguq或Salgyq。但是突厥的文书指明正确

①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56页以下。关于乌古斯民族马木特同剌失德丁的资料之比较分析，参考托尔斯托夫《古斯人的城市》。——俄译本注

② 《突厥语词典》卷三，第307页。参考剌失德史（俄译本）第一册，序言，第27页。——俄译本注

③ 关于喀拉什人及其分布，也可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上册，第552页；马松和罗慕丁《阿富汗史》卷一，第21、271、276页。——俄译本注

的发音是塞尔柱克（Selgük）（Selčük）[1]这种发音见于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中[2]，见于突厥古老的英雄传说：《科尔库特之书》或《我的爷爷科尔库特之书》，和若干其他的资料中即16世纪的一种奥斯曼人的著作中，而且是一首无名的诗，它是算端苏莱曼统治时代，回历950年即公元1543—1544年（——俄译本加）所作的，它保存于康士坦丁堡大学图书馆（图书馆7340号）的回历954年即公元1547—1548年（——俄译本加）的一手稿中。

关于塞尔柱克的活动，人们只知道他信奉伊斯兰教和解除锡尔河下流伊斯兰教殖民地居民过去向乌古斯纳税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在锡尔河流域殖民的伊斯兰教居民和塞尔柱克的后人之间，可能结成了密切的关系。可是我们发现11世纪毡的城的一位有伊斯兰教名（沙·马立克）的统治者被说成是塞尔柱克王室势不两立的敌人。

乌古斯古斯迁往西方之后，他们似乎丧失了自己在蒙古已经有的国家的萌芽的观念，他们6世纪在那里建立起当时最大的游牧帝国之一（关于这方面，它仅次于蒙古帝国，占第二位），他们在那里屡次从中国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把衰微的国家重新恢复过来了，在势衰之后又恢复了元气。但是，这种国家观念、国家组织原则也强加于东方，在鄂尔浑碑文中，说可汗碑文称之为Chaqan，把托古斯·乌古斯（Toquz Oghuz）或简称为乌古斯（Oghuz）看作是敌人或暴动者的地方，比之把他们视作自己的民族（人民）的地方数次更多。在里海以东的草原，无论是乌古斯或他们的后裔突厥蛮都没有达到政治上的统一，并没有停止过相互间的战争。乌古斯民族中有个别部分广泛出征，并迁

---

① 《伊斯兰百科》卷二，第975页。
参考Khwarizm，第975页，《巴托尔德文集》卷三，第548页。——俄译本注

②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397页。

往遥远的国家。但是在这一切迁徙中没有一次包括整个民族在内，即不是普通的民族迁徙，由于异常的矛盾冲突，正是使这一乌古斯从未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政治上的统一体，他们建立了包括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内的几个最强大和最持久的突厥帝国。

裴奇内格人

在6世纪至8世纪的突厥帝国之后，历史上所知道的乌古斯最早的一次西迁就是9世纪末的裴奇内格人的迁徙。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博菲罗哲尼吐斯在10世纪中叶写道，这一移动是在（他以前）50年发生的。在剌失德丁和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中提到在乌古斯氏族中有裴奇内格人氏的发音见于俄罗斯的纪年史，它不是假自希腊人的，他们是以稍异的形式来转写这个字的：Patzinakitai。俄罗斯人恐怕是根据他们自身所见的那样来转写这个名称，并根据实在情况正确地流传下来。从前人们认为，我们这里有一个突厥字bağynaq（内兄弟Shwager，同时以bağanaq的形式出现），可是在马木特[①]的手稿中却明确地提出了Pečeneg（Päčänäg）的发音法。

裴奇内格人从其他的乌古斯中分出来显然是很早的。9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在他们迁徙以前，已把他们看成是从乌古斯中分离出来的民族。他们当时是可萨部的东邻，生活于耶亦克河附近。922年伊宾·法德兰在可萨部那里还发现有裴奇内格人小部分的残余[②]，他们的主要群众得到可萨部统治者的同意或在违背它的意志，通过可萨境，并在今南俄罗斯住下了。从司维牙脱

①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57页及其它。
关于裴奇内格人的早期阶段，参考克里雅什托尔涅依《古代突厥碑文考》，第163—166页、第177—179页。——俄译本注

② 《科学院公报》，1924，第246页。
科瓦列夫斯基编：《伊宾·法德兰》(1956)，第130页。——俄译本注

思老时代开始，他们甚至从这里威胁着基辅。裴奇内格人之掠夺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君主反对他们的战争常常被记载入俄国的编年史中。君士坦丁·博菲罗哲尼吐斯对裴奇内格人，同样提供了相当多的报道，并列举裴奇内格的一些氏族。

在可萨帝国早已瓦解后，即临近11世纪的时候乌古斯新的迁移出现了，他们越过窝勒伽河，从那里通过今南俄罗斯，但是这一回在拜占庭史料中所记述的他们民族的名称，乃是乌兹(Uz)。俄国的编年史家称他们为托尔克(Tork)。无论如何，这一批乌古斯并没有和他们的近亲即裴奇内格人联合，而是相反地进行反对他们的战争。裴奇内格人被迫逃亡到巴尔干半岛，乌古斯也追踪他们到那里。这件事发生于拜占庭在小亚细亚被其他一批乌古斯进攻的时代，乌古斯和塞尔柱克后裔一起来到那里。拜占庭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的领土被突厥人所充斥，他们彼此无关地从各方面来到这里，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拜占庭帝国来说，这几部分突厥幸而没有联合成为统一的整体。到11世纪末，即在十字军开始进军的时候，拜占庭皇帝已经感到没有什么危险了，他很后悔在反抗突厥从各方面来威胁他的时候，曾向西欧请求援助，现在已不再需要了。

乌古斯中间的基督教

参加这次迁徙的乌古斯和伊斯兰教及其文化分明没有什么接触。在阿拉伯文学中有一个故事被保存于13世纪著作家的著述中①，但是它显然属于早得多的时代，从这一故事得出的结论

---

① E·卡兹威尼《宇宙形态志》维斯天菲尔德编，卷二，第394页以下，但没有基督教倾向的同一记事，也见于毕鲁尼的《年代记》沙豪编，第264页中；可能毕鲁尼的记事是Qazwini的来源；基督教的倾向恐怕是卡兹威尼后来加进去的，参考较J·马迦特的《东突厥方言研究》，第101页。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92页；马迦特《库蛮考》，第101页。——俄译本注

是，在乌古斯中间有基督教徒。乌古斯又从同其进行最活跃的商业关系的文化国家中：花剌子模中获得有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概念。事实上花剌子模存在有基督教，证明这件事的是11世纪花剌子模的学者毕鲁尼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基督教徒不是属于景教，象波斯和突厥斯坦的大部分基督教徒那样，而是属于正教②。乌古斯所信奉的大概也是这一派。

伊朗高原的塞尔柱克王朝

伊斯兰教徒在锡尔河附近建立起殖民区以后那里就是乌古斯的主要首脑的所在地，这里的伊斯兰文化的优势象其他许多地方的情况一样是巩固的。此外，一部分突厥蛮服役于萨曼王朝，从那里得到了牧场的所有权，义务是保护萨曼王朝地区的边界，反对他们非伊斯兰教的同族人。当时生活于萨曼帝国边省地区的突厥人中有熟悉伊斯兰教文化的。10世纪阿拉伯著名的哲学家法拉比就是出身于突厥族的。每当萨曼王朝和哈拉汗朝之间发生战争时，乌古斯时而站在这一边，时而站在那一边。在11世纪开始时，他们迁往加兹尼的算端马木特的帝国里。这个时代的波斯历史学家强调指出在完全没有组织的新来者和塞尔柱克后裔有组织的权力之间的差别，即他们是征服者的异密，而不是象他们的先人那样是牧人③。前者通过他们的蹂躏的入侵只能在经济上损害加兹尼王朝和其他王朝的省区。这一次掠夺性的出征遍及一个广大的地域，但是没有引起政治上的变化。游牧民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留下驻屯军，没有恢复已经被

① 沙豢编：《年代记》，第296页。
参考托尔斯托夫《新年佳节》。——俄译本注

② 《伊斯兰百科》卷二，第974页，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三，第545页。——俄译本注

③ 穆莱编：《白哈奇史》，第584页。

破坏的城市，不努力去消灭已存在的国家和以自己建立的国家去代替它。

另一方面，塞尔柱克的后裔早在他们最初征服呼罗珊之后，即在加兹尼王朝算端马木特的时代，就开始僭取统治权，他们令人把他的名字加进在星期五祷告中和星期五在清真寺朗诵它，在货币上铸它。虽然他们在最初并不热中于建立统一政权，同6世纪的突厥帝国一样，11世纪的塞尔柱克后裔的帝国也是由两兄弟建立的：塞尔柱克的两个孙子，同时一个兄弟的名字在虎土白的星期五祷告中提到，并在尼撒普尔（Nîšâpûr）[1]铸上货币，另一兄弟的名字则在木鹿[2]铸上货币。

他们逐渐地把伊朗人的权力统一的概念据为已有。富有意义的是，在塞尔柱克突厥统治者的时期，在呼罗珊铸造的货币上初次出现了古伊朗的称号沙汗沙。无论是萨曼王朝或是加兹尼王朝都没有正式使用过这称号，因为他们仍然是隶属于哈里发之下的正统伊斯兰教的异密，他们极力避免这样的猜疑，即他们想要恢复伊斯兰教以前时代的帝国的传统。自称沙汗沙的只有统治报达和西波斯的十叶派的白益家族（Bûjiden）。当塞尔柱克的后裔在向西方推进时，他逐渐由沙汗沙改用"伊斯兰算端"。"算端"一字在他们的时代获得了比从前更为明确的意义。从塞尔柱克王朝以后，"算端"的称号是为有势力和独立的统治者所专用。对其臣属的诸侯和省长则采用马立克（阿拉伯语王的意思）或沙（波斯语王的意思）的称号。人们把伊斯兰教世界理解为一个整体，哈里发是宗教的领袖和"伊斯兰的算端"，哈里发把世俗的权力交给后者。

---

① 在回历428年沙班月（公元1037年 5—6 月）以后。《伊宾·阿勒·阿提尔书》，Tornberg编），卷九，第328页；穆莱编《白哈奇史》，第 676 页以下把这件事定在下一年（1038）。——俄译本注

② 自从阿华拉札波第一个星期五（公元 1037 年 4 月22日）以后，《伊宾·阿勒·阿提尔书》卷九，第327页。

值得注意的是，塞尔柱克的后裔在他们的政治方面极少得到自己同族人即乌古斯方面的支持，乌古斯是比塞尔柱克的后裔先来到伊朗的。当塞尔柱克的后裔要求承认他们的权力时，乌古斯用粗暴的拒绝①来回答这一要求，只能以暴力使之屈服而已。

政权的代表及其所由来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塞尔柱克后裔的地区比较在哈拉汗朝帝国更为复杂一些。哈拉汗朝只自称为"突厥人"和"阿夫拉西也布家族"在突厥民族中没有一个占特别优越地位，没有任何历史资料说到这一汗朝本身是来源哪一个民族。塞尔柱克王朝首先表现为沙汗沙，以后表现为伊斯兰的算端。正如对于哈拉汗朝一样，对于塞尔柱克王朝也是承认和采用阿夫拉西也布系谱的传说的，虽然他们宣称不仅是乌古斯或突厥蛮，而且实际上也是属于出自奇尼库②部落（这是马木特·喀什噶尔的发音）的后裔，它是乌古斯的24个氏族（据马木特说只有22个）之一。相同的氏族名称见引于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以及蒙古时代剌失德丁的著作中，仅有的区别是马木特·喀什噶尔是赋予更古老的形式。例如后来奥斯曼王朝所由来的氏族就是叫做喀衣库（Qajygh），而不是喀衣 Qajy，又约质尔（Jazyr）部落的名称写成约质基尔（Jazghyr）。根据马木特·喀什噶尔的意见以及突厥学界详尽的论证③，马迦特的主张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他企图拿喀衣氏族的名称来和生活于远东和以考伊而知名的民族的名称作比拟（根据毕鲁尼和若干其他的资料）。根据这一比拟马迦特提出奥斯曼人来源于蒙古人的学说④，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⑤则将考伊民族列入非纯突厥民族中。考伊这一名称同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中所记的喀衣库氏族的名称毫无相同

① 《伊宾·阿勒·阿提尔书》卷九，第348页。
②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56页。
③ 《土耳其学的复兴》卷一，第187页以下。
④ 《东突厥方言研究》，第88页，第187页以下。
⑤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30页。

之处[①]。

当时在乌古斯中间已经不再保存从前他们的民族统治蒙古的口传。热海的附近地方被看作是突厥的故乡，突厥传说的祖先的故乡[②]。乌古斯的传说没有继续向东方延伸。乌古斯把有关族长、民间歌手科尔库特（Qorqud民间智慧的编撰人和保藏者）的传说从锡尔河两岸带到西方去。人们今日还能指出锡尔河岸边的科尔库特的墓地。同时有关科尔库特的传说文学杰作，直到现在仍保存于土库曼人中。到中世纪，在安纳托里亚地方也知道有这一传说，它甚至还流传于奥斯曼时代，直到17世纪[③]，同样也存在于阿哲尔拜占的突厥人中间。10世纪在裴奇内格人中也发现有科尔库特的名称。这一切都使人认为有关科尔库特的传说是乌古斯信奉伊斯兰以前时代的遗产，这一遗产由他们带到西方去[④]。

从文化的观点来看，乌古斯比哈拉汗朝突厥人低，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更忠实地保存了突厥民族生活的特点。乌古斯的首领和人民同甘苦、共创业，服装同战士很少有区别。在13世纪的著作家阿布·法利治（Abûl-Farağ）[⑤]用叙利亚文写的一本著作中，给我们保存了有关塞尔柱克的长孙、算端、脱黑鲁勒贝和哈里发的女孩结婚的记事[⑥]。

在这里有关突厥人舞蹈的描写，当跳舞时他们怎样“时而坐

---

① 关于这一问题的现况解释得最充分的就是迈那尔斯基（马卫集的著作，第95—98页）；同时参考库布吕鲁的《关于考伊部落》。——俄译本注

② 这一传说最早见于无名氏的《历代志略》（12世纪），原文见巴托尔德《突厥斯坦》卷一，第19页。

③ 参考奥列阿留编的（第四版，施列斯维克，1671年，第721页以下）。关于打耳班附近的坟墓和依马木科尔库特的记事。又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379页。——俄译本注

④ 关于这一问题的现况，雅库鲍夫斯基和西蒙斯基作了说明，参考《我的爷爷科尔库特之书》，巴托尔德翻译，再版。——俄译本注

⑤ 叙利亚文的编年史收入祁尔施和伯恩斯坦所编的古典文选中，莱比锡，1836年，第38页。

⑥ 同时参考古西诺夫《叙利亚的史料》，第73页。——俄译本注

下，时而站起”。这里写的显然是关于俄罗斯的舞蹈：Pljaska v Priesjadku，很可能是俄罗斯从突厥人那里接受过来的。虽然基督教之传入乌古斯较早于伊斯兰教，但是他们在采用阿拉伯字母以前显然没有自己的文字，否则就是采用类似于哈拉汗朝通用的回鹘字母。但回鹘字母逐渐便为阿拉伯字母所排斥。在哈拉汗朝的铸币上也有回鹘字母的题铭。如同后来在蒙古可汗的铸币上的情况一样，用回鹘字母写的，主要是可汗的名字，甚至即使这一名字是阿拉伯文的。中亚突厥人和前亚突厥人的正字法的差别，根据列宁格勒学者所注意到的，是从乌古斯不大精通回鹘字母来说明的。中亚突厥人习惯于用回鹘字母来表示所有的母音，因此在应用阿拉伯字母时，他们也常常使用阿拉伯母音的 alif、waw，和jâ。在前亚所写的突厥文手稿中，母音常被省略掉。甚至过去时第三人称的 i 常常写作 d，而不写作 di。正字法的模糊不清引起手稿的元音化。在前亚的突厥人手稿中元音化显然比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手稿中多得多。

塞尔柱克汗朝对伊斯兰教的政策

作为伊斯兰的异端，塞尔柱克汗朝的后人对于正教信仰的维护，其热烈程度更甚于哈拉汗朝。在历史上他们不仅是伊斯兰教，而且是哈乃斐派的热烈拥护者。在萨曼帝国中哈乃斐派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和为突厥人所接纳。在脱黑鲁勒贝的时代，沙斐仪派(Ša fiiten) 遭到骇人听闻的迫害，部分原因和这一派之修改正统派的教义体系有关，他们诚然是反对异教的，但是在他们的信仰中引进了理智的因素，甚至希腊的科学，而希腊科学对宗教教义的传统则是有害的。据称，对沙斐仪派的迫害早在脱里鲁勒贝的继承人阿尔布·阿斯兰的时期结束，他的宰相是沙斐仪派教徒尼咱木阿勒·莫尔克。但是从尼咱木·莫尔克本人的话

语中，人们可以看出，即使阿尔布·阿斯兰也是个热诚的哈乃斐教派，他憎恨沙斐仪教派，感到要一个沙斐仪教派的宰相来效劳而惋惜[①]。

作为伊斯兰的算端，塞尔柱克的后裔不但要为帝国领土内正教信仰之胜利而努力，而且也要为伊斯兰教在国外敌人世界之胜利和扩大伊斯兰世界的界限而奋斗。很自然，即他这个义务，主要是在西亚实现的，那里他们所取得的胜利和征服是和极大的经济利益相联系的。从而在小亚细亚和高加索同基督教徒相斗争，在叙利亚和埃及同十叶派相斗争。伊斯兰在和拜占庭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完全和突厥势力在哈里发内部的树立相联系。在伊朗白益王朝统治期间不久以前，10世纪下半期和11世纪上半期拜占庭人利用逊尼派和十叶派之间的倾轧大大地扩大了他们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疆界。当突厥人在哈里发帝国境内确立统治地位之后，拜占庭不仅丧失了这一占领区，而且伊斯兰教第一次进入到小亚细亚内部，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伊斯兰教的，同时又是突厥人的帝国[②]。塞尔柱克人的后裔对这个地区的边界争夺战具有什么重要意义，人们可以从下面的一件事看出，即他们正是派遣他们同族的人来到这里的。伊朗东部居民在地理上是和乌古斯人所由来的地方相接近的，一般保存从前的民族成分，而在波斯的西北地区阿哲占拜占和安纳托里亚，在语言方面逐渐形成为纯突厥的语言。同时在安纳托里亚，伊斯兰教是多数居民的宗教。我们暂时还不能追寻这一过程发展的渐次经过。我们必须相信，伊斯兰教

即跟从前的阿拉伯化的过程一样，突厥化的过程和伊斯兰教的传布过程是不相一致的。大家知道，阿拉伯语也为叙利亚和埃及的那些居民所采用，但是他们仍然是基督徒或犹太人。就是在突厥统治的时期内，也不仅出现了原来是信基督教的人，还采用了突厥语，而且也出现了保存自己固有语言的人，却采纳了伊斯兰教。在这种情形下，伊斯兰教是和居民有关的语言相适应的。哲拉尔丁·鲁美的儿子：算端威列德在13世纪下半期不仅写下了波斯语和突厥语的诗，而且也写了希腊语的诗，而这用阿拉伯字母写的希腊诗是研究当时在肯尼亚四周通用的希腊方言的唯一的文献，语言学家对此感到很大的兴趣①。

伊斯兰教和突厥语在高加索的胜利当时所表示的意义不甚明显。阿徐里一语在阿哲尔拜占人是用伊朗方言来表示的，现在则用突厥方言来表示，突厥方言几乎为阿哲尔拜占全部居民所使用，它的分布范围无论在北方或在南方都远远越过波斯版图的限界之外，而这地方是保存有阿哲尔拜占的名称的。但是关于那里突厥语分布的报道是在蒙古统治以后的时代才有的。人们会怀疑，突厥语如果没有随着蒙古侵入而来的新的突厥的浪潮是否会占优势，塞尔柱克算端在高加索取得胜利后不久，政治优势就转入基督徒手中了。整个12世纪和13世纪初期是一个强大的乔治亚或格鲁西亚王国兴盛的时代。乔治亚的伊斯兰教的邻人所受到的轻蔑和10世纪与11世纪上半期拜占庭的伊斯兰教的邻人所受到的一样，乔治亚和拜占庭仅有的不同区别是，他对伊斯兰教文化不是采取敌视态度，在伊斯兰教地区，铸造采用阿拉伯字母的货币②，甚至根据某一阿拉伯语的作家的意见，在他们的臣民间一个伊斯兰教徒和一个乔治亚人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作为伊斯兰的算端，塞尔柱克的后裔努力于尽量把整个伊斯

① 沙莱曼：《亚洲论丛》卷十，第240页以下。

② 《阿拉伯地理学丛书》卷二，第243页下面。

兰教世界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因此他们必须将其注意力转到中亚细亚地区，那里是他们所迁出的，和当时哈拉汗朝统治的地方。在突厥开始征服安纳托里亚的时候，阿尔布·阿斯兰已经同时向锡尔河和哈拉汗朝开始了胜利的进军。他们的儿子和继位者灭力沙（1072—1092）在其统治期内塞尔柱克帝国达到了势力极盛的时代，一直达到费尔干纳的乌兹根和他接纳了喀什噶尔汗臣服的表示，以致于当时伊斯兰的算端，在伊斯兰亚洲的全区的势力是东界回鹘、西界地中海的。仍然保存独立的只有在阿富汗和印度的加兹尼汗国，在这里桑撒儿即灭力沙的儿子在位时才在举行虎土白仪式时为塞尔柱克算端祷告。塞尔柱克算端之在中亚，如同在各地一样，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依靠暴力。没有什么标志表现出突厥居民在他们中间看到自己世袭的统治者，或者自己竭力支持突厥人的民族观念。塞尔柱克算端虽能将哈拉汗国置于自己支配的地位，但没有把全部的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牢固地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帝国，而且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当时在中亚细亚的突厥人和迁往西方的乌古斯之间的差别已经太大了，连乌古斯也不是塞尔柱克算端的忠实臣民。塞尔柱克强有力的后裔的最后一人、算端桑撒儿必须和过去8世纪的突厥可汗一样，和他的同族乌古斯相斗争。这一算端甚至有几次为乌古斯所俘虏，只有逃走才得幸免。

钦　　察

除了东方的文明的突厥人即回鹘人处于伊斯兰文化圈之外，还有西北方相当数量的游牧突厥人，在当时虽然不和伊斯兰教文明相对立，但同样是独立于伊斯兰教之外。在11世纪，从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两岸出来的钦察民族得到了广泛的分布。关于在也儿的石河岸那里生活的各族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只有从他们

的名称的变化来进行判断。在鄂尔浑碑文里有几次提到了也儿的石河，但丝毫没有说及那里生活的是哪一民族。看来西部乌古斯或突骑施可汗的领土是达到额尔齐斯的。虽说支持这一方面存在着若干突厥语的民间语源，但额尔齐斯的命名无疑不是突厥语。阿拉伯地理学家把奇马克（Kimäk）民族安置在额尔齐斯河畔，这民族位于乌古斯的北方，占有一片向西延伸到窝勒伽河或卡玛河的广大地区（卡玛河在当时是被视为名叫阿得水即窝勒伽河的上游的）。奇马克人分为好几个部落，其中也有钦察和埃马克两个氏族。马迦特[①]对奇马克一字来源于Iki Emek（两个埃马克）的解释无疑的是不中肯的，因为他先假定存在着两个氏族。在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中已不再有奇马克这个字了。分布在额尔齐斯河一带的埃马克，作者称之为钦察的一个部落（gil）[②]。

后来，除钦察民族之外还记载有康里民族。在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中，人们发现康里一字不是当作民族名称的。只说到康里是钦察的一个大人物的名字[③]，此外，Qangly一字作者认为是“车辆”（Wagen）的意思。我们从波斯历史学家白哈奇的著作中得知，钦察人在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撰写以前很久在南方就达到伊斯兰的边镜，他们是花剌子模的邻居[④]。马木特·喀什噶尔有关钦察迁往南方的报道[⑤]显然是指名为布拉克或者是埃尔卡·布拉克的突厥民族而言的，他们被钦察所俘和带走，但是后来由于依靠上帝的帮助才从监狱中被救出来[⑥]。在这里，象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里的许多地方一样，我们又看到有关历史

① 《东突厥方言研究》，第96页。

1972年在阿拉木图出版了库麦柯夫著的《9—11世纪的奇马克国家（据阿拉伯史料）》一书。——汉译者注

②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273页。

③ 同上书，卷三，第280页。

④ 穆莱编：《白哈奇史》（Baihaqi），第91页下面。

⑤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316、116页。

⑥ 《突厥语词典》原文，卷一，第317页。

事件的一个模糊的暗示，关于这方面我们希望得到附有日期记录的比较详细的资料。

11世纪乌古斯之迁往西方和南方可能部分原因是由于北方的钦察人的压力而引起的。或者可据以说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录的、10世纪乌克斯夺取从来未有人居住过的①曼格什拉克半岛的事实。曼格什拉克半岛从那时以后直到最近一二世纪②仍然为土库曼所占有，直至这里的土库曼被迫向来自北方的新压力，即哈萨克Qazaq人让步③。俄国革命后，曼格什拉克便合并到哈萨克斯坦④。

11世纪的民族迁徙的事实指出，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依照乌古斯的名称呼为古斯草原的这一广大草原，现代被称为钦察草原。这一名称即使作为民族的钦察已经不再存在的时候，还仍然保持着，直到今天仍保存在伊斯兰教的科学文献中，即使在里海的可萨崩溃后，仍然被称为可萨海一样。锡尔河畔乌古斯的遗产和为乌古斯所驱逐出来的俄罗斯南部的裴奇内格的遗产传给了钦察人以及和钦察人有密切联系的康里民族。这样钦察人的领土包括从东到西的广大地区。显然在这广大地区以北迁徙已经不再发生了。在西方钦察人和俄罗斯人以及西欧人有了接触，虽然他们都不认识钦察一字。俄罗斯人称钦察人为波洛夫谢尔人，西欧人称之为库蛮人。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除了伊德利西的著作（他于12世纪在欧洲写过著作）和利用伊德利西的著作的著作家外，人们从伊斯兰教的文献中找不到库蛮一字⑤。

---

① 《阿拉伯地理学丛书》，卷一，第219页。

② 如巴托尔德后来确定的，16世纪突厥蛮为诺盖，17世纪为卫拉特人从曼格什拉克半岛所驱逐。《土库曼》卷一，列宁格勒，1929，第51、57页。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上册，第109页，16世纪末土库曼人为诺盖人，1630年为卡尔梅克人从曼格什拉克驱逐出去。——俄译本注

③ （Казахов）。——俄译本注

④ （Казахстана）。——俄译本注

⑤ （Команен）。——俄译本注

关于钦察的起源，近来出版了马迦特天才和渊博的著作，马迦特[①]企图证明，在一些伊斯兰教著作家所记载的远东的库恩民族是属于钦察的成份，正如库尼的名称著称于西欧一样。在我看来，他已不能成功地证明他所假定的库恩民族是从东方迁往西方的，又不能证明其存在的事实。在这同一地区即吉利吉思人之东，格尔德齐[②]曾安上一个名为夫利（Fûrí）的民族，他们的文化水平比吉利吉思低。很有可能，我们在夫利这名字下遇上一个突厥字büri（狼）。在马迦特所根据的著作的多数手稿中，即毕鲁尼和奥费（Aufi）的著作中，人们发现是以夫利一字来代替库恩的，很有可能，这后一异文夫利应当是更可靠的[③]。同样马迦特以下的探索也是很不确实的，他根据某些汉文资料去证明钦察人是比较晚的，即12世纪从远东来的统治王朝。

钦察人的迁徙提供了一个少见的例子，即一个民族成功地占领广大领土，而没有达到政治统一的目的和意识到自己是主权者。虽然有个别的钦察人的可汗，但从无一个为全钦察所共戴的唯一的可汗。他们所占领的广大地区在此时期仍然独立于伊斯兰世界之外，高加索的钦察人在13世纪时参加了攻击伊斯兰教国家的战争。甚至有时乔治亚人和伊斯兰教徒联合起来击退来自北方的对他们的攻击。这些攻击不仅是旨在掠夺性的出征，而且旨在占领地盘。伊斯兰教徒在某一时期，丢掉了打耳班，甚至丢掉了包括夏伯兰城（Sâberân）在内的，位于打耳班以南的地区，最后他们在乔治亚人的援助下成功地恢复这一地区。在1175年从这方面

① 已经引证过多次的班格和马迦特的著作《东突厥方言研究》，柏林1914年（《哥廷根论文集，哲学，历史组》新辑，卷十三，第一号）。
〔按〕伯希和有文评马迦特的著作，译文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论文译丛》（二）。——汉译者注

② 巴托尔德：《报告》，第86页。

③ 也可读作кypu，巴托尔德：《吉利吉思人》，伏龙芝，1927年，第23页。参考巴托尔德《吉利吉思人》，第23页，《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上册，第497页。——俄译文注

来攻击伊斯兰教国家的敌人中，人们同时提到了斡罗思。人们在俄罗斯的纪年史中没有发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显然，只有志愿军团参加，而没有当时斡罗思的公国的人们参加① 。

乌古斯的文明

钦察一些可汗甚至在南俄罗斯也有伊斯兰文化的代表，特别是长于战术的专家为他们服务。但是在伊斯兰教地区的紧邻有非伊斯兰教的钦察汗国，一些城市也成为它的组成部分。从12世纪开始，这个汗国的首都是苏格纳城今苏纳克一古尔干废墟，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② 也是把它看作是位于乌古斯地区的城市来记载的。花剌子模在12世纪下半叶和上述汗国有了联系。伊斯兰的资料很清楚的说到，钦察人和康里人（这两个民族常常一起记述，以致不易区分开来），由于他们和花剌子模结成亲密的关系，在12世纪后半叶才信奉伊斯兰教。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哈萨克草原的突厥民族大批改信伊斯兰教的事实，对于伊斯兰教在钦察草原进一步的扩张未必就具有重大意义。根据依宾·阿提尔③ 的记述，这件事发生在回历435年沙法月即公元1043年 9 月或10月（据我所知，这一记述目下还没有发现较早期的史料）。正如有关960年的记事一样，在这一情况下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的名称没有被记载下来。然而，他们放牧的地区是确定的：他们冬天在八喇沙衮附近过活，夏天则来到窝勒伽河畔。这一地区虽然是辽阔的，但是这一民族的人数显然是比 960 年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少得多。

---

① 《伊斯兰百科》卷一，第983页（打耳班 Derbend）。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三，第425—426页。

②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392页。

③ 托伦伯克编：《伊宾·阿勒·阿提尔书》卷九，第355以下。

他只提到一万帐；伊宾·阿提尔之后阿布·菲达的著作[①]甚至只提到五千帐而已。

从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中不易确认伊斯兰教的影响在西北方面达到何处。一般说来，看不清楚，他所引用的突厥诗歌的例子，所涉及的是哪个地区和哪一个突厥民族，而这些诗歌或者是关于民间想象的作品或者是关于艺术作品和关于突厥宗教信仰、风俗以及他们的国家行政的详情。作者所引用的诗歌涉及各国不同的地区。其中有的诗歌叙述可敦一西尼（Qatun tuu Syny）城和唐兀人的战争[②]，也有的诗歌描写窝勒伽河，句子是：

阿得河流水，
冲击暗礁下。
涨水的池塘，
多鱼又多蛙。

除了民间诗歌之外[③]，在突厥人中间还有诗人的作品，甚至还有宫廷诗。在有一处地方，作者自称为可敦的仆人（可敦的，即汗的妻子的），并补充说他奉献给可敦的一首诗是作为他服务的新成果的。这一类诗歌称为科舒格，它是从阿拉伯语Qasîde翻过来的[④]。后来，人们在这一种科舒格和依据其他韵律写成的另一种诗，图欲克之间做了区别。Tujuq[⑤]一字不见于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他只记载Gugu或Cuču诗人的名称，并说这是一个

---

① 赖斯克·阿德勒编：《阿布菲达穆斯林年代记》；《巴托尔德文集》卷五、卷三，第120页。

② 《突厥语词典》卷三，第240页。布洛克曼在《夏德寿辰纪念论文集》中发表的论文，第9页。

③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70页。参考布洛克曼《大亚细亚》卷一，第29页。

④ 同上书，第314页。

⑤ 关于这种诗体，参考Türk Meğmûsy（《土耳其学的复兴》）卷二，第213页以下。关于图欲克，参考科布吕鲁《韵律》第257—258页。——俄译本注

突厥诗人的名字[1]。但没有说明这诗人是出身于哪一个突厥民族，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生的。

正如波斯文化的影响不能一下子就代替先前的突厥诗歌一样，伊斯兰教的信仰也不能一下子使从前的宗教信仰完全取消。甚至在鄂尔浑碑文中所记载的乌弥女神的崇拜也被保存下来。根据马木特·喀什噶尔的报道，人们也称她为母亲腹中婴儿的保护神。有一谚语言道："尊敬乌弥女神的人，将得到一个儿子"[2]，在同一作品中也提到为"死者祝祭"[3]的约克的旧术语。人们也称在安葬后给送葬者的款待，为jogh，为期从3天到7天。还盛行以下的信仰，即在两军战斗之夜，相应的两个地方的精灵也彼此在战斗，战士在战争以前的夜晚不敢从他们的帐篷里出来，为的是不要中了精灵的暗箭。人们称精灵的分队为"哲卫"。精灵的这一分队或那一分队的胜利决定人们之间的战斗的结局[4]。当人们为了探询一个新生的孩子时不是说："生下来的是男孩还是女孩？"而是问："生的是狼还是狐狸？"[5]

在关于国家机关的原委中，说到了可汗权力的外部标志。图克就是这种标志之一，图克是旗帜的意思。一个可汗能拥有的军旗最大的数目是九个。当人们说及拥有9个军旗的可汗时，就使人想象到最有势力的可汗[6]。有关非伊斯兰教的突厥可汗，特别是回鹘可汗的若干详情也有所提供。关于堪都一词的解释，据说是用来指长四欧尼（近两公尺）宽一拃一块的棉布。这种布上面盖有回鹘可汗的章、用来作为商业上的计价标准。这种棉布每隔七

---

① 《突厥语词典》卷三，第180页。
② 同上书，卷一，第111页。
③ 同上书，卷三，第105页。
④ 同上书，卷三，第171页。
⑤ 同上书，卷一，第359页。
⑥ 同上书，卷三，第92页。

年缝洗一次，重新盖章①。以棉布作货币用，常常见于中国突厥斯坦，甚至在最近也是这样的②。哈拉汗朝和乌古斯，即塞尔柱克后裔各国行政用语的差异有时是很显著的，在炽俟即东突厥就是这样。从这时期开始，和后来在蒙古帝国中一样存在着 jarlyq（jarlygh）这一术语，而乌古斯却不知道这一个字③。另一方面，乌古斯却存在意指印章，署名的杜克拉克（tughragh，现在为tughra）这个词，作者关于这个词说道："突厥人不认识它，我不知道它的来源"④，蒙古时代的著作家，伊宾·阿勒·穆罕纳引用过这两个词：tughra和jarlyq同在一叶⑤。但是，谁也知道tughra一词，到后来只为塞尔柱克的突厥人使用，其次为奥斯曼的突厥人所使用，在中亚完全不为人们所知道。关于这一由乌古斯携往西亚和其他突厥人完全不知的文化词汇的来源问题，对于历史家来说，会显示出极大的兴趣。

关于突厥文化生活的其他现象是和突厥在其后几世纪直至蒙古入侵同西方、东方的文化联系问题相关的，这是下一讲所要阐述的问题。

---

①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350页。
② 《札记》卷十七，第191页以下。
③ 《突厥语词典》卷三，第31页。
④ 同上书，卷一，第385页。
⑤ 里夫阿特编：伊宾·阿勒·穆罕纳书，第149页；梅里奥兰斯基，《阿拉伯语言学者》，第51页。
参考《巴拉尔德文集》卷五，第102页。——俄译本注

·第七讲·

西辽和可失哈儿的突厥文化

蒙古入侵前突厥同西方和东方的文化关系。

中国的契丹人

马木特·喀什噶尔还对哈拉汗国在北方同以后在历史上不再出现的叶护民族的战争，在东方同回鹘的战争提供了若干参考资料，但是他完全没有提到早在11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对当时夺取了远东政权的契丹的战争。我们已经注意到，俄罗斯、蒙古和部分伊斯兰教徒间直到此时，对远东主要文化国家中国，都是用这一民族的名称即契丹一名来表示的。在中国虽然契丹的统治已在12世纪宣告结束，这一民族和她的语言大抵是在蒙古帝国时期已消失。契丹在其统治中国时是用辽的名称来叫自己的统治王朝的，契丹是以辽这一名称在中国史书上著称的。在伊斯兰教史料中不用这一名称来指明这一王朝，伊斯兰教著作家用契丹（Chitai）的名称来指明民族，这一名称常以t（Chitai）来写，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也有时这样写。

征服华北后，辽朝诸帝便在蒙古居住下来，在那里他们于924年遇见了伊斯兰教商人。这一会见，只见于汉文资料①而不见于伊斯兰教资料。辖戛斯被契丹逐出蒙古后，似乎又回到了叶尼

① 布莱德施奈窦：《中世纪研究》卷一，第265页。

塞河沿岸，我们后来在这里再次看到他们。同样，蒙古的古代支配者即回鹘，当时生活于中国突厥斯坦的，归顺了契丹。契丹向他们建议回到他们从前所占领地区蒙古去，但是在中国突厥斯坦的回鹘民族都习惯于农业和城市生活，不愿意接受这一建议①。

用阿拉伯文写作的著作家，自加兹尼王朝的马木特的同时人鄂特比以来，往往谈到从东方来的，对哈拉汗国的进攻（所有这一切进攻）总是归之于契丹。如果是关于契丹领导的军事远征，那末辽代的历史，不会轻易略过的。但是人们都没有发现有关契丹西征的任何报道。很有可能，当时前往西方的不是契丹本身，而是他们煽动迁徙的蒙古诸部落，这些部落首先占有蒙古东部，然后占有蒙古西部。相同的印象也在中亚景教主教发往报达景教总主教的信中获得，信中提到某一民族的攻击，它是分为8个氏族的②。很有可能它是指乃蛮人说的。乃蛮人是成吉思汗时代占据西部蒙古的蒙古民族，因为乃蛮一词蒙古语是“八”的意思，是指这一民族分为八个部落的。

辽朝吸取中国文化也许是比支配中国的其他异族更多。虽然辽的最后代表被迫离开中国，即当通古斯民族女真（Ğur Ğen，伊斯兰教著作家称之为朱尔治Ğurgi）在满洲取得了政权的时候。1125年，女真征服辽帝国，在华北代替了辽朝，并在那里建立了金朝（Ğoldene Dynastie）。汉语是金，蒙古语是阿勒坦汗（Altan Chan），突厥语是阿勒廷汗（Altyn Chan）。辽朝最后的代表当时迁往西方，只有自己民族的一部分人跟着走，其他的契丹人仍留在中国，归顺于女真，但是当成吉思汗权力提高和当他领导反对女真的战争时，他们便纷纷起来反抗。伊斯兰教的史料后来使

① 布莱德施奈窦：《中世纪研究》卷一，第214页。

② 引自阿布·法剌治撰：《叙利亚编年史》，见鄂比特(Oppert)《长老约翰》，第91、124页。

用同一的名称：哈喇契丹①，既指迁往西方的契丹，也指归顺于女真政权的契丹②。

契丹迁往西方

关于契丹迁往西方的报道，我们发现伊斯兰史料比较汉文史料更为清楚和详细。中国人只提到契丹的迁徙是在辽朝末君的兄弟指挥之下进行的，他们通过回鹘国家，得到他们的帮助，迁到东突厥斯坦，只有伊斯兰教资料报道这次迁徙的结果是不幸的。契丹为可失合儿汗完全打败了，这一胜利的消息是由塞尔柱克算端桑撒儿报告给报达的哈里发的③。相反的，哈喇契丹④的另一部分从北道越过西部蒙古，却取得了成功，他们在谦河（叶尼塞河）上流虽然遭到辖戛斯的袭击，但是却成功地通过了他们的土地，他们继续向西南方走，并在楚库楚(Čugu čak)地区修建了叶密立城。到了11世纪，就在同一地方发生了哈拉汗朝和叶护民族的战争。

这一地区在12世纪时，同11世纪一样，大抵也仍处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之外，而在其最北的伊斯兰地方则同从前一样，是在哈拉汗朝支配下的八喇沙衮城地区。

哈拉汗朝这一次象上世纪发生的情况一样，没有能够击退敌人契丹的进攻，当敌人来到离八喇沙衮八日程的地方就被打败了。契丹的胜利是利用了八喇沙衮汗和处于屈服地位的游牧民之间的倾轧。契丹在这场战争中是站在可汗这一边的，但是当他们

① 关于契丹、辽、西辽，参考《伊斯兰百科》卷二，第789页以下。

②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一，第37—38页；关于中亚西辽的历史，也可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上册，第48—56页。——俄译本注

③ 原文见巴托尔德：《突厥斯坦》卷一，第371页；巴托尔德：《西辽》，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542—546页；同时参考魏特夫和冯家升的《辽》。——俄译本注

④ 这里最重要的史料是术外因的《世界征服者传》，《吉伯纪念丛刊》，十六辑，第二卷，第86页以下。

从敌人手中把他解救出来以后，就将汗位废了，并占领了他的领土，从此以后，那里便成为哈喇契丹帝国领袖的官邸。这里作为哈喇契丹向东方进军的出发点，他们征服了可失合儿汗国，那是从东方进兵所不能征服的，为了惩罚他们过去的敌人辖戛斯，他们向东北方进军。回鹘也落入他们支配之下。1137年他们干预西突厥斯坦的事务，这里同样是可汗和游牧民首领战争的舞台，但是哈喇契丹这一次却站在游牧民这一边来反对可汗，跟在八喇沙衮时所采取的态度相反，寻思干可汗在忽毡附近被打败了。1141年算端桑撒儿本人在寻思干以北的卡特万草原为哈喇契丹所击败，强大的塞尔柱克算端和异教徒作战的这一败北，给他们同时代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关这一事件的模糊不明的报道一直传到十字军时代，那时候十字军在巴勒斯坦和北美索不达米亚同伊斯兰教徒作战。1141年的事件似乎在欧洲产生了这样一种传说，据说有一名叫约翰的祭司王从东方来攻击伊斯兰世界，并和巴勒斯坦自己的同教者联合在一起。

实际上，哈喇契丹当时是逗留在阿姆河附近的，但是接着却占领包括巴里黑城在内的阿姆河以南的地区，包括不花剌和花剌子模在内的伊斯兰教突厥斯坦全部都属于哈喇契丹的主权。

在八喇沙衮附近居住的哈喇契丹诸帝无论是伊斯兰教徒或是蒙古人都尊称他们为古尔汗①，这一称号无论在以前或以后，似乎都未有见过，因而它的起源仍然是一个谜。伊斯兰作家以"汗之汗"(Chan der Chane) 的意义来解释这一名称②。在这称号中的 (Gur) 一字有可能就是古代突厥字的 Kür 或是 Kül，它见于鄂尔浑的碑文，格尔德齐和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中。

处于古尔汗支配下的有广大的地区，从花剌子模一直延伸到

① 《伊斯兰百科》卷二，第195页。

② 巴托尔德：《古尔汗》，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528页，同时参考孟吉斯《称号》。——俄译本注

回鹘。但是他们在中国不占有任何地区。虽然这样，但是中国历史家还是把西辽算入中国王朝中，按照中国的习惯，记载各个皇帝在位的年代，以这一统一时期的年代来表示各个事件发生的时期不用皇帝的本名，而外国人、伊斯兰教徒、欧洲人则常常用皇帝本名来表示其统治年代。在中国的历史中，这是个唯一的例子，即人们把一个在中国丧失自己统治地位的外国王朝、哈喇契丹还继续算入中国王朝之内。14世纪当蒙古人从中国被逐出以后，元朝（这名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被称为中国王朝资格而取的）就算是消灭了，不当作成吉思汗后裔统治的年代，因为他们只有统治蒙古。仅仅为了辽朝而作的例外。这件事清楚地表明了哈喇契丹是非常深刻地吸收了中国的文化，显然，人们不再把他们当作外人来看待。

哈喇契丹

从伊斯兰教资料中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古尔汗政府的少量知识可以推论，在他们离开中国和来到突厥斯坦以后，汉语在商业往来上是官方语言，他们带来了中国的行政原则。例如女婿一字就是以中国字“驸马”（fu-ma）来翻译的。同样在他们中间，也同后来在蒙古那里一样存在有表示官阶证明的牌子（paiza）一词。

哈喇契丹和游牧国家的习见的类型之分别在于，它不是分割成各个独立省一事实。甚至在叙述到第一个古尔汗的时候，说他拨给任何人的骑士都从不超过一百人。另一方面，属国内部自治原则得到广泛的运用。哈喇契丹仅仅消灭哈拉汗国在八拉沙衮的统治，古尔汗从这里开始行使其权力，虽然从居民的组成看来，这个城市甚至在后来仍是伊斯兰教城市，但是在其他被统治的地区，在可失合儿和河中地方哈喇汗国的可汗仍和以前一样存在着。从前的王朝如西方的花剌子模和东方的回鹘同样存在着。归顺古尔汗的表示是向他纳税，此外，在这一或那一君主的宫廷

中有古尔汗的代表。象后来在蒙古时代所见到的一种归顺形式，有时为其他更具特权的形式所代替。古尔汗的代表只为了收税住在属国君主的宫廷里，以后即离去，属国的君主往往甚至取得允许自己携带贡物交给古尔汗的权力。

哈喇契丹所制定的按户征税制度是模仿中国的。人们向每户征收一第纳尔，即一金币。这种制度正如同游牧民的传统相抵触一样也和伊斯兰世界的传统相抵触。然而哈喇契丹的这种新规定在中亚不是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不动产征税的例子和按每户征税的习惯在中亚各国甚至保存到19世纪。

后来，蒙古努力把人头税制度引入中国本部，引起了中国官吏方面的强烈的反对。

例如塔什干，在霍罕汗时代，是按户来征税的①，而且按户数少得多时代的旧帐册来征税。正如12世纪古尔汗时代的情况一样，在霍罕汗时代也是按每户征收一个特拉即一个金币。可惜的是，我们对于12世纪至19世纪这一长时期内的征税制度知道得太少了，以致于在哈喇契丹和霍罕汗的行政制度之间是否可能有历史联系或者我们这里只看到偶然的巧合，仍然是不清楚的。

一般说来，直到现在对以下的问题仍有争论，即富有远东文化特点的一个民族在中亚建立统治权的事实是怎样影响到一般的中亚历史和特殊的突厥历史。这一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一起，都是马迦特《库蛮人》②这一著作所研究的对象，他在这本著作里赋予古尔汗国家以很大的重要性。马迦特认为，从来注意太少的文明帝国哈喇契丹在12世纪和13世纪③暗淡无光的历史背景中是光芒四射的。但是马迦特没有任何事实来支持他的主张，他

---

① 原作《突厥斯坦地质学爱好者小组会议记录》卷三，第175页。参考马利斯其《若干篇幅》，第176页（根据本文集卷五，第106页）。——俄译本注

② 马迦特：《东突厥方言研究》，第25页以下。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107页，《库蛮考》。——俄译本注

③ 马迦特，《东突厥方言研究》，第209页。

的意见看来只能说明他对伊斯兰和突厥是持否定态度的。

首先西辽王朝本身的生活就呈现出一幅十分悲惨的形象。诚然，这里不存在和部落制度与封建制度相联系的动荡不安，如同人们在伊斯兰教国家和游牧帝国所看到的那样，但是另一方面，和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一样，权力常常落人到女人和他们的情夫的手中，有一个女统治者为了缓和由于她的行动而引起的狂暴的情绪，不得不在群众的众目睽睽之下亲手把自己的情夫处死。同时我们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让我们说古尔汗努力提高自己势力范围内各地的文化水平是有任何成效的。纵然也曾经尝试把暴乱的游牧民，特别是处于对哈拉汗朝服役地位的割禄队伍解除武装，并使其习惯于耕作，但是这一尝试并没有取得持久的成效，而哈喇契丹不久就必须再次平定割禄首领的暴动。

一般说来，几乎没有一个时期是古尔汗在自己统治的全地区建立了内外和平的时期，虽然花剌子模归附了古尔汗，但是花剌子模在遭到已从失败中恢复过来的塞尔柱克算端桑撒儿的进攻时，并没有得到哈喇契丹方面的任何帮助。同样，也没有关于古尔汗干预其他在突厥斯坦所爆发的骚动的报道。最后，人们也看不出哈喇契丹是代表突厥斯坦最高的文化的，政权为这种文化的代表所掌握，恰好相反，最后的古尔汗的宰相是一个名为马木特·拜的人，他显然是个伊斯兰教商人，换言之，即伊斯兰文明的代表。

基督教的扩展

哈喇契丹帝国的成立，虽然对文化的进步必然产生有利的影响，但也仅仅局限于它对国内并存的文化各种因素的接近方面作了贡献。

伊斯兰地区之从属于非伊斯兰统治者的政权可能在非伊斯兰文化因素向西方扩展上起着一定的作用，直至此时，人们还不能

完全说明位于楚河流域的哲第苏省用叙利亚文和突厥文写的基督教碑文所提出的问题。其中有许多碑文是在热海附近的，它们同伊犁河流域的碑文一样，是属于14世纪的，换言之，是属于蒙古时代的。但是在楚河流域也有若干碑铭是属13世纪初期的，也就是说属哈喇契丹帝国时代的。俄国科学院院士科科夫佐夫在比较哲第苏地区的基督教碑文和吐鲁番的碑文之后，发现吐鲁番的基督徒比较哲第苏（七河）的基督徒较有学问，假如说在基督教的环境中影响是彼此间产生的，那末它只提到东方对西方的影响，换句话说，是吐鲁番影响哲第苏，而不是相反的意思，西方影响东方①②。

除了信仰基督教的回鹘之外，信仰佛教的回鹘也对西方有所影响。我们这里虽没有关于哈喇契丹时代的任何资料，但是从蒙古统治者最初的十年开始，即1253年，旅行家卢布鲁克在伊犁河北的卡雅里克城中发现有回鹘的佛教徒，这些佛教徒的回鹘人可能也是早在哈喇契丹的时代来到这里的，但是我们缺乏关于支持这种假定的证据。11世纪和12世纪一般说来是基督教加强宣传的时期。我们知道一系列的蒙古民族在这时信奉了基督教。这不仅是基督教的资料，而且伊斯兰教的资料也指出西蒙古的乃蛮和东蒙古的克烈是基督教徒。伯希和教授③的研究还指出，生活于中国边境的南蒙古的汪古惕同样是基督教徒。

回鹘参加这一基督教的宣传事实，从下列的情况中得到证明，成吉思汗在乃蛮地方发现一位回鹘掌玺官，并通过它学会了回鹘字母。

为了证明哲第苏的基督徒是属于回鹘人这一假说，有以下事

---

① 《科学院公报》，1909年，第778页以下。

② 科科夫佐夫：《关于叙利亚·突厥的碑铭学》，第778页以下；同时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二，第265—298页；马洛夫《蒙古的古突厥文字》，第75—76页。——俄译本注

③ 《通报》，第二辑，十五（1914年），第629页以下。

实可以说明，即我们发现在他们中间有和鄂尔浑碑文和回鹘文书中①一样的，作为十一（elf）意义用的“二十一”(einszwanzig)的记数法②。回鹘基督教的中心分明在吐鲁番东的布拉依克村，在这里人们只发现基督教文献片断，而且是用各种语言：叙利亚·粟特和突厥语③编辑的。不错，哲第苏的基督教徒不是使用向粟特人借用的回鹘字母，而是使用叙利亚起源的字母，他在叙利亚文字母上面增加一些新符号。

伊斯兰徒的商业和伊斯兰教的扩展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宣教的活动是和商业的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在有关克烈人信奉基督教的叙利亚文记事中，直接说到④这一民族的可汗从基督教商人得到有关基督教教义的消息。不管怎样，下列事实是值得注意的，虽然有关在蒙古伊斯兰教宣传的资料是完全缺乏的，但是伊斯兰教商人在提高文化水平方面是比基督教商人重要得多的。蒙古人从突厥人中借用萨尔特(Sart)一词来表达商人的概念。正如人们从 Soghd 一词构成 Soghdaq 一字那样，人们是用 Sart一词来构成 Sartaq一字的。蒙古人是用后一词来表示蒙古境内商人占大多数的民族的，换句话说，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朗民族”的。蒙古人用来指示每人的所属民族是在民族名称后面增一“台”音(tai)⑤，如Sartaqtai一词的构成，换言之，即Sartaq或Sart民族的人。

有关具有伊斯兰伊朗文化的人们在蒙古活动的性质，表现于

① 《科学院公报》，1909年，第789页以下。
② 科科夫佐夫：《关于叙利亚突厥的碑铭学》，第789页。同时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363页。——俄译本注
③ 米勒：《回纥志》柏林，1908年(《普鲁士科学院论文集》)，第4页。
④ 鄂比特：《长老约翰》，第89页，根据阿布·法剌治。
⑤ 《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报告书》卷七，第65页。

关于英雄 Sartaqtai 的蒙古传说中，据说 Sartaqtai 是个很灵巧的建筑师，他在大河、巨湖上面修筑了奇迹般的堤坝①。显然，人工灌溉术是伊斯兰教徒介绍给蒙古人的。在蒙古人看来，Sartaq或Sartaqtai 与其说是表示某一民族的人的意思，不如说是表示某种文明类型的人的意思。成吉思汗曾任命把归顺他的第一个伊斯兰教徒君主即哲第苏② 北部的剌禄人阿厮兰汗（Arslan Chan）称为 Sartaqtai，虽然从语言方面看来剌禄人不是伊朗人，而是突厥人。同样的语根Sart在蒙古人间还构成为Sartaghu[1]或 Sartaul 一词，那是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开始使用了。后来刺失德丁使用这个词 Sartaul 作为塔吉克③ 意义用，伊宾、穆罕纳则用作“回教徒”④ 的意思。

有关Sartaqtai的传说和完全缺乏关于蒙古方面伊斯兰教的宗教宣传的资料清楚地表明，当时在蒙古伊斯兰教商人的活动和伊斯兰教的传布关系不大，正如现代欧洲商业的成功和基督教的传布的关系不大一样。在蒙古时代，有钱的蒙古商人修建了经文大学和清真寺，但是在伊斯兰代表和伊斯兰教商人之间在当时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他们的关系常常甚至以公然的敌对为特征⑤。

古代伊斯兰商业和近代欧洲商业原则上的差异是在于下列的事实：伊斯兰商业的成功和伊斯兰教国家政治上的成功没有联系。在哈里发崩溃之后，伊斯兰国家边界只是依这一或那一王朝的兴起或瓦解而确定的，变动很大，以致于居民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组织和政治地图的改变不发生任何关系。我们已经看到，甚

---

① 特别是波塔宁《西北蒙古概观》卷二，第170页以下；卷四，第285页以下。
② 《报告书》卷七，第171页。
③ 《刺失德丁史》，布洛什编，第5、541页。
④ 《札记》第十五卷，第75页，里夫阿特版，第194页。
⑤ 参考赛甫丁·巴哈尔吉献给哈巴什·阿米德的诗篇，载《突厥斯坦》第一部，原文第102页，晃迭米儿《蒙古诸汗史》中的阿布·耶库伯·沙吉尔史，德黑兰版，第三卷，第28页。

至在比较有势力和比较巩固的萨曼王朝的时代，在草原上出现了与之无关的伊斯兰教殖民区，它们不隶属于萨曼王朝，而隶属于土著突厥统治者。有一种彼此发生关系的商业公司出现了，虽然缺乏近代类型的信用组织，但是人们在当时可以用某一地区发的支票到另一个政府统治下的另一个城市兑换现金。在最近发现和出版的由11世纪历史学家阿布·宿札[1]所编撰的著作中，明确表明以商人的支票换取现金比之以政府权力机关出的支票换取现金要容易得多。由于伊朗人在商业中所占的优势，作为表示这种支票的波斯字ček在广大范围内是有名的，它是明确地相当于波斯字的形式，而不是相当于阿拉伯字sakk的形式。波斯文形式的Ček后来传到西欧，并扩大到商业界的整个领域。

在中亚细亚，突厥人自然也参加了商业活动。后来，蒙古人用ortaq[2]称伙计，合伙人，阿拉伯语作šerîk一词来表示商人。这表明行会在商业关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马木特·喀什噶尔[3]显然只知道这个词作"伙计"的意义，而不是作为"商人"的意义，可见突厥人中行会的商业发展(die Genoss oenschaft 法文作 corporation，俄文作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大概是在11世纪以后。

由于伊斯兰文化在当时占优势，这一文化同其他文化所存在的一切接触，结局都必然引向伊斯兰教传布地区的增大。哈喇契丹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使得自己不象后来在中亚的蒙古人那样变成为伊斯兰教徒；但是，甚至在哈喇契丹的统治时期，使伊斯兰教徒服从异教统治的结果仍然只是扩大伊斯兰教的分布范围而已，虽然程度上没有后来蒙古时代那么大。就是在哈喇契丹出现时，伊斯兰教的范围也是和马木特·喀什噶尔的时期一样很少越

---

① 《阿拔斯朝哈里发的衰微》卷三，第138页以下(原文)，卷六，第143页(译文)。

② 《伊斯兰百科》卷一，第893页。

③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91页。

过八喇沙衮汗国以北的地方。不满百年以后，蒙古人出现不久，人们发现有关哲第苏地区北部有割禄汗国和伊斯兰教徒阿厮兰可汗以及卡雅里克城的记载。它的方位直至今日只能略知一二。卢布鲁克在路经阿拉湖（Ala Kul），越过伊犁河后不久，经过这个城市附近，看来他当时所走的路比现在更靠近巴尔哈什湖，因为卢布鲁克从远处可以望见巴尔哈什湖，不仅是卡雅里克城，而且割禄汗国本身也是到了哈喇契丹的时代才成立的，而割禄汗乃是古尔汗的一个属国。在另一城市，即阿力麻里位于固勒扎①这一现代城市的西北，已不见载于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也不见载于有关哈喇契丹入侵的记事中，其掌权者（在蒙古出现以前不久），不是古尔汗的一个诸侯，而是反对他的一个暴动者，即一帮强盗的头目，他或是出身于割禄或是出身于康里的突厥民族。关于这种矛盾的说法也在几乎是同时代的各种手稿中见到，即研究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事件的主要资料：术外因的《世界征服者传》。这一部落的名称在这里是以下面的矛盾的形式来记载的：割禄以及其旁的康里②（Qanghly 按勘误表作 Qang-ly）。无论如何，阿力麻里的统治者也是个伊斯兰教徒。我们注意到：在中亚的非伊斯兰教徒哈喇契丹的古尔汗统治末期，存在着伊斯兰教徒的宰相服务于非伊斯兰教徒的统治者的情形③，在从前非伊斯兰教的地方成立了新的伊斯兰教国家。

在文明的回鹘形成一道反对伊斯兰教传播的堤防的东方，伊斯兰教在这方面的扩展是比较困难的。伊斯兰国家的边界即在蒙古帝国形成时也只达到龟兹（库车）以东，同样的情况早在马木特·喀什噶尔的时代就已存在了。有关的唯一的报道④是龟兹

① 《伊斯兰百科》卷二，第1193页。
② 《吉伯纪念丛刊》第十六辑，第一卷，第3、57页。
③ 同上书，第二卷，第17、89页。
④ 奥费（Aufi）（原文见），《突厥斯坦》卷一，第95页以下。

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英雄之一，即乞思儿别是以战胜回鹘而著名于世，回鹘在当时已是个和平的民族，没有能力来抵挡勇敢的战士。为了报答乞思尔别在反对自己的敌人时所提供的帮助，可失合儿汗同意给他以汗的称号。恰恰相反，在塔里木河流域南部，在马木特·喀什噶尔的时代，车尔成已成为伊斯兰的边疆城市，而在13世纪，马哥波罗的时代，罗布淖尔附近地区的居民也成为伊斯兰教徒了。

突厥的作用

突厥在伊斯兰亚洲的文化生活中究竟占有什么位置？这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突厥无论在何处都不是完全屈服于阿拉伯、波斯文化的，突厥无论在何处都没有丢掉自己本民族的语言。不管怎样，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对突厥人的影响也没有达到这样强的程度，以致于突厥语言完全不能成为国语和文化语言。在最西的，即小亚细亚的突厥国家中，阿拉伯语直到13世纪仍是国语，这一报道是一位无名氏的著作提供的，它是14世纪在小亚细亚用波斯语写的，我对这一报道有怀疑①，但是已故的马克斯·梵·伯尔内发现题铭学的资料是有利于上述意见的。如所周知，波斯史诗对算端的影响很大，这反映于经常使用象开呼斯劳和开科巴德这样的名称。但是此外我们也碰到纯突厥语的名称，它清楚地表明算端没有忘记他们是突厥民族。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在伊朗的塞尔柱克国家，那里波斯语逐渐成为官方语言和文学语言。又在突厥斯坦，即在哈拉汗朝国家管辖下的地方，阿拉伯语在行政的领域和在文学的领域中越来越被波斯语所排挤。值得注意的是，在10世纪，即萨曼王朝时代的不花剌历史是用阿拉伯文

① 《札记》卷十八，第129页。

写的。到了12世纪这本著作翻译成波斯文，这样的一种译本的出版，特别可以从下列的原因来说明，即人们不再有读阿拉伯语书籍的偏爱了①。甚至在神学教育的领域中阿拉伯语也为波斯语所排挤。有许多教员在经文大学的教课中是用波斯语的②。相同的现象也发生于宗教初级课程中。人们提到马质达丁·阿卜都剌·迦菲尔是乃沙布尔历史续编的作者，生于回历451年（公元1059—1060年——俄译者加），据称从5岁开始，就精通波斯文的伊斯兰教义初步③。虽然如此，但在哈拉汗朝国家和甚至在可失合儿中，阿拉伯语在12世纪的后半叶仍然用于官方文书，而且这种文字也用来起草法律判决词，巴托尔德将其译成英文，发表于《东方研究学校校刊》中。这一著作和文献的土耳其译文发表于《土耳其学的复兴》卷一，第221—226页上④。这文献是属于布格拉汗的统治时代，正是《福乐智慧》这一训导诗在可失合儿写作的时期（参考下记）。这一时代的文献和以后时代的文献一样，指出了在哈拉汗朝帝国和甚至在寻思干那里的居民中的确几乎没有人是操突厥语的，而后一种语言也没有完全被排除于行政术语之外。例如象突厥语的形容词 ulugh（伟大的）附在wazîr（宰相）一词的旁边，在寻思干汗12世纪末所铸的货币上甚至列上汗的称号：Sul-tân as-Salâtîn（算端的算端）。直至汗朝瓦解，可汗继续使用突厥名称，特别是突厥称号，从而保持这样的用法，我们从统治蒙古的乌古斯和回鹘可汗的历史知道这种用法，即汗就位时不用他从前的称号，而改用一个新的称号；用这一称号来代替本人的名称。这种用法屡屡使得历史家感到困惑，使他难以判断在同一地区几乎是同一时代所铸造的货币上的各种称号是属于一个人的或

① 施费（Schcber）编，《纳尔沙希》，第2页。

② 《沙曼尼》；几哥利奥斯编，《系谱词典》，第50页B，见阿达什尼的意见。

③ 科普吕鲁：（Köprülü）（写本），1152号。

④ 在《福乐智慧》记载中的布格拉汗，《东方研究学校校刊》，伦敦协会，卷三，1，1923年，第151—158页。

是许多人的。

但是在寻思干，据我们所知道，不存在用突厥文写的文学的问题[①][②]。在可汗的宫廷里住着得到很好保护的波斯诗人[③]。创造突厥语的伊斯兰教文学的比较适宜的环境是可失合儿，虽然那里有波斯影响，并且日益增强。到了17世纪，那里还有波斯语写的历史著作，但是作者关于波斯文法知识所达到的错误的程度，以致可明显的看出，这种语言已不可能是作者的母语，也不可能是他的日常用语[④]。

《福乐智慧》

在回历462年，即公元1069—1070年，一位出身于八喇沙衮城的，名为玉素甫 Jusuf 的（他担任宰相的职务）在可失合儿为这城市的汗，用突厥语写了一部训导诗，书名叫做Qutadghu Bi-eig的书籍，意为带来幸福的学问，美满幸福的学问，适合于君主的学问（全书译为《福乐智慧》）。表示“幸福”之意的 qut一词多次用到，在“福乐智慧”一书中也有许多地方用来表示今日的“陛下”之意，作为对王一级的称号。

这种文学，换句话说即关于君主、大臣等等义务。训诫著作自古以来流行于东方，其中也包括波斯世界在内。这类著作中最有价值的是来自历史或传记的事件的故事，通过这可以确证或说明这一或那一理论性的教义。

---

① 特别关于乞思尔汗和他的宫廷诗人见尼泊米·阿鲁季·撒马尔罕的《四讲》或《珍品集》。《吉伯纪念丛刊》卷十一，第146页。（原文）；卷十一，第2、52页（译文）。

②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421页。——俄译本注

③ 参考尼泊米·阿鲁季（Низами Арузи）《珍品集》或《四讲》(Собрание Редкостей)，由巴叶夫斯基等翻译成俄文。——俄译本注

④ 《札记》卷廿二，第313页以下。

正是这一因素是八喇沙衮的玉素甫的著作中所缺乏的。他的著作没有记载任何的历史人物。在他笔下的伊力克王只是没有生命的譬喻的正义化身的人物。其他的德行的拟人化则是通过宰相，他的儿子和兄弟来体现的，因此《福乐智慧》远比不上它的波斯样板①。

序言说，阿拉伯人和塔吉克人写了许多著作，但是一般说来没有突厥语写的书籍。这一事实表明在信奉伊斯兰教之后用突厥语写的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的文学杰作是以多么迅速的程度被遗忘了。我们从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中所知道的突厥语的伊斯兰教诗，不是在这部著作发表后才有的，这种文学正是在可失哈儿形成的。根据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②，可失合儿本城居民是操突厥的可汗语言的，即操涵义最丰富的突厥方言的，但是可失合儿的农村则是操干什克语的，换句话说是突厥化的土著居民的语言，他们原来不是突厥人。

《福乐智慧》在其文体和表现手法方面和旧的突厥传统的联系达到多大程度，它对于同时代的人有多大的影响，仍是个问题。我们所保存的《福乐智慧》有三种手稿：一是回鹘文1439年在哈烈写的，其他两本是用阿拉伯文写的，一本在开罗发现，一本在费尔干纳发现。作者自己在写他的著作时所采用的是哪一种文字，是回鹘文字或是阿拉伯文字③的问题，还常常是个讨论的内容。这本书的书名本身以及作为"陛下"意义的qut一字的使用，指明了伊斯兰的影响，部分地波斯的影响在可失合儿，甚至在宫廷生活的范围中，仍未成功地排除突厥的传统。我们在蒙古时代又发现《福乐智慧》的书名。它作为成吉思汗的圣谕集的名称④，人

① 关于《福乐智慧》，参考马洛夫《碑文》，第224、299—302页；原文和翻译（片断）第224—298页；书目第302—304页。——俄译本注

②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31页。

③ 阿拉伯文的可能性较大，参考上述。

④ 《札记》卷十三，第15页以下。

们根据它如根据“札撒”作为法律的本源，那是适用于蒙古帝国以及在它瓦解后所形成的各国的。根据15世纪一位著作家伊宾·阿拉布沙[①]的话语，可以得出结论说 Qutadghu 的名称也适用于蒙古人所使用的回鹘字母，从而伊宾·阿拉布沙错误地把这个字和成吉思汗所属的部落名称汇合一起（伊宾·阿拉布沙由于看错把部落名称读作葛塔特Qattât，以代替基雅特Qijât）。

人们提出下面的意见[②]是，布格拉汗的“回鹘”文的《福乐智慧》最少在有关书名方面是影响了蒙古人的，对促使成吉思汗的敕语《福乐智慧》的发表是有帮助的。但是自从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出版后，人们对于这样的事实不容置疑了，即哈拉汗朝国家的臣下不把自己看作是“回鹘人”和八喇沙衮的玉素甫用以著述的语言不是回鹘语[③]。同样，象布格拉汗的《福乐智慧》这样的渗透伊斯兰精神的一部著作，是不可能为回鹘人所接受的，因为他们仍是佛教徒和基督教徒，而这在后来又转而影响到蒙古人。

从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话语中，看不清楚，他本人是否知道八喇沙衮的玉素甫的著作，而后者是在两年前写出的，是在马木特着手自己的语言学著作以前。根据他的说法，他这本书是没有先导者。已故的马丁·哈尔特曼看出了八喇沙衮的玉素甫和马木特·喀什噶尔之间的区别是在下列的事实，即前者遵循庙堂的传统，而后者则是根据民间歌谣的传统的[④]。这种意见难以承认是有证据的。我们已看出，引自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诗句中也发现有宫廷诗歌的例子。另一方面，八喇沙衮的玉素甫为了训诫的目的也运用民间的智慧。人们在《福乐智慧》中看到有些章句的文字所表达的思想同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中所引用的民间智慧的例子

---

① 《继承人的趣语》，埃及版，1315年，第184页。

② P·梅里奥兰斯基，见《札记》卷十三，第21页。

③ 现代的研究者确定，八喇沙衮的玉素甫的语言（方言）是割禄语言，参考泽尔巴克《语法大纲》，第26页。——俄译本注

④ 哈尔特曼：《韵律形式》。——俄译本注

究全相同。凡是阅读过《福乐智慧》的人，如果他看见马木特·喀什噶尔① 所援引的下列的谚语：ärdäm bašytil即“德行、英勇的开端就是语言”② 都会想起这本著作。

纵然直到目前所知的手稿是有数的几种，但《福乐智慧》在当时却享有一定的声誉，这由于在耶亦克河口附近的萨拉友奇所发现的附有碑文的陶器而真相大白，因为碑文里有来源于这一著作的诗句③ 。此外，最近在土耳其发现和出版④ 的稍后的同性质的文学作品，即阿合马·伊宾·马木特·尤克涅奇（Ahmed ibn Mahmud Jügneki）(Jögneki）的《真理的礼物》，他是为一异密达德·伊斯帕拉沙尔·伯克用可失合儿语言写的一本著作，里面也包含有和现实生活事件没有任何联系的干燥无味的道德规范和指示⑤ 。

《真理的礼物》这本著作的发现，表明了《福乐智慧》不完全是一本孤立的著作，它在突厥文学中形成一个“可失合儿时代”，显然它对于其后时代的命运的影响是很微小的。

中国的影响

当时，突厥和中国文化早先的密切关系，其痕迹保存于汗的称号中。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表明了在当时人们已使用中国

---

①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281页以下。比较布洛克曼《东亚杂志》卷八，第68、214页（“教育的基础是语言”）。

② 马木特·哈什噶尔：《突厥语词典》卷一，第281页下方。根据布洛克曼的翻译：教育的基础是语言；参考布洛克曼《古代突厥人的民间智慧》，第68页。——俄译本注

③ 《札记》卷二十一，第42页。

④ 奈希布·阿西木出版，伊斯坦堡，1334，第二部分；此外参考丁尼《关于回纥文学中的道德观》，载《穆斯林世界杂志》60期（1925年），第189—234页。

⑤ хибат ал-хакаик，参考马洛夫《碑文》，第316—322页，刊出和翻译（片断），详细书目。——俄译本注

的名称，而在较后的时代见之于哈喇契丹的一个官职的中国名称tajangu① 相当于阿拉伯语hagib（大臣），而tajangu一词是从突厥语 tajanmaq（täjänmāk，意为支持、信任）派生出来的。它同样保存公主（qunčui）(qungui）一词，从鄂尔浑碑文中知道它，它是“夫人”、“女主人”（Herrin）②③ 的意思。

而可敦（Ch-atun）一词，在当时是指等级较高于用公主（qunčui）一词来表示的妇女。在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中所引用的，作为表明物质文化对象的无数单词当中，有 ulatu④ 一词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ulatu的意思是挂在胸前的一小块用来拭鼻子使之清洁的丝织品。大家知道，古代和中世纪，人们是不用手绢的，无论是古代希腊或是伊斯兰世界，人们是不知道这种用法的。在西欧，直到15世纪才用手绢，即欧洲人和远东文化接触之后。在远东，例如在中国，手绢是从古以来就使用的。同样，在中国的影响下，手绢也出现于蒙古。手绢出现于突厥是在11世纪，大概只能从远东文化影响的残存之一来说明，这以后就不见踪影了。

在可失合儿时代之后，伊斯兰教突厥文化的中心是锡尔河下流地区和花剌子模。这一地区在突厥史上的作用问题是下一讲讨论的对象。

---

① 《突厥语词典》卷三，第281页。
② 同上书，第181页。借自汉文的公主kung-cu，参考米勒（F.Müller）《摘自一本摩尼教的圣歌集》，第34页。——俄译本注
③ 参考葛玛丽《古突厥语语法》，第331页，马木特《突厥语词典》，第229页。——汉译者注
④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122页。

·第八讲·

面对蒙古入侵的花剌子模诸汗

后可失哈儿时代花剌子模的兴盛。成吉思汗的崛起。

花剌子模的突厥化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地理的位置，花剌子模对游牧民的商业关系比之中亚其他的文明地区重要得多。它的地理位置也不能不影响到民族的构成以及它的居民语言。大概当花剌子模的邻人由伊朗游牧民组成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情形了，至少人们努力去证明花剌子模和阿兰人（Alanen）是同一民族的①。他们往昔曾统治由锡尔河上流直到顿河下游的广大草原地区②。在草原突厥化之后，花剌子模所受的突厥因素的影响较其他地区更甚，在伊斯兰最初的几百年间，在花剌子模人们说的是为其他伊朗人所不懂的伊朗方言，但是，这种语言，不仅是日常用语，而且在11世纪人们还用来写书③，同时，在波斯文的字典中也常常把突厥字当作花剌子模字。在10世纪时，人们指出花剌子模人和突厥人之间的

① 《伊斯兰杂志》卷十一，第122页。

② 赫尔兹费特关于花剌子模人的起源及其在古代的民族联系，参考托尔斯托夫《古代花剌子模文明的踪迹》和《古代的三角洲》。——俄译本注

③ 穆莱编：《白哈奇史》，第842页。关于花剌子模语及其文献，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三，第546页，注4。——俄译本注

外貌是相似的[①]。到了蒙古人侵时代的13世纪，花剌子模已被视为专用突厥语的国家[②]。突厥化的过程显然是在11世纪和13世纪之间实现的，换句话说是在花剌子模处于突厥族的塞尔柱克总督支配之下的时代完成的，虽然如此，但他们仍保存“花剌子模沙”这一古老的伊朗称号。这里花剌子模沙的世袭王朝是在11世纪最后的年月里建立的，它们的代表几乎全部都有突厥名称。花剌子模在当时成为自己历史进程上最初和最后一次的伟大帝国的中心，这一帝国是由中亚和波斯许多地区组成的。

花剌子模沙由塞尔柱克一算端的长官（总督）逐渐变成伊斯兰世界东部的元首，并以伊斯兰算端的身份要求承认其享有从前塞尔柱克一算端所享有的一切权利，甚至不满足于恢复12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世俗权力的这一事实。最后的诸花剌子模沙要求他们的权力象过去塞尔柱克一算端的权力一样，也得到了报达的承认。

花剌子模自然也处于波斯文化的影响之下。在用波斯文撰述的科学家和诗人当中也有花剌子模人。在花剌子模沙的时代，波斯语是国家的官方语言。但是花剌子模人民群众的当地方言要象在粟特的情况那样，完全被波斯语所代替，那是不大可能的；大抵是花剌子模语仍是人民的语言，只有后来才让位于突厥语。锡尔河流域的殖民区，部分由花剌子模人所建，部分可能由粟特人所建立。这些殖民区突厥化过程应该早些。11世纪时人们也发现这里有突厥人居住的城市，马木特·喀什噶尔著作中[③]提到的乌古斯城市有扫兰和苏格纳，前者马木特作沙布兰[④]，当时是萨曼

---

① 《阿拉伯地理学丛书》卷三，第285页。

② 见《普兰·迦尔宾游记》。参考今之阿合马·泽基·瓦里斯里在《伊斯兰志》上写的论文，托炯《花剌子模论文集》卷三，1927年，第190页以下。——俄译本注

③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364、392页。

④ 同上书，第364页。

（波斯帝国）的边疆城市，今日仍存在，后者是12世纪非伊斯兰教帝国钦察的首都，它的废墟现在称为苏纳克·库尔干[①]。

在扫兰东南，在扫兰和法拉布（或讹打喇）之间有10世纪地理学家所记载的撒夫加城：根据那里被指出的距离来判断，它的位置相当于今日的土尔克斯坦城。撒夫加的名称是伊朗语。但是，人们不知道这个城市在10世纪时是否为伊朗人或突厥人所殖民。根据伊宾·贺轲尔[②]的文献，有关萨曼（波斯）阿哈马（914—943）率领约达三十万大军（这个数目显然是夸大的）远征的报道，即是关于撒夫加这一城市的。如果确是这样，那末，这地方就应该是强有力的统治者的官邸所在地，但是在伊思塔忽利[③]的著作原稿中有关伊宾·贺轲尔的资料在相应的地方，读法完全不同。这就是为什么说人们不知道这次出征的目的是往什么地方，更不用说没有关于这一事件结果的其他资料。除这一撒夫加外，靠近锡尔河还有同名的另一城市，西南方距离奥列阿塔（Aulija Ata)（按Aulija勘误表作Aulija）城有四帕拉森（约25公里）。和这两个撒夫加有关，可举萨马尼[④]和雅古特[⑤]的意见。例如前者（12世纪，提到11世纪的一个作者的意见）"关于和突厥人接壤的边疆"，后者（13世纪，提到12世纪一位著作家因兰尼的意见），"关于突厥城市之一"。

阿合马·耶西维

不论是萨马尼或雅古特都没有述及位于现在土耳其斯坦的地

① 关于废墟位置，参考雅库鲍夫斯基《科学院物质文化研究所通报》卷二，第123页以下，附插图。
详细参考《古斯人的城市》。——俄译本注

② 《阿拉伯地理学丛书》卷二，第340页。

③ 同上书，卷一，第291页。

④ 马哥利奥斯编，《萨马尼系谱词典》，第328页。

⑤ 维斯天菲尔德编，《雅古特地理辞典》卷三，第245页。

方的雅西城或叶西城，虽然这一名称早在12世纪就有了。阿合马·耶西维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他是这里生的，或至少是在这里过活和在这里逝世的。阿合马·耶西维死于回历562年即公元1166年至1167年，根据若干报道，阿合马是赛兰人，但是这自然不能理解为东突厥斯坦的赛里木城，因为以这名称出现的城市在当时还不存在（这一赛里木城是仅在16世纪时由西方的赛兰城移民才建立起来的[①]，而另一赛兰则位于西突厥斯坦今寻干特[②]稍东的地方。后一地方同时以伊斯费遮普和白水胡城而见称）。这一赛兰城早在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③]中有所记载。阿合马在突厥人中得了阿塔·耶西维（父亲耶西维）的绰号，看来他对伊斯兰和伊斯兰教神秘派在突厥人中的扩展有巨大的影响。他的用突厥文写的神秘诗取得了很大的声誉，直到今天仍为中亚的民间诗人所模仿。但遗憾的是，正因为他的声誉，这许多诗不是以原来的面目流传下来的，许多抄写人根据他们的时代精神改变原来的语言，也进行了许多增补。因此，我们所知道的阿合马·耶西维的传记几乎全靠很晚的传说故事，根据这些传说，阿合马·耶西维有一突厥先驱者，他名为阿厮兰·巴巴或称巴布·阿厮兰（大家知道，在突厥斯坦阿拉伯语巴布“bâb”一字是用以表示伊斯兰教士的）·阿厮兰的儿子：曼殊尔·阿塔是第一任哈里发，换句话说就是阿合马·耶西维的继承者。阿合马自己乃是波斯神秘派玉素甫·夏玛丹尼的第三任哈里发，而玉素甫·夏玛丹尼是从夏玛丹来到突厥斯坦，于1140年死于马鲁的，他在这里多年充当苏费教派的司教，领导了神秘派学派。根据他的传记[④]，玉素甫·夏玛丹尼是完全不懂突厥语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使突厥神秘派的奠基人成为他的学

---

① 《札记》第十七卷，第188页以下。

② 《伊斯兰百科》卷一，第891页。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三，第563—564页。——俄译本注

③ 《突厥语词典》卷三，第133页。

④ 伊宾·阿里·忽辛·卡什菲：《生活的基础》。

生。玉素甫·夏玛丹尼的第二任哈里发，换言之即阿合马的直接先驱者是阿布·摩诃米安达奇（Hasan ibn Husain al Andâqî），他死于1157年。他的同时代人和朋友萨马尼提供了有关安达奇的若干资料，但萨马尼对于阿合马的存在却毫无所知。甚至连阿合马的姓"耶西维"在萨马尼的词典中都没有收入①。

象14世纪末由帖木儿（Tamalan，德文本作Timur）为耶西维所修建的坟墓这一堂皇的建筑物所证明，阿合马·耶西维的崇拜，特别是当作突厥圣人来说，长期以来继续保存于锡尔河畔②。在阿合马的学生和继承人当中，人们发现有许多神秘派，他们用突厥文写作和采用突厥语的ata(父)的别号；其中有哈奇木·阿塔或叫做苏来曼·巴奇尔干尼，他的活动和花剌子模有联系。象阿合马一样，哈奇木·阿塔也有用突厥文撰写的神秘派格言的集子，但不是象阿合马作的那样用诗歌，而是用散文的。哈奇木·阿塔的俚谚正象阿合马的一样，是用简洁的语言写的，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写的③。

突厥人和花剌子模的文明

在这几个世纪对花剌子模生活中的突厥化过程引起巨大的兴趣是和下列问题相联系的：即在突厥斯坦（按勘误表作Turkestan）突厥因素递增的优势对文化的衰微起到多大的作用？

欧洲东方学者中德国的著名东方学者诺尔德克以最坚决的态度宣称突厥人是起到敌视文化的作用的。照他的看法，突厥人之征服萨曼帝国是这一国家历史上最可悲的大灾难之一②。最近他在

---

① 《伊斯兰杂志》卷十四，第112页。

② 关于阿合马·耶西维的坟墓，参考查西布金《中亚的建筑》。——俄译本注

③ 关于阿合马·耶西维、苏莱曼·巴奇尔干和他们的诗歌，参考查力曼《关于阿奇木·阿塔的传说》，波洛夫科夫《导论》。——俄译本注

1924年的伊斯兰杂志上再一次论述这个问题，并再次强调，一般说来，突厥人之进入伊斯兰文化界，是伊斯兰的萨曼帝国瓦解后世界上最大的不幸①。但是，花剌子模却提供了文明达到特别高程度的国家的例子，不独突厥政权在这里建立，而且突厥语言在这里同样取得了优势。因此要引用任何事实以证明下面的情况将是困难的，即突厥统治时期的13世纪花剌子模的文化水平要比10世纪和11世纪，换言之即突厥统治以前的时代的水平低。雅古特所提供的关于花剌子模的报道（他是蒙古人侵以前不久即留这里的）证明城市生活的巨大发展和甚至耕地面积的扩大，特别是在花剌子模的西南部。根据其他资料，我们知道花剌子模的商人比以前更广泛的到中亚各地旅行，他们的影响达到更远的国家。例如1218年，有一位名为马木特的花剌子模人，以成吉思汗的大使身份来到花剌子模沙穆罕默德那里。很有可能，这位“马木特”大使就是蒙古时代担任北京长官的马合木·牙喇哇赤（Mahmud Jalavač），而他的儿子马思忽惕伯（Mas'ud,Bek）则管辖中亚的文明地区，Bek的称号和他的两个儿子的纯突厥的人名：沙特尔米什（Satylmyš）和色维实（Sevinč）可以让我们设想，马思忽惕伯本人以及他的父亲马合木从其语言来说乃是突厥人。

花剌子模的精神生活

文化的高度发展，早在11世纪的莫塔齐力的理性神学派的广泛传播得到了证明，这一学派在当地的繁荣情况还维持到13世纪。对此须补充一句，即在花剌子模神学争论是非常机智地进行的，而不采取狂热的信仰的各种表现。如果有人企图以非常粗暴的语言来辩护自己的观点，那末他立刻会被迫中断他的讲话②。

① 《伊斯兰杂志》卷十四，第158页。

② 同上书，卷四，第222页。

当人们看到莫塔奇力派一直保持到蒙古入侵时期就会认识到这一神学派在花剌子模是如何深入人心的，虽然花剌子模由于面对1221年的蒙古侵入者进行了顽强的反抗，受到了来自蒙古人方面非常严重的损害。农业显然再也无法完全恢复过来了，以致14世纪时的耕地也比蒙古入侵以前时期少得多。虽然如此，但是花剌子模的首都，玉龙杰赤（即现在的昆涅·玉龙杰赤，老玉龙杰赤），早在1221年事件后几年在同地附近恢复过来了，蒙古时代的伊斯兰教徒的或欧洲人的旅行家都是把它看成是从前亚和欧洲去远东的商道上的主要城市。1333年访问过这座城市的阿拉伯旅行家伊宾·巴图塔宣称玉龙杰赤是最大的、最重要的和最美丽的突厥城市之一。

花剌子模和位于锡尔河下游的，与其有文化联系的诸城市，乃是文学和科学活动最有生气的舞台，这在蒙古人侵前或以后都是一样。在卡尔·布洛克曼所撰的阿拉伯文献史上引证了在花剌子模及共邻近地区创作的许多著作家的名字以及他们的著作的名称。据我所知，君士坦丁图书馆有可能对这一说明给予充分的补充。他们的著作，绝大部分自然是神学文献，但对这些文献感兴趣的，并不仅仅只有神学家。有人告知我，有一部文献，引用了花剌子模语的词句①。我们希望这一文物不久即可出版②。

在出身于花剌子模的和在这里展开自己活动的12世纪的学者中，我们也看到了象查马克舍里和舍拉斯坦尼那样的名闻世界的学者。显然，人们期待当时那样有名的学者表现出乡土观念和突厥的爱国心是枉然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花剌子模最后一个沙，名为札兰丁的事迹（他于1221年初离开花剌子模，在同年9月逃往印度，1223年后在西波斯进行活动，于1231年反对蒙古的战争中阵亡），是一名为穆罕默德·伊宾·开斯（关于他，我们没

① 《伊斯兰杂志》卷四，第222页。

②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三，第546页，注4。

有别的资料）所写即论突厥语的“大作”（ein grosses Buch），大概是用阿拉伯文写的。据我们所知，这本书恐怕是继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后的第一部论突厥语的著作。可惜穆罕默德这本书没有流传下来，它的存在只由于某些引文得到了证明，在这些引文中有两处见于伊宾·阿勒—穆罕纳在蒙古统治时期所写的著作[①]。

突厥“察合台”语文学

在花剌子模，突厥人显然不独拥有当时当地现有的高级文化，而且也使用学习到的东西以促进突厥伊斯兰教文学进一步的发展。

如果在蒙古以前时代不存在突厥—花剌子模文学的话，人们就难以理解花剌子模和一般说来金帐汗国在蒙古时代在突厥文学史上所占的位置，并且这一重要性越来越清楚。1353年，金帐汗国一位出身于花剌子模的诗人的著作已经用后来即帖木儿汗国时代所称的“察合台”的文学语言来写作了。这部著作不在他出生的花剌子模（他的别号是花剌子美），而是在锡尔河岸边写的[②③]，这位诗人根据我在君士坦丁堡所确定的，有自己的先驱者。它是一部诗歌集子的模仿[④]，这部集子不象花剌子模的著作那样，是

① 关于穆罕默德·伊宾·开斯，参考科布吕鲁在《土耳其学的复兴》卷二，第441页发表的文章。又作《土耳其语言和文学》。——俄译本注

② 不列颠博物馆藏的手稿和萨莫洛维奇的《米尔·阿里·湿勒》，列宁格勒，1928年，第17页。

③ 萨莫洛维奇：《中亚突厥语言史论》，第17页。这里提到花剌子美《诗集》，大家知道有回纥文写的本子（施尔伯克编），有阿拉伯写的本子（那什布编）。关于《爱情之书》的抄本，参考郭洛生的《诗集》；有关花剌子美的创作和全部突厥语的花剌子模和金帐汗国文学以及书目，参考埃克曼《钦察文学》。——俄译本注

④ 巴黎，《古代突厥文库》312号（萨莫洛维奇，同上，第6页）。在库特布中作绍新列夫莱和什林。

在扎你别（Ğānī Bek）的时代写的，而是为他的长兄，有王子称号的第尼别（Tinî Bek）写的，这就表明作者是早在月即别汗的时代写的，月即别汗是第尼别王子的父亲，换言之，即早在1340年以前写的①。大家知道，克里米亚在蒙古以前的时代里，居住的并不都是穆斯林，但在那里居然写了一部关于“玉素甫和祖莱霞”的诗，这是我们从译为南方突厥的文学语言的一部书中知道的②，这种文学语言属于蒙古时代，后来被称为奥斯曼语。还有其他的翻译：如埃及在15世纪时曾将神学家阿布·纳色布·撒拉克西的著作翻译成南方突厥文，这种翻译同玉素甫和祖莱霞故事的翻译一样是从鞑靼语，换言之，即金帐汗国的文学语言翻出来的。

13世纪后半叶有一位渊博的神学家名为忽三木丁·巴尔申力基的住在锡尔河下游的巴尔什干特的城市（它同时以巴尔京和巴尔申力基 Barčyn 和 Barčynlygh 的名字著称），巴尔申力基用三种文字写作，根据熟悉这位学者的扎马尔·卡尔希的报道，他的著作是用阿拉伯语（雄辩的）（Fasih）波斯语“敏慧的”和突厥语“真实的”三种文字的③。据我们所知，把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三种文学语言加以比较，这还是第一次。

扎马尔·卡尔希出生于阿力麻里。他大约生于1230年，后来多半时间在可失合儿度过。他以胡赛姆·阿特丁的名字见知于巴尔什干特，他于回历672年即公元1273—1274年去巴尔什干特④，并在那里结识了忽三木丁。

扎马尔·卡尔希的叙述指出金帐汗国的文化还在13世纪时就

① 萨莫洛维奇：《中亚突厥语文学史论》，第6页，又参考査雅兹科夫斯基的《突厥文本论》，1—111（复制版，是金帐汗国突厥语文学最伟大作品，库特布长诗《绍斯列夫和什林》拉丁文转写和字汇）。——俄译本注

② 华里夫（P. Falev）出版，见《东方学家协会札记》卷一，第139页以下，根据哥塔抄本。提要见前；何兹马：《东方学杂志》第43卷，1889年，第69—98页，作为附录再刊于马冬库里词典中（伊斯坦堡，1340年）。

③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原文）卷一，第151页。

④ 《札记》卷十一，第287页。

影响了突厥斯坦的文化。这一影响的事实直到最近还完全不为中亚的突厥人和欧洲的学者所认识。16世纪初，八八儿（Bābur）认为察合台古典诗人阿里·池勒一纳瓦依的著作是用费尔干纳地安集延城通行的语言写成的。1888年拉德洛夫[①]力图证明八八儿是错误的，而察合台语是人为的文学语言，和某一地方流行的语言没有任何的关系。根据拉德洛夫的意见，这种语言的来源与东方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有密切关系。首先是通过回鹘的文学语言来实现的（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有鄂尔浑碑文），一直追溯到用"纯粹回鹘文字"编写有关先知史一书的1310年。同一文学语言在金帐汗国领土内的普及，得到了托克塔迷什和帖木儿·库特鲁克所提到的雅尔力克语言的证明，那是属于14世纪末期，拉德洛夫则置于14世纪。根据他的意见，这种雅尔力克语言是由"那些掌握察哈台文学语言"的人来写的。在这时候，还不能认为察合台语本身只是和金帐汗国对突厥斯坦的文化影响有关，而不是相反的[②]。

花剌子模诸沙的征服计划

察合台文学语言的形成，如果没有蒙古人的入侵，那是不可能的。大家知道，13世纪蒙古的入侵在世界史上占有一个异常的位置。不管游牧民族掠夺文明国家是件常事，但我们不知道除了蒙古在很短的时期里成功地征服了远东、前亚和东欧的诸文明帝国之外还有别的事例。那是很自然的，即在被蒙古所征服的各国，人们都在撰写有关蒙古人的事，以致我们在历史资料中找到

① 《札记》卷三，第1页以下。

② 以14—16世纪中亚文学而闻名的突厥语，在苏联突厥语学文献中采用了《老乌兹别克语》的名称。关于这一语言及其文献，参考施尔伯克《老乌兹别克语语法》。——俄译本注

有关蒙古史的资料比较其他历史时期还要多。同样，西欧科学界对于蒙古帝国的注意也比中世纪东方几乎所有其他历史上的帝国都多。我们还不能认为有关这一帝国的形成诸问题都搞清楚了。同样，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成吉思汗帝国和花剌子模沙·摩诃末之间的冲突问题特别是和胜利者成吉思汗的征服计划联系来看，人们往往藉此企图证明，这一计划如果不是由于外来的影响支持的，那就是说报达的黑衣大食哈里发纳西勒的影响。直到现在，科学文献中的代表意见是，哈里发请成吉思汗来反对花剌子模沙，但是如把有关这一战争的伊斯兰文献对照看，甚至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战争是由于花剌子模沙的征服计划所促成的，而与成吉思汗无关。

最后的花剌子模诸沙要求伊斯兰算端承担的责任，不但是保护伊斯兰帝国内的信仰和正义，而且在有利的条件下也从异教徒的统治下把伊斯兰教徒解放出来。在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统治时代促进这一任务的实现的，是古尔汗（即哈喇契丹）帝国的崩溃和在他们支配下的伊斯兰教地区若干地方所产生的暴动。有关这些暴动的原因和情况我们没有掌握精确的资料，起来反对古尔汗的第一个伊斯兰教统治者大抵是忽炭（和田）的算端。关于这一统治者无疑是突厥人和伊斯兰教徒，只有在这场合才被提到。我们也没有蒙古以前时代在忽炭所铸造的任何货币。大约在同一时代，古尔汗帝国西部的居民，在不花剌进行了暴动，他们反对古尔汗的统治，同时也反对当地专制君主的统治。在这件事稍前，不花剌对驻在寻思干的突厥汗完全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不花剌的全部权力转入于布尔汗王朝的手中，舍特尔（Sadr），伊斯兰教学者的领袖是这里产生的。这些舍特尔直接隶属于哈喇契丹的古尔汗，有权亲自把贡品交给古尔汗，换句话说，即对其采取最温和的臣属形式。这种形式无论在哈喇契丹的历史上和在后来的蒙古帝国的历史上都存在。舍特尔的统治由于群众暴动而宣告瓦解，

这一暴动一般是针对当地的贵族阶级的，领导暴动的人是属于手工业阶层的，他被指控为对过去当权者的残酷迫害，因而这一暴动的性质就非常清楚了。值得注意的是，舍特尔虽拥有支持其权力的宗教权威，但是为了镇压叛乱转向异教徒的哈喇契丹的斡耳朵（首都）请求援助。哈喇契丹满足了他们的请求。但不是给予军事援助，而只通过一纸公文、指令和公告来表示支持，由于古尔汗帝国全面的崩溃，这些公文不再起到任何的作用①。

花剌子模沙摩诃末利用了不花剌发生的事件，于1207年秋向哈喇契丹发动了第一次进军。人们也许可以期待，他会支持也反对古尔汗统治的群众运动，但是情况却不是那样。在不花剌发起暴动的首领显然没有能力抵抗花剌子模沙的军队，反被后者俘虏押往花剌子模去了。当时花剌子模沙就着手和古尔汗的诸侯，寻思干汗进行谈判。

在寻思干的哈拉汗朝最后两个可汗：易卜拉欣和他的儿子鄂斯曼拥有"算端的算端"的崇高称号，并在伊布拉欣汗的货币上发现除阿拉伯的称号外还附加有突厥语的形容词乌鲁克（"伟大的"）；两个汗的货币除了证明他们的王朝是来源于突厥人之外，是不可能有其他的特征的。只有从他们同时代的波斯人奥费的著作中，我们才知道易卜拉欣和鄂斯曼的全衔是乌鲁克·桃花石汗和乌鲁克·阿厮兰汗·可汗。我们也没有资料表明，在两个可汗的军队和臣民中突厥人的成份占多大比重。值得注意的是，泽拉夫善河最终流入的湖泊在当时已命名为"哈喇库尔"，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即不花剌地区，至少在最接近沙漠和花剌子模的地区，当时已经有若干突厥人的成份了。

花剌子模沙1207年的进军没有取得重大的成果，这显然是由

---

① 关于出典见《突厥斯坦》（英文版），第355页。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一，第420页；同时参考本文集卷二下册，第515—518页，以及其他的新著。——俄译本注

于暂时征服的地区重新被迫置于古尔汗的支配之下，只有到了1210年秋花剌子模沙摩诃末才在塔拉斯附近地方打败了哈喇契丹的军队。这一胜利不完全是决定性的，它没有把古尔汗和花剌子模沙的伊斯兰教臣民联合起来。花剌子模沙甚至未有能够对起来反对过古尔汗的八拉沙衮的居民提供援助。但是不管怎样，花剌子模沙却利用了自己的胜利给自己的统治权带来了新的光辉。他称自己为算端·桑撒儿，即塞尔柱克王朝最后的大算端的名字。另外，他又采用亦思干答儿的，换言之即阿历山大的名字，因而清楚地表明，他力图征服全世界，而不仅是一个伊斯兰算端所应有抱负的那种程度。

鞑　靼

但是哈喇契丹的命运与其说是决定于花剌子模沙的行动，不如说是决定于蒙古的，或者当时人们称为鞑靼的到来者多，根据历史家伊宾·阿勒—阿提尔的描写，首先是被成吉思汗驱逐出蒙古的"最早的鞑靼"的到来，其后才是成吉思汗本人的军队。

历史家剌失德丁认为鞑靼这一民族的名称在蒙古以前时期已广泛传布，这和居住于捕鱼儿海(贝尔湖)岸的原来所谓鞑靼的强大是有联系的。今天，我们知道"鞑靼"一名的广泛传布时间要早得多：它的传布始于鄂尔浑碑文的时代以后，换句话说就是8世纪以后。在10世纪我们在杜曼斯基的手稿中和11世纪在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中发现这一名称。人们在开始时大抵也把操蒙古语的各族称之为鞑靼。从剌失德丁和其他资料所引证的事实来看，人们可以证明当时蒙古语和突厥语的界限，大概和现在的界限差不多。操蒙古语的是包括从鄂尔浑河直至额尔齐斯河上流的全部西蒙古的乃蛮人和甚至他们北方的邻居，即居住于谦河河源的斡亦剌惕人，后者的名称被叫做色奇孜没辇（八河)。表明在

这里蒙古语和突厥语是混在一起的。色奇孜突厥语是八的意思，“没辇”蒙古语是河流的意思。在斡亦剌惕人的北方，居住有操突厥语的吉利吉思人，他们在叶尼塞河岸，或者象为突厥人所常称的河流的谦河河岸。额尔齐斯河岸的乃蛮人的邻居是操突厥语的康里，钦察以及可能是哈剌鲁，它的首都是在12世纪以前还未修建的海押立，位于哲第苏（七河）地区的北方。

蒙古诸部落占领从南到北，从中国万里长城和直到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他们处于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人区别鞑靼为三大类：白鞑靼是在南方，与中国比邻，稍北的是黑鞑靼和最北的是生鞑靼，或者象蒙古人自称的森林民族。同黑鞑靼区别的是，森林民族不是游牧人，而是狩猎者。

从这角度来看，有关13世纪蒙古部落的所在地、生活风俗的报道，其资料是比有关突厥的过去的资料要丰富得多和方面更广些。在汉文资料和其他资料中都没有提到除了游牧民的突厥人之外是否还有突厥的狩猎民族，也没有提到草原民族和森林民族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只有格尔德齐有关吉利吉思人和他们的东邻的若干叙述是个例外。剌失德丁的著作使我们了解到萨满教原来不是游牧民的宗教，而是狩猎民族的宗教，甚至在他的时代，换句话说即蒙古的时代也还是这样。生活于北方森林地区的萨满被看作是最有才干的萨满。至于有关森林的乌梁海部落，他们是具有特殊的萨满能力的部落，在剌失德丁的著作中引用了一段记事，证明游牧民的生活在狩猎者的眼中看来，是难以忍受的奴隶生活，正如定居农民的生活在游牧民的眼中看来是难堪的奴隶生活一样①。

① 原文见《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卷七，第114页。

成吉思汗的登位

在成吉思汗的支配下[①]统一蒙古以前，在蒙古游牧民中内战起着主要作用，虽然狩猎民族也有部分参加了内战。这一内战的主要特征，同今日所证明的一样是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草原贵族和环绕在成吉思汗过去的朋友札木合周围的人民群众之间的战争，札木合后来成为成吉思汗的仇人，并仿效哈喇契丹统治者，自封为古尔汗[②]。札木合成功地在个别蒙古族的领袖和可汗中间一再给成吉思汗增加新的敌人。但是这一战争是以札木合的一切追随者和同盟者的部分被消灭，部分被逐出蒙古而告结束的。

札木哈参加的，反对成吉思汗的最后一战是在1204年发生的。据蒙古史料，札木合最后于1205年被引渡给成吉思汗和被处死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家术外因说到有一个名为古尔汗的英雄，首先是为成吉思汗服役的，后来站在伊斯兰教徒一边，最后于蒙古占领不花剌时遇害[③]。札木合可能不顾蒙古的传统，去花剌子模沙的帝国那里找避难所。

在成吉思汗的蒙古敌人当中有居住于色楞格河附近的蔑儿乞人和迁往西方的乃蛮人。无论是前者或后者最后都被成吉思汗于1209年所击败。这一年，他们分开了，蔑儿乞人采取北道，来到了钦察国，而乃蛮则来到了哈喇契丹帝国。

乃蛮和蔑儿乞人从前都是受到了基督教宣传的影响。除此之外，乃蛮象我们上面所指出的，还采用了回鹘文字。突厥人对蒙古的文化影响还得到其他许多事实的证明，其中有许多姓氏和称

---

① 关于成吉思汗，详见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卷一，第892页以下。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615—628页。——俄译本注

② 参考《伊斯兰百科》卷一，第893页。

③ 《吉伯纪念丛刊》，第廿一辑，第80页。gurchan的读法是不确切的。

号为蒙古来源的民族所使用。关于伊斯兰教信仰宣传的资料我们不掌握，虽则伊斯兰教商人在成吉思汗的牙帐，甚至当其滞留在东蒙古的时期就已存在了。早在成吉思汗的时代有蒙古人伊斯兰教徒的几乎唯一的暗示，是我们在蔑儿乞人首领的名字中，即成吉思汗妻子的兄弟的名字中找到了，那就是哲马尔 火者。①

在同蔑儿乞人和乃蛮人的战争时期中，第一个归顺于成吉思汗的突厥民族，就是叶尼塞河附近的吉利吉思人。后来他们起来反对他，这一反抗在1218年为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所平定，术赤是在冰上越过叶尼塞河的。依据阿拉伯地理学家的报道，当时已没有吉利吉思可汗了，与8世纪的情况不同了。整个民族分为两部分，其中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领袖，但是无论是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都没有称“汗”的。接着，吉利吉思人连自己过去曾经有过汗的称号的事也忘记了。拉德洛夫在哈喇吉利吉思人那里听说到一个传说，根据这一传说，吉利吉思人曾向“大汗”，换句话说即成吉思汗请求派给他的长子术赤为君主。当时术赤还是个小孩，遭到一群野驴的袭击，被吉利吉思人救出。阿克沙克·库兰·术赤汗（意为跛脚的野驴）是吉利吉思人最初和最后的汗。虽说这个故事是带有幻想的性质的，但它却保存了有关吉利吉思人归顺于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子术赤的回忆录，甚至库兰的故事也许就是有关下列诗句的传说的回声，即成吉思汗在听到他的儿子术赤死讯的时候，用所谓突厥语来朗诵：

正如库兰在猎人追击时失去自己的幼畜一样，我和我的儿子永别；

正如向四方纷纷飞散的群鸭一样，我和我英勇的儿子长离②。

---

① 《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卷七，第96页，卷十五，第197页。

②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原文），第163—164页，根据《突厥系谱图》。

花剌子模沙的衰微

1209年，即花剌子模沙打败哈喇契丹的前一年，比较文明的突厥民族的领袖回鹘的亦都护归顺了成吉思汗，在这以前他一直是对哈喇契丹保持属国的关系的。这件事和追击逃往西方的敌人的成吉思汗相联系。蔑儿乞人和乃蛮人想通过亦都护的土地，但是遭到亦都护方面的强烈反抗，并被击溃了，这比其他一切因素都重要，使得一直保持协同行动的这两个民族不得不分开了。到了1211年，换句话说即企图把伊斯兰教徒从异教徒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花剌子模沙胜利后的一年，古尔汗另外的一个诸侯，伊斯兰教的统治者阿厮兰汗哈剌鲁的君主宣布归顺成吉思汗。

这一事实证明了花剌子模沙的权威的下降，甚至在中亚的伊斯兰教徒中间也一样。一般说来，作为统治者花剌子模沙的个人性格同他的崇高称号以及他的统治的外表光辉是完全不相称。在他征服下的各国完全不能维持军队的纪律和保护人民免遭军人的暴行。说明这一点的是下列富有特征的事实，即1212年出现于花剌子模沙和寻思干之间的决裂，后者重新站到哈喇契丹这一边。在术外因有关这一决裂以前所举行的谈判的记事中，它的详细情节特别引人注意。寻思干汗与花剌子模沙的女儿结婚以后，花剌子模沙的母亲想尽可能长期地把寻思干汗留在玉龙杰赤，这会得到一个古老突厥风俗的支持。根据这个风俗女婿在结婚后第一年必须在岳父的家里度过。当汗回到寻思干的时候，寻思干汗得到自己首都居民的完全支持，起来反对他的伊斯兰教的解放者，即反对花剌子模沙本人，而花剌子模沙是把他从古尔汗的统治者中解救出来，花剌子模沙须用大量流血的代价去平息这一暴乱。

在这事件以后，花剌子模沙的边境，是从费尔干纳直到咸

海①广大的锡尔河的沿岸地区（右岸也包括在其中）。过去在哈喇契丹支配下的(除了归顺成吉思汗的，最北部的哈剌鲁汗国外)其他的伊斯兰教地区，都在来自东方的乃蛮领袖屈出律政权的支配下。屈出律是个基督教徒，根据若干报道，到了哈喇契丹国内他崇拜偶像了，换句话说，大概是改信佛教了。屈出律于1211年，即在寻思干汗反抗花剌子模沙的暴动前，占领了古尔汗的帝国。花剌子模沙和屈出律交锋，但是没有结果。根据伊宾·阿提尔和雅古特的报道，他被迫把几个自己已占领的地方：白水胡城即赛兰、塔史（塔什干）和费尔干纳的北部让给屈出律。当他离去这一地方时，已将该地掳掠一空。这或者也是花剌子模沙的意图。但是他要这样做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在不满十年以后的时期，即蒙古侵入的时代，这一地区并没有完全荒废。

值的注意的是，虽然蒙古和突厥斯坦相距很远，从1211年以后便和中国作战，但是成吉思汗在中亚所树立的权威要比伊斯兰的算端的权威强大。在这个时期，即大约在1211年事件之前不久发展起来的阿力麻里城今固尔札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的伊斯兰教公国。这个公国的奠基人从前是个强盗和窃马贼，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直至14世纪初期还兴盛的王朝的祖先。他一开始是臣服于成吉思汗的。后来屈出律成功地在打猎时把他捉住并将其杀死。但是被害者的未亡人成功地保卫了阿力麻里城反对屈出律军队的入侵，直至来自蒙古的援兵的到达。

屈出律大概没有企图反对成吉思汗其他的诸侯即哈剌鲁阿厮兰汗，他把全部兵力转向到可失合儿。当他侵占了这个地区以后，这里出现了中亚历史上最初和最后一次对伊斯兰教的迫害。人们报道了屈出律关于强迫伊斯兰教徒穿着哈喇契丹衣服的命令和禁止他们举行他们的宗教仪式，此外，人们还记载了杀害忽拨

① 《伊斯兰百科》卷一，第436页。

的一个教长（伊马木）和乃蛮军队驻在伊斯兰教徒的家中，他们显然是监视伊斯兰教徒是否严格遵守政府法令。即使在这种情形下，伊斯兰教徒也得不到伊斯兰算端的任何援助，换言之即得到花剌子模沙的援助，而这种压迫只有在1218年，蒙古军队的到来才得到了解除。

同蒙古人周旋

花剌子模沙在这个时期内继续进行对异教徒的战争。但是他打击的对象是个力量较弱、组织较差的敌人，即在锡尔河北地区的钦察人。在伊尔吉兹（Irghiz）附近的地方发生了花剌子模沙军队和在术赤领导下的蒙古人之间的几次偶然性的冲突。而蒙古人是追击逃往西方的蔑儿乞人的残余的。

尽管失败，但花剌子模沙仍继续在做享有世界征服者声誉的迷梦。他希望能逐渐征服中国，因此当他听到北京1215年①为成吉思汗占领的消息时感到愤怒。为了核实这个消息和搜集有关成吉思汗成功的总的情况，他派遣曾经在中国遇见成吉思汗的巴哈丁·拉兹为使者到成吉思汗那里去，有关这一使节的记事是由历史家朱孜章尼从使节的本人口中传来的，没有引起任何怀疑。派遣使团到蒙古的征服者那里去的，也不是哈里发纳西勒，而是花剌子模沙本人。

大家知道，这些事件后来是怎么演变的；同上述使团无关的花剌子模沙的帝国的队商来到成吉思汗旁边，蒙古派遣回访的使团和回访的队商，花剌子模沙接待了使团，他一天夜里独自接见了名为马木特的花剌子模人使者，全属伊斯兰教徒的商人在花剌子模的边境城市讹打剌遇害。

---

① 土耳其版原文作1225年。

特别突出的是，花剌子模沙要求在花剌子模出生的马木特承认自己是理所当然的算端的臣民，要求他向自己报道有关成吉思汗帝国的一切必要的消息。这种要求从一个现代欧洲人的观点看来是极其自然的，例如英国政府会毫不踌躇地派遣任何一个英国人去到野蛮或半野蛮民族的地方去临时服务。但是中世纪的伊斯兰教商人却不承认和他们所出生的地区的政府有关系，不觉得有什么理由要帮助伊斯兰教统治者去实现他们的战争计划。这情况很可能是造成来自蒙古的伊斯兰教商人在讹打剌复灭的原因之一。

无论如何，在讹打剌事件之后，蒙古的进攻花剌子模沙帝国变成了不可避免的了。而不会是由于哈里发纳西勒或其他任何人煽动蒙古人而引起的。由于哈里发和花剌子模沙之间存在着敌对关系，必然就有关于哈里发的主使的种种谣言，我们知道，对于哈里发的此种责难，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儿子和继承人札兰丁早就说过了。但他没有提供有关的明确证据。成吉思汗之出征伊斯兰各国是讹打剌事件直接的结果，同样，伊斯兰教商人对成吉思汗表示充分合作，也是很自然的，象我们以后看到的，他们在蒙古军队胜利后所建立的新秩序中取得了最大的利益。

·第九讲·

金 帐 汗 国

蒙古统治下的突厥斯坦。蒙古王朝"金帐汗国"的成立。

有关蒙古侵入突厥斯坦的事件的各种报道是有些矛盾的。甚至有关以下问题的资料报道和学者的意见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即花剌子模沙的军队和术赤的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和以蒙古军队的撤退告结束的事件是在讹打喇事件之前或之后发生的。在花剌子模沙摩诃末帝国中存在有大量的诗歌主要是用波斯文写的，内容也涉及政治事件，我们知道的这一文学作品只是简短的引文。属于这种文学作品的有雅古特所引用的，据说是花剌子模沙摩诃末自己作的[①]阿拉伯文诗句，内容是关于离开河中地区[②]被洗劫的情况。奥费曾论述一首史诗体裁的诗，即诗人马质德·阿特丁·摩诃末·帕孜的《王中之王纪》。奥费在回历600年，即公元1203—1204年在阿什哈巴德西边的[③]、今突厥斯坦的尼西城[④]看见他。这是有关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统治下的事件的诗歌。此外，同样也是奥费所引用的诗人奥马尔·科列木·阿巴底的诗句，这首诗把沙摩诃末颂扬为第二亚历山大的诗中言道：要知道，契丹犯了错误，这是契丹(Chitai)名称和阿拉伯语表示"错误"一词之间的文字游戏，他

① 土耳其版原文，"为花剌子模沙而写的诗句"。
② 雅古特、维斯天菲尔德编：《地理词典》卷一，第250页，卷三，第234页。
③ 原文有在尼西河畔。
④ 布朗编：《诗集》卷二，第345页。

们在寻找机会和你们的军队冲突；如果他们要寻找冲突，那末他们无疑的会体会到这是自己愚蠢的结果。对全体鞑靼人来说，那是明如白昼的，如果他们不遵守你的命令的话，那白昼会立即变成黑夜[①]（Tatar和târ的文字游戏）。人们不知道这里说的是指同成吉思汗及其蒙古人的战争或者是指同"最初的鞑靼"，换句话说就是同屈出律和乃蛮的冲突。

在伊尔吉兹河畔的冲突并无进一步的结果。在这场合，侵略者是花剌子模沙，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的军队都不希望这次军事冲突。花剌子模沙在这个地区是和钦察作战，而术赤在这个地区是和蔑儿乞人作战。术赤甚至使人告诉花剌子模沙，他没有得到他的父亲要和他打仗的命令，但是得到的回答是，算端把所有的异教徒都同样当作仇人来看待。

对于算端来说当战争变成为防御战争的时候，人们便努力于把保卫伊斯兰领土为目的战争提高到为反对异教徒的战争，虽然战争的原因是由于在花剌子模沙国土内杀害了伊斯兰教商人而引起的，虽然可失合儿的蒙古军队的首脑在1218年恢复了伊斯兰教信仰的自由。此外，在蒙古军队中还有系出海押立和阿力麻里的伊斯兰教支队，而为成吉思汗服务的伊斯兰教商人还没有计算在内。在这些商人中当时的确不包括塔吉克人和突厥人在内。蒙古人把所有商人都用突厥语ortaq一词[②][③]即称之为伙伴，这显然是因为商人为了装备商队组成行会的缘故。

花剌子模沙的军队是由各个民族代表组成的。在河中的首都寻思干的驻军中有一个特点是，突厥人和塔吉克人的人数，据术外因的著作是大约相等的（60,000突厥人，50,000塔吉克人），民

---

① 《诗集》卷一，第292页。

② 《伊斯兰百科》卷一，第893页。

③ 巴托尔德：《成吉思汗》，第893页；《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618页。——俄译本注

族之间的纠纷可能或多或少地影响这一军队的稳定性。关于13世纪花剌子模和玛拶答而的纯伊朗人地区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历史家提到在突厥人和塔吉克人之间不能有真正的友好关系①。还有一个特点是突厥人和伊朗山区土著居民、哥疾宁的哥尔人之间的冲突。突厥的首领想和哥尔人的首领建立友好关系，后者回答说：我们是哥尔人，你们是突厥人，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②。

突厥人比之其他民族的人民，自然是更近似于蒙古人的。此外，在成吉思汗军队中有好几个突厥支队。还有一般的中亚民族游牧民传统都是把突厥人看成是和蒙古人比较近似的。尽管这样，我们看见蒙古方面没有任何尝试要和突厥人联结成友好关系，并把他们看作是他们征服事业的共同参与者。当他们偶尔和突厥人进行谈判时，那也不过是蒙古人习见的一种战争诡计而已，通过虚假的友好关系，使得敌人分裂，以便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甚至其中也包括他们从前称之为朋友和同盟者在内。成吉思汗甚至和花剌子模沙的母亲结成友好关系（她当时和他的儿子交恶），以防止掌握许多突厥支队的这位女统治者干预战争。但在围攻寻思干的情况下，蒙古人即宣称，接纳花剌子模沙的舅父，即他的母亲的兄弟所率领的驻屯地的突厥军队来为自己服役。但是当夺取这座城市之后，据称突厥人中约有30,000人在20名指挥官的命令下被包围于一个平地上并被屠杀了。相同的情况也见于达格斯坦，在那里阿兰人和钦察人结成联盟来反对蒙古人，而蒙古人把钦察人当成突厥人，对他们说："我们和你们都是同出一个部落，但是阿兰人不属你们，你们不应帮助他们"。当钦察人接受蒙古方面的礼物之后，便离弃了阿兰人。但是当蒙古人打败了阿兰人后，便立即转向钦察人，并向他们索取两倍于他们从前所给予的东西。

① 多朗（Dorn）编：扎希布尔丁书，第253页以下。

② 原文见《吉伯纪念丛刊》第十六辑，第二卷，第193页。《突厥斯坦》，英文版，第439页。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一，第506—507页。

当波洛夫谢尔人即钦察人向他们的世仇斡罗思人寻求帮助的时候，蒙古人也开始向斡罗思君主保证，他们无意侵入俄国土地，相反的他们只是反对他们的仆人、马夫、污秽的异教徒波洛夫谢尔人[1]，换句话说即是库蛮人，因为他们给斡罗思人造成了许多损失。蒙古人同样地在一个时期内在前亚同以后由于蒙古的入侵而遭到覆没的统治者进行谈判，例如亦思马因派和报达的哈里发。算端扎兰丁大约在1126年从伊斯法罕给在阿哲尔拜占活动的首相一道命令，要他查询来自叙利亚的商队，因为根据他所得到的情报，有一个鞑靼使臣带着亦思马因派的商人经由报达来到了叙利亚，扎兰丁需要一个证据，根据这他就可以责难个别君主或哈里发政府和鞑靼人有联系。但是，他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证据，虽说他的首相不但对于搜查，而且对于完全消灭亦思马因商队也不畏缩。因此，他后来使得自己的统治者处境非常狼狈[2]。尽管如此，但是有关谈判的谣言也许仍和实际情况相符。

如所周知，花剌子模摩诃末1220年死于里海的一个岛屿上，在和蒙古的战争中毫无作为，以致于他的名字在蒙古人的印象中不留下一点痕迹。在战争时期和这以前的时期，花剌子模沙政府的一切行动，其中也包括有关在讹打剌的遇害，按照蒙文的资料都归咎于摩诃末的儿子和继承人：扎兰丁。扎兰丁1221年11月逃亡到印度，事实上就是战争的结束，虽则也提到往后几年的暴动受到镇压和若干山上堡垒之被攻占。1223年夏，成吉思汗离开了突厥斯坦，1224年夏在也儿的石河附近度夏。甚至在成吉思汗生前（他是在1227年去世的）扎兰丁又回到伊朗来了。过了一个时期，即1228年，蒙古人在离伊斯法罕不远的地方打败了扎兰丁，但是在这一战役中，蒙古损失异常惨重，以致被迫离开伊朗。扎兰丁的军队追击到阿姆河，但是并不企图去动摇蒙古人在花剌子

---

① prosit' svoich cholopovi konjuchov, poganych Polovcev。

② 斯达斯编，纳西维书，即纳西维的《泽拉尔·埃丁史》，第158页。

模和河中地的统治地位。

根据上述的一切资料，蒙古的征略是和对居民的恐怖屠杀相联系的，欧洲的学者一般只注意于游牧民对文明各国的居民的大屠杀。事实上，游牧民的政治统一只有经过长期和血腥的战争才能取得，有时是和有计划的歼灭全民族相联系的，以致于不容易说明被成吉思汗军队所杀害的人数，是否在草原的比在文明国家的要多。同样也不容易证明蒙古的征略只对游牧民有利，而对定居的居民有害。蒙古人的远征不同塞尔柱克人侵入前亚的例子，是和全民族的迁徙没有联系的；绝大多数的蒙古人仍然留在蒙古，那里也是成吉思汗再次回去的所在，在他去世后有30年以上①仍是他的继承人的邸宅所在地。在公法的范围内，采用了在蒙古私法中占统治地位的原则，按照这法则父亲生前就把财产相继分给年龄较大的孩子们，而家产则以后遗留给年纪最幼的儿子。因而成吉思汗的本帐(Stamm-Jurt)②蒙古，是传给他最小的儿子拖雷的。蒙古的常备军有129,000人，而拖雷得到其中的101,000人。这数字清楚地表明，迁往其他国家的蒙古人数字和留在蒙古的人数对比起来，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金帐汗国的形成

蒙古以西的广大的略得地分给成吉思汗的三个大儿子，其中每人只得常备军4,000人，其他16,000人是分给汗国的其他成员。他的每个儿子的领地界线只有极漠然的规定。正如最年幼的儿子

---

① 原文误作40。

② jurt意为"土地、财产"，今奥斯曼语仍为"故乡"意，只有俄文作帐幕的意思。但是马洛夫《碑文》，第390页指出，Jurt除了表示"土地"，"国家"，"故乡"之外，还有古突厥语"家"、"宅"的意义。关于蒙古语中jurt这一术语，参考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第57—58页。——俄译本注

得到的是父亲的财产一样，而长子术赤所得到的是距离最远的被征服地。因而随着成吉思汗成就的进展，术赤的领土越来越向西方推进。当成吉思汗仅仅统治蒙古的时期里，术赤分得的土地是色楞格河以西地区。当西方被征服的时期，便规定为"蒙古人马蹄所及的边界"，所有土地都是属于术赤的分得土地。在成吉思汗生前，从也儿的石河以西的钦察草原（其中包括蔑儿乞人残余被消灭的地区），直到窝勒伽一不耳阿里帝国的边境都是属于术赤的领地。成吉思汗死后，术赤的后继人的领地是此地全部以及斡罗思公国全部领土（蒙古之侵入波兰、匈牙利和其他西欧地区，虽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但没有长期占领）。

术赤的后裔对高加索以南和里海以西各国也提出了要求。这一要求是引起术赤后人和由蒙古1256年以后在波斯所建立的帝国之间频繁战争的原因之一。在对哈喇契丹和花剌子模沙国家的进军中，即从也儿的石河沿着西南方向直到阿姆河和更远地方的出征中，除了锡尔河下游以及花剌子模的诸城市外，是谈不到这些国家和术赤帝国的联合的。但是正因为花剌子模是术赤帝国的组成部分，所以他于1221年努力设法（虽然是徒劳的）把玉龙杰赤从其受到毁灭的危险中解救出来。

下列的事实是具有很大的兴趣的，即窝勒伽河流域地区和阿姆河下游各国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也就是说在过去已有紧密的文化联系的各国，他们无论在这以前和以后直到突厥斯坦为斡罗思所征服时为止，从未达到统一于一个国家中。到了14世纪上半叶，花剌子模同窝勒伽河流域的联系比较同锡尔河地区的联系要密切得多。在月即别汗时代，有这个汗的名字的货币，同时在窝勒伽河流域诸城市和花剌子模境内铸造，而在苏格纳这一时间，则铸有其他的汗的名字的货币，他们是术赤的后裔。在开始时哈喇契丹帝国的北部地区：包括海押立城在内的七河流域的一部，和一般从也儿的石河到阿拉湖以及到伊犁河和锡尔河的整个地区，

也是属于术赤及其一家的领土的组成部分。在普兰·伽尔宾1246年旅行时，术赤的长子鄂尔达就是生活于这个地区的东部，可能就在离也儿的石河不远的地方。西部显然是指伊犁河和锡尔河之间地区，属于术赤的幼子昔班（Syban），根据伊斯兰教的文献资料，昔班的名字后来改变成Saiban，这即是16世纪初昔班的后人突厥斯坦月即别帝国的奠基者采取了昔班尼（Saibânî）这一诗人名字的原因，而昔班尼（Saibânî）和阿拉伯某一部落的名称相合，它之更为闻名是由于以下的事实，即它是汗尼菲派，阿布·汗尼华和阿布·玉素甫的学生、著名的教法学家的姓名。很有可能，在伊斯兰世界这一很常见的人名，即从Šyban一名变成Šaiban和出现Šabânî一名的原因[①][②]。

根据阿布哈齐所引用的传说，昔班从他的兄弟拔都[③][④]获得属于拔都本人的土地和鄂尔达的土地之间的地方，作为条件是，他夏天必须在伊尔吉兹、鄂拉、伊列克的岸边，一般说来，是在耶亦克河和乌拉尔以东的地方度夏；冬天必须在锡尔河、楚河和塞雷苏河（Sary Su）岸的喀喇库木、阿拉库木地方过冬。阿布哈齐是一个晚至17世纪的著作家，他没有提到他的资料的来源，但是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他的陈述大体上和鄂尔达，拔都和昔班同时代的普兰迦尔宾的报道相一致。昔班的后人也在别的地方展开活动。根据剌失德丁的陈述[⑤]，担负守卫铁列克（Terek）边防职责的就是昔班的孙子。但是昔班的领土直到15世纪仍在他的继承者的手中，他的系谱据阿布哈齐和15世纪一位匿名的历史家，即系谱著作的编者，并无很大的矛盾。

---

① 关于昔班王朝，参考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卷四，第294页。
② 《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下册，第545—548页。——俄译本注
③ 参考《伊斯兰百科》卷一，第709页以下（Bātū）条。
④ 《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下册，第496—500页。——俄译本注
⑤ 布洛什编：《剌失德史》，第117页。

金帐汗国和游牧民的传统

游牧生活在术赤领土的各个部分中，尤其是属于昔班后人的地区中占优势。虽然这样，但是就是这个地方，政权能在200多年长久的时间内仍保留在同一汗国的成员的手中，这在游牧民中是很罕见的现象。因昔班的继承人与城市文化接触得最少，从而他们仍然最忠于游牧民的战斗传统，所以在成吉思汗王朝的势力已经到处陷于几乎完全崩溃的时代，他们还能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

和其他许多类似的现象合起来看，这一事实是和拉德洛夫[1]的意见相背的，拉德洛夫认为同其他游牧国家比较，蒙古帝国的长期存在只能这样来解释，即包括在这一帝国中的，有许多定居的异民族的国家，因此，这一帝国不是表现为游牧部落的联合，而是表现为在成吉思汗后人统治下的文明国家的联盟，如中国、中亚和前亚(俄文译本作波斯——汉译者)等。但是事实上成吉思汗后人统治最久的地方，正是依靠前蒙古时代的统治传统最少的地方，即在钦察草原、窝勒伽河流域和在克里木地方。显然，由成吉思汗的天才所创造的军事组织，对于国家秩序的维持来说，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在民政的范围内采纳定居居民的代表所提的忠告。

后者（定居居民的忠告)对于汗的影响自然会有夸大的地方。关于中国人方面，这更其正确，除了中国文化，和任何进步只能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形式中去了解外，他们不承认其他文化。这一事实说明汉文资料归功于耶律楚材所起的作用，是从其有教养的中国人来说，而不是从其民族来源来说（他是哈喇契

---

① 拉德洛夫，《福乐智慧》、《导言》，第56页。

丹人）。根据汉文资料，人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耶律楚材是蒙古帝国的真正奠基人。虽然完全缺少有关耶律楚材的汉文以外的资料，但是中国人的这一主张，都为剌失德丁著作最近时期的欧洲的出版者，即布洛什所接纳。按照他的意见，耶律楚材首先让蒙古汗明白，人不应该以屠杀和奴役文明各国的居民为满足。布洛什认为，只有术赤帝国是处于耶律楚材的影响之外，一般说来，处于中国文化的代表的影响之外，因此它仍然陷入于不可言状的野蛮状态中①②。

金帐汗国的都市文明

实际上，术赤的领土的西部，即他的次子拔都所统治的地方，也是被认为属于他父亲的全部领土的统治者，在蒙古统治时期是文化显著发达的地方。蒙古人在被他们消灭的窝勒伽不耳阿里帝国境内住下来，并满足于向斡罗思君主征收贡赋，最初指派出自己的代表驻在斡罗思君主身边。当蒙古人1223年从斡罗思返回成吉思汗那里去的时候，他们遭遇到不耳阿里人的包围，在受到很大的损失之后才得突围。对此他们便在1236年进行复仇，当时他们成功地征服不耳阿里帝国和毁坏它的首都。被毁坏的城市很快就恢复过来了。在那里一直保存到现在的所有建筑物和碑文都是属于蒙古统治时代的。在某一个时期内，不耳阿里城是术赤王朝领土内镌有蒙古汗的货币的唯一城市。从碑文中可以看出当地居民直至14世纪初还保存过去的蒙古以前时代的语言，在今天的楚瓦什语言中出现它的最后的残余。但是居民逐渐地受到钦察的突厥语的影响，这里也象在蒙古统治时的中亚一样，突厥语成为国家的官方用语，这些城市同喀山一样是14世纪蒙古时代在窝勒伽河

① E·布洛什：《剌失德蒙古史导言》（伦敦），1910年，第217页。

② 关于耶律楚材及其事业，参考蒙克也夫《中国史料》。——俄译本注

中游所修建的，很有可能这些城市在开始时是纯突厥的。窝勒伽河下游，早在拔都的时代就修建新的城市。卢伯鲁克修道士1253年在通往蒙古的旅途上，在窝勒伽河附近看见一个新殖民区，由斡罗思人和撒拉森人（换言之，即伊斯兰教徒）组成的鞑靼人所建立的，当他无论来到拔都的宫廷或是回去的时候都是渡过这条河。这是后来位于萨拉托夫附近，以乌鲁克而著称的地方。当卢伯鲁克1254年从蒙古回来的道上，提到了一座名为萨莱的新城市，是拔都在阿得（窝勒伽）水附近修建的城市。卢伯鲁克路过萨莱时，他指出这座城市和拔都的宫廷是位于河之东岸的；他既没有描述城市，也没有描述宫殿。

正是在这个地方的附近发现在窝勒伽河中流的近处有一座蒙古以前时代的城市“苏美尔罕”，据说蒙古人围攻此城达八年之久。

其他任何的史料都没有关于苏美尔罕城的记载。人们仍不知道，它是属于哪一个民族。是否可以考证为沙克辛（Saqsyn）城，象有些人所提的那样，根据12世纪的一个著作家阿布·哈米德·加尔那弟的意见，这一城市是在乌古斯人的手中①。关于沙克辛城的位置同样仍然是个争论。但是人们最常从耶亦克河或窝勒伽河口去找这个城市（在这个场合，12世纪的沙克辛城和沙加辛城毫无共同之处，马木特·喀什噶尔②把它看作是不耳阿里人的城市，并考证为苏瓦尔城来记载的）。此外，他一点也没有说到蒙古人在沙克辛遭到顽强而长期的抵抗。关于这个城市的真正位置，甚至法国的学者费琅在1925年出版了加尔那弟著作的原文③④也没有加

① 见Z·卡兹威尼的《宇宙形态志》，维斯天菲德编，卷二，第402页以下，由费琅发行的加尔那弟书原文没有这一报道。

②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365页。还有J·马迦特在《匈牙利年刊》（4，1924年，第275页）发表的文章。

③ 关于加尔那弟及其著作，参考克拉什科夫斯基《阿拉伯地理文献》，第299—302页；望亥特《阿布·哈米特·阿勒·加尔那弟》，赫尔伯克《阿拉伯斯拉夫语学》卷一。——俄译本注

④ 《亚洲报》卷二〇七，第1页。

以解决。

萨莱是意谓“宫殿”的波斯字，突厥人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人们早在《福乐智慧》一书中就发现它。在蒙古时代，人们一般是这样来称呼汗的宫殿的，人们也用这一个字来指在宫殿的四周修建的城市。于是就出现了阿姆河附近的萨莱村（在捷尔麦兹上游）①，窝勒伽河附近的萨莱和克里米亚的巴克舍·萨莱。关于窝勒伽河附近的萨莱的位置成为科学文献上争论的对象。有关若干货币上的和几种手稿资料中的新萨莱的报道也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萨莱这一名称是属于两个城市或一个城市。根据卢伯鲁克所提供的资料，原来由拔都所建的第一个萨莱，其废墟位于现在的色尔特连尼依村附近的地方。另一个萨莱是和拔都的兄弟的名字别尔哥相联系的，它的位置在卡列夫②，按从那里保存的废墟和发掘时所发现的遗物来看，这一个萨莱在历史上是远较前者更为重要。

目前人们还在试图证明③，位于色尔特连尼依地方的，不仅有拔都的萨莱城，而且还有别尔哥的萨莱城。但在卡列夫地方的新萨莱城则是在月即别的时期才建的，而在扎你别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在史料中“别尔哥的萨莱”正是叫做萨莱，那是早在月即别的时期就存在了。我们保存有一枚货币是月即别登位前回历710年即公元1310—1311年（俄文译本——汉译者注），在新萨莱铸造的，此外，据说在君士坦丁堡也保存有一神学著作手稿，那是回历705年，公元1305年在新萨莱撰写的。“新”这一形容词（阿拉伯语为 al-gadid）出现于蒙古统治时期的货币上面，这样，人们几乎能假定，在这一情况下，有两个城市，一个是老的，一个是新的，都具相同的名称。很可能，在城市向前扩大的过程

---

① 《伊斯兰百科》卷四，第860页以下（Tirmidh）。

② 今之列宁斯克。——俄译本注

③ 有关文献，参考《伊斯兰百科》Saray条，卷四，第16页以下；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二，第483—484页。——俄译本注

中，新区便称为新城了。

货　币

同术赤领土的东部相反，拔都和别尔哥后继者的帝国的城市生活越来越发展了。我们知道有很多城市，都是铸造货币的城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城市都发展自己的特殊的货币型式。货币的价值几乎到处都是一样的，关于这一层，我们看见在前蒙古统治时期的一致性，比在其以前或以后的任何时期都要大得多。在蒙古人所建立的各国中，除了中国本部以外，都逐渐建立了以银本位为基础的货币制度，其中大块的称第纳儿，小块的称为第儿罕，一个第纳儿值六个第儿罕。在术赤的后继者的帝国中，一个第儿罕的重量规定为三分之一的密特卡。相同的重量也为中亚和波斯所采用，这里特别明显的指出了这一时期在术赤的后继者领土内，特别是花剌子模在国际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就货币的外观，特别是文字的性质、铭文的性质、字母的外形、它的装饰等等来说，则每一城市都有自己的传统。和这些事实相关联的，还有下列的问题：从某一城市的文化生活，人们能推断术赤后人整个帝国的文化水平达到什么程度。根据在萨莱城和其他地方最近的发现，人们开始论及金帐汗国的文化，这是俄罗斯编年史对拔都帝国的称呼（据我所知，在东方的史料中没有这种名称），甚至也提到鞑靼民族的文化。但是，直到能肯定说，这个城市或那一个城市，这一个地方或那一个地方是哪一个民族占优势，以伊斯兰教和突厥语言胜利告终的文化演进是怎样形成的，显然仍须作长期的探讨。

金帐汗国的政情

蒙古语在金帐汗国中不占很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金帐汗国和蒙古之间的关系中断以后。突厥语的优势看来很快就巩固了。拔都和别尔哥在其生前还参加有关全国事务的决定，并为了这个目的前往蒙古。卢伯鲁克于1253年说到全国按拔都和生活于蒙古的蒙哥帝的势力范围来划分，这个地区的界限是在答剌速河和楚河之间。伊斯兰教著作家也提到了河中各城市都归拔都支配。其后则归别尔哥支配。只有1260年以后，（中亚）才确立了阿鲁忽的政权（Algu)(成吉思汗次子察哈台的后人)。这个政权甚至还扩张到起初是金帐汗国领土组成部分的若干地区。阿鲁忽夺取了花剌子模，若干年后又从别尔哥的手中夺取了讹打剌并将其毁掉。后来这些地区又重新归于金帐汗国，但是金帐汗国的势力，不再向东方伸展。早在别尔哥统治时代(1257—1266)，金帐汗国的汗就从蒙古帝国的第二号人物转变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统治者①②，虽然只有后来的汗即忙哥·帖木儿（1266—1280）才开始在货币上面镌下自己的名字。

出自术赤王室的其他所有的汗，其中也包括鄂尔达和昔班的后人在内，名义上都归顺于金帐汗国的汗。但是这一归顺并不是真心的。有几个历史家把金帐汗国称为青帐汗国和把鄂尔达后人的领土称为白帐汗国（weisse orda)，在这种场合，使用的不是蒙古字，而是突厥字kōk（青色）和aq（白色）。然而，在有些史料中，青帐汗国（blaue orda）一名是指鄂尔达后人的领土的。在15世纪初有一个无名氏的历史家③甚至提出主张：东方 的白帐

① 《伊斯兰百科》卷一，第737页，(Berke) 条。

②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503—507页。——俄译本注

③ 关于这无名氏的著作，作者可能是布朗编《道拉特沙》，第 371 页，15所提到的木莫·丁·纳坦什。参考里奥《波斯手稿》，第1062页以下，巴托尔德《科学院汇报》，1927年，第115页以下，《科学院公报》1929年，第155页以下。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139页。有《无名氏伊斯达史考》、《再论无名氏伊斯达史》。波斯手稿藏不列颠博物馆。——俄译本注

汗国和西方的青帐汗国的分法是在脱克塔汗（Tochta—Chan）（1290—1312）时期才有的，那就是说在他和叛逆的宗王那海的战争之后（脱克塔一名的真正的蒙古形式是脱黑塔迦，后一形式出现于波斯的蒙古汗1305年写给法国国王的信中），那海是1300年被暗杀的。根据这一史料，白帐汗国诸汗都是那海的后人，那是和实际不符的，表明人们早在15世纪在无名氏作者写书的波斯地方想象术赤后人的历史是多么不恰当的呀。另一位著作家阿布哈齐称昔班的领土为白帐汗国。除鄂尔达和昔班后代的领土不计外，金帐汗国一开始就是比较成吉思汗其他后人支配下的国家要巩固得多的帝国。人们还可以指出在有些地方存在有自己的"斡耳朵"和拥有特殊军队的诸王。虽然他是承认汗的最高权力的。有一位埃及著作家[①]提到克里米亚的速答黑这一座商业城市，它的收入是分给四个鞑靼君主的。但是在金帐汗国全境，从多瑙河直至花剌子模和锡尔河下游，再也没有系出蒙古血统的王朝了[②]。

金帐汗国中的突厥语

蒙古人象其他各地一样，也把回鹘文传进金帐汗国中，在这以前，钦察地方是几乎不认识回鹘文的。我们掌握有14世纪末用回鹘字母写的金帐汗国的敕令。属于这个时代的还有脱古塔迷什[③][④]。汗晚期的几个货币，货币上汗的名字是用回鹘字母写的。回鹘文字的使用只见于萨莱所铸的货币上，但是就在这儿也不是经常的。萨莱城的货币表明，汗的名字往往是用蒙古语和也许用

① 基督教徒穆法达勒是马金的继续者。布洛克曼：《阿拉伯文献史》卷一，第348页。原文见齐先豪先《关于金帐汗国历史的资料集》，第184页。

② 关于金帐汗国的历史和文化，参考格莱可夫和雅库鲍夫斯基《金帐汗国》。——俄译本注

③ 《伊斯兰百科》卷四，第874页以下。

④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564—567页。

一些突厥语，其发音和用阿拉伯字母写的不一样。例如扎你别汗（1341—1357）的名字用回鹘字母则写成詹伯克。

根据阿布哈齐的说法，蒙古语言在15世纪还没有停止使用，但我们没有支持这一主张的任何论据。无论如何，人们不知道金帐汗国中有镌有蒙古文字的货币，而另一方面人们却发现镌有突厥文字："他多幸福"的货币，虽然它只是无名氏的和比较晚期的货币。访问过月即别汗的斡耳朵的伊宾·巴图塔，在那里只听说突厥语。比如宫廷妇人中有乌鲁可敦和裘秀克可敦，意即大可敦和小可敦。汗本人用突厥语阿塔称他的宗教的指导者和顾问阿塔赛义德。这一突厥语也用于伊斯兰教的礼拜中。在阿查黑城，有一个说教者在伊宾·巴图塔面前用阿拉伯语讲道，即当他为算端（即月即别汗），为异密(阿查黑异密按血统是花剌子模人)，为所有在场的人而祷告时，然后他把自己的讲词翻译成突厥语。但是，必须注意到，这一仪式不是在伊斯兰教寺院中举行，而是在宴会的场合举行的。在朗诵古兰经之后，人们唱歌，首先用阿拉伯语，然后用突厥语和波斯语。伊宾·巴图塔补充说，人们把阿拉伯歌称为qawl（语），波斯和突厥语称为al-mulammaʿ，而阿拉伯语则称为mulammaʿ即"彩色的，杂色的"意思。人们后来同样称在阿拉伯语中混杂波斯语和突厥语的演说为mulammaʿ。

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

伊斯兰教的扩张对于花剌子模和中亚的突厥人的影响比之对窝勒伽河的不耳阿里人的影响恐怕要更大。

本地的突厥人，钦察人早在前蒙古时代就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是从两方面来的：一方面是斡罗思，另一方面是西欧。这种宣传一直延续到蒙古时代，这可从钦察、库蛮的词典，即人们所谓

的库蛮词典中看出①。它是13世纪末的著作，其中福音书和天主教的颂诗的原文是翻成突厥语的。翻译得很成功，证明是出于精通语言知识的说教者之手。伊宾·巴图塔本人在克里木的克尔什（Kerč）和卡华（Kaffa)之间看见了钦察突厥人的基督徒。在克里米亚还有其他民族成分的土著基督徒。1382年②初在开罗逝世的阿纳思（Anas)，是埃及后来算端巴尔库克（Barquq)的父亲，他是生于克里米亚的彻尔克斯人，③据称原先是个基督徒，后来才改信伊斯兰教。甚至在埃及，他既没有学会阿拉伯语，也没有学会突厥语，而是只说彻尔克斯语，以致于他身边常常带翻译。

当时在伊斯兰世界文化优势的影响下甚至比钦察人更坚持基督教传统的一些民族的代表也改奉伊斯兰教。当时所有的著作家（其中也包括卢伯鲁克在内）都是把阿兰人或阿速人写成是基督教徒，而伊宾·巴图塔在萨莱城看到的则是伊斯兰教徒的阿速人。为了使基督徒改奉伊斯兰教徒，对人们采取强迫手段，看来是不存在的。但无论如何，基督教士和伊斯兰教阿訇一样，他们享有免税的权利。甚至在萨莱城，早在1261年伊斯兰教徒的别尔哥的统治时期就建立了一个正教（天主教）教区。

关于别尔哥的信奉伊斯兰教后来以各种各样的资料传布开来。如根据阿布哈齐的资料，当别尔哥已当上汗的时候，他是通过来不花剌的两位商人而改信伊斯兰教的。根据其他的报道，当他还未有即位时，受到了在忽毡或在不花剌的司教的影响，这里指的是著名的撒菲丁，他于1261年去世。甚至还有剌失德丁所叙述的关于乌古思汗的传说（根据这传说，他拒绝喝异教母亲的奶），也记在别尔哥的身上。卢布鲁克的叙述指出，别尔哥早在拔

① 关于这一文献及有关资料，参考葛玛·丽《库蛮文献》。——俄译本注

② 原文误作1328年。

③ 科普留柳手稿，1081，回历783年下面。达哈比的《伊斯兰史》的续篇，参考布洛克曼《阿拉伯文献史》卷一，第47页。

都生前，即1253年就已经是伊斯兰教徒了，在他的斡耳朵中禁止吃猪肉。大家知道，伊斯兰教的这一法令就是在最难以遵守的地方，例如在中国也付之实施，在那里猪肉是居民的主要食物。别尔哥的斡耳朵当时位于打耳班和窝勒伽之间，根据卢布鲁克的报道那里是适当所有从波斯和土耳其而旅行的萨拉森，换句话说，即是伊斯兰教徒的道路上。当他们去到拔都那里，就把礼物交给别尔哥。卢布鲁克补充说，拔都于1254年命令别尔哥把他们安置在位于窝勒伽以东的地区，因为他不希望使节带来的礼物有一部分归别尔哥所用。由于共同反对波斯的蒙古人，别尔哥后来和埃及的算端取得了谅解，并接待若干埃及的使节，我们应该感谢他们有关别尔哥的斡耳朵和他对外关系的详细报道。不仅是别尔哥自己，就是他的妻子以及他的亲信，也是伊斯兰教徒。他的每一个妻子，每一个异密都有自己的伊马木和穆文精（宣礼员）。有学校，这是人们把小孩送去学会诵读可兰经的地方。同时有象在蒙古地方那样，严格遵守异教的习惯，其中甚至有的习惯还和伊斯兰教的要求显然抵触的，例如不能用河水洗衣物和洗脸。埃及使节首先得到通知，他们不要在斡耳朵里洗衣物，但是如果一定要洗的话，那就秘密地去干。别尔哥同时代的人，从金帐汗国来到埃及，必然地在更大的程度上去接纳伊斯兰文化。大家知道，别尔哥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算端贝巴儿思（1260—1277）：从这一婚姻中就产生了贝巴儿思的第一代继承者即赛义德汗摩诃末①，人们也称他为纳速剌丁（摩诃末）别儿哥汗。显然，除了伊斯兰教名字外，还有一个蒙古名字。埃及历史家曲突比即《历史长篇》的作者（曲突比著作这一部分的手稿藏在君士坦丁堡）②，把他的生年定于回历658年即公元1260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别尔哥和埃及政府的关系是在1262年才开始的。1279年4月年轻的算端

① 原文误作Sajjid。

② 科普留柳手稿，112号。参考布洛克曼《阿拉伯文献史》卷二，第48页。

和他的母亲，即别儿哥汗的女儿来到了大马士革。以后不久在叙利亚爆发了暴动。算端打发他的母亲去说服暴动者。当她到达时，显贵都出来迎接她，吻她轿子前的泥土，并按照习俗在骡脚下敷开大块的布。谈判由于女皇心腹的过错而宣告失败。算端打发他的母亲去黑拉黑要塞，他自己后来也被放逐到这里。根据曲突比的陈述，他以慷慨和仁慈出名，非冷酷无情者。这种慷慨也表现于黑拉黑，由于自己岳父喀拉温的猜忌，把政权交给了他。1280年3月算端去世，因而人们认为，他是喀拉温命令毒死的。他的妻子，哈齐雅可敦（喀拉温的女儿），直至她死时还不停止地哭算端（她活到1288年）。1281年算端的母亲把儿子的尸体运往大马士革，埋葬在贝巴尔思的坟场里。

到别儿哥的斡耳朵去的埃及使节公开宣称汗没有男孩，只有女孩，因此根据曲突比的报道，1280年2月在开罗逝世的异密巴德拉丁·摩诃末是别尔哥汗的儿子和算端的舅父。据说他写了两卷阿拉伯诗歌集。此外，还有一系列的神学著作都归之于他，其中有一部可兰经注释。他从高处坠下，突然死于开罗，生年还不满五十岁。

金帐汗国的瓦解：月即别、鞑靼和诺盖

自别尔哥去世后，异教徒诸汗重新统治了金帐汗国。伊斯兰教最后决定性的巩固是在月即别汗统治时期（1312或1313至1340）形成的。根据伊宾·巴图塔的意见，月即别汗宗教上的领导者是赛义德·阿布德·阿勒·哈米德。还有一种记载①，说突厥斯坦的司教赛义德·阿塔（他的原名是阿哈马）的学生，是促使月即别

① 不列颠博物馆的手稿，插图26、190，参考里奥《波斯手稿》，第163页以下；巴托尔德《突厥斯坦》（英文版），第56页以下，参考迈尔兹的译文（《突厥系谱》），伦敦，1838年，第232页。

汗改奉伊斯兰教的，并给他取名为算端·摩诃末·月即别汗。此事发生于回历720年即公元1321年牝鸡年①。有关的传说叙述圣徒后来怎样带领月即别汗统治下的民族来到了河中，在这里开始了按照汗的名字命名为月即别人（乌孜别克人），而他们不听从司教的呼吁，仍留在突厥斯坦，取得了卡尔马克（Qalmaq）的名称（显然是从语根qalmaq意为留下派生出来的）。这种传说自然是想象的产物。但是其他史料，其中包括阿布哈齐的在内，同样把月即别民族的名称追源于月即别汗的名称，根据其他的比拟，人们可以承认这种语源学的解释显然是比较其他许多学者，其中包括拉德洛夫在内的所作的解释更为有根据，据拉德洛夫等的解释，月即别是"自己的主人"的意思。15世纪的历史家往往把术赤后人的帝国或兀鲁思称为月即别兀鲁思。在中亚细亚，人们后来把月即别一字看作是民族的名称，和"察合台"一名相对立，那是按照成吉思汗第二儿子的名称来称呼突厥斯坦的游牧民的。他们构成当地诸汗的武力。

中亚细亚的酋长为了使金帐汗国诸汗改信伊斯兰教对他们一直施加压力。大约在1360年短期统治萨莱城的是阿昔思汗（'Áz-iz-Chan）（在货币上作'Aziz Saich），他过着奢侈的生活。因此受到另一个赛义德·阿塔即大阿哈马·耶西维的孙子赛义德·马合马·耶西维的规劝。汗听从他的话，将女儿嫁给他为妻，并表示悔罪。但是三年之后，他再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最后被杀害了②。

15世纪上半叶，在军事上被组织进月即别兀鲁思的全部居民显然是当作单一民族来看待的。当金帐汗国越分裂，它的成员越丧失其相互依存关系时，作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名称的"月即别"一字在南斡罗思就越不被使用了，只留下为迁往突厥斯坦的

① 《巴托尔德文集》卷一，第106页。——俄译本注

② 这一报道见于上面（172—358）所提到的，恐怕是由纳坦什（Mŭinad—Dîn Natanzi）所写的佚名的著作中。

若干部落所使用。

但是，斡罗思从未停止过使用“鞑靼”一名来称呼金帐汗国的居民，无论在蒙古语是国语的时期或全国已“突厥化”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15世纪和16世纪，斡罗思与之发生关系的所有汗国——克里米亚汗国，喀山、阿斯特拉罕（Astrachan）和西伯利亚等汗国在斡罗思人看来都是“鞑靼”人的汗国。在这些汗国中，如所周知，克里米亚汗国是为时最久的，此地“鞑靼”这一用语看来是最经久的。称克里米亚的居民为“鞑靼”的，不独是斡罗思人而已，而且还有奥斯曼土耳其人，它于1475年征服了克里米亚。大家知道，克里米亚居民现在拒绝使用“鞑靼”一名，他们称自己为“突厥人”，而窝勒伽河附近土著居民的有识之士在经过若干次讨论之后，决定采用“鞑靼”（Tatar）一词作为自己民族的正式名称，由此产生了鞑靼共和国的名称。有一个时期斡罗思人使用鞑靼一词的范围很广。拉德洛夫屡屡呼月即别人以及一般对中亚操突厥语的居民为“鞑靼人”。从那时起，人们力图赋予这一名称以比较确切的意义。但是，即使在今天，人们还难以确定在其他突厥民族中鞑靼民族有什么民族志上的和语言学上的特点。

在15世纪，特别是在16世纪，除鞑靼人之外，人们还提到了诺盖民族，它不仅形成民族单位，而且形成政治单位和有自己的君主。诺盖的中心在当时是萨莱楚克城，换句话说即小萨莱城，位于耶亦克河河口，是金帐汗国诸汗的陵墓所在，从阿布哈齐以后，人们往往把萨莱楚克和新萨莱混在一起。诺盖政治上的意义，在16世纪后半期结束，当时形成了耶亦克的哥萨克军。最初是离莫斯科而独立的，后来在17世纪则归顺于莫斯科沙皇。

值得注意的是，诺盖一名当时只有斡罗思人使用：在东方的史料中，其中也包括阿布哈齐的史料，诺盖是按照突厥氏族之一的名称，叫做蒙古特人。但是，反之，现在在中亚、诺盖一字具有比在斡罗思广泛得多的意义，人们也称伏尔加的鞑靼为诺盖，

在南俄罗斯，人们今天称克里米亚和北高加索的一个民族为诺盖人，人们把在蒙古时代形成为一个民族方言的诺盖方言和喀拉柴方言、巴尔卡尔方言区别开来，后两种方言是比较早得多，他们和前蒙古时代的钦察语更为近似①。

直到现在，下列的问题仍不清楚，即13和14世纪，中亚的突厥人和突厥化的蒙古人的民族生活和政治生活是怎样的？下一讲就要谈到这一问题。

① 萨莫洛维奇在《札记》卷二十一，第155页所写的论文。

·第十讲·

中亚的蒙古人

突厥人的人民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亚突厥化了的蒙古王朝。王朝和文化的衰落。

政治情况的变动和混乱

金帐汗国诸汗，由于他们的国家远离蒙古，在开始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独立的统治者，因而由蒙古所征服的突厥斯坦和中亚细亚的地区的政治组织一般说来是很不巩固的。无可置疑，成吉思汗是想把蒙古以西的他所占领的地方交给自己的三个大孩子，而这三个王子在父亲生前就想行使他们的权力了。但是，关于他们每一个人的领土范围，以及和最高首领的权力相比，他们自己的权力范围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是完全不清楚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帝国是多大，但是三个王子的斡耳朵彼此是比较接近的。

术赤的斡耳朵位于也儿的石河上游，根据最早的资料，他的墓地也在这里，虽说人们后来指出，他的墓地是在更西的地方即在萨雷苏河附近、昔班的领土中①。这和蒙古的习俗更为符合，根据习俗，父亲的斡耳朵是传给他最年幼的孩子的。术赤去世

①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英文版），第392页。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一，第459页。——俄译本注

后，他的长子鄂尔达也是生活于也儿的石河附近。

第三个王子，即后来成为皇帝的窝阔台①② 的斡耳朵位于稍南的地方，即流入阿拉湖的叶密立河岸。据剌失德丁的报道，窝阔台的坟地是在距也儿的石河两日程的一座高山上，那里是叶密立河一支流发源的所在③④。1221年经过这附近的中国道士长春报道了通过阿尔泰山的路，他是当蒙古军队进军时奉窝阔台之命被安置在阿尔泰的⑤，从这里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窝阔台在他的父亲生前就被看作是这个地区的支配者。

但是关于窝阔台的领土边境的确切界线，我们找不到任何可靠的资料。术外因只说窝阔台的牙帐，甚至在他父亲生前，就在叶密立河及和布克河的边境⑥⑦，大家知道，这两条河的发源地大约在同一地方，而前者是流向西方的，后者是流向东方的。

术外因十分明确地说到，第二王子、察合台的斡耳朵和领土。他的斡耳朵位于阿力麻里附近，被称为库雅斯地方的旁边⑧。它的领域从回鹘地方的边境伸展到寻思干和不花剌。根据长春的报道，察合台第一次修路经过赛拉木湖和越过塔勒奇岭的地方，同时于1222年重建了在战争中被破坏了的阿姆河上的桥梁。成吉思汗三个大儿子的斡耳朵位于从也儿的石河上游直到伊犁河南岸一个比较小的地区。关于库雅斯和察合台的斡耳朵的位置，我们从其他的资料知道，这两个地方都是位于伊犁河以南的固勒扎地方。我们注意到，库雅斯早已为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所

---

① 《伊斯兰百科》卷一，第898页。
② 《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62页。——俄译本注
③ 《突厥斯坦》（俄文版）卷一，（原文）第122页，参考英文版，第393页。
④ 《巴托尔德文集》卷一，第460页。——俄译本注
⑤ 布莱德施奈窦：《中世纪研究》卷一，第62页。
⑥ 《吉伯纪念丛刊》卷十六，第31页，那里应读作 gonag qobaq，参考《突厥斯坦》（英文版），第393页。
⑦ 《巴托尔德文集》卷一，第460页，附注④。
⑧ 术外因，同上，qanâs读作qujâs。

记录，说它是位于巴尔斯罕后面的一座城市①。在另外一个地方（《突厥语词典》卷三，第 129 页）说突骑施和炽俟全地都用卡雅斯或库雅斯这名称，那里有三个具有下列名称的堡垒，即沙布里克卡雅斯，① 乌隆克卡雅斯和卡拉卡雅斯。关于察合台的和他初期后继人的斡耳朵，术外因也是以突厥的名称乌鲁克·依弗，"伟大的家"来报道的②③；用来表示蒙古汗的斡耳朵的突厥名称出现在那么早的时代是件有趣的事。关于察合台和他的继承者的坟地，没有什么资料可参考。

成吉思汗三个大儿子的斡耳朵位于从也儿河上游直到伊犁河南地区的一个比较小的场所的情况就是这样，从这里人们已经看出，这三个斡耳朵不能看做是三个不同帝国的首都。

特别不清楚的是，察合台和窝阔台的疆域对蒙古的地位的关系是怎样的。成吉思汗逝世后，窝阔台被选为皇帝，并迁往蒙古，在这里他修建了哈喇和林城和在这城中及其近郊的若干宫殿，在这里他显然行使作为君主的一切的权力而无视父亲牙帐，即蒙古的继承人拖雷的权力。虽然直到寻思干和不花剌的地域是原属于察合台的，但是在河中行使权力的马合木牙喇洼赤，却驻在忽毡，不由察合台任命，而由窝阔台任命。这种情况在回历636年，即公元1238—1239年，当人民特别是农民反对在不花剌的蒙古人的暴动时还是那样。在这以后不久，察合台在没有事先和他的兄弟商议的情况下，把马合木免了职，任命其他的长官来代替他的位置。当马合木向窝阔台诉冤的时候，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察合台给他兄弟发出一封道歉的信④，窝阔台满意这个，同意他的

---

①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330页。

② 《吉伯纪念丛刊》第十六辑，第二卷，索引。

③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下册，第539页，看来抄本有错误的地方。
——俄译本注

④ 土耳其文版误作ithâm-nâme（告状）。



处理，并赠给河中作为他的财产[1]。〔蒙古用语是ingu(inču)〕[2]。人们因此理应假定，河中是由察合台任命的总督来管理的。然而，根据刺失德丁的记载，在窝阔台时代，由窝阔台自己任命的马合木，牙剌洼赤的儿子，马思忽惕伯[3]担任从喀喇和卓、别失八里（即从回鹘斯坦）、忽炭、可失合儿、阿力麻里、海押立、寻思干和不花剌直到只浑水岸边的长官。马合木·牙剌洼赤本人被任命为北京长官，于1254年在职去世。波斯历史家——朱孜章尼不了解这样的国家制度，并因此错误地把马思忽惕伯称为"察合台大臣"。他告诉我们说，马思忽惕伯行使从别失八里直到寻思干和不花剌广大的管辖区的权力。他特别喜爱后一城市[4]，在这里修盖了一座名为马思忽惕雅的范围广的经文大学。这座大学在1273年为波斯的蒙古人所毁，但后来又重修了，1289年它的创始者就葬在这里。第二座马思忽惕雅由马思忽惕伯修建在可失合儿，14世纪初马思忽惕伯的第三子迁其官邸到这里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出身于花剌子模的伊斯兰教商人虽然在生前遇见中亚发生种种政治变化，但他们仍然能保持其政权，并将其传给自己的儿子。

争论和竞争

蒙古帝国内部发生动乱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关于汗位继承的法律，在每个汗去世后，对于他的继承人问题是个长期商议的对

---

① 布洛什编：《刺失德史》，第196页。

② 参考《伊斯兰百科》卷一，第898页。

"采地" indju，其收入满足蒙古王宫廷和军队的需要。此外，每人（王）还要求一个兀鲁思（相当数量的部落，俄译本作氏族）和帐幕（jurt）（土地）；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627页。——德文版和俄译本注

③ 见《突厥斯坦》（原文）卷一，第139页。

④ 土耳其版原文说："他在不花剌受到特别的尊重。"

象。为了汗朝全体成员对继承人的承认和参加他的就任庆典的需要，召开一次忽里勒台（Qurultai）大会①。对于前任的汗的意向是考虑的，但是对于皇子来说都不是无条件的约束。在汗死后至他的后继者宣告就任的忽里勒台大会之间②，是要经过若干年的。在这王位虚悬时间内则由前王的未亡人来摄政。但是她的权力并不是人人都承认的，许多王子在自己的省区内随意行使权力，而不理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权力。

象这样王位虚悬期的例子早见于窝阔台死（1241年）后直至他的儿子贵由就位（1246）中间的时期，他违反死者的意志，因为后者是决定由另一人来作为他的继位者。完全象其他的长官一样，马思忽惕伯感到他的统治并不是全无危险的，便到拔都那儿，但是他可能在选举贵由以前即已回来，和作为长官出席了1246年的忽里勒台大会。贵由同意他担任河中突厥斯坦和其他地区长官。

贵由早在1248年去世，继位者是成吉思汗第二儿子的后人，换句话说就是拖雷的后人③。1251年，拖雷的长子蒙哥被宣布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当他即位后，察合台和窝阔台系的许多王子都阴谋计划反对他。被控告为参加谋反的王子，一部分被处死，一部分被放逐。结果，察合台和窝阔台的兀鲁思几乎完全被消灭了。但是，从外表形式看来兀鲁思还是保存下来了，因为贵由的未亡人，仍留在叶密立河岸的斡耳朵，而察哈台的孙子哈剌旭烈兀的未亡人即额尔根可敦④仍为察合台斡耳朵的女统治者。可是

---

① Kurultai的较准确的读法是Qurultai，见《通报》，卷二十七，1930年，第32页。自从1926年巴库突厥学者会议之后，这个字在所有突厥语中又复活了。

② 关于这字的正确读法，参考伯希和《突厥斯坦》札记，第52页。——俄译本注

③ 拖雷应是成吉思汗的幼子。这里原文如此。——汉译者注

④ （Оркына）。——俄译本注

事实上，全部权力却转入拖雷和术赤王朝的手中，1253年蒙哥汗[1]对卢布鲁克说："正如太阳向各处射出光芒一样，我和拔都的权力伸张到所有的国家。"[2]根据这个旅行家的报道，蒙哥和拔都的势力范围的界限在答剌速河之东，因而术赤的兀鲁思的一部分疆域也入于蒙哥的势力范围中。

关于马思忽惕伯在这纷扰和阴谋时代中的活动情况，我们没有任何资料。只说因为怀念蒙哥，他的生命受到威胁。当秩序恢复后，马思忽惕伯统治的界线更为扩张了，在其统治下的有河中、突厥斯坦、讹打剌、回鹘国、忽炭、可失哈儿、毡的、花剌子模和拔汗那等地。

1253年秋，蒙哥弟旭烈兀率兵从蒙古出发，成功地占领了报达，消灭了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在前亚建立了一个新的蒙古政权。但是旭烈兀的移动和以前成吉思汗的军队一样，是缓慢的，到了1256年才渡过了阿姆河。1254年，他在阿力麻里和乌鲁克·依弗受到了额儿根可敦的接待，1255年秋他在寻思干近郊度过四十天，在那里受到了马思忽惕伯很周到的款待[3][4]。

察 合 台 帝 国

蒙哥去世（1259年——俄译本）后，情况重新发生了变化。为争夺王位，他的兄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间展开了斗争。忽必

---

① 法译本，第144页，作1254年。——汉译者注

② 《伊斯兰百科》卷一，第711页。此外，卢布鲁克的旅行记，见地理学会出版的旅行和回忆录汇编，巴黎，1839年，卷四，第307页（原文略）。卢布鲁克：《东方旅行记》1253—1255年（W. W. 罗克希译），第174页。1253年没有谒见，而是在1254年1月3日谒见的，法译本，第304页，英译本第171页，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498页。——俄译本注

③ 这一切都根据术外因的《世界侵略者传》。

④ 参考术外因书，加兹文尼版卷三，第98页。布洛什编，《剌失德史》，第272页以下，特别是第308页以下。——俄译本注

烈在中国宣称为大汗，而阿里不哥则在蒙古宣称为大汗。因而发生中止从中国输入小麦的事，而小麦正是蒙古补充粮食补给所必须的。当时阿里不哥决定派遣察合台皇子阿鲁忽到西方去，以便从突厥斯坦把粮食、必需品，其中也包括武器在内陆续运进来，阿鲁忽很快地把以前属于察合台兀鲁思的全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甚至把属于术赤的兀鲁思的花剌子模也占领了，但是这一切，自然都是为自己打算的，而没有考虑到要实行阿里不哥的委托。额尔根可敦来到阿里不哥那里，指控阿鲁忽。马思忽惕伯似乎也去到那里。阿里不哥决定和阿鲁忽打仗，但是在几次胜利后，终于失败了。他离开了突厥斯坦，并派遣额尔根可敦和马思忽惕伯去到阿鲁忽那里，阿鲁忽娶额尔根可敦为妻，派遣马思忽惕伯担任寻思干和不花剌的长官。藉赖马思忽惕伯所征集的金钱之帮助，阿鲁忽在他死前（大约是1266年），成功地征服了原属于别尔哥领土的讹打剌。

阿鲁忽逝世后，原配额尔根之子木八剌沙是伊斯兰教徒，在安格兰河畔宣称为察合台汗。但是，后来被在蒙古赢得稳定局面的忽必烈汗所派遣的察合台系的其他王子八剌（Boraq）①夺去他的王位。另一方面，八剌必须使窝阔台的孙子、海都屈服，海都原先在阿里不哥的军队中，离开军队后，独自不断地和阿鲁忽和他的后继者作战。1269年，海都于答剌速河畔召开忽里勒台大会，这次大会特别就文明国家防御游牧民的侵入采取了措施，诸王子本人有义务在山上和草原里生活，不让畜群到田间去吃东西。文明地区的管理再次交给马思忽惕伯，他本人和继他之后的两个大孩子是由海都任命的，马思忽惕伯的第三个儿子是由海都儿子和继位者察八儿任命的，他在1303年在叶密立河附近某地登上王位。

① «Барак»。——俄译本注

根据这后一报道①，海都和他的后继者的官邸开始是属于窝阔台的地方的，而海都的墓地则在楚河和伊犁河之间的山上。虽然这地区的最高权力属于窝阔台后人，但是察合台诸汗也登上宝座。统治时期最长的（1282—1306）就是八剌之子、都哇，八剌是在海都后死的。窝阔台的兀鲁思和察合台的兀鲁思之间的疆界是否确定，一点资料也没有。

甚至关于中亚的成吉思汗四个孩子的兀鲁思之间的疆界也依然是不明确的。在北方，看来还在13世纪上半叶先前属于术赤领地的某些地方，其中包括吉利吉思地区，也划归拖雷兀鲁思，关于这方面，在忽必烈的历史中有明晰的说明。此外在阿布哈齐的著作里有重要的，诚然没有为其他史料所证明的下列记事，即关于蒙古人从吉利吉思地区到谦河（叶尼塞河）河口进入阿拉库津(Alaqčin) 地区的进军。这次进军是奉拖雷的未亡人莎儿合黑帖尼皇后的命令，因而是在拖雷卒年（在蛇年 1233 年）和皇后死年（1252年 2 月）间的时间进行的。在西北方，忽必烈的领土，大抵达到也儿的石河边。有一个报道说忽必烈和海都领土的边界是经过海押立旁边的②，因此关于察八儿在叶密立河岸附近某一地方登位的报道就难于一致了。

在描述今日的中国突厥斯坦的地区时，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把忽炭和在它以东地区同样列入忽必烈的领土之内③。但是他同时指出，从可失合儿直到这里以及更远的是属于“大土耳其”的地区(马可·波罗本人对海都帝国的称呼)，鸭儿看是正式被宣布为大汗侄子的领土的，而马可·波罗却错误地称之为海都本人。

① 出处见扎马尔·卡尔希编：《附录》（原文见巴托尔德《突厥斯坦》俄文版，卷一，第138页)。此书在新疆喀什写成。——汉译者注

② 《多桑蒙古史》卷二，第516页，根据瓦撒夫书。

③ 《马可·波罗游记》（颇节版)，巴黎，1865年，卷一，第143页；《马可·波罗游记》（亨利·玉尔版)，伦敦，1875年，卷一，第196页。

有兴趣的是刺失德丁所提供的报道，回鹘在忽必烈和海都战争的时期是保持中立的，回鹘努力和双方保持友好关系①。显然亦都护王朝直到那时还支配这个地方。1209年归顺成吉思汗的亦都护巴尔楚克（Barčuq）于1218年参加了反对屈出律的战役，后来又参加反对花剌子模摩诃末帝国的战役，最后又参加成吉思汗对西夏的最后一次战役。巴尔楚克是在窝阔台统治时期逝世的。在他之后，他的三个儿子先后继位。他的第一个儿子是在窝阔台的未亡人秃剌乞纳（1241—1246）统治时期逝世的，他的第二个儿子是在蒙哥统治时期因下列告发而被处决②，即他企图在星期五那一天把聚会在一间大伊斯兰教寺院中的别失八里的所有伊斯兰教徒统统杀光。杀他的是他的亲兄弟，后来被任命为他的继承人。有关亦都护王朝的其他资料似乎是没有的③。

如果一方面是大汗帝国是靠牺牲海都帝国来稍为扩张自己的疆界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就是中亚蒙古帝国在海都统治时期是靠牺牲旭烈兀和术赤帝国向南和向西延伸自己的疆界。属于海都帝国的组成部分的是从巴达哈伤直到木儿哈卜水的阿富汗以北的全部地区，那里是海都的二十四个儿子之一的撒儿斑驻军的所在。术赤的兀鲁思分明是缓慢地丧失其东部的地方，即锡尔河下流以东的地方，虽然我们没有掌握精确的资料，指明13世纪后半期，鄂尔达的后继者的牙帐在什么地方。根据剌失德丁的叙述，蒙古军队中有一支队在向宽舒（即鄂尔达的后继者）的斡耳朵推进时经过毡的和讹迹邗④，从这里可以推断，宽舒官邸⑤位于西方和

---

① 布洛什编：《剌失德史》，第502页。

② 参考术外因对此过程所作的详细叙述，《吉伯纪念丛刊》卷十六，第34页以下。

③ 有关亦都护王朝的比较晚近的中国报道，参考马雅福金《回鹘吐鲁番公国》。——俄译本注

④ 布洛什编，《剌失德史》，第443页。

⑤ 土耳其版原文误作sefer（出师）代替maqarr（牙帐）。

西北方更远的地方。马可·波罗把宽舒置于极北的某一地区，那里人们象动物那样过活，那里一般是没有五谷的，那里有许多地方的交通工具是用狗来代替马的①。宽舒死时，海都还在世。他的政权传给儿子伯颜，但是鄂尔达的另一个曾孙奎律得到了海都的帮助，起来反对他，他们两人的战争一直继续到剌失德丁写书的时候。

在埃及和叙利亚两地写书的阿拉伯的历史家中，从阿布·菲达开始，都宣称宽舒和他的继承人是统治哥疾宁和范延的，这一没有得到消息很灵通的波斯著作家证明的报道也载入欧洲人的许多著作中，其中也载入叙述阿拉伯王朝的兰甫的著作中②。这些阿拉伯著作家大概是把宽舒一名和鄂尔达之子忽里的名称混为一谈了，忽里参加了旭烈兀征服波斯之役。后来他在波斯被处死。他的军队的一支队在旭烈兀和别儿哥交战时向东方开动，占领了哥疾宁和范延，并在那里归顺于察合台的诸王子。

当地藩国的王朝

虽然中亚是分给汗朝的成员，但是在这里早在14世纪初，人们还看到（和金帐汗国不同的）有许多蒙古侵入前的当地王朝。有关的资料我们在扎马尔·卡尔希14世纪初写的著作中找到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则在用纯阿拉伯文写的碑铭中找到。所有这些统治者都拥有马立克（王）的称号，如蒙古侵入以前波斯或中亚的藩国国君的称呼。往往附在崇高的称号如算端和汗旁边。根据讹迹邗圣人布尔罕丁·奇里什的话语，在扎马尔·卡尔希的记事

① 亨利·玉尔：《马可·波罗游记》，伦敦，1875年，卷二，第478页以下。

② 兰甫：《回教王朝》第138页，注4。原文有1894年威斯特明斯特版的和经过巴托尔德订正的1899年圣彼得堡出版的两种，以后一种为佳（按：此注根据《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151页）。——汉译者注

之一中曾提到拔汗那的统治者依勒赤·马立克沙① 在此迹邗保存有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撒的迷失·马立克沙的坟墓，他死于回历665年，即公元1226—1227年②。如果从他们的名称和称号来判断，那末全部的国君都是出身于突厥的。若干名称和称号有很古的痕迹，例如埋葬在奥列阿塔附近的于1262年去世的本地国君乌鲁克·毗伽·伊格波尔汗③④。碑文是学者用阿拉伯文写的，扎马卡希尔引用他在毡的用阿拉伯文写的突厥圣人迦马拉丁·花剌子模·速克那基的墓志铭。他在突厥蛮中以赛赫巴巴著称，1273年11月底在毡的去世，享年八十有五⑤。上述作者同时引用了波斯文翻译的有韵诗，这首诗的原文见于锡尔河岸边的忽毡附近的坟墓上⑥。此外，人们引用一首时代不明的波斯诗，它是为颂扬忽炭算端蒙米什特勤而作的，内容说到：愿沙长寿，因而突厥人说，蒙米什特勤长寿了⑦。后一句是引用突厥文的。

13世纪藩国王朝的存在也得到了中亚各城市、例如讹打剌城所铸造的货币的证明。通常是铸当地"马立克"的职名，虽然不称自己的本名。同海都、都哇和其他的国君有关联的货币，我们一块也没有，但在金帐汗国中忙哥帖木儿已经在货币上铸有自己的名字。我们也没有资料足以作出结论，在汗直接统治的地区和从前的土著王朝继续统治地区之间存在着一种疆界。甚至位于察合台斡耳朵紧邻的阿力麻里城（虽然伊犁河这条大河流经它们之间），归顺于成吉思汗的当地王朝仍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合剌鲁阿厮兰汗王朝由于某种原因早已丢掉了海押立。阿厮兰汗的儿子从蒙

① 《突厥斯坦》（俄文版），卷一，第149页。
② 这一墓志铭见引于突厥斯坦考古学爱好者小组会议记录。
③ 《札记》卷十二，第5页。
④ 《巴托尔德文集》卷四，第307页。——俄译本注
⑤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俄文版）卷一，第151页以下。
⑥ 同上书，第147页。土耳其版原文误作碑铭以代替诗。
⑦ 同上书，原文是 čändân bizî ej šâh ki gûjäd Turkî "javlaq qary bolmyš Munmyš Tägin"。

哥汗的手中（原因不明）得到的是讹迹邗，而不是海押立[①]，而讹迹邗在当时是拔汗那的首府。人们不知道他的后代是否能保持住这一城市，上述的阿勒赤·马立克沙是否就是哈剌鲁阿厮兰汗的后代。

城市生活的衰落

卢布鲁克1253年访问过海押立，他在那里逗留了十二天。在他的记载中，把它描写成是一个有繁华市场的大城市[②]。有趣的是，这座伊斯兰教城市有三间属于回鹘人的佛教寺院。哪怕是找到这座城市的任何遗物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其中有各种各样的文化要素并存着。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可确定海押立的地理位置。在海押立以北的若干距离中，卢布鲁克在单有景教徒居住的移民区附近经过，那里有他们自己的教会[③]。但是人们在哲第苏区北部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过基督教碑文。

在海押立稍南，伊犁以北的地区，旅行家还看到一座住有伊斯兰教徒居民的美丽的城市，但是他们说的不是突厥语，而是波斯语[④]。这批移民很可能是不久以前从河中南部迁来的。

无论如何，当时城市生活在伊犁以北的平原已全趋衰落。以前那里有许多城市，但是鞑靼为了利用那里最好的牧场便将其中大部分的城市破坏了。那里也提到大部分地方为突厥蛮所占领。卢布鲁克的话是否应作如下的解释，那是困难的，即它是指突厥蛮这一特定突厥民族，或者这一名称如同在高加索目下的情况那样，特别是在阿拉伯语多数：塔拉奇枚（Tarakime）的形式下

① 术外因书，《吉伯纪念丛刊》卷十六，第58页。

② 《卢布鲁克游记》，第281页。莱蒙德华兹力编的勃拉奴克劈尼和卢布鲁克的原文和翻译，伦敦，1903，第178页。罗克希编《卢布鲁克》，第140页。

③ 《卢布鲁克游记》，第293页，罗克希编《卢布鲁克》，第159页。

④ 同上书，第281页，罗克希编《卢布鲁克》，第139页。

指在经济和智力方面都最落后的居民，特别是突厥居民。第二种解释看来是更有道理的，即扎马尔·卡尔希[1]提到的巴尔什干特和毡的附近的塔拉奇枚人，当时那里几乎不可能有突厥蛮居住。卢布鲁克关于此地文化衰落的报道和中国人常德的记载相吻合，常德是旅行家同时代的人，于1259年经过这里的[2]。常德说："民伙，沟洫映带，多故垒坏垣，问之，盖契丹故居也。"[3]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城市的破坏是和蒙古汗的政策或者突厥人占优势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已经注意到诸汗（其中也有海都）采取一切措施来保护农业活动，不受游牧民的攻击。此外，海都和都哇在拔汗那修建一座新城市：俺的干[4]，后来成为一座大城市，这座新城市逐渐成为纯突厥的。根据巴毕尔的报道，16世纪初的俺的干人，无论在城里或在市集上没有不通晓突厥语的。同蒙古时代的大多数城市相反，在这种场合下没有提到宫殿和一般地提到汗的官邸：汗显然是专为居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他自己而修建这座城市的。

很早就在蒙古帝国爆发的动乱，无论对于商业活动以及对于城市生活都起了破坏性的作用，这种动乱的原因除别的一些原因外，是由于影响蒙古的文化因素的不同而引起的。人们发现这种例子即在同一的汗的家族中，有的儿子是受基督教教育的，有的儿子则是受伊斯兰教教育的。为蒙古所征服的不同的文化民族的代表在汗的斡耳朵中经常施奸计引起互相对立的情况：这种情况也同样见之于任何国家内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斡罗思历史家证明在

---

①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俄文版）卷一，第151页。

② 中国人常德于1259年由蒙古皇帝蒙哥派至他的兄弟旭烈兀那里，他是从蒙古去到西亚的，他的旅行记《西使记》由布莱德施奈窦翻译和注释（见《中世纪研究》），伦敦，1910年，卷一，第109—156页。

③ 布莱德施奈窦：《中世纪研究》卷一，第129页。

④ 关于这一城市的建立，参考H·卡兹威尼书，《吉伯纪念丛刊》第二十三辑，第246页。

金帐汗国内许多斡罗思国君和显贵被消灭的主要原因就是其他斡罗思国君和显贵对他们搞的阴谋。死刑的判决是由鞑靼人宣布和执行的，但是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成为被判罪者的敌人手中的工具。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为蒙古所征服的其他国家。只有成吉思汗第一继承人：窝阔台有能力不为这阴谋所左右和成功地采取不偏不倚的裁判去维持互相敌视的王子和显贵之间的和平。在窝阔台死后不久紧接着开始了斡耳朵中的残杀的时代：十年以后，汗朝的成员开始了大多数被残杀的这种现象（个别的情况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再过十年又开始了各个不同的蒙古帝国之间的战争的时代，以及从一个国家来到另一个国家的完全无辜的商人的被杀害的情形。1262年旭烈兀和别儿哥作战在铁列克附近吃了败仗之后，他命令凡从敌国来的所有商人都毫无例外地处死，而别儿哥对此的回答是杀害来自旭烈兀帝国的商人。在动乱时期，眼前和个人的利益一般说来必然是超过帝国的共同利益。根据历史家的叙述，阿鲁忽为了巩固他在中亚细亚的统治地位在1260年所采取的行动已经是这类性质的了。还有更具特色的，就是1273年在波斯的蒙古人对不花剌蓄意的破坏，他们认为这座城市很可能成为来自突厥斯坦的敌人突然袭击波斯的据点。不花剌不仅在1220年蒙古侵入后很快就恢复过来了，而且在蒙古统治的最早的几十年间就达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繁荣。术外因① 称不花剌为一座“在伊斯兰教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城市，而马可·波罗（他的兄弟和叔父在不花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从1262年到1265年）则称不花剌为“全波斯中最好的城市”②，换句话说就是在说波斯语的所有国家中。甚至反对蒙古统治者的暴动（1238—1239）也无损于城市的繁荣（也不是完全不利的）。马哈木·牙喇哇赤懂得说服蒙古人，特别是窝阔台汗，由于若干少数的暴徒的罪行破坏了

① 《吉伯纪念丛刊》，第十六辑，第84页。
② 《马可·波罗游记》（颇节版）卷一，第9页。

富裕的城市，对于国家权力是没有好处的①。

在动乱的时期中，若干的汗和王子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行动，重要的与其说是城市长期所能提供的收入，不如说是立即能支配大量的财源。从1260年开始，不花剌遭到好几次的强制征税和掠夺，甚至在1273年的大灾难以后，这个城市还经常招引掠夺者，剩余物资还供给了两个暴动的王子即阿鲁忽的儿子以很多的战利品。在这以后有七年（大约是1275—1282年）之久，不花剌完全不存在了。只有当都哇登位时才能采取重新恢复的措施。

上述资料所说到不花剌的情况，无疑的也在别的地区重现，而关于这些地区的资料还是比较稀少的。有关中亚各城市的许多有趣的资料，人们希望从扎马尔·卡尔希的《附录》中得到。《附录》是扎马尔·卡尔希翻译的10世纪的阿拉伯语词典的附录。摩诃末·海达尔是16世纪的一个作家，他谴责扎马尔·卡尔希偏袒自己的出生的城市八拉沙衮。当他列举每一城市杰出的政治家时，只说有十个撒麻耳干人，当他提到八拉沙衮人的时候，则多到人们几乎不能理解，一个城市在同一时期内怎能有那么多的著名人物呢②？当《附录》的唯一手稿尚未被人所知的时期内，人们希望在发表的新闻报道中③，也许会找到有关八拉沙衮精神生活有价值的历史和文学资料呢。但是被发现的手稿中在当时并未能满足这期望，因为在这些手稿中一次也没有提到八拉沙衮城，在出生于这座城市的人当中只有提到作者的司教：沙木斯和他的儿子路克④。其次提到库兹·巴力克⑤，有一个阿力麻里的国君1259年在那里逝世。人们认为同是表示八喇沙衮的，依马木特·喀什噶尔

① 《吉伯纪念丛刊》第十六辑，第90页。
② 《剌失德史》，罗斯译，第364页。
③ 《札记》卷八，第353页。
④ 《突厥斯坦》（俄文版）卷一，第141页。
⑤ 同上书，第140页。

的著作①，还有虎思斡耳朵（这一名称在13世纪也见于中国的转写）②和虎思兀鲁斯的名称。但是下面的情况看来是少有的，即作者不以城市的司教取得外号的名称去命名八拉沙衮。此外我们还在扎马尔·卡尔希的著作中③发现一个不见于其他史料的地理名称即伊尔·阿拉尔忽，在察合台斡耳朵所在的一个地方就是这样命名的。察合台的伊斯兰教徒首相哈巴什·阿米德是个商人，在阿鲁忽统治初期的1260年死于阿力麻里地区的一个城市里，并埋在那里由他修建的一座清真寺中，他的第二个外号就是伊尔·阿拉加威。

扎马尔·卡尔希分别以篇幅不等的各章献给若干城市（阿力麻里、可失合儿、忽炭、忽毡、拔汗那地区的城市：塔史，换句话说即塔什干、巴尔什干特和毡的），给每一个城市以简短的描摹和列举出身于该城市中的学者和其他的著名人物。作者生于阿力麻里④（他的父亲是八拉沙衮人），以后他迁居可失合儿，并访问过其他若干城市。他提到可失合儿和毡的的衰落，前者当时是一片废墟，后者"过去是一座大城市"，虽说当时城市繁盛的商业也还是引人注目的。仅仅提到可失合儿受到哲塔（guta）的攻击，guta一术语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遇见⑤，后来见之于中国突厥斯坦，用作和西突厥斯坦的哈萨克（Qeazaq）一词相同的意义，换句话说是对于那些游牧民集团的称呼，即他们从自己的民族和部落分离出来，变成了绿林匪党。哲塔的袭击是在冬天发生的，年份不明。有大批人被杀害，有5,000名儿童被掳。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下列的报道是有趣的，即在可失合儿地区已不用公牛

① 《突厥语词典》卷一、五，第60、112页。
② 布莱德施奈窦，《中世纪研究》卷一，第18页。
③ 《突厥斯坦》（俄文版）卷一，第140页。
④ 有关他的资料汇编、参考《札记》卷十一，第286页。
⑤ 《突厥斯坦》（俄文版）卷一，第146页。

也不用母牛来耕种，而是满足于园艺工具①（在原文所用的ku-länd一词原来是指斧的）。在今天，可失合儿似乎不再缺少这类耕畜了。

突厥斯坦的伊斯兰化

在13世纪实现了（虽然是缓慢的）突厥斯坦的伊斯兰化和突厥化。还在成吉思汗生前就出现了和屈出律预期即哈喇契丹的预期相反的现象，在这个地区为蒙古占领的时期内，在生活方面仍采用了回民的服装②。伊斯兰教徒现在的地位，在先前的哈喇契丹疆域比之在先前的摩诃末花剌子模沙帝国较好，这是由于后者在若干城市所表现的对蒙古人顽强抵抗的缘故。1221年寻斯干的贵族是由各国民族的代表组成的：长官是具有中国文化修养的契丹人)。伊斯兰教徒经营果园和耕地，但是只有和中国人、哈喇契丹和其他民族合作。几年后在窝阔台统治时期，成为寻斯干和不花剌的长官是一位具有中国人名字或称号的张三太傅，这早在1268年就报道过了③。说明这种情况的大抵还有在不花剌铸造的有中国文字的铜币的事实，而且是这个城市历史上的最初和最后一次。以后我们在穆斯林各省再也看不出非伊斯兰的行政机关，虽然人们也提到东方移民来到了穆斯林各城市。根据常德的报道，在阿力麻里的中国人是和伊斯兰教徒在一起生活的，中国的习俗甚至在这里逐渐占了上风④。

在屈出律时代发生的反对伊斯兰教的迫害的确在蒙古统治时代不再重演了。虽然察合台是蒙古习惯法的热烈拥护者，有时因

---

① 《突厥斯坦》（俄文版）卷一，第144页。

② 布莱德施奈德：《中世纪研究》卷一，第29页。

③ 《札记》卷十二，第3页以下；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四，第345页。——俄译本注

④ 布莱德施奈德：《中世纪研究》卷一，第127页。

为伊斯兰教徒遵守伊斯兰风俗而责难他们。关于察合台之死，术外因引用一位诗人的波斯诗，它是以下面的诗句结束的。由于恐惧而禁止人们冒险进水的那些人，现在自己却沉溺于死亡的大洋之中①。即使察合台本人也有一位名叫马质达丁的伊斯兰教医生，此外，他还受到有钱的商人名为哈巴失·阿米德的影响，据扎马尔·卡尔希的著述，这一有钱的商人是客儿明人。根据剌失德丁的著述，商人是讹打剌城人②。这影响非常大，以致哈巴失·阿米德能给察合台的每一儿子以自己儿子中的一个作为陪伴，哈巴失·阿米德虽然是个伊斯兰教徒，事实上象我们所见到的，他甚至使人修建一座清真寺，但是他对于伊斯兰教教士没有好感，对待他们也不给予任何同情。人们甚至把他称为当时著名的学者花剌子模人尤素甫·撒卡吉被害的主谋人。这位学者除给我们留下伊斯兰世界非常受欢迎的百科全书，书名Miftah al-'ueûm（科学之键）之外，还保存一封写给他的学生名为摩诃末·沙萨克力·札德（大概是西突厥人）的信③④。

关于突厥斯坦这个时期伊斯兰教学者的科学活动，我们知道得很少。我们甚至一点也不知道，改信伊斯兰教的最初察合台汗——木八剌沙和八剌宗教方面的顾问和指导者是谁。扎马尔·卡尔希也称木八剌沙的母亲——额儿根可敦是个女伊斯兰教徒。因为海都不是伊斯兰教徒，所以按照蒙古的风俗，他被葬在位于楚河和伊犁河之间的一座高山上。按照自己的（遗嘱）指定，甚至伊斯兰教徒八剌汗也是葬在山上，换句话说是当作蒙古人来埋葬

① 《吉伯纪念丛刊》，第十六辑，第228页。萨第德·阿瓦尔这首诗也见引于《伊斯兰百科》卷一，第849页。《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下册，第539页。——俄译本注

② 布洛什编，第197页。

③ 布洛克曼：《阿拉伯文献史》卷一，第296页。

④ 关于尤索甫·撒卡吉，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一，第542—544页。——俄译本注

的。但是，海都对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徒并不怀任何敌意。扎马尔·卡尔希（看过海都两次：在他的统治初期和末期）把他描绘成是公正、慷慨、慈祥的和对伊斯兰教徒友好的汗①。

要是知道当时突厥斯坦的伊斯兰教学者对于帝国内其他文化因素的认识达到什么程度，那会是特别有趣的。关于这一方面，有关突厥斯坦学者海白特·阿拉（后来迁居波斯，在合赞汗统治时期② 即1295—1304年死去）的报道表示了十分突出的现象。根据剌失德丁的报道，海白特·阿拉精通突厥语和叙利亚语，具有一切科学的知识，演讲全象司教一样。但是合赞汗却把他列入第二流的学者中，把他和参加政务的官吏相比拟，但不能进入国库大厦（财政部）。合赞汗补充说："我对此并不感到惊异，他和他的同行不认识隐秘的东西，但是，凡是他们知道的东西，我都高兴，因此尊敬他们。从这里我们可作出结论，海白特·阿拉与其说是个神学家，不如说是个世俗的学者③。可惜他的著作一点也没流传下来。

中亚蒙古人的突厥语

当时突厥语的重要性表现于下列事实，例如剌失德丁的著作，当它说及成吉思汗的家庭时，他们是混合使用蒙古语词汇和突厥语词汇的。蒙古语那颜（nojon）（作为突厥语beg意义用的君主），在帖木儿时代以前在突厥斯坦是当军事贵族的意义用的。在成吉思汗时代，用作军事领袖的最高那颜，是他的儿子拖雷。这个职位是用蒙古语 jeke nojon（大那颜，大君主）来表示的，但是此外，代替蒙古语形容词的，有个相同意义的突

① 《突厥斯坦》卷一（原文），第138页。

② 《伊斯兰百科》卷二，第158页。

③ 《米尔·伊斯兰》，第82页以下，最后引用的一节见第83页。

厥语形容词，那就是采用突厥语的ulugh nojon。

但无论如何，我们从伊斯兰教徒方面看不出有使突厥语成为官方语言的任何尝试。当普兰·迦尔宾1246年离开蒙古的时候，人们托他带给教皇一封用"萨拉森语"写的书信①。近年来伯希和教授②确证，这封信是用波斯语写的，日期是回历644年（即公元1246年11月）祝马达拉喝勒月月底，它直到现在还保存于梵蒂冈的档案中。这封信行文很多错误，因而说明波斯语不是作者的本国语言。这封信的头衔是用突厥文写的。值得注意的是，没有贵由汗的名字，这封信是以"大兀鲁思和全界的汗"的名义发出的。这封信的原文有突厥的单词和用语，人们得假定，这封书信的作者是个出身突厥族的中亚商人，他是竭力用波斯语来写的。换句话说是用他们国家里当作文学语言的语言来写的。

统一的企图

由于政治的混乱和因此而带来的商业关系的中断，结果对中亚蒙古人的影响比之对其他蒙古国家的影响要坏得多，为此打开了一条通向大海的道路（金帐汗国也不例外）。从这里也许说明，正是在中亚恢复蒙古帝国统一的伟大计划是采取蒙古封建国家的联盟的形态的，使得商人可自由地，质言之不受强制征税，从一个国家去到别一国家。历史家把这计划的创意归之于察合台汗都哇，他成功地说服察八儿，为此派遣使节到其他的蒙古政府中去。到处人们都表示同意，中亚的使节首先去到中国铁木耳那

① M.达瓦扎克编的《迦尔宾蒙古游记》卷四，巴黎，第594和745页。里施译《迦尔宾游记》，第47页。有库玉克图章的这封信的波斯原文，在梵蒂冈的档案库中找到，同时参考康慕洛夫《马可·波罗的同时代人》，伦敦，1929年，第16—17页。——德文本和俄文译本注

② 伯希和：《蒙古与教廷》，载《基督教东方杂志》，三辑卷三（1922—1923），第3—30页。

望。铁木耳是在1294年去世的忽必烈的孙子和继承者。伴随铁木耳的使节一起来的有察八儿和都洼的使节，他们于1304年9月到达波斯的蔑剌合，那里正是刚登位不久的算端完者都①。1305年完者都送给法国国王腓力普第四一封蒙古文书信，内容是通知同意对方的意见。这封信保存在我们的手中，看来它是我们所知道的有关这协定的唯一的蒙古语文献。这封信解释过去的战争不是由于汗的坏意和贪欲，而是由于悖德的臣下的恶言中伤。原文后面说，现在恢复了和平，汗的家族的全体成员，无论是年长的或年幼的都一致同意开放所有的道路，第一个违反这协定的人，会受到其他所有的人的反对。这封信道出了以下天真的意见，即佛兰克算端，质言之欧洲的统治者应当缔结类似的和平协定，同样地大家一起反对可能破坏和平的人。当时在欧洲发生腓力普第四和罗马教皇和解，苏格兰为英格兰人征服的事件。由于英王爱德华第一（1272—1307）接到一封同样的信件，新王爱德华第二在他的1307年的回信中只能表示这样的愿望，即依靠上帝的帮助，各地发生的争端和战争应该让位于互相谅解和和平②③。

关于协力反对一切和平的破坏者的协定条款，也象蒙古帝国中过去和以后所常见的那样，自然仍是一纸空文而已。

在下一讲中，我们将看到14世纪上半叶是突厥斯坦内战更激烈和文化更衰落的时代。

---

① 《多桑蒙古史》卷四，第483页。

② 同上书，第593页。

③ 关于蒙古和西方各国的关系，参考西诺尔《导论》，第314—318页；穆士塔尔特和克力夫斯《通信》。——俄译本注

·第十一讲·

突厥斯坦的内乱和文化衰微及帖木儿时代，帖木儿的性格和国家组织

可惜我们不掌握任何关于蒙古各国之间和平的恢复以及和平再次被破坏的资料。扎马尔·卡尔希（他的报道写到1303年春）对于这一协定的内容毫无所知。他仅仅自信说，“我们的可汗”有足够的兵力足以防御忽必烈的孙子及其继承人铁木耳征服中亚诸城市的一切企图。同一作者还称都哇是察八儿政权的坚强的支持者。这些报道显然是早在1305—1306年爆发的这些汗之间的战争以前写的。

关于这次战争及其后果，正如直到16世纪初在伊斯兰教徒中亚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只掌握波斯文写的资料。根据这些报道①②，在撒麻耳干和忽毡之间窝阔台王室和察合台王室的宗王发生了冲突。都哇派遣使节到察八儿那里去，说明这一冲突是“年幼的轻率行为”，并建议停战和在塔史召开一个确定争端发生原因的仲裁会议，察八儿对此表示同意，但是察合台宗王却在很短的时期以后中断了休战，很可能得到了都哇的同意，虽然他对此是采取保留态度的。除河中外，答剌速河沿岸也遭到了抢掠。此时，铁木耳军队攻击也儿的石河岸边和阿勒台山附近察八儿的国境哨

① 资料是瓦撒夫的著作；参考巴托尔德《七河史纲》，第60页以下（《七河省统计委员会备忘手册》卷二，第133页）。

②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上册，第72—73页。——俄译本注

所。它明确地说明了是都哇引进这一军队的。所有的人几乎都离开了察八儿，他只带领骑兵300人来到都哇那里，并归顺于他。察合台王室在中亚的优势是这样恢复过来了。

这内战还延续了一段时期，直至1309年夏怯伯国君召开的忽里勒台大会止，怯伯是都哇的儿子（都哇已于1306年去世），窝阔台王室几乎全部宗王或部分逃去，或部分失去他们的领地。在海都所有儿子中只有一个名为沙的，保留一千名特殊军队和自己特殊的牙帐。

波斯历史家瓦撒夫把这次内战同河中和突厥斯坦的农业、商业的全面衰落联系起来。在河中，农业的传统是根深蒂固的，因而城市和农业移民区的完全消失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但是在位于更北的地区则形成另一情景了，关于这个，阿拉伯著作家奥马利（1301—1348）重复了一个访问过突厥斯坦的人的话说道："人们在突厥斯坦只能发现保存得或好或坏的废墟。从远处人们看见一个繁荣的移民区，四周为深绿色所包围，但是当人们走近前去，希望碰上居民时，人们找到的却是空无一物的房子。境内的全部居民都是游牧民，绝无从事农业的。①

突厥斯坦诸汗

1309年的忽里勒台大会使得突厥斯坦的灾难告终。怯伯的长兄也先不花（Isan Buqa）②即汗位（这一名字的第一部分是蒙古字），那时突厥斯坦遭到了来自中国的蒙古军的袭击。靠近和布克和也儿的石河上流诸川的地区是大汗帝国的边区。来自这个地区的军队深入到察合台系的领地，掠夺也先不花的立脚地，他的冬帐

① 《简志和摘要》卷十三，第一册，第257页以下。
② 土耳其版原文作Juqa。

在热海附近，夏帐在答剌速附近①。从一个15世纪初的无名氏的历史家的记载可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掠夺行动不仅来自敌人的军队，而且也来自察合台汗本身的军队。根据这一记载，也先不花和怯伯率领军队反对从哈剌火州侵入的敌人——也先不花来自可失合儿，怯伯来自阿力麻里。前者打算在途中破坏一切，认为如果失败时，敌人将一无所得，但如胜利时则将会比较容易把文化恢复过来。恰好相反，怯伯竭力使得他经过的地方促使地区繁荣起来，以便在胜利的场合，使敌国的居民在自己的正义的感召下，比较容易站到自己这方面来，在失败的场合，自己的臣民将和他一起和使得他易于撤退。也先不花被打败了，因而怯伯也不得不撤退。在回来的路上，也先不花的军队忍受一切的困难，甚至不得不宰吃自己的马匹，而怯伯的军队则处处找到一切必需品。

也先不花的后继者是怯伯（1318—1326），他的统治，在使中亚的蒙古诸汗逐渐受到了伊斯兰文化支配的历史上似乎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完全和他的前任一样，怯伯仍然是个异教徒，但是他迁居到河中，甚至迁往该地的南部，在那里修建一座宫殿距离位于喀什卡达里亚下游的那黑沙布2.5帕拉桑，质言之即15卫尔斯特的地方。作为萨莱（宫殿）意义用的，蒙古人也在蒙古本部使用卡尔希这个字，当时的著作家，认为它是来源于蒙古的，虽然人们早在《福乐智慧》和在马木特·喀什噶尔的著作中②，已找到这个词，后者一点也没有说明这个词是否仅为东突厥人所使用，或者也为西突厥人所使用。看来，突厥人是从中国突厥斯坦的土著居民的语言中假借来的。那黑沙布城是按照其中宫殿的名称，而取得卡尔希一名的③④，这一名称一直保存到今天，虽然现在的城市位

---

① 这里的资料是剌失德丁《史集》的继续。关于剌失德丁著作续补的作者，看来是Хафиз-и Абру；《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上册，第72页，注56。——俄译本注

②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354、215、376页。

③ 《突厥斯坦》（英文版），第136页。

④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一，第190页。——俄译本注。

置，已不相当于蒙古以前时代的城市位置，也不相当于14世纪的城市位置。同样的情况，我们也在突厥斯坦中遇见有这样的例子，即在蒙古帝国境内习惯于将汗的宫殿的名字用来作为城市的名称。

怯伯的另一革新是在铸造有汗的名称的货币，如同在波斯一样铸造大小两种银币即第纳尔和第尔罕，一个第纳尔值六个第尔罕。货币的铸造象从前一样，是在河中的大城市：不花剌、撒麻耳干，讹打剌和忒耳迷（按《西域记》作怛密）进行的。按照怯伯的名称，后来这种货币也就叫做 Kebekî 了，并常错误地把这一名称和俄国的戈比（kopeika）相提并论。人们也发现有铸造无名氏的货币的例子，和金帐汗国的情况完全一样，带有回鹘字母的突厥文字：gutlugh bolsum（愿他幸福！）。据我们所知道的，在察合台汗的货币上没有使用蒙古字的任何例子。

更令人惊讶的事实是，我们后来在帖木耳的若干货币上发现有用阿拉伯字母写的蒙古字 üge manu（我的话），相当于突厥语的 söziim①②。

对于诸汗来说，迁往河中定居和修建一座宫殿，并不意味着放弃游牧生活。成吉思汗1220年夏是在喀什卡达里亚河谷西部度过的，从那时开始，这里已经吸引了许多游牧民，主要在夏季。还有，和怯伯比较，他的最近的继承者之一，他的兄弟答儿麻失里（1326—1334）更多地掌握伊斯兰文化，他改奉了伊斯兰教，但是，答儿麻失里在接待游历家伊宾·巴图塔时，即使是冬天也是在帐篷中的。

没有资料证明，当时察合台诸汗是通晓蒙古语言的。伊宾·巴图塔指出怯伯说的语言是突厥语，答儿麻失里接待伊宾·巴图塔

① 《札记》卷十二，第366页。

② 关于察合台国家的货币流通和怯伯的改革，参考马松《关于察合台古钱学的历史短篇》。——俄译本注

时是用突厥语来问候的。汗的宗教方面的顾问依马木忽辛丁雅基是操波斯语的，但是汗在每天太阳升起之前早祷后用突厥语朗读齐克尔（或古兰经）。伊宾·巴图塔引用的几个突厥字是从回鹘语直接引入蒙古语的，并为全蒙古帝国所使用；例如al tomgha（朱印），一术语，在波斯各处缩写为阿勒（al）。tamghagy或nišaangy或mühürdâr即掌玺官，管理全部文书手续，看来也懂得阿拉伯语，因为他是担任伊宾·巴图塔的翻译的。伊宾·巴图塔采用突厥字toi（宴会）来表示忽里勒台一事是有兴趣的。根据他的意见，toi是每年召开一次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成吉思汗的后人，异密，贵夫人和军队首长。在伊宾·巴图塔的时期，没有召开过toi（会议），这是当时受到指责的一件事，人们用这类指责说明反对答儿麻失里的暴动是正确的。

根据奥马利的意见，答儿麻失里之信奉伊斯兰教，对活跃河中和其他伊斯兰教地区之间的商业关系极有帮助①②。但是，这事又扩大了河中地区和察合台帝国东部地区间的疏远。依据依宾·巴图塔的记载，汗照例每年一次去到东方，即在和中国接壤的地区，那里有阿力麻里城，这座城市一直被认为是汗的首都所在。然而答儿麻失里先后四年都滞留在和呼罗珊接壤的地区。虽然答儿麻失里忠诚于伊斯兰教，但是他毫不放弃对伊斯兰各国的战争，即在他的统治的初期，他就在1326年实行对呼罗珊灾难性的进军，通过这一战役波斯蒙古人占领和掠夺了哥疾宁。1329年他侵入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度和几乎达到德里。但是在内政方面，据伊宾·巴图塔的记载，他是反对蒙古的习惯法——扎撒黑（扎撒）的③，但这和信奉伊斯兰教无关，因为15世纪初期一个很熟悉草原传统的无名氏的作者也说答儿麻失里是违背扎撒黑法令的规定的。

① 《简志和摘要》卷十三，第一册，第238页。
② 《巴托尔德文集》卷一，第89页，注①。——俄译本注
③ 参考《突厥斯坦》（英文版），第41页，注④。

这后一事实在突厥斯坦重新引起了纷争，时间一直延续到1346年或1347年①，结果河中诸汗的政权，事实上没落了，河中和东方地区完全分开了。战争行动扩大到多大程度？战争对于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衰落有什么影响？这是不易于明确的问题，因为在伊宾·巴图塔的著作中我们只找到关于军事部署的报告，他的报告无论就编年史的年月，或是其他的报道而言都和历史家的记事有很大的出入。在答儿麻失里被废和暗杀以后的几年，汗的官邸，无疑是再转移到了东方，同时伊斯兰教的影响因而在相当时期内逐渐减少。在靖克失汗统治的时期内（直到1338年），他的货币也在河中铸造，天主教宣教师在阿力麻里附近修建了一座华丽的大教堂。根据我们上面引过的无名氏的伊斯兰教著作家的说法，靖克失和苾刍，换句话说和佛教僧侣商议有关的事务。但是反对伊斯兰教的反作用不能有持久的效果，有一个系出突厥族的司教从1340年初在河中即位。他显然被看作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这后来成为算端的司教，有个时期是著名的布哈拉圣人巴哈丁·那克什般德（1318—1389）的宗教方面的顾问。后者的传记叙说他在梦中看见了突厥圣人哈奇木·阿塔。巴哈丁本人无疑的是个塔吉克人。在这一梦中他得到这样的解释，他的宗教方面的老师是突厥人的伊斯兰教托钵僧。当巴哈丁遇见伊斯兰教托钵僧哈里勒时，托钵僧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认为预言就是指他说的，巴哈丁留在那里，直到哈里勒就位及以后的时期。当哈里勒去世后，他自信今后地上的财富都不过是一场虚空而已。他开始了苦行者的生活。

历史著作中没有提到察合台系的算端中有名为哈里勒的，但是伊宾·巴图塔的著作都记载了在动乱时代的统治者中有察合台系王子牙撒吾儿的儿子哈里勒，据说在和答儿麻失里的最初继承

① 土耳其版原文作1377年。

人不赞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历史家提到的无论是靖克失或其他的汗，在伊宾·巴塔图的著作中均无记载），不仅攻占了阿力麻里，而且也攻占了哈拉和林和别失八里。以后和中国皇帝缔结了和约，返回撒麻耳干和不花剌。他的主要的战友是忒耳迷的统治者阿拉·木勒克·赛义德，他采用火答温德·咱德的称号。接着，哈里勒由于若干突厥中伤者的教唆，把阿拉·木勒克处死了，他这一做法是使其失去政权的原因。他成为哈烈统治者胡赛因的俘虏，据说直到伊宾·巴图塔1347年春离开印度时，他还过着俘虏的生活。

尽管这一记事是带有幻想性质的，但是哈里勒的存在却从回历742年和743年（1342—1344）在不花剌铸造的、有算端哈里勒·阿剌（Chalil Allah）的人名的货币中得到了证明。有些历史家只知道牙撒吾尔诸子中有一个算端：哈赞（Qazan，我们也掌握有他名字的货币）。同怯伯和答儿麻失里一样，他也生活于喀什卡达里亚河谷，在离卡尔希有两日程之远的地方修建了一座为赞吉萨莱的宫殿，1346年或1347年在和起来暴动的游牧民首领的战斗中他丧生。哈赞和哈里勒·阿剌是否看成是属于同一个人的两个名称，暂时还未能确定。

突厥诸异密

当哈赞去世后，河中的支配权便落入突厥诸异密的手中，波斯的史料就是这样说的。表示这一相同的意义，突厥人是用匐（bek）一词，也往往用蒙古语那颜一词。在这些异密中第一个异密就是哈萨汗，他的冬天驻地是在阿姆河岸的萨里·萨莱的地方，（现在是忒耳迷河上流的沙莱居民点）。这一地方恐怕是从察合台诸汗的时期开始就起着这种作用的。根据15世纪初一位无名氏的作家的报道，哈赞汗就是埋在这里的，根据名称来判断，汗的宫殿也在那里。阿姆河沿岸从古以来就是游牧民的冬帐所在地。

1220—1221年，成吉思汗在那里度冬。夏天哈萨汗转移到猛克和巴勒尊附近的山地。

哈萨汗和他的后继者使充当傀儡的伪汗就任的首先是察合台王室，其次是窝阔台王朝的人。有这些汗名的货币只有在河中府铸造(从忒耳迷到讹打剌，和白水胡城到赛兰都包括在内)。我们知道，河中异密的统治也伸展到阿富汗的北部，但是有关这一事实的古钱学的证据，显然是没有的。当时察合台汗国的东部地区政治上是完全和河中分开的，统治那里的有他们自己的汗和他们的大异密（Ulus-Emire），他们在一定时期内立某人为王。中亚以后的历史的演变是在河中，异密把权力巩固地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从他们中间产生了一个象帖木儿那样有名的人物，他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的缔造者。虽然到了他的后继者逐渐缩小到一定程度，他们逐渐放弃了使用傀儡的汗以掩饰他们现实权力的惯例。

东突厥斯坦诸汗

另一方面，在东方出现了汗的王朝，它逐渐地夺取了异密的一切权力。这些汗中的第一个汗就是秃黑鲁·帖木儿，他生于回历730年（即公元1329—1330年），年18岁① (即回历748年公元1347—1348年)当了汗。这一时间上的一致可以推论秃黑鲁·帖木儿登位和哈赞汗去位的因果关系，尽管在史料中没有找到这种联系的任何暗示和没有明确察合台国家完全瓦解的日期。

有关阿力麻里和河中的政治分裂在何时出现，没有任何详细的报道。宣教师马利克诺里1341年经过这座城市②，他说他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教堂，自由传教。虽然在以前不久，有若干传教士

① 土耳其版原文作81。

② 玉尔：《契丹及其通道》，伦敦，1914年，卷三，第190页。马利克诺里在察合台汗国的首府阿力麻里是1340—1341年。Jale按勘误表作Jule。

身遭不幸，但是他没有提到当时据有阿力麻里的汗的名字。继阿里算端之后统治阿力麻里的是摩诃末孛罗。阿里算端是基督徒的迫害者，是出身于窝阔台后人的一个宗王（此外，在伊斯兰教的史料中，他被称为残酷的暴君）。公元1345（回历746）年在阿力麻里铸造的一枚货币上有摩诃末的名字。据我们知道的，这是阿力麻里最后的一枚货币。所有这些汗的名字后来被蒙古人遗忘得几乎一干二净，以致拉施德史的作者摩诃末·海达尔在16世纪利用蒙古的传说时，把秃黑鲁·帖木儿称为也先不花的儿子，而也先不花很难说在1318年以后还活着。在较早的史料中，都哇的另一个儿子：亦迷火者被称为秃黑鲁·帖木儿的父亲。为了消除史料中的这一矛盾，阿布哈齐认为亦迷火者（或如他自己写作亦勒火者IlChoğa）同样具有也先不花的名称。无论是古代的史料或是后世的史料都没有提到秃黑鲁·帖木儿系出身于汗的家族，他的母亲在自己的配偶去世后，和某一异密结婚，根据另一资料，他甚至在其丈夫生前就同他结婚了。秃黑鲁·帖木儿在这一异密的家中长大，异密并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很有可能，关于秃黑鲁·帖木儿出身大汗的家族的故事，是由都黑剌氏族的异密所创造出来的。在没有真正的汗的家族后裔的情况下，秃黑鲁·帖木儿在察合台汗国东部地区被立为汗。

突厥化的蒙古帝国：帖木儿和帖木儿汗国

有关帖木儿历史的资料[①]

很有可能，我们根本无法用最概括的手法，把14世纪和15世纪中亚的生活状况介绍出来（如果不是深入到象帖木儿帝国之建立

① 法文版这一节以下编为第十二讲。——汉译者注

那样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去①)。有关的包罗万象的历史文献出现了，有一部分是根据帖木儿本人倡议写的。在帖木耳出征的故事中包含有许多同伴的名字，其中有关于他们的出身家族居住地和他们祖先生活的地方的资料。有关帖木儿本人的言行，他的敌友的言行的资料，同时也提供了有关帖木儿出生环境特征的宝贵资料。可惜这种资料直到今日不但还没有被人研究，而且也没有公布。

帖木儿本人统治时期的历史，根据他的倡议是由本身是波斯人用波斯文来撰写的，我们得到的有三种著作。其中第一种是1915年由圣彼得堡科学院根据塔什干现存的唯一手稿出版的。第二种是尼咱木丁所撰，写到1403年，已经定名为《Zafer-nâmel》，意为《武功记》，书名是帖木儿自己所想出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全部出版。除了伦敦现藏的手抄本外，还有一部完全的抄本，收入1417年哈非兹·阿不鲁（Hafiz—i—Abru）所整理的历史汇编中，这一手稿存君士坦丁堡②。最著名的是第三种，这是舍利甫丁的《武功记》，于1419年开始，于1425年完成。但是直到现在，这部著作只有一部没有经过鉴定的印度版本，和一部完全过了时的早在18世纪翻译的法文译本容易得到，其中有一篇导论，是反映帖木儿进入政治舞台以前的世界历史概要，其中也包括蒙古帝国的历史在内，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版③。

此外还有一系列的没有出版的有关帖木儿历史其他的手稿，其中有一本无名氏的，写于1412年的普通历史著作，是献给帖木儿的孙子莎勒坛亦思痕迭的。在迄今人们所知的限度内，这部著作只保存两种手抄本，藏于伦敦和列宁格勒，在巴托尔德有关

---

① 关于帖木儿及其有关资料，更详细的参考巴托尔德：《兀鲁克伯克》、《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下册，第27—62页。——俄译本注

② 达乌德·易卜拉欣·帕沙图书馆909号（《札记》卷十七，第138页）；尼咱木丁沙米，《帖木儿武功记》，由姚依编，于1937—1954年出版。——俄译本注

③ 新版（但没有索引）于1957年在德黑兰出版。——俄译本注

“兀鲁伯”的研究中，是作为无名氏亦思痕迭史而引用的①②。象舍利甫丁那样，作者是用波斯文撰写的，但是同前者比较，他对于中亚细亚的传说和见闻有着较为丰富的知识。这本著作和尼咱木丁的著作一样，同为哈菲兹·阿不鲁编撰他的篇幅浩瀚的历史著作《历史的根本》所利用，他是1423年开始为了帖木儿另外一个孙子拜宋豁儿撰写的。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完全的本子，有关帖木儿统治时期那一部分的本子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出版，因此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由于后来的历史家阿不德·拉扎克（1413—1482）的著作才知道，这部著作一直写到1471年。阿不德·拉扎克本身的著作也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版③，虽然我们得到许多好的草稿。

除这部著作和有它用波斯文写的著作外，还要指出的是奉汗之命，由畏吾儿博士用畏吾尔文字和畏吾尔语言写的编年史《汗的历史》。这是由16世纪初月即别人的著作家所报道的，他手上显然还有这部书的手本④。博士（蕊舞）⑤一词在这情况下自然不应理解为佛教的僧侣而应理解为用畏吾儿文起草公文的官吏⑥。我们知道不仅在察合台诸汗身边和帖木儿身边有这样的官吏，而且直到15世纪后半期的帖木儿的诸继位者的身旁也有。显然在这本书中以及在无名氏亦思痕迭史的著作和摩诃末·海达尔的著作中所利用的草原传说，与其说是历史事件，不如说是地方传说和英雄故事。有关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的帖木儿祖先和甚至更早的在

① 关于这一研究，后来再有一次，见《科学院公报》，1929年，第165页以下。

② 巴托尔德改为穆因·纳丁·纳珇齐的著作；参考巴托尔德《论无名氏的亦思痕迭史》；同上，《再论无名氏的亦思痕迭史》，这一著作的摘要于1957年出版。——俄译本注

③ 卷二，由穆罕默德·沙菲出版，1941—1949。——俄译本注

④ 《札记》卷十五，第188页。

⑤ 《突厥斯坦》（英文版），第388页，bachši 梵文作bhikshu 是佛教居士的意思，在蒙古文中是抄写人、职官的意思。

⑥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一，第454页。——俄译本注

中亚细亚地方所起的重大作用的传说很可能都是帖木儿的畏吾尔书记官所创造出来的。

欧洲的学者常常对《四大汗国史》一书的遗失表示惋惜，据说这部书是帖木儿的孙子兀鲁伯用波斯文写的。我们在16世纪的历史家晃迭米儿[①]的著作中发现了有关这本书的许多引文。此外，在河中，大约也是16世纪用波斯文进行写作的（这本著作的两种手稿保存于伦敦；其中一种早在1838年出了一本不大令人满意的英译本[②][③]，另外一个著作家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兀鲁伯著作的缩写本，虽然他无疑地对此作了若干补遗）。从晃迭米儿的著作中，人们看出四汗国的历史实际上不是由兀鲁伯本人而是用他的名字[④]编撰的。总的说来，它只是复述了剌失德丁的著作和若干不甚重要的内容及尼咱木丁著作的绪论[⑤][⑥]，因此，这部著作的遗失，对科学界来说并不是重大损失。

无论如何，我们没有丝毫理由设想蒙古和帖木儿帝国时代的中亚历史著述创作了和能够创作同剌失德丁的著作相等价值的著作。在中亚可能也知道蒙古的金册的传说，这一传说除了波斯之外，还在中国进行了文学加工，但是，我们不掌握有关这一传说在中亚传播情况的任何资料。

剌失德丁的著作在突厥民族中间取得普遍欢迎的原因大抵是由于它给游牧民生活的形象以明白清晰的描写。但是他的著作这一方面受到的欢迎显然是在小亚细亚的西突厥人中间比在突厥斯坦的突厥人中间早得多。在突厥斯坦剌失德丁的著作和舍利甫丁

① 《蒙古诸汗史》。

② 《突厥系谱》由迈尔兹英译。

③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一，第105—106页，注6。——俄译本注

④ 巴托尔德：《兀鲁伯》，第113页；此外，参考《突厥斯坦》（英文版），第56页；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下册，第141页。——俄译本注

⑤ 《武功记》；参考《突厥斯坦》（英文版），第54页，注①；《札记》卷十八，第38页以下。

⑥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一，第102—103页。——俄译本注

所撰写的帖木儿历史①，在16世纪初才为月即别汗忽春赤翻译成突厥文②。相反，在小亚细亚，剌失德丁的著作早在15世纪就为编写《塞尔柱克王室历史》大量地利用，而这部历史又是为献给奥斯曼莎勒坛穆拉德第二（1421—1451）而写的。这部著作中有些部分是拉翁季和伊宾·比比的波斯文著作的翻译。其中作者也利用了成吉思汗的谕旨（见引于剌失德丁），把它译成突厥文，作者大胆地把它归之于自己民族的神话祖先乌古斯汗。有一个突厥学者③认为《乌古斯纪》包括有突厥的原始立法，据说为成吉思汗所抄袭仿效。但是同波斯原本作个比较，分明表现出前者是原稿，后者是翻译。突厥作者在波斯文手稿中有一处地方把seg（狗）读成seng（石）。

因此在突厥文的原稿中就以"狗坠入水中"代替了"石坠入水中"了。

关于帖木儿的传说

如果把剌失德丁所提供的资料和人们在突厥斯坦（14世纪和15世纪）有关13世纪的事件的叙述作个比较，表明了这些叙述是没有真正的事实的根据，而纯出于虚构，目的在于说明或辩护已存事实的情况。它也发生于帖木儿帝国内以及和河中分开的一些东部地区。帖木儿出身于突厥化的蒙古部落即巴尔拉斯（Barlas）部落（蒙古文为Barulas），当时这一部落占有喀什卡达利亚沿岸的地区。从剌失德丁的著作中可以知道，察合台异密之一，哈剌察儿后来被看作出身于巴尔拉斯氏族的帖木儿的先祖。无论对哈

① 回历828年，公元1425年撰的《武功记》，见《突厥斯坦》（英文版），第53页；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一，第102—103页。——俄译本注

② 《札记》卷十五，第251页。

③ 奈希布·阿西木，《真理的礼物》，胡特斯马（M. Houtsma按勘误表作Hartmann，《伊斯兰东方》卷三，第37和198页）。

剌察儿或是对他最近的后继者，剌失德丁都没有就此提到他们在国家行政方面起过任何重要的作用，而在帖木儿时代形成的哈剌察儿和他的后继者的传说，他似乎是察合台帝国的专横的君主，好象和后来的帖木儿的情况一样。这一统治之取得据说是依靠成文的协定，这一协定首先在成吉思汗的先祖合不勒汗和哈剌察儿的先祖、他的兄弟卡朱立之间缔结的，以后又改订了好几次。人们同样地提到在14世纪动乱之际遗失的另外的文献。因此，另一个突厥化的蒙古部落的代表都黑剌在14世纪中叶，占有一个辽阔的地区，除了中国突厥斯坦之外，还包括费尔干纳、七河流域南部直至热海(伊塞克湖)的地方。也断言他们的先祖奥尔图波是从察合台得到这一地区的，而剌失德丁在提到都黑剌部落时说，在他们的代表中间直到剌失德丁的时代，还没有一个有声誉和威信的人物。

突厥化的蒙古人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无论在中亚的东部或是西部，突厥化的蒙古部落起了重要的作用。历史家没有列举分列在两个帝国的游牧民的氏族，但是在氏族的各个名称中人们几乎找不到从前的突厥民族中的氏族名称。人们在帖木儿帝国内提到钦察氏族，但是没有提到哈剌鲁。畏吾儿是被记载为帖木儿和他们的后继者的突厥书记官所出的氏族或民族，但是他没有只字提到畏吾儿所占据的地域，对于其他若干氏族也很少提及。剌失德丁只提到成吉思汗交给察合台支配的正规的蒙古军队 4,000人①，但是 14 世纪人们在中亚游牧民氏族的名称下所见到的很多的蒙古民族的名称。可以推断，后来有许多蒙古人来到了突厥斯坦。显然，这一民族的

① 土耳其版原文误作alaj。

代表是散居在各个地区的。我们往往在帖木儿的统治下以及生活在东部地区的汗的统治下的氏族中遇见相同的名称。列入这些氏族中的也有都黑剌。异密道德是出身于这个氏族的，他是帖木儿姊忽都鲁·秃儿罕（Qutlugh Turkan）[1]的丈夫，得到帖木儿的完全信任。同样，人们在东方的省区也见有巴尔拉斯氏族的名称。

察合台和蒙兀儿

值得注意的是，察合台这一名称仅仅是为指称帖木儿帝国的游牧民而保存下来的，虽则在东部省区被看作是察合台后人的诸汗具有重要得多的意义。但这一地区的游牧民称他们自己为蒙古人，他们的国家为蒙兀儿斯坦（Mogholistan）。在中亚，蒙古的民族一开始就是采取这种形式mogol，缺n-，虽说在蒙古文献中往往是写成 mongol 的。在迁往西方的蒙古人中，保存自己语言直到今日的，只有生活于阿富汗的一个部落。他们称自己为蒙兀儿。因为蒙古人把自己看作是中亚游牧民传统的纯粹的代表者，所以他们把察合台人轻蔑地称为混合来源的人们，“杂种”——卡拉纳斯[2]。另一方面，作为中亚蒙古国家观念的传统的代表的察合台称蒙兀儿为“强盗”[3]。这个名称在欧洲科学界有时当作古代格特人的称谓，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一样，实际上它和15世纪突厥中亚地区的哈萨克一字用于指游牧民一部分有相同的意义，而这一部分的游牧民从其所属的国家中分裂出来，而又与之处于战争状态的。

14和15世纪的蒙兀儿，从语言来说在多大程度上是蒙古人，

---

① 作Терекен。——俄译本注

② 土耳其版原文中显然误解为俄文的 metis(Mestize)（白种人与印第安人所生之混血儿），在误刊的影响下，则变成了 meliz。

③ 奥斯曼语作čete。

蒙兀儿人和察合台人之间的敌对关系是否可以理解为象蒙古人和突厥人之间的民族敌对关系，那是不完全清楚的。有若干征象表明，蒙兀儿的语言在16世纪初还是属于蒙古语的。八八儿说道，他的伯父[1]蒙兀儿阿黑麻汗有个别号名为阿拉吉，而这个词在蒙兀儿人和卡尔梅克人的语言中是“杀人犯”（Mörder）[2]的意思。另一方面，摩诃末·海达尔把蒙古人和吉利吉思人看作是同一民族，他所看到的两者之间的唯一区别是蒙古人信奉伊斯兰教，而吉利吉思人则依然是异教徒。阿黑麻汗的儿子：赛义德汗（于1533年[3]逝世）已经用波斯文和突厥文写诗了。摩诃末·海达尔把蒙兀儿和东突厥斯坦的原始居民区分开。并特别理解“蒙兀儿斯坦”为在西方邻接巴尔哈什湖附近的草原（它形成蒙兀儿斯坦和月即别斯坦的界线），在东方直抵卡尔梅克人的地方，在北方以叶密立和也儿的石两河为界线，在南方则是费尔干纳和从可失合儿直抵巴尔库尔（原称巴尔斯库尔的东突厥斯坦）。16世纪蒙兀儿人为卡尔梅克人和吉利吉思人逐出这一地区，但是根据摩诃末的报道，他们仍有30,000人左右留在可失合儿。可失合儿的自然条件是不适于保持游牧的生活方式的。在17世纪末，汗朝瓦解后，蒙古人必然迅速地转化为定居的土著居民，不可避免地忘记他们自己的名称了。至于说到语言方面，游牧居民和定居居民之间的差别长期以来显然不再有什么差别了。11世纪马木特·喀什噶尔时代存在的干什克[4]的名称显然是很久以来就被遗忘了。

因而在蒙兀儿地方的情况，并不象在察合台地方的那样，一开始就存在有突厥人和塔吉克人或萨尔特人之间的对立，虽然在游牧民受到伊斯兰文化影响较少的东方，其生活方式的差别是比

---

① 土耳其版原文误作dede（爷爷）。

② 庇维玉什：《八八儿传》，《吉伯纪念丛刊》，第一辑，第11页（alaġa alaġy）。

③ 土耳其版原文误作1522年。

④ 《突厥语词典》卷一，第399页。

较大的。例如在蒙兀儿人中间下面的战士是享有特别的声望的，即当他们年青的时候，在沙漠中，山上或树林里度过一段时期的完全孤寂的生活，这里距离最近的居民点有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旅程，他们以自己所宰杀的动物肉来养活自己，用野兽的毛皮作为自己的衣服。在察合台那里，诸如此类的生活习惯自然是不会存在的。

在帖木儿时代察合台自称是地道的穆斯林军队。虽然他们在外观上和在军事组织上仍忠实于成吉思汗的传统。同成吉思汗的名字联在一起的游牧民的习惯法，是用古代的突厥字托立来表示的，它恐怕在著名的希伯来语以及同时在《古兰经》也遇见的用来表示"圣经"al—taurât一字的影响下变成为tura的了。人们甚至对帖木儿和察合台人提出谴责，认为他们把成吉思汗的tura位于伊斯兰法沙里阿之上。根据这个理由，叙利亚的神学权威公布了一道决定（Fetwâ），依据Fetwâ，不承认帖木儿和他的臣属是伊斯兰教徒。1372年，帖木儿的使节在花剌子模得到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帝国是Dâr al—hab（法文本作敌国pays ennemi；德文本作战场Kriégsgebiet，俄文本作战场область войны），伊斯兰教徒的宗教职责就是和你们作战。帖木儿和他的战士跟其他的伊斯兰教徒的显著的外表区别是，按照蒙古的习惯留辫子，这也为若干中亚的工笔画的手稿所证实。当帖木儿军队于1400—1401年包围大马士革时，他的孙子莎勒坛忽辛，背叛了他的祖父，站到被包围者方面来。人们首先把他的辫子剪下，叫他换衣服。

察合台的部落组织

要详细地了解察合台的部落和氏族是怎样区分的，由于术语

方面的模糊紊乱，感到困难。兀鲁思（ulus）[1][2]术语（我们已经看到的，它的意思是很广泛的，例如人们说，术赤的兀鲁思或察合台的兀鲁思)和伊勒(il）和土绵(tümen)以及同样明显的蒙古语的爱玛克（aimaq)[3](人们常常写成 uimaq）是当作相同的意义来运用的。用作“众多、一万”意义的都曼（tümen)一词是从可失合儿原始居民的语言转为突厥语的。后来tümen一字更常用来表示有关的定居居民集团，而少用于表示游牧民的军队。摩诃末·海达尔把可失合儿人（按他的表达方式：在合失合儿和忽炭）分为四等：1.土绵：农民；2.可陈（qaučin）：军队；3.爱玛克：游牧民（他们有取得一定数量的谷物、纺织物等等的权利）；4.官员和宗教人士的阶级。蒙兀儿人大概是构成第二和第三阶级的[4]。都曼一字最近在不花剌是用来表示和山居之民相反的平原居民。

对帖木儿帝国内察合台人的地位同定居居民的相比，1404年8月，见到察合台人的西班牙使节克拉维约较之东方著作家更为明确了。克拉维约说：“他们愿意去那里，他们就可以带着畜群到处去牧放，为了播种和收割，愿意在哪里就在哪里，无论是在夏天或是冬天。他们是自由的，不向国王纳税，因为当国王号召的时候，他们要为他而去参战。”[5]

在察合台人中间有四个氏族是特别重要的，即阿尔拉特，哲莱尔，可陈和巴尔拉斯。可陈一词，象我们已看到的，原来不是一个特殊氏族或部落的名称，而是军队中享有特权的那一部分的名称。按照舍利甫丁的说法，汗自己的千人团(近卫军)也是用这一名称的。很有可能，出身于可陈的河中第一个统治者是察合台异密中的哈萨汗(1346—1358)，他的孙子后来为帖木儿所打败和杀

① 参考《伊斯兰百科》卷一，第898页。ulus是许多部落的意思。
②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627页。——俄译本注
③ 参考拉德洛夫《突厥语方言字典研究》卷一，第63页。
④ 德文版缺，根据俄文版增加这一句。——汉译者注
⑤ 马尔克舍：《克拉维约东使记》，哈克鲁特学会版，26号，第115页。

害了。至于有关其他三个氏族的名称，那么它们原来就是指蒙古的民族的。阿尔拉特人居住在阿富汗的北部，哲莱尔人居住在锡尔河附近的忽毡之旁，巴尔拉斯人居住在喀什卡达利亚的岸边。

和氏族单位同级的，察合台人的个别部分有自己的代表和地区，还有当时分配给各个汗或宗王的支族，在他们死了之后仍保存其名称。如在巴里黑附近有怯伯的土绵（Tümen），根据历史文书，当怯伯的哥哥也先·不花统治的年代里，他取得了这样的权利，即从每一个兀鲁思把富人（显然是指有最大畜群的游牧民），集中在自己的周围。根据这个历史家的话语从这些人产生出那些现在傲慢地自称为怯伯的自己人的人们[①]。根据同一历史家的报导，后来归并怯伯的有他战胜的敌人、牙撒吾尔宗王的兀鲁思，但是在帖木儿统治的时期内，牙撒吾尔是分别作为一个氏族来记载的，这一氏族是在撒马尔罕的附近过活的。牙撒吾尔族长——异密乞思儿，根据无名氏亦思痕迭史所记，统治了撒马尔罕。

帖木儿和诸部落

帖木儿和自己所属的巴尔拉斯氏族之间自然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这一氏族的个别代表往往被称为“帖木儿的兄弟”。帖木儿和阿尔拉特和哲来尔的异密长期为了争夺权力而进行斗争，甚至在他被宣布为察合台帝国的领袖以后。哲来尔兀鲁思在1376年甚至被宣布解散，它的残部被分配到其它异密的部分中。虽然这样，据记载，和帖木儿最接近的异密，不仅是巴尔拉斯，而且还有其他氏族的代表。其中的一个就是出身于乃蛮氏族的阿克不花（Aq Bugha）[②]，他和帖木儿其他的许多的同伴一样，在生前就在帖木儿的墓碑附近准备好坟地，那是计划在萨里沙布兹（Šahr—i—

① 原文是tâ ki imrûz mufâcharat ba—ingû—ger—i—kebek mikunend。

② 原文以boi代替sói。

sabz）构筑的。值得注意的是，公墓地上这些场所的命名是和战时的支队的所在地或个别战士的所在地一样用相同的字murčil来表示的。

这一记事和其他的记事都证明了帖木儿一般地在察合台汗国中，特别在他们的领袖中的声望。帖木儿无疑的感觉到他和自己领地内的军事成员之联系是比较和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要密切得多，虽然帖木儿也做了一件在两个中亚的帝国即察合台帝国和蒙古帝国的游牧民看来，是犯了弥天大罪的事：他修建了一座大城市，虽然不是作为自己的常住官邸，但是作为自己的驻屯之所，并开始在这里营造建筑物。

游牧传统的坚持

游牧民，他们的宗王和首领之转向城市，被认为是破坏成吉思汗的法令（扎撒）的。

法令规定："永世流动，任何地方也不要定居下来。"小亚细亚的突厥人把这条规定归于乌古思汗①，在这场合所使用的oturaq一术语，从语源学上来说，和现在中亚所使用的oturag字相比较，是更接近于现代欧洲语的特点（俄文osedlyj、法文sedentair、德文sesshaft），表示定居的意思。对于城市的憎恨在蒙兀儿斯坦自然要比在西方强烈得多。还在15世纪的下半叶，即当帖木儿的继位者长期以来早就因其在撒马尔罕和哈烈的建筑物而名闻天下时，但是蒙古要奴斯汗由于他的蒙兀儿人的不满，不得不放弃在阿克苏定居下来的计划。虽然这地方当时"只有和蒙兀斯坦的一般情况相比较才能算是座城市"。若干年后当要奴斯汗占领了赛蓝和达失干并在那里定居下来之后（他的坟墓今天还在达失干），

① 《阿里、塞尔柱克史》，亚洲博物馆手稿，590，ba 第28页，原文是dâim gōč edeler oturag olmajalar。参考《突厥斯坦》（英文版），第461页，注4。

有部分蒙兀儿人和汗的亲生子阿黑麻一起离开了他。阿黑麻仍然是个真正的草原的战士，在习惯和外表上同他的父亲和哥哥相对立。他的外甥八八儿①在1502年看见他还是那样的。

在察合台帝国中游牧民对此向他们的领袖所表现的激怒，只在有关14世纪事件的描述中才提到。历史家赞美哈萨汗，因为仍然忠于游牧生活方式，在阿姆河岸过冬，在巴勒尊附近的山上度夏，不经过定居居民的土地。他的儿子阿不阿剌没有征得自己父亲的许可就侵略花剌子模。花剌子模人交纳200杜曼（等于两百万银第纳尔）以免掠夺。当哈萨汗知道这件事之后，他告诉他儿子对他无故的袭击伊斯兰教地区表示强烈的反对。至于说到哈萨汗，在其统治时期内无论是突厥人或者是塔吉克人，都过着富裕的幸福生活。阿不阿剌的统治和他的父亲一样的好。可是他的有些措施却引起人们的不满，例如他决定要在撒马尔罕修建自己的官邸。因而在哈萨汗逝世前不到一年，他就被异密所废。经过好些年的动乱之后，权力便转入哈萨汗的孙子，即异密忽辛的手中。他有意以巴里黑为首都。帖木儿试图说服他改变计划，指出他自己的叔父的命运为例子。但是他不依从。一个有帖木儿参加的暴动爆发了。忽辛被杀，统治权落入帖木儿的手中，他自己即刻干他过去责难过阿不阿剌和忽辛所干的事情：他选择一座大城市为自己的首都，恰好就是撒马尔罕，并在那里修建城墙和碉堡。

从上面所说的一切事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游牧民本身不愿将自己的生活改变为定居居民的生活，成吉思汗的法令是保护土著居民即塔吉克人的利益的，除了这两点以外，要游牧民仍然留在草原的，也素来被认为是一种愿望。汗和异密自然不是单独地，而是和一定数量的他们的同族人迁徙到各个城市来。要使新来之人的利益和早先居民的利益趋于一致，那是困难的。

① 庇维里什：《八八儿传》，第103页，a/b，107b。

此外，他们遭到游牧民君主统治和他们彼此之间进行的内战的有害的影响。关于海都和都洼时代的俺的干城的兴建，历史家无名氏亦思痕迭史作了如下的记述，即各个汗从自己的国家各处招来了一大批人，还在作者的时代，每一个民族，换句话说即大抵是从前的游牧民的每一个氏族在这座城市里都有自己的特区。

跛子帖木儿和城市文明

帖木儿除了突厥语外还通晓波斯语，不但对作为宗教的伊斯兰教，而且对于伊斯兰教的科学和艺术也有一定的了解。他招徕各地的学者和艺术家到撒马尔罕来，开辟新运河，在撒马尔罕修建伟大的建筑，一般说来他竭力要使同时代的人们对他的建设活动具有深刻的印象，不下于他的破坏活动的印象。他的帝国境内的突厥成员几乎没有参加他这一方面的活动。在帖木儿所征服的文化区域中，突厥化最深的地方就是花剌子模：花剌子模的工匠在萨尔沙布兹为帖木儿修建一座豪华的皇宫，它的名字叫做阿克沙莱（它的废墟即在今天还给人留下极强烈的印象，在艺术价值上它几乎超过帖木儿在撒马尔罕所修建的建筑物。特别是由于它配以多种多样风格的华美的陶器）。但是这座宫殿除了名称之外，显然什么也不是突厥的。在墙上的铭文中有许多波斯诗句，但没有一首突厥诗。帖木儿本人感到兴趣的，显然不是诗歌，无论是突厥语的或是波斯语的。没有什么提到他是认识波斯诗人的，如果人们不把他大概在1387年①会见哈菲兹的轶事放在考虑之内。帖木儿对于他的突厥臣民宗教兴趣的关心，只表现于为最重要的突厥的伊斯兰教圣人阿合马·耶西维的坟墓修建一座豪华的建筑物。在撒马尔罕和他的近郊以及萨尔沙布兹以外，帖木儿未兴建

① 土耳其版原文误作1377年。

其它建筑物。关于这座建筑物的捐赠基金的文献，留给我们的毕竟是用波斯文撰写的。

下一讲将要提供有关帖木儿及他的后继者和月即别汗时代的中亚突厥人经济和文化水平的报道。

·第十二讲·

直到近代中亚突厥人的经济和文化生活

征服者帖木儿

帖木儿在建立自己的帝国时，自然不是以突厥民族为目的的。帖木儿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把许多国家，如有可能把全世界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没有资料表明，帖木儿是了解亚历山大第一的历史的，但是他的历史家是用“整个世界用不着由两个统治者来支配”这句献给亚历山大第一与其类似的征服者，其中包括10世纪的阿都德道拉即伊朗白益王朝最强大的代表在内的征服者相同的话语来献给帖木儿的。当帖木儿的征服行动取得成就的时候，他就计划征服中国，象在这以前的花剌子模沙摩诃末和这以后的纳的儿沙（Nâdir Šâh）所做的一样，只有下列的一个差别，对于这两个征服者来说，进军中国只是个不能实现的梦而已，但帖木儿却成功地为这次进军而召集军队，只因为他的突然逝世而中止进攻。在中国人们是知道帖木儿的军事准备的，并采取了抵御攻击的许多措施，甚至有资料指出，在帖木儿逝世后，军队的指挥官就想开始继续进军，仅仅因为帖木儿帝国爆发了内乱才放弃了他们的计划。

从这一切可以看出，在当时伊斯兰教徒突厥人的心目中中国

所起的作用有多大。八八儿在他的《自传》中提到①，他经常梦到远征中国，有一个时期好象是由于军事失利解除他的全部政治职务，他认为实现了自己的梦。当然，他的出现于中国只能作为客人，而不能作为征服者好象帖木儿那样。

撒马尔罕在帖木儿及其继位者的时代仍然是个巨大的商业中心，也有中国的商品运到这里，虽然在蒙古统治时期，就我们所知在突厥斯坦找不到有关中国的这样确切的报道，如同这个时期在波斯，特别是在剌失德丁的著作中所找到的那样。沙哈鲁出使中国（1419—1422）的详细记载，其中也有撒马尔罕的使节参加，是出自使团中波斯成员之笔的。

花剌子模的毁灭

帖木儿的目的主要是要征服伊朗文化地区，其中，从地理学的根据看，首先就是花剌子模，从居民方面看，是个突厥人的地区，但是从文化关系方面看，无论如何它是不下于任何的纯伊朗地区的。帖木儿从花剌子模引进许多学者和艺术家到撒马尔罕来。花剌子模的工匠在萨里沙布兹为帖木儿建筑一座名为阿克沙莱的皇宫，它的废墟在今日还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这座建筑物在艺术方面，特别是由于富有雅趣的琉璃砖（一种天然色彩的陶器）使得撒马尔罕的帖木儿其他的建筑物相形见绌。

当时形成的局面是花剌子模受到帖木儿战争损失最大。在这以前不久，花剌子模才从金帐汗国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而置身于自己的王朝统治之下，这个王朝同帖木儿的王朝一样，也是出身于突厥化的蒙古人的。虽然两者的出身是共同的，但是花剌子模的统治者忽辛苏菲甚至不承认在完全采用伊斯兰文化的花剌子模

① 《八八儿传》，第101页以下。

人同外表与习惯全象异教徒的察合台人之间有什么可以调和的地方。当1372年帖木儿的使节为了谈判来到花剌子模时，忽辛拒绝谈判，并毫不客气地对使者说："你们的帝国是一个异教徒的地区。伊斯兰教徒的义务就是同你们战斗"。

当花剌子模1379年为察合台所征服后，在这里还爆发了好几次暴动。在帖木儿和金帐汗国汗托克塔迷什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花剌子模一再站在托克塔米什这一边，并让人在货币上铸上他的名字，因而花剌子模特别是它的首都玉龙杰赤比帖木儿所征服的其他地区遭遇到更为残酷的命运。帖木儿出征的时候，对好些城市的居民进行多次的大屠杀，但是没有采取使这些城市在将来仍然处于荒凉状态的任何措施。这些城市有上万的人被屠杀，但后来还是有大量人口并成为帖木儿的儿子和孙子停驻之所。只有玉龙杰赤是座完全被毁的城市，人们在这里种上大麦，以致城市的破坏在外观上造成深刻的印象；三年后令人相信，玉龙杰赤在重建中，但只是在另一个市区的范围内。这样，花剌子模即在帖木儿之后不再恢复它过去的商业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花剌子模地区由于它的地理位置越来越遭到月即别的，换句话说金帐汗国的突厥人和察合台人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的破坏。

帖木儿本人，象我们所看到的是个察合台型的军人，他对突厥化的察合台人自然比他的伊朗人的臣属即塔吉克人要接近得多。在帖木儿的军队中正好除突厥人之外还有伊朗人。呼罗珊人的历史家哈菲兹阿不鲁甚至还主张，帖木儿在他的军队各部中是最信任呼罗珊人的。但是同时帖木儿在自己的言论中，他只承认突厥人是最富有战斗力。帖木儿1404年在他逝世前不久把遗嘱告诉他的儿子和孙子。他对他们说：莎勒坛阿哈马·哲来尔过去统治过西波斯（这一王朝也是出身于突厥化的蒙古人的），他是个"具有塔吉克性格"的，没有引起他的不安。

但是同时，帖木儿和所有的突厥人一样，也必然受到伊朗文

化的影响。帖木儿不会读也不会写，但是他对于一切文化是不生疏的。他善于下棋，经常和学者往来，在和他们的谈话中，就掌握了若干学科的基本知识。他的历史知识使得当时最伟大的阿拉伯的历史家之一的伊宾·哈尔顿①大吃一惊。帖木儿不仅竭力取得军事上的成功，而且千方百计地吸引学者来到他的帝国和首都，通过宏伟的建筑物和水利工程而使其名声永垂不朽。但他的一切事业都是依靠有伊朗文化修养的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依靠出身于伊朗民族的人们。

帖木儿晚年在关于对中国的有计划的进军中，采取和现代的统治者一开始就会采用的那些措施。这些措施是使用于永久地征服突厥、蒙古民族的，而从来对于这些民族只进行掠夺而已。在草原上建立起要塞，而推进到最西的一点，就是位于热海附近的城堡。一般说来，努力是集中在恢复农业和城市生活上面。但是，有关这一切的成就是在帖木儿远征前所取得的，在他死后就立刻归于乌有了。他的后继者企图重新征服游牧民的尝试，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成功。

哈烈和撒马尔罕的帖木儿帝国

至于就其儿子和孙子而论，帖木儿不及成吉思汗之幸运，在他去世后，维持帝国的疆界是谈不到了，更说不上进一步的扩张了。在帖木儿死后，除了突厥斯坦、伊朗东部诸省和南部诸省一部分之外，他的王朝很快就丢失它的全部领土，在这有限的地区内，由于恢复了比较安静的局面和战争规模的缩小，文化活动可以开展得比帖木儿本人的时代更为活跃些。帝国的首都是代撒马尔罕而兴起的沙哈鲁的官邸所在地哈烈，沙哈鲁是帖木儿的儿

① 参考费歇尔《伊宾·哈尔顿和帖木儿》。——俄译本注

子，经过几次内战之后，管理全区的最高权力便落入沙哈鲁的手中，而这地区仍属于帖木儿。但是撒马尔罕由沙哈鲁的长子兀鲁伯（1409—1449）统治达四十年之久。它仍是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甚至从技术角度来看，兀鲁伯的建筑在结构的牢固、在规模和外观的华丽方面都超过他的祖父的建筑。无论是哈烈的建筑或是撒马尔罕的建筑都没有一点点突厥民族的特色。除了清真寺和经文大学外，也还修建一些公用建筑如公共浴室，商队客栈等等。但就是在这些建筑物中，看来没有哪一个可与帖木儿的建筑物中唯一具有民族色彩的建筑物相比，这就是阿哈马·耶西维坟墓上的建筑物，里面有特大的锅①，专用来煮食物以款待本地的伊斯兰教托钵僧人和过往的旅客。建筑物的这一预定的用途是和伊斯兰教关于清真寺（如在官方文件中，我们所看到的 chanegâh-i-müsâfir-penâh："寺院是外人逃亡之所"）的作用的概念相符的，同时也符合突厥人关于君主的职责在于慷慨的招待自己的臣属的概念。

帖木儿帝国统治时期的察合台文学

在帖木儿继位者的时代里，突厥文学有了重要的发展，这在帖木儿本人的历史中是几乎没有的。在察合台帝国内早就存在一种突厥诗歌。托钵僧人哈布尔沙于1366年宣布即汗位，不久又被废了，他写的诗歌在15世纪还享有一定的声誉。他一登上汗的位置后，理当被看作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显然，他的本国语言是突厥语，很有可能，他的诗也是用这种语言来写的。帖木儿的一个拥护者异密赛甫丁·巴鲁剌思是用波斯文和突厥文写诗的。但是

① 土耳其版原文作 zâwije（寺院），以代替"锅"（kessel），关于这点可参考哥尔德列夫斯基《阿合马·耶西维》，见《雅各纪念论文集》，第62页，注②。

当帖木儿死后，出现了民间诗人色迦奇①和鲁特飞。鲁特飞的诗的价值也为古典诗人米尔·阿里·池勒·纳瓦依所欣赏，1927年曾举行纳瓦依500周年（按回历计算）生辰庆祝会②。

色伽奇在他的诗句中已经赞颂了帖木儿的孙子，继承帖木儿在撒马尔罕的位置的哈里勒莎勒坛(1405—1409)，后来他还歌颂了兀鲁伯。在他献给兀鲁伯的诗句中，作者同时提到自己是突厥诗人："天上还须许多年才能完成一次自己的运行，当他创造一个象我一样的突厥诗人和一个象你那样的有学识的统治者以前。"③鲁特飞也提到兀鲁伯是知道他的诗的价值的，依他的看法，他的诗不下于14世纪波斯诗人的色勒曼·沙瓦吉当时最流行的诗句。

在沙哈鲁和兀鲁伯的身旁还有一个突厥诗人，他是帖木儿系的成员：赛夷阿黑麻（Sidi Ahmed ibn mûān）Šâh（法文版作赛夷阿黑麻，米兰沙Mîrân-châh之子）。他在回历839年即公元1435—1436年为沙哈鲁而写的Ta'aššuq-nâme，象它的标题所表现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模仿Mehebbet（Muhabbet)-name《爱情之书》的，这部诗集是14世纪金帐汗国的一位作家名为花刺子美所写的。在帖木儿帝国时代之末，换句话说即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米兰沙的另一位后继者八八儿是用突厥语言撰写著作的④。从八八儿的话语中我们知道，他的堂兄弟拜来豁儿，有一段时间统治撒马尔罕，也是一位有声望的诗人。⑤⑥所有其他的察合台诗

① 《伊斯兰百科》卷四，第87页；科布吕鲁《色迦奇》。同时参考鲁斯塔莫夫《乌兹别克诗歌》。——俄译本注

② 俄国科学院纪念刊，载有巴托尔德《导言》和《米儿阿里池勒和政治生活》；萨莫洛维奇《中亚突厥语文学史论》；罗马斯克维奇《新编察合台——波斯字典》。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下册，第199—260页；同上，第202页，注21，有关纳瓦依的新文献。——俄译本注

③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下册，第140页。——俄译本注

④ 萨莫洛维奇：《八八儿诗集》，彼得格勒，1917年。

⑤ 《八八儿传》，第68页以下。

⑥ 关于帖木儿时代的中亚突厥语诗歌，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五，第606—610页。——俄译本注

人，在15世纪后半叶在和纳瓦依[①]的相形之下都黯然失色。只有纳瓦依的著作是比作者的生命更长久和取得了远远超出帖木儿王朝的疆域之外的声誉。甚至八八儿的著作，虽有无可置疑的价值，但只保存少数的手稿，很容易被遗忘，因而需要欧洲的学者重新发现它。

纳瓦依是波斯文化的拥护者。他把波斯的题材引进突厥的诗歌中，他甚至还写了一部古代波斯统治者的历史。没有资料提到，他是否对于剌失德丁的著作或者一般对于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历史感到兴趣，但是他同时对于突厥诗歌和突厥语言予以极大的重视。在他的晚年所写的一本著作中，他努力证明突厥语言比波斯语言优越，在我们知道的限度内，没有一个突厥的著作家，至少是在小亚细亚的敢这样提[②]。

突厥诗人主要是在撒马尔罕和哈烈撰写他们的著作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在这样的城市写作的，即那里塔吉克人无疑是人口中占压倒的多数，而突厥人主要是代表王朝和军队的。突厥人的政治优势必然使他们的语言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我们知道，甚至在埃及恐怕除了军队之外一般是没有突厥人的，有一种文字，主要是一种翻译文学在马木鲁克时代发展起来了。

伊斯兰的文化和传统

自然，并不是王朝的所有成员都感觉到自己是突厥人和珍惜本民族的传统的。此外，纯突厥的传统为突厥蒙古混合的传统所排斥。当时的突厥的军事组织是成吉思汗帝国的一种遗产，除了

① 参考巴托尔德《米尔·阿里·池勒》(Мир-Али-Шир)，《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下册，第199—260页，同上，第202页，注21，有关纳瓦依的新文献。——俄译本注

② 《语言的精密性》，君士坦丁堡版，1315。

突厥的军事术语外，同时也采用后来成为过时的蒙古的术语，例如表示队伍意义的 chošun 一字。统治者依附于突厥的民族传统的程度取决于（同伊斯兰法律规范即“沙里阿”相比），赋予成吉思汗的法令即“扎撒黑”的意义多大。沙哈鲁在哈烈只愿意作个伊斯兰教的莎勒坛和哈里发，并毅然拒绝承认成吉思汗的法令，与此同时，兀鲁伯在撒马尔罕则至少在有关军事方面是竭力使之与成吉思汗的名字有联系的法令相一致。他仿效帖木儿的范例，任命一个拟汗，主要是竭力按照祖父的精神来行使权力。

兀鲁伯

同帖木儿相反，兀鲁伯在其父生前不能向前亚细亚进军，因而向金帐汗国和蒙古的进军在当时要取得比帖木儿时代的意义更大，但兀鲁伯也没能再提帖木儿在其晚年所提出的方案。兀鲁伯的愿望和帖木儿原来的方案一样，没有向前迈出一步，只是做到了把自己所喜欢的当地诸王中的候补者扶持上宝座。

帖木儿没有达到这一目的，而兀鲁伯则更无能为力了，他显然没有继承自己祖父的军事天才，不具备一个征服者的天资。甚至在1425年向蒙古进军，即兀鲁伯最大的军事尝试仍然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兀鲁伯的领地在他统治的晚期比他统治的初期要小。蒙古人夺去赛兰的东部地区，月即别人略取突厥斯坦下游的锡尔河的沿岸地区。月即别人的势力，当时在阿布海尔汗的统治下得到了加强，其后他的儿子和孙子决心要结束帖木儿王朝的统治。阿布海尔在1430—1431年冬短期内占领了包括玉龙杰赤城在内的花剌子模的北部。当1448年秋兀鲁伯在沙哈鲁逝世后，力图将呼罗珊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阿布海尔则侵入河中，并于1451年掠夺了撒马尔罕的近郊。阿不海尔也参加了在河中发生的帖木儿王朝的内战。由于他的帮助，卜撒因即米兰沙之后人战胜了兀鲁

伯的侄子奥都剌即沙哈鲁之后人。卜撒因的胜利同时标志着火者阿拉尔的胜利，火者阿拉尔是中亚托钵僧人的首领，在宗教方面是反对兀鲁伯的，并反对他的政府的组织制度。

兀鲁伯是他的祖父帖木儿的崇拜者，同时又是突厥蒙古传统的维护者，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可说是突厥的爱国主义者。这一事实在1447—1449年两年中所铸造的货币上得到了证明，这是他充当帖木儿王朝国家首脑时令人在撒马尔罕和哈烈时铸造的。直到1447年也在事实上为兀鲁伯所统治的撒马尔罕城镌上沙哈鲁名字的货币。兀鲁伯大概就是令人在货币上镌有突厥铭文的唯一的帖木儿王朝的统治者。在为帖木儿所铸造的许多货币中同样有这一类型的货币。兀鲁伯的货币的铭文是 Emîr Timür gurgan himmetidin Ulugh Bek gurgan sözüm，意思是说：由于异密帖木儿库尔干的祝福，我们的话变成兀鲁伯库尔干的话，大家知道sozüm或sözümüz 的形式（“我的”或“我们的话语”）直至最近还用于圣旨（Chan-Jarlygh'）中，它是帖木儿的货币上的蒙古语üge manu一词的译语。Gurgan 是蒙古语“驸马”的意思，它是帖木儿和他的若干后继者的自称，这些人都以帖木儿为榜样，和成吉思汗王室结成姻亲的。

帖木儿帝国和伊斯兰文化

突厥的爱国主义情操并没有阻止兀鲁伯去吸收伊朗文化，它达到比帖木儿所做的更高的程度。兀鲁伯不仅和学者交谈，象他的祖父帖木儿一样，而且自己也从事科学研究，特别是天文学，在伊斯兰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例子：汗本身就是学者。关于这方面，同时代的人把兀鲁伯比做阿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一世，因为人们在伊斯兰历史上显然不能找到更适当的例子。兀鲁伯和他最近的后继者的天文学著作被看作是伊斯兰文学上最高的

水平。

兀鲁伯和科学的关系清楚地表明：兀鲁伯时期的撒马尔罕是比帖木儿时期的撒马尔罕更为进步的。在帖木儿的亲信中不仅有学者，也具有突厥的战士阶层的成员。但是他们彼此间是全无关系的。人们没有发现任何例子，即帖木儿的亲信者中有变成学者的。兀鲁伯不仅自己是个渊博的天文学者，而且还从他的突厥亲信者中培养出一个学生和后继者：阿里·库什（'Ali Quščy）。quščy（qušğy）的绰号表明，他是执掌一项和沙皇的sokolničij（=šâhinği 放鹰者）相当的官职，大概这是他和兀鲁伯很接近的起因，兀鲁伯酷爱放鹰，所以八八儿称他为Qeušcy Pâdišâh（皇帝放鹰人）。库什仿效自己的统治者的例子，献身于天文学的研究，并参加兀鲁伯的撒马尔罕天文台装置的工作和编写历表。显然，他比兀鲁伯年青，所以兀鲁伯在历表上称他为自己的儿子。甚至在兀鲁伯逝世后，阿里·库什仍然忠于科学。他后来在君士坦丁堡工作，1474年死于该地。在帖木儿帝国内，他穿突厥衣服，这可作为他是出身于突厥人的一个补充证明。因为显然兀鲁伯时代，突厥兵（察合台兵）仍然保存和土著居民塔吉克人有别的外部特征，正如早在帖木儿时代的情况那样。

在操突厥语的人士中，出现了象阿里·库什与兀鲁伯那样的学者，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自然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都没有尝试用突厥语来谈科学，而只是用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来著述，兀鲁伯在撰写他的著作时，感到精密科学的国际意义比它的民族意义更吸引人，它比语言学的和神学的著作更优越，是由于下列事实：它的价值并不因语言的更改或宗教的变更而受到什么反响①。

除了伊朗科学的影响之外，帖木儿虽然和突厥的军事集团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他和他的伊朗臣属非常接近，以致于他采用一

① 有关兀鲁伯的更详细的情况，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下册，第25—196页。——俄译本注

句波斯的格言作为他的政府的座右铭：Rasti usti，即“公正是强大”。兀鲁伯虽然学识渊博看来比其祖父更象个突厥人，但是他还精通波斯语，很有可能，他是用这种语言来和当地的神学界代表交谈的，其中有撒马尔罕世袭的谢赫·伊斯拉目，即十二世纪《希达雅》①一书的作者布尔罕丁·马尔基南尼的后裔。

值得注意的是，谢赫·伊斯拉目和兀鲁伯本人一样，受到谴责，人们指责他们违反伊斯兰的教规，和酷嗜宗教所禁止的各种娱乐（在帖木儿生前，反对统治者的这样的谴责是不可能公开说的）。事实上，由谢赫·伊斯拉目所组织的，吸收女歌手参加盛筵的这类事实，从伊斯兰教的观点来看，是完全不平常的，不容许的。同时这一事实显然证明，在帖木儿和兀鲁伯时代撒马尔罕的生活是很少和宗教的教规相合的。

无疑的，通过这种自由和这一文化进步所打开的机会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的代表和富人所利用，但是也不排斥人民大众参加这种生活。克拉维约有关帖木儿的盛宴的记事说明在宴会时也让人民参加款待②。依据历史家伊宾·阿拉布沙的记载，帖木儿的宫殿和他们宽广的花园，在统治者不在那里住的时候，撒马尔罕所有的居民无论是有钱的或是贫苦的都可以进入。

免税人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种风俗，趁皇族举行盛大宴会的机会，首都的居民被宣布为答剌罕，换句话说不交租不纳税。

在游牧的征服者看来，人民大众是有纳税义务的阶级，他们有义务出钱，和为游牧民的利益而劳动，正如在伊斯兰教国家中，非伊斯兰教的异教徒是负有纳税义务的阶级。这一限制即在

① 关于穆斯林法的著作。——汉译者注

② 参考克拉维约《东使记》，第149页。

游牧民接纳伊斯兰教后仍然没有改变，虽然他和伊斯兰传统是相矛盾的。1365年，当撒马尔罕发生反对突厥统治者的人民大暴动的时候，人们提出了向伊斯兰教徒征收人头税的谴责。

虽然这样，但是居民免除从伊斯兰教的立场看来是违法的这种租税，不是由于服从伊斯兰教的法律，而是根据游牧民法律针对定居居民的另一规范的运用，那就是通过免税制度，只有授予免税特权于某一个人才意味着这个人是从负担纳税义务的阶级中分出来，并升为贵族阶级。用汗的名义授予免税特许状，被保存于从蒙古帝国分裂出来的后来的国家的档案中。在窝勒伽河地区，升为免税阶级一事在斡罗思的统治下甚至延续到亚历山大二世的时代。

整个城市居民的免税特权的让与，自然不是游牧民法律原来的目的，但是这免除首都居民缴付租税的方法直到后来，甚至到了18世纪末期，即月即别人统治时代还应用上。沙木拉德或异密马思忽惕是沙里阿法（伊斯兰教法律）的热心的拥护者宣布在他的统治初期，卜花儿的全部居民是答剌罕，目的在免除他们的一切租税，换句话说在这一情况下，没有按沙里阿法的规定实施，而是按游牧民法的规定实施。这一特权把首都居民置于比较其他城市，特别是农民阶级更有利的地位，农民阶级的社会地位在游牧民的统治下是处境特别困难的。

解　　体①

帖木儿王朝的帝国，象中亚其他的国家机构一样，没有充分时间在牢固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土生土长的文化生活。过渡时期的纷乱产生为外来征服者所利用的危机。火者阿拉尔和托钵僧人

① 法文版作第十三讲。——汉译者注

的胜利跟伊朗人反对突厥人的民族战争没有联系。火者阿拉尔出身于山地塔吉克人。据人们所知的，在他最亲近的同伴中，不曾发现有突厥人。但是托钵僧人常常在突厥的游牧民中获得成功，卜撒因虽与火者阿拉尔结成联盟，但并未和民族传统决裂。下列的传说也证明这一点，卜撒因梦见阿哈马·耶西维和火者阿拉尔，当时阿哈马·耶西维给他指出火者阿拉尔为宗教上的指导人①。作为领袖的卜撒因继承了帖木儿王朝的传统：在他的货币上镌有帖木儿纹章（三环形）。

月即别汗国

帖木儿汗国在和来自草原的其他突厥人即月即别（乌孜别克）人的战争中归于失败了。月即别人和伊朗的城市文化的接触比较察合台人要少得多，并因此保持更多的游牧民的风俗。月即别诸汗用不着象帖木儿和兀鲁伯那样在自己的游牧民中间人为地唤起突厥的勇武的爱国心，关于英雄们勇武的业绩的传说出现于草原是和诸汗全然无关的，而且往往和诸汗相对立。从月即别人的观点出发的14和15世纪的英勇事件的传说，甚至也为帖木儿帝国的历史家的著作所采纳；这些传说比起为帖木儿所编的关于其祖先的传说要生动得多。在河中除了有关帖木儿的历史记载之外，还发展了用波斯语撰写的关于征服者的传说。正如人们从兀鲁伯的货币中可以看到的是，有关帖木儿的回忆录在很早的时候已变为“伟大的异密的精神”的半宗教性质的崇拜了。在鞑靼的和诺盖的传说中，我们发现比突厥斯坦的传说中的作为战士和军队领袖的阿克沙克·帖木儿即“跛子帖木儿”的生动得多的形象。

月即别人和帖木儿帝国的突厥人一样，也把阿哈马·耶西维

① 关于火者阿拉尔及其事业的评价，参考巴托尔德的著作，《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下册，第121页，注11；第167—168页，注121—122。——俄译本注

看成是突厥民族圣人；阿哈马·耶西维葬身之地的和月即别人在某一时期内建都的城市取得了突厥斯坦（今土尔克斯坦）的名称，由此特别明显地表明了突厥人心目中对阿哈马·耶西维的崇拜的重要意义和月即别人心目中的突厥民族观念的作用。在帖木儿为阿哈马·耶西维的坟墓所修建的建筑物中，有许多月即别汗和他们的夫人的坟墓。在昔班尼在和波斯作战中失败和逝世后，撒马尔罕、不花剌和其他占领地暂时被夺去后，月即别人纷纷回到突厥斯坦城。

阿布海尔的孙子昔班尼，是帖木儿帝国的征服者，他是突厥人，感情同突厥人，但是在他的征服计划中却自然不是依突厥民族的目标为转移①的。象所有的游牧民的征服者一样，他占领一个又一个的地区，除非遇上不能克服的困难时才停留下来。根据一个波斯历史家的报道，他无论在涂兰或在伊朗都以赫赫战功著称于世。他征服了呼罗珊，自然是不能满足于这一个伊朗的省区的，假如他和沙法维王朝伊斯迈尔即新波斯帝国的奠基者作战而不被打败的话。在这事件以前不久，昔班尼在北部草原为月即别民族的一部所打败，这一部人在阿布海尔的时代是和月即别的主体部分分离的，并因而取得了哈萨克的名称。在最初人们是用月即别哈萨克一词的，正如人们称呼那些和自己的国家分离，并和他们处于战争状态中的游牧民一样。这种集团的出现表明，月即别人和过去的游牧民族一样，他们对为了实现征服目的而自愿在汗的政权下联合起来不甚热衷。

河中被一个几乎和伊朗文化全无接触的新的突厥民族所征服这一事实必然会有助于突厥语的文学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翻译文学进一步的发展。事实上，由初期月即别诸汗所撰写的这类性

---

① 关于阿布海尔和昔班尼，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下册，第489—490页，第545—548页，那里有新的文献；同时参考阿哈默多夫《乌兹别克游牧国家》。——俄译本注

质的著作就有许多。早在1530年，人们就提到了撒马尔罕的汗、卜撒因（昔班尼的堂兄弟）是个完全不懂波斯语的突厥人。

但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居民之间的这种隔绝状态不会长期继续下去。卜花儿汗乌伯·都剌于1539年逝世，他是昔班尼的侄子，不独从游牧民传说的立足点，而且从伊斯兰法律（即沙里阿）的立足点来看，他也是个理想的统治者。16世纪月即别最著名的汗即卜花儿汗阿卜都拉也尝试用这种精神来进行统治的。他死于1598年，除了河中以外，花剌子模和呼罗珊也在他的统治下统一起来了。当阿卜都拉于1583年被宣布为汗时（事实上他在这以前就掌握了全部权力），按照古老的蒙古风俗，用一块白毡把汗抬起来，但是这块白毡的四角，不是按游牧民的传统由诸游牧氏族的首领来执握，而是由不花剌的托钵僧团的首领来执握。从中我们看见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即人们是怎样地力图把纯异教的风俗和伊斯兰教国家观的精神调和起来。

阿卜都拉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同中亚细亚蒙古的和突厥的统治者是一样的。他的统治特别在定居居民的眼中看来是受欢迎的，因为它有利于一个强大的政权的存在。对他的怀念在突厥斯坦直到现在仍是当为秩序和文化的奠基者而受到赞扬的。一切公用建筑设施一般都是归功于他的：新运河的兴修，草原上商队旅舍的修建等等。

但是游牧民象从前一样不大需要在一个强大的政权之下联合起来，阿卜都拉的胜利是以毫不容情地杀绝自己一切的敌人的代价换取来的。不仅对敌人支配的王朝的成员连同婴儿在内进行大屠杀，就是特别在阿卜都拉向北进军草原的时候，人们叙说，正当某一次相类的屠杀时，人们有意识地拖着一车被屠杀者走过汗的面前，以此来激发他的同情心，和诱导他制止屠杀者，但是汗仍然无动于衷，仍把普遍的屠杀进行到底。但是这种流血是毫无目的的，虽然哈萨克遭到了损失，但是在阿卜都拉逝世前，还对

河中进行新的进攻和推进至撒马尔罕，在阿不都拉及其儿子阿卜都木明去世后，由阿卜都拉所创立的帝国就很快地瓦解了。所有的征服地都丧失完了，甚至在不花儿政权也落入新的汗国的手中，在新的汗国支配下的，只有阿布海尔王室过去的领地的一部分。在其后统治的诸汗中，没有一个汗在他的支配下有象阿卜都拉所占有那么多的土地。

月即别统治下的花剌子模

月即别缺少政治的统一，而他们力图达到这目的，特别明显地表现于花剌子模的命运中。花剌子模在最后的帖木儿帝国的时期列入统治哈烈的莎勒坛的领地中，和统治撒马尔罕的莎勒坛完全无关系。昔班尼只有在征服撒马尔罕后才征服花剌子模，几乎和进军呼罗珊的时间同时。当昔班尼还在世的时候，花剌子模和撒马儿罕、不花儿一样，同是月即别汗国的组成部分。但是在1510年战役后，战胜者即波斯沙伊斯迈尔把撒马尔罕和不花儿让给帖木儿帝国末主八八儿，另派自己的长官去花剌子模。八八儿为昔班尼的近亲逐出河中。而波斯的长官则被出身于昔班尼后代的其他的月即别人逐出花剌子模，但这部分月即别人是和阿布海尔不同的另外一支。

到了16世纪，花剌子模有两次服属于卜花儿汗，时间不长，一次是乌伯都剌统治时期，另一次是阿卜都拉统治时期。结果，昔班尼后人的王朝之在花剌子模的统治时期比较月即别汗朝之在撒马尔罕和卜花儿的统治时期较长，几乎统治至17世纪结束，而阿布海尔王室的统治则在16世纪末告终。花剌子模的历史家阿布哈齐（死于1663年）倾向于把阿布海尔王室的消灭看成是对花剌子模汗朝所有成员进行屠杀的处罚，而屠杀是阿卜都拉在花剌子模的行为的无智之表现，虽然他对统治者阿卜都拉是极为尊重

的，并注意到阿卜都拉统治时代所铸造的货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普遍流通情况。因此，阿布哈齐是花剌子模诸汗中第一个开始企图侵略卜花儿的。在阿布哈齐的儿子和继位者、阿奴萨统治的时期，卜花儿甚至在短期内是在花剌子模人的支配之下。

无政府状态和文化的退步

从这时代开始，中亚突厥民族的流血的内战延至突厥斯坦为斡罗思人和中国人所征服时为止。战争不仅发生于各个不同的国家之间，而且也发生于每个国家内不同成员之间。

到16世纪和17世纪，以下的广大的地区处于突厥的支配之下，即从西方的里海开始，到东方的哈密，从南方的兴都库什、昆仑开始，直至西伯利亚的斡罗思领土的边界。这一地区同不久以前相比处于文化衰退的状态中。历史家在解释这种现象时，象其他的许多的情况一样，要探索出什么是原因和什么是结果是很困难的。

中亚的大部分为文化这样低下的民族如月即别人所征服，这必然会减低中亚在国际贸易上的重要性。商人的活动由于各国中缺乏一个统一的政权而更感到困难，例如在花剌子模，汗朝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竭力提高商品税。不管怎样，所有这一切困难看来是比较快的和比较容易的被克服了，如果横贯中亚的商道仍然保持其重要性的话，这在15世纪上半期，帖木儿和兀鲁伯时代是这样，而这重要性在15世纪后半期即自从欧洲人发现美洲和通往印度的海路后就逐渐丧失了。因而优势过渡到为欧洲人手中掌握的海上贸易。此外，随着斡罗思在西伯利亚统治权之确立，也开辟了一条从欧洲通往远东的新的陆上贸易大道。早在16世纪后半叶（俄译本作十七世纪后半叶——汉译者注），西伯利亚商人和中国的队商贸易是经过中亚和中国边城肃州的。

在18世纪前半叶，中俄条约开辟了以恰克图为中心的贸易关系。有一条通往中国的新路，“西伯利亚大道”开辟了，这条路在20世纪初由于敷设铁路而加强，因此突厥斯坦对于国际贸易的作用就更为减少了。

倘若说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如月即别人的统治会引起商道的改变，而商道的改变毕竟又转而更降低了文化的水平，并且对文化的进步有不利的影响。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主张，16和17世纪的月即别人和其他中亚的突厥人，在掌握文化上不如中世纪突厥人。

突 厥 蛮 人

在中亚的所有突厥国家中位于最西的是花剌子模。它的居民除月即别人外，还有萨尔特人和突厥蛮人（土库曼人）。在月即别人中间并不是和在帖木儿帝国那样，把萨尔特（Sart）一词用作伊朗人的意义，和突厥一词（Türk）相对立。当时在花剌子模人们是叫城市居民为萨尔特的，他们和月即别人一样是操突厥语的，但是在有关生活方式和文化方面则和他们有悬殊的差别。在阿布哈齐的著作里，月即别人不独作为游牧民，在保存自己部落和氏族结构等方面，而且同时作为乡村居民和农民方面也是和萨尔特人相对立的。萨尔特人在花剌子模的军事史和政治史上当时是不起任何作用的。相反地从16世纪直至近年来的事件，月即别人和突厥蛮人之间一再发生流血的战争。甚至花剌子模汗在和月即别贵族的作战中有几次是征集突厥蛮的，并藉赖他们的帮助对月即别人进行血腥的大屠杀。人们赋予突厥蛮人以何等重要意义从下列事实中可以明了，即花剌子模的历史家阿布哈齐汗除了他的突厥史著作月即别人占首要地位的外，还写了一部有关突厥蛮

人的专史著作①。

突厥蛮人同月即别人相比，保有更高程度的战斗性癖和作诗的才能。在所有的突厥部落中只有突厥蛮人有自己的民族诗人：马赫冬·库力。在突厥蛮人的心目中，花剌子模的月即别人不是突厥人，而是塔特人，这一名词从马木特·喀什噶尔的时代开始就用来称呼同游牧民相反的有文化的居民（农民）。

突厥蛮人当时处于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是和他们的历史全过程相合的。这说明两个最强大的突厥帝国：塞尔柱克和奥斯曼帝国的奠基人所从出的民族从来未有过自己的政治结构。从16世纪以后，个别的突厥蛮人时而服役于花剌子模的月即别人，时而服从于卜花儿人，时而服从于波斯人。当这些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他们时而站在这一方面，时而站在另一方面作战，他们甚至彼此间也打起仗来，虽然这样，但是他们都取得了对敌战争的胜利。甚至斡罗思人也遭到突厥蛮人方面比之来自其他任何方面的更为顽强的抵抗，斡罗思军队只要同突厥蛮人作战时，就丢失军旗和加农炮。②

乞 瓦 汗 国

花剌子模的月即别人虽在异常不利的条件下仍保持他们的政治组织。在16世纪后半期，花剌子模遭到了自然灾害：在若干时期，供应这个地区的首府玉龙杰赤用水的阿姆河左支完全停流

① 关于13世纪以后的突厥蛮人，也可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上册，第584—623页，关于花剌子模的突厥蛮，参考贝格尔《花剌子模的突厥蛮》，马尔可夫《北突厥蛮形成史纲》。——俄译本注

② 土耳其版原文误作 tüfek 。在斯科伯列夫包围阿什喀巴德附近的哥克迭北（Göktepe）时，由于突厥蛮的袭击，俄罗斯人损失了两门炮和阿布朗团的一面军旗，是役发生于1880年12月28日。《土库曼人对哥克迭北的包围和袭击》，圣彼得堡，1882年，进一步研究的文献，参考米佐夫的《亚洲书目》，圣彼得堡，1891/92，卷一，第355页以下。

了，它的全部水流改道注入咸海。一个新的首府，乞瓦和若干新的城市在阿姆河的三角洲兴建起来了，有些城市在一定的时间内成为独立于乞瓦之外的政治势力①。因为花剌子模人受波斯文化的影响较少，所以他们比卜花儿更加珍视自己固有的语言和口碑。16世纪为了多士特汗编辑了一部民间口碑集。到了17世纪，阿布哈齐汗写了一部有名的历史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竭力使写出的东西连五岁的孩童也懂得，他尝试不但要避免用阿拉伯用语和波斯用语，而且同时也避免用察合台用语②。阿布哈齐在波斯度过十年，因此他比自己的同族人更有修养些。他推崇汗国的统治，他用自己同时代的英国人霍布士一样的理论来为专制主义的思想作辩护："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社会全体成员有必要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愿望。"这不是不可能的，即和霍布士有同样的思想的英国人当时在波斯，这一理论是这样地经过第三者的手传到阿布哈齐那里。他的继承人阿奴萨颂赞波斯的专制主义思想，在占领麦什赫特后采用了沙的称号。他给他所修建的一条新的大运河，取了这样的名称——沙阿巴德，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珍惜自己新的称号。然而在一个不大的花剌子模里要新建一座美丽的首都是缺少有利的条件的。阿奴萨死后不久，王朝便消灭了，整个政权便落在游牧氏族族长的手中，但是仍坚持下列的原则，坐上汗位的权利仅仅限于成吉思汗的后裔。这就是登上汗位的都是拟汗的原因，拟汗大半是人们从哈萨克草原领来的。历史家说到这一风俗时，称之为"汗的游戏"。花剌子模的月即别人，在卜花儿人的眼中看来是独立的人，他们丝毫也不愿意听从自己主人任意的摆布。这种无政府状态在18世纪的下半叶达到了极点，甚至乞瓦城本身也完全荒废了。自从1770年以后，秩

① 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三，第549—550页；关于中世纪晚期阿姆河河道变动的更详细的情况，看上书，第75—94页。——俄译本注

② 作Казахов。——俄译本注

序在一个新汗朝，即翁克拉脱的统治下恢复过来了。他们的代表以后也采用汗的称号，有效地努力在自己的国土内建立强大的政权。早在1840年，乞瓦的汗统治了包括从木儿合卜直到锡尔河下游在内的广大的帝国，后来这个国家的范围受到突厥蛮人和哈萨克人暴动的影响大大地缩小了。当乞瓦为斡罗思占领（1873）之后，花剌子模便脱离了乞瓦汗，虽然它的面积是被大大地缩小了。但是，当1924年民族划界时，作为一个国家的花剌子模完全被消灭了，它的领地一大部分划入乌兹别克斯坦，其余部分划入土库曼斯坦，民族原则的这一彻底的贯彻到底给人带来了多大希望，人们是可以就此进行争辩的。从11世纪起，花剌子模就已没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了。但是它在历史传统的民族的和经济的特点方面，它仍然是个富有生气的和特色的有机体，从很古的时代以来就存在的这个有机体的消灭过程恐怕不会无踪无影地消逝的①。

卜花儿汗国

其他国家的生活是比较简单的②。在卜花儿汗的领地中，看来恐怕只有月即别人和塔吉克人之分。政治上的优势掌握在月即别人的手中。当17世纪后半叶，汗的权力衰微的时候③，有些地区落入到个别的月即别氏族族长的支配下，同时这里确立象14世纪蒙古时期末、帖木儿政权确立前支配突厥斯坦的那种封建制度。此外他们必须抵御哈萨克人④的入侵，撒马尔罕完全被破坏

① 巴托尔德的顾虑没有得到历史的确证，1924年中亚的民族划界也没有妨碍花剌子模的发展，现在花剌子模的主要部分合并于乌孜别克加盟共和国（卡拉卡尔伯克自治共和国和花剌子模州），及土库曼加盟共和国中。——俄译本注

② 16世纪至19世纪的中亚各国史概况，参考伊凡诺夫《中亚史纲》。——俄译本注

③ 土耳其版原文作parladyghy（汗权"最盛"时代）。

④ 作Казахов。——俄译本注

了，以致这一城市有一段时期是处于不再存在的状态，而卜花儿则和乞瓦相反，没有遭到敌人的任何攻击，甚至在和内外敌人展开战争的极大不幸的时代里也是这样。卜花儿的政权在18世纪末即在采用了异密称号的满吉特新汗朝时代，他的首都未受到骚扰。满吉特朝的异密从事于反对月即别氏族的贵族阶级，依学者哈内科夫的说法，是反对卜花儿封建主义的残酷的战争，这次战争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但是卜花儿异密的政权大大地加强了。有些异密甚至成功地也将霍罕短期内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满吉特为了恢复走入衰微中的农业，兴修了许多灌溉工程。泽拉夫善河流域平原的新灌溉区为过渡到定居的生活的月即别人所占领。掌握在塔吉克人手中的，除了少数例外只有山上的聚落。虽然如此，但是主要城市：撒马尔罕和卜花儿的居民仍然是塔吉克人，而异密也是塔吉克人多于月即别人。乞瓦的历史家甚至称不花剌军队为塔吉克人的，虽说在卜花儿汗国中，月即别人也还是军队的成员。

霍罕汗国

早在蒙古统治时期，就有突厥人进入费尔干纳地区。这里的塔吉克人在霍罕汗统治时期，也是被赶到山里去。在这里和花剌子模一样，月即别人、塔吉克人和萨尔特人是有区别的。看来人们把当时此地操突厥语的城市居民也是称之为萨尔特人的，萨尔特人甚至在费尔干纳代表一定的政治力量，他们和月即别人，特别是和一时夺得统治权的钦察民族进行武装斗争。萨尔特一词大抵为哈萨克人所使用。在他们的谚语中，哈萨克是游牧民的意思，和萨尔特一字相对，后者是城市和乡村的定居居民的意思，不管他说的是什么语言。到了19世纪，霍罕汗通过大规模的灌溉设施（这对城市生活的发展同样有用），大大地增加了费尔干纳的

耕地面积。此外，他们和卜花儿打仗，有效地扩张自己的领地，西北至锡尔河，东北至七河省。他们为此也竭力使游牧民——哈萨克人和吉利吉思人屈服于自己。

哈萨克人、吉利吉思人、卡尔梅克人

在俄罗斯的文献中，这两个绝对不同的民族取得了同一的名称：吉利吉思人。真正的吉利吉思人，人们起初是用哈喇吉利吉思人的名称，这是为了和哈萨克相区别。

我们已经看到，哈萨克民族是在15世纪才从月即别人的一部分中形成的，这部分人是从阿布海尔汗的政权下解放出来的。相反，吉利吉思人很早以来就被人提到了，虽说不易确定他们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占据七河流域的南部和锡尔河流域的东部，我们今天在这里发现他们有关帖木儿和兀鲁伯出征的资料中，人们找不到有关吉利吉思人的任何记载。他们在七河区域是在16世纪初第一次被提到的(他们是怎样在七河地区出现)，当时的首领是蒙兀勒汗阿黑麻的一个儿子哈里勒莎勒坦。但是关于他们从什么地方来的报道是一点也找不到的[1]。16世纪时，吉利吉思人是往往在哈萨克汗的统治之下，和他们一起跟蒙古诸汗打仗，这时蒙古汗已突厥化和统治可失哈儿。到了17和18世纪时，他们和哈萨克人同时（但是不和他们一起），去打新来的蒙古人即卡尔梅克人。卡尔梅克人有一个时期曾征服了中亚细亚。他们在18世纪也占领了达什干，赛兰和突厥斯坦等城市，这些城市在当时是属于哈萨克的，甚至卜花儿汗也服属于他们。

在卡尔梅克人中，佛教是深入人心的，因此卡尔梅克人就不能象成吉思汗的蒙古后人那样，信仰伊斯兰教。信仰伊斯兰教的

---

① 更详细的情况，参考《巴托尔德文集》卷二上册，第511—543页。——俄译本注

只有极少数人。他们的后裔现在是以萨尔特卡尔梅克的名称而见世的。卡尔梅克帝国的政权在1758年后不久便被中国粉碎了。同时由于战争进行得很剧烈，结果这个民族的极大部分被消灭了。当一部分卡尔梅克人违反俄罗斯政府的意愿从窝勒伽河流域向东方出发的时候，这一民族又受到哈萨克新的毁灭性的打击。在卡尔梅克帝国被消灭后，中国竭力想使哈萨克人和吉利吉思人服属于自己。斡罗思起来反对中国的要求，并在这场斗争中最后占了上风。

在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消灭了哈萨克汗的政权。吉利吉思人没有自己的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吉利吉思人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这一生活特殊现象来。吉利吉思人之服属于俄罗斯是比哈萨克较后，因而保持自己的军事组织的时间较长。吉利吉思人和卡尔梅克人之间的战争在吉利吉思人的史诗中，特别是在有关玛纳斯①的传说中得到了反映，在这一史诗中，战争是当作宗教战事来描写的，虽说吉利吉思人在19世纪，完全象在16世纪的吉利吉思人一样对于伊斯兰的教义和习俗几乎是一无所知的。

同哈萨克人一样，吉利吉思人现在也得到了创立他们自己的民族共和国的机会。由于种种原因，19世纪的吉利吉思人的命运要比哈萨克坏得多。今天他们的处境无论是从文化方面或特别是从卫生方面来看都是非常可怜的②。

阿勒台山和谦河的突厥人

阿勒台山和谦河上游的突厥人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是属于

① 参考阿克西肯季从塔吉尔占诺夫出版的《史集》中摘出。——俄译本注

② 巴托尔德的话是指20年代中期，有关当年吉尔吉思民族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过程，参考《现代的阿乌尔》，波戈列尔斯基和巴特拉科夫《游牧阿乌尔的经济》，萨哈罗夫《游牧经济与定居》，伊里雅索夫《残存》，关于社会主义吉利吉思的经济与文化，参考《中亚各民族》卷二，第154—320页。——俄译本注

卡尔梅克帝国的组成部分，阿勒台的突厥人今天在自己的民族共和国成立后还采用原来属于卡尔梅克人的卫拉特（Oirat）这一名称。

东突厥斯坦

早在17世纪时，卡尔梅克人也征服了当时在突厥化的蒙古人的汗统治下的东突厥斯坦，这种蒙古人自称为"蒙兀儿"，我们已经看到，这一名称和帖木儿的帝国与帖木儿朝中的察合台的名称一样不是指全国的居民，而是仅指军人阶层而言的。这一名称和西突厥斯坦的"察合台"一词相似，在政治条件发生变化后，逐渐地停止使用了。在卡尔梅克人的统治下和以后在中国的统治下，东突厥斯坦的突厥人不再有自己的民族名称了，也没有这一需要了。民族的个别部分按其所在的城市和地区来命名：可失合儿人，吐鲁番人等。当地的伊斯兰教王公常常用中国的称号：王。

此外，自从蒙古诸汗的时代开始，出身于费尔干纳和特别是出身于为塔吉克人所占据的费尔干纳的北部的宗教领袖，火者（和卓）的若干暴动也许是带有塔吉克民族色彩的，因为它们是针对月即别人和哈萨克人的。在东突厥斯坦，那里突厥化比较深，和卓加入突厥人的行列内，有突厥的绰号。人们往往称和卓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教的传播者。在史料中没有指明这件事。相反，伊斯兰教早在15世纪就在这里根深蒂固了。蒙古诸汗热烈地去传播它，甚至还诉之于暴力。汗强迫其蒙古人缠上穆斯林的头巾，违者就往头部打钉子。据说蒙古人必须剪发，换句话说也许是指他们的辫子。为了加强自己的影响，和卓们也和他们看来是伊斯兰的地方圣人的崇拜进行斗争，虽说很有可能这些地方和到处的情况一样，在伊斯兰传入前已有崇拜的对象和以后人为的将

其归入于伊斯兰的圣人之列，正如在欧洲，崇拜基督教圣人的地方就是从前拜偶像的所在。

东突厥斯坦的文化状况同月即别帝国相比要更落后一些。欧洲和前亚的影响之进入此地就更少了，虽然这里文化语言有一部分是波斯语。摩诃末·海达尔在16世纪中叶所写的历史著作也是用波斯语的，依欧洲学者的解释，它是在可失合儿所写的唯一重要的文学著作，这一著作后来多次被翻译为土耳其语。自从18世纪开始，文学语言专限于土耳其语，但是任何值得注意的著作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一幅非常野蛮的形象也从下列的政治运动中表现出来，通过1860年①，这一运动，在东突厥斯坦此时，即当西突厥斯坦为俄罗斯所占领的时期，在短短的时间内恢复了自己的政治独立。这一整个运动表现出一幅流血的和往往是疯狂的战争的形象。本地居民不独和中国人之间，而且他们彼此之间也进行战争。本地的伊斯兰教历史家承认，伊斯兰教居民只能欢迎中国统治之恢复②。

东突厥斯坦在满洲皇帝被推翻和中华民国建立后，也仍在中国的统治之下。但是在俄国发生的事件的影响下，他们深感民族自治，最低限度文化自治以及民族名称的需要。东突厥斯坦有识之士今天倾向于称自己的民族为“维吾尔”，虽说维吾尔的所有地从未达到喀什噶尔的西部，而在东方则达到很远的中国本部地区内。维吾尔的残余至今还深信佛教，使用15世纪后为伊斯兰教突厥人所完全舍弃了的回鹘文字，在自己的语言中，最低限度在翻译文学中保存有宗教文学。现在在他们中间，回鹘字全为西藏

① 土耳其版原文作1680年。

② 关于东突厥斯坦1864年暴动的原因，它的社会政治特点和研究资料，参考李霍诺夫《1864年的暴动》、《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维吾尔族的历史手稿》、《若干问题》；尤金《若干史料》。——俄译本注

字所排除①。

前　　途

中亚突厥人的未来和其它的每一个民族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他们参加世界文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修建一条横越东突厥斯坦的铁路，并因此恢复前亚通往中国的商道列入考虑之中，虽然这一计划是在报刊上常常讨论的。在有一条经由西伯利亚通往中国的铁路的情况下，还要修建第二条铁路的可能性就较少，此外在技术上它比第一条要困难得多。如果长期以来对此早已提出的问题最后得到解决的话，可能性较大的，对突厥斯坦，特别是对西突厥斯坦来说，是联系欧洲、印度的铁路，它的作用将更大。大家知道，俄国人早在17世纪就寻找经由突厥斯坦通往印度的路了。

---

① 关于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形成的过程和他们的民族文化与语言，参考《东亚各民族》第616—630页；纳吉姆《现代维语》；关于其他的突厥语民族集团（撒拉、裕固），巴托尔德将其同古代回纥发生学联系起来，参考《东亚各民族》，第641—651页。——俄译本注

译后记

一

苏联科学院院士巴托尔德曾于1926--1927年，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大学和苏联塔什干高等教育学院讲授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及突厥和蒙古民族史（六讲）。前者有1927年出版的土耳其版的《中亚突厥史十二讲》（Orta Asija Türk tárîchi haqqynda dérter），1935年孟泽尔（Theodor Menzel）译成德文，名为Zwöef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Türken Mittelasiens（中译同上），1945年堂斯基（M. Donskis）翻成法文的《中亚突厥史》（Histoire des Turcs d'Asie Centrale）和1968年巴托尔德文集第五卷中的俄译本《Двенадцать лекций по истории турецких народо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各种本子都有其特点。俄文译本是译自德文本的，而德文译本又曾经巴托尔德亲自审阅订正、注解和补充，认为符合原讲精神并同意其出版的。《世界境域志》（Hudud al-ālam）的作者也认为这是极好的本子。德译本还有施德的勘误，可供参考。我们的译文就是采用德译本的。

此外还有发表《十二讲》的摘要的，如《土耳其信使》等报。

二

《十二讲》的内容巴托尔德演讲时没有标明，翻译者为了读者易于掌握，曾把每讲内容略作扼要说明。

第一讲　突厥碑文、特别是鄂尔浑碑文研究的主要成果

第二讲　突厥民族及其邻族相互间的血缘关系和语言关系

第三讲　东突厥斯坦的突厥化　乌古斯（245）和回鹘国家（840）的灭亡　摩尼教、佛教、基督教及东伊朗、粟特文化的传入

第四讲　伊斯兰教在突厥人中的传播是突厥人历史上最重要的事实　伊斯兰教作为世界宗教处处胜过基督教和佛教

第五讲　马木特·喀什噶尔的突厥语词典（11世纪）对乌古斯和其他西突厥人提供了丰富资料

第六讲　突厥向西方和西南迁移、进入伊朗的文明世界

第七讲　蒙古人侵前突厥同东西方间的文化关系

第八讲　在喀什噶尔后期花剌子模的繁荣　成吉思汗的勃兴

第九讲　蒙古统治下的突厥斯坦　蒙古王朝（金帐汗国）的形成

第十讲　突厥的民间生活和政治生活与中亚突厥化的蒙古王朝　王朝的崩溃和文化的衰微

第十一讲　突厥斯坦的纷乱和文化的衰落　帖木儿时代　帖木儿的特性　国家组织

第十二讲　直至最近中亚突厥人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

三

前面说过，《十二讲》的各种翻译本各有特点，我们根据这些

人》中就有如下细目：政治情况的变动和混乱、争论和竞争、赛合台帝国、当地藩国的王朝、城市生活的衰落、突厥斯坦的伊斯兰化、中亚蒙古人的突厥语、统一的企图等。有了细目对于原书的参考就更方便了。我们的译本采用了法文本各讲的标题和细目。《巴托尔德文集》第五卷的俄译本出版于1968年，距《十二讲》的演讲时间有四十年之久，在这期间，在中亚突厥史的研究各方面都有不少的进展。为了反映这一情况，我们将五卷中的《十二讲》的新注收到汉译本中。当然这些注释只限于苏联和西方的学者，我国和东方国家的研究成果这里就没有反映。但这许多注释也提供一个了解这方面的线索，便于进一步研究各有关的问题。

《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出版后有多种文字的翻译，可见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德文的译者孟泽尔认为，当时对中亚突厥史的研究巴氏是个最好的专家。他翻译时，每一讲都曾同讲者本人联系，征求其意见，可惜由于巴托尔德的过早逝世，没有全部审完；但也足见他对此书的重视。

巴托尔德是个历史进化论者，同当时的突厥学者拉德洛夫的看法一致。他认为，促进草原国家形成的主要因素不在于氏族结构的发展，而在于游牧社会内部的阶级或阶级斗争的产生。他比较重视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上的作用。但这部书不是用马列主义历史观写成的民族史，正如《巴托尔德文集》第五卷序言的作者克里雅什托尔涅伊所说的那样，作为统一的、完整的历史世界观对巴托尔德来说，仍然是陌生的（第 15 页）。此外，巴托尔德还非常重视宗教的作用，以及强调民族独立政权和为沙俄扩张政策张目，这就更不足为训了。虽然这样，这本书在叙述时间上千年，空间越万里，内容广泛的史学著作中，能扼要的理出个头绪出来是很难得的。与同类的著作比较，这本书在今天仍然是极为有用的参考书，一方面可作为中亚史的ABC，另一方面又可作为深入研究的阶梯。译稿是十多年前译出的，虽经再三核对，可能仍有误译

或不够准确的地方，请同志们指正。本书的注释、索引的编排，全部由吴永明同志独力完成；在译文审阅方面，李佩娟同志对俄文译本相当部分作了详尽的比较，尹文成等同志根据法文译本复制了两幅地图。阿拉伯文的书名承马克林同志核实，任一飞同志为此书又做了一次校对工作。在此，谨向各位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名索引

A

B

C

D

E

F

G

Ğ

H

I

九

K

L

M

N

O

P

Q

R

Š

T

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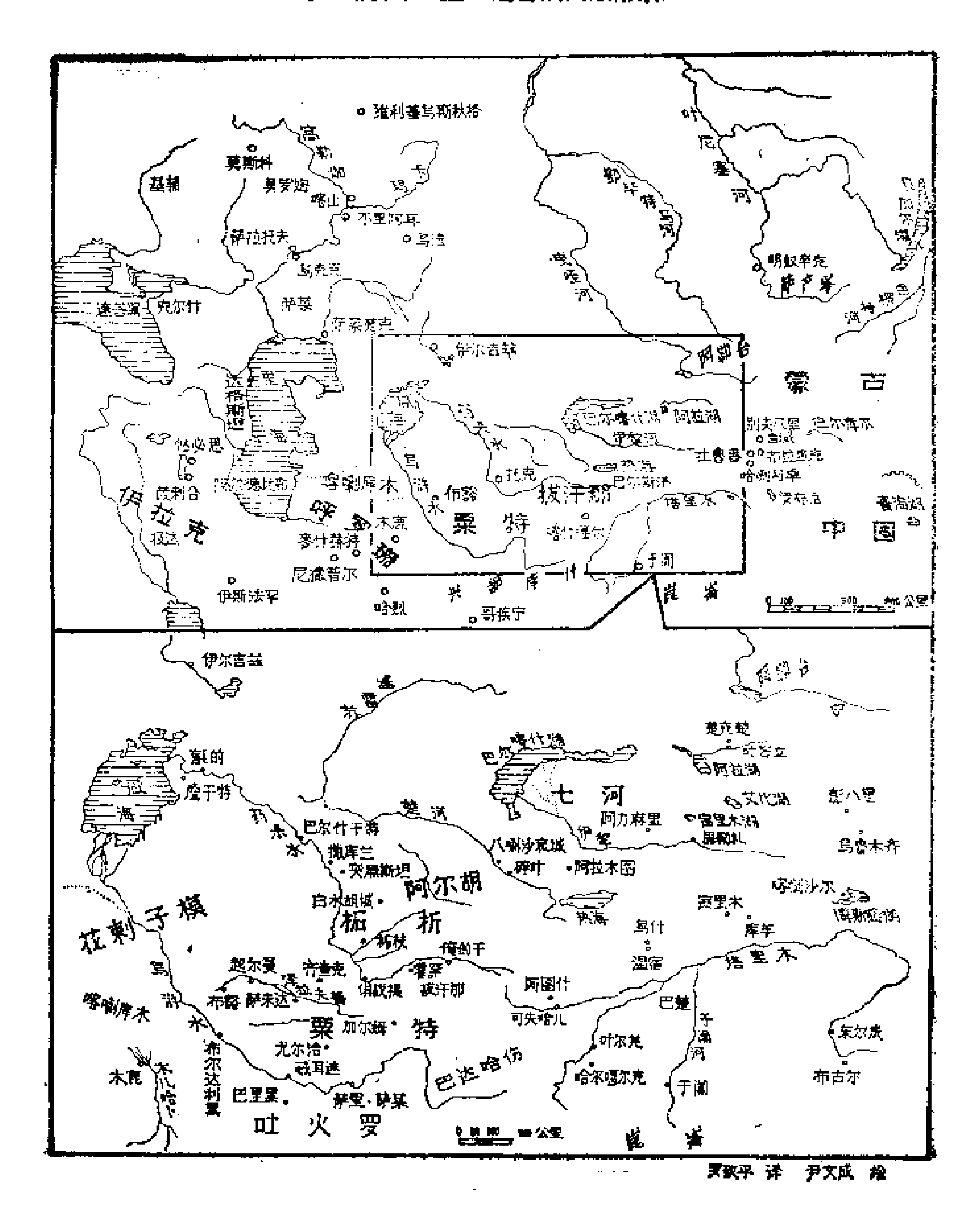
V

W

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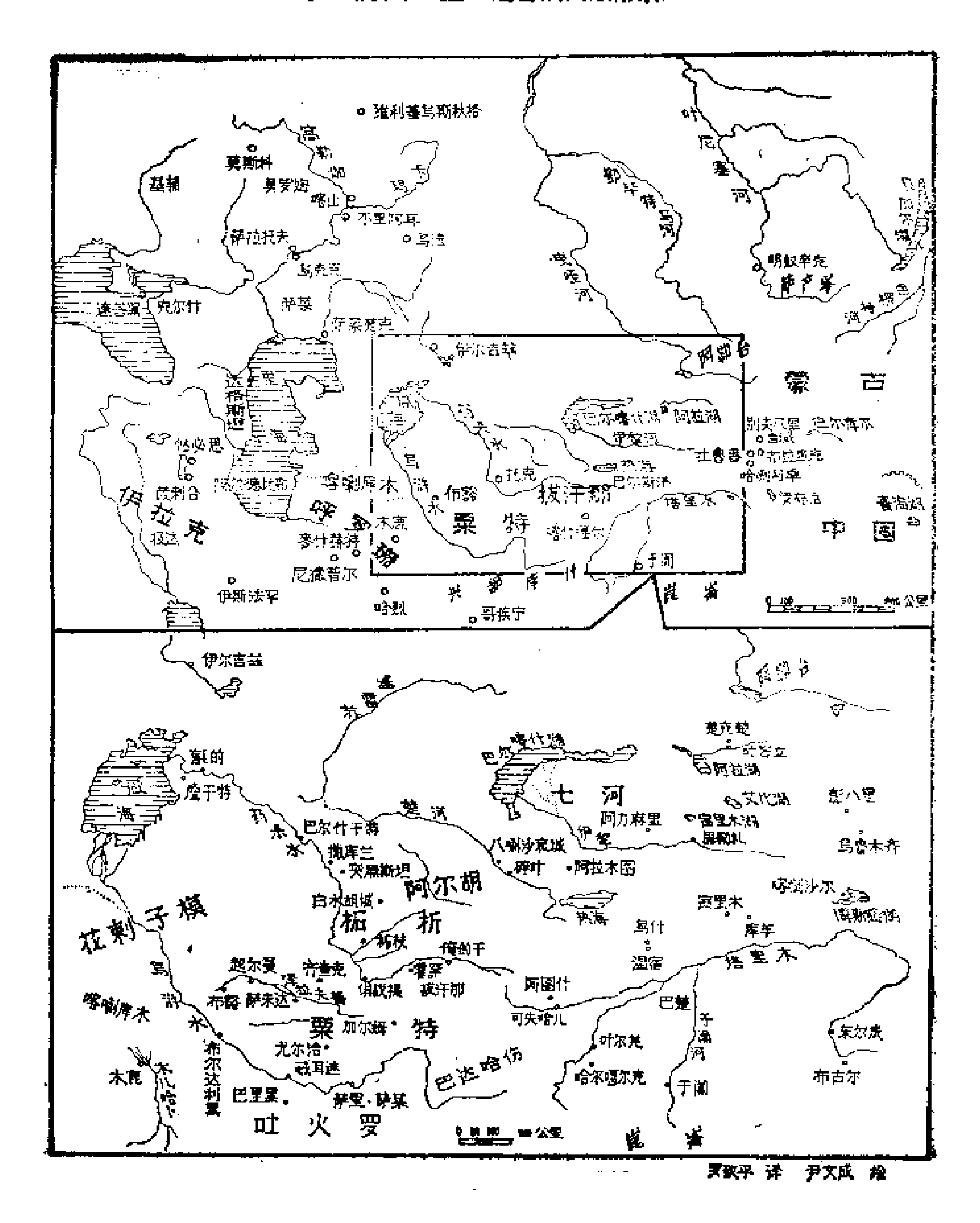
Z

中亚历史地图（选自法文版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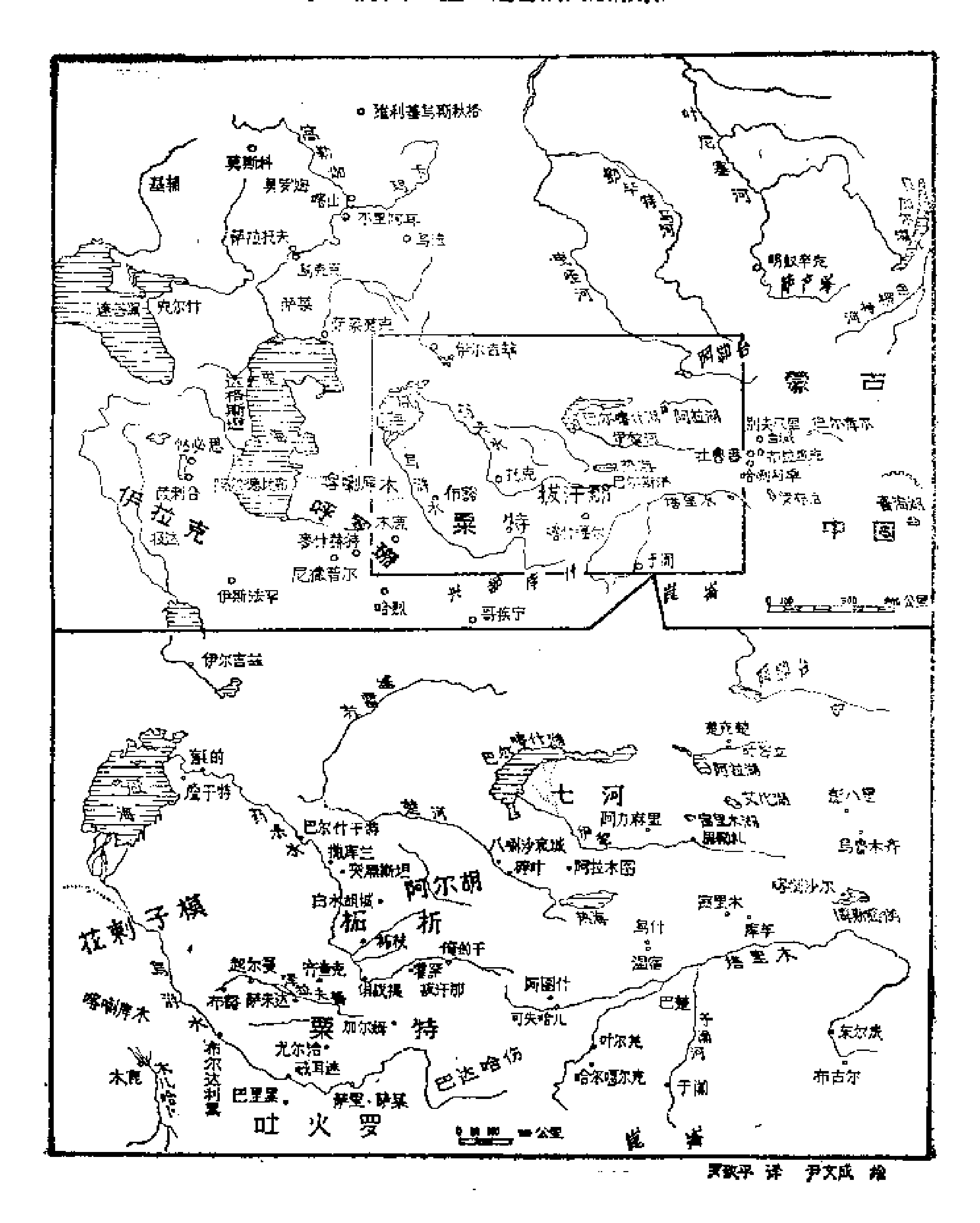
罗致平 译　尹文成 绘

中亚历史地图（选自法文版附录）



罗致平 译　尹文成 绘

中亚历史地图（选自法文版附录）



罗致平 译　尹文成 绘